
目 录

緒言	1
第一章 封建时代教皇的經濟活动	13
第二章 天主教教会在殖民地(十六至十八世紀)	54
第三章 梵蒂岡走向資本主义	89
第四章 羅馬教皇厅及其金融势力	130
第五章 梵蒂岡的政治蜘蛛网	179
第六章 美国的天主教	213
第七章 天主教陣营內的危机	249

緒 言

曾經以上帝榮耀的靈光庇護過封建制度的羅馬教廷，在資本主義時代繼續保護着剝削階級的利益。現代的梵蒂岡不僅是宗教中心，它在經濟和政治利益上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有着聯系。為教廷鼓勵着的有勢力的教權派政黨，現在在西歐活動着。其中的許多政黨，在最近十年間曾經或目前仍掌握着政權（意大利，法國，西德，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奧地利）。天主教會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反動政權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在美國，天主教會愈來愈甚地得到金融寡頭的支持。天主教會將在拉丁美洲，亞洲和澳大利亞，積極地擴張自己的勢力。

根據這些事實，梵蒂岡過去的和現時的活動經常受到關注，是可以理解的。西歐各國和美國以此為題的書籍愈來愈多，就是這種關注的表現之一。各式各樣的稱頌梵蒂岡的書籍，數量特別眾多。

教會的頌揚者們否認教權派在大戰後政治方面所得到的成功應該歸功於資產階級的支持，因為資產階級看出教會在上所進行的蠱惑性宣傳，是和共產主義影響作鬥爭的最有效的武器。教會的頌揚者們斷言戰後教權派在政治方面所得到的成功，証明了在群眾間教會的“新生”和“宗教復興”。但是沒有事實証實這一論據。今天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教徒，要比過去任何時期為少。關於這一點，教會人士自己也寫到和說到。1947

年法国枢密红衣主教修尔在致教廷的諮文中——其上有一个动听的标题“教会能忍受住最后挣扎嗎？”——写道：“在现代无神論所有激烈攻击教会的言論中，我們坦白地承認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信仰衰落了”^①。修尔接着以下面的論調来安慰自己，即宗教信仰衰落現象不仅在天主教教徒占优势的国家里发现，其他国家也如此，这种現象是“所有阶级和所有种族”所固有的。

彼得罗·巴比里神父——教皇庇护十二世的一位顧問——也发表同样的意見，他在梵蒂岡出版的“观念”杂志中写道：“信奉自己的信仰和經常上教堂的信徒正在减少这一事实，客观的观察者不会看不见；社会广大阶层不奉行宗教仪式和上教堂的情形在各国不一样，在同一国家的各个区域其发展程度亦各异——因此，不能不分皂白地同样对待；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对于一些民族來說这事实是无可爭辯的。”^②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俄国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向全世界被剝削者証明了摆脱不合理制度的可能。苏联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更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心。西方劳动群众今日期望改善自己的境况，不是依靠上帝和教会，而是依靠和資本家斗争的胜利。在这种条件下談論宗教的复兴等于以願望代替现实。

虽然有宗教复兴这种奇談怪論，实际上梵蒂岡本身也无力巩固教会在群众間的影响。这本来不是秘密，当梵蒂岡在行动上成为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以反共为自己的主要标志后，許多劳动群众就厌弃了教会。教权派政党的执政，使教徒們有权利要求教会不但賜与“天国”并且要求滿足人們在现实世界上的日常需要。尽管教权派和教会控制着西欧一些大国的国家机

① 修尔：“教会能忍受住最后挣扎嗎？”，羅馬，1948年，第59頁。

② 彼得罗·巴比里：“宗教的不安与可信的宗教”（載“观念”，羅馬，1955年1月，第33頁）。

器，仍然沒有能力滿足群众的期望——群众不問政治或宗教观点如何一致要求和平、进步和社会公平。可是不能說阿登納、皮杜尔和謝尔巴这三位西欧教权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也表达了上面所列举的理想。大家知道，在国际关系上他們曾經是和現在仍旧是“冷战”的支持者，在內政問題上是“强硬政策”的執行者。然而今天这种路綫在教权派本身的陣营內引起了愈来愈大的不滿，这有許多事实証明，意大利、法国和西德的报刊差不多每天都有这种报道。

当进步陣营的代表人物指出，在天主教的工会、政党和其他群众性組織，以及在天主教的知識分子队伍中，爭取一切善良人們的团結、拥护和平共处政策、拥护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爭取殖民地各民族获得自由的呼声愈来愈雄壮时，梵蒂岡的刊物恼怒了。梵蒂岡的刊物断言左翼分子企图用这种方法把信教群众和他們的神父隔离开来，断言左翼分子感兴趣的只有一点：破坏梵蒂岡在教徒心目中的威望。

不言而喻，在这些断言中沒有一点眞实。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羅馬教皇在1955年的聖誕文告中表示贊成停止試驗原子武器，得到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报纸的广泛反应。这种証明进步陣营以客观态度对待梵蒂岡的事实，还可以举出許多来。

但是梵蒂岡繼續和国际反动势力最侵略性的集团一起，联合反对社会主义陣营。教皇在1956年不止一次地煽动波兰、匈牙利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天主教徒反抗政府。全世界都知道，梵蒂岡委派在匈牙利的紅衣主教明曾蒂，是1956年反革命暴乱的首魁之一。梵蒂岡刊物一貫地歪曲苏联的和平政策，把苏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每一个爱好和平的行动，說成是“宣传”。

我們可举这一事实为例。庇护十二世在致1956年在科隆举行的全德天主教77届大会的信函中，支持阿登納总理的侵略政策，并且不顧事实，硬說教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在同一信函中，羅馬教皇号召天主教教徒不要相信“和平共

处的海市蜃楼”。难道这不是号召繼續进行今天为每一个正直的人，不論其哲学或宗教观点如何，所指責和憎恶的“冷战”嗎？

但是，梵蒂岡今日的首腦人物們对早已破产了的“冷战”政策的偏爱，和他們对社会主义陣营的仇恨，毫不意味着所有的天主教教徒，甚至于天主教教会所有的主教，都同意这一路綫。

現代天主教思想著名的代表約瑟夫·馬迪写道：“天主教教会的存在决定于它善于适应新的历史条件”^①。今天的“新的历史条件”，首先就是差不多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号召“消灭”共产主义的天主教僧侶們，早應該認清这一事实，并且从而作出相应的結論。

在現代的进步書籍中，苏联的和国外的，有不少著作是从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梵蒂岡的各方面活动的；例如梵蒂岡的外交政策，其代理人在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反人民罪行，耶穌会的历史以及其他等等。但是，关于梵蒂岡及天主教教会和統治階級，特别是和金融資本的具体联系这一問題，研討得最为不够。

同时我們知道，列宁即認为这一問題有着重大意义。在“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写道：“凡屬包含有許多具体事实与比照，能把現代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及其階級組織与宗教团体和宗教宣传机关間的联系揭示出来的書籍和小冊子，都是我們特別必須利用的。

凡关于美国的一切材料都极为重要，因为那里宗教同資本发生的正式官場国家联系，还表現得不甚明显，但是另一方面，那里却又令人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所謂‘現代的民主制度’，不过是表示可以自由宣传有利于資產階級的东西，而对資產階級有利的东西却是最反动的思想、宗教、黑暗观念，为剝削階級作辯护等等。”^②

① 馬迪編纂：“教会与社会”（天主教社会、政治思想和运动，1789—1950），紐約，1953年，第95頁。

根据列宁上述的指示，本書作者試圖闡明梵蒂岡的至今尚不失却其现实意义的历史的各主要阶段及其在現代的活动。作者不仅仅引据用馬克思主义观点和用資產階級观点編纂的史料，在相当程度上也引据教权派編纂的史料，适当地将其特点介紹給讀者。

大家知道十八世紀伟大的启蒙者們的著作和十九世紀进步学者和历史学家們的著作，給予教廷的頌揚者們一个打击，他們把教廷描摹成系出于神意而产生的理想組織。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和工人运动的扩展，强烈地动摇了天主教和教廷所占有的陣地。从十九世紀下半叶开始，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和保卫資本主义制度原則便成为天主教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中心任务。

以科学态度批判宗教、天主教的哲学和历史的胜利，迫使梵蒂岡以自己的历史学者們出場应战，这些学者們似乎能从“科学”立場上来捍卫教会的利益和威望。于是世界上就出現了一个現代天主教(教权派)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任务是以伪历史方法将教会的历史理想化。

这一学派的鼓励者是里夫十三世，第一个浸透資產階級思想的教皇。

教权派历史学派是如何体现里夫十三世的意图的呢？这可以根据这一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德国人路德維希·馮·巴斯托尔(1854—1928)的例子来判断，他根据里夫十三世的提議，写有共十六卷的教廷历史^③。和巴斯托尔共事的有一些耶穌会会徒为他提供为教廷辯护所需的文件和論据。从篇幅的浩繁和所引用的材料的丰富來說，巴斯托尔的著作可以說是博大精深的。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5—206頁（俄文版）。（譯文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第460頁。——譯者）

③ 路德維希·馮·巴斯托尔：“中世紀后的教廷史(XV—XVIII)”，第一卷至第十六卷，夫蘭堡 1886—1933年。

然而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作品。巴斯托尔并不否認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些教皇道德敗坏的事实，如西克斯脫四世、亚历山大六世、里夫十世等；但是巴斯托尔断言他們的敗行是时代所特有的，不是教会所特有的。巴斯托尔把教皇在文化、政治和外交上的活动加以美化，他贊揚反对宗教改革，称頌耶穌会。他对教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物質联系諱而不言，对加以分析后会显出教廷真面目和降低梵蒂岡威望的其他許多問題避而不談。巴斯托尔違背历史真理，企图証明，不管天主教教会有着一切的“弱点”，它是人类社会所需的和有益的机构。他在十六世紀耶穌会的詭辯家培拉尔明的論据上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培拉尔明說：假使教会由品質优秀的神职人員主持时，那末教会命运的經久不衰可以解释成由于他們的賢明所致，这是很自然的；可是若由道德敗坏的神父領導着时，那末教会所得到的成功只能認為是由于不可思議的原因所致，不能作別的解释①。

培拉尔明的論据直到現在仍旧是梵蒂岡頌揚者們特別喜爱的武器，借以証明教会的“神意”的性質。例如，一位名叫保罗·卡立雅里的僧侶在他所写的“从近处看教皇——护教札記”一書中，承認过去有許多教皇是积习甚深的罪人，这还是客气的說法。这本书的出版是得到梵蒂岡当局的同意，赶上紀念“神圣的”1950年的。卡立雅里在談到中世紀的教皇时說：

“事实的确如此，当教皇刚才即位，立刻把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安插在自己的周围，好象他唯一关心的是使自己家族致富和显赫。亚历山大六世、烏尔朋八世、里夫十世、巴維尔三世、亚历山大七世等忘記了他們是教皇，而只記得他們是巴尔特齐亚，巴尔比林尼，密奇契，法尔尼什和基特齐。他們的侄子們，甚至

① 現在梵蒂岡还有人記得，庇护七世似乎在回答拿破仑消灭天主教教会的威吓时說：“陛下，假如我們僧侶在二千年間，以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尚不能办到这一点，那末您将也无法办到”。

年齡尚幼的和沒有任何优秀品性的，裁決着教會中重大和重要的事務。徇私這一污點（庇護親屬——作者）在教會歷史上持續了三百年”^①。的確卡立雅里說，教會的歷史不是一部寧靜的田園詩，而是戲劇；確確實實有許多卑鄙的教皇莊嚴地坐在“神聖的寶座”上；然而這事實本身就是教會系出于神意而產生的證明。因為教會假使沒有上帝的庇護，早已因不勝負担自己的罪孽的重荷而復滅了。“難道這不是奇蹟嗎？”——卡立雅里及和他持相同見解的人質問道^②。

羅馬教廷的現代頌揚者們就是這樣地絞盡腦汁，將罪惡充作德行。

培拉爾明—巴斯托爾的“理論”在美國教權派歷史學者中特別受到歡迎，因為依靠這一理論，不僅很容易證明天主教教會的“神聖的”性質，同時能證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神聖性質。

美國教權派歷史學家梅納德在所著的美國天主教教會史一書中指出：“可以完全肯定地說，天主教教會中的雜亂無章證明教會是出于神意而產生的”^③。梅納德的同行——愛德華·華金同樣地寫道：“天主教在其具體的化身上（即指教會而言——作者）能夠降低的程度和能升高的程度相同；天主教在最良好的狀態時——是最好的，好到能表現出真正的基督教，在最壞的狀態時，比什麼還要壞。因此（！？）天主教是所有宗教之中最好的和最真實的宗教。”^④

其他的教權派歷史學家們，一方面承認許多中世紀的教皇是道德上的醜陋兒和欺詐者，說道：在非宗教的世俗事務上和在自己的私生活上，這些教皇確是那樣的，至于觸及宗教問題時，

① 保羅·卡立雅里：“從近處看教皇——護教札記”，米蘭，1950年，第45頁。

② 同樣的觀點見諸梵蒂岡當局同意出版的，供有文化的讀者閱讀的著作中，例如：海華爾德：“羅馬教廷史”，巴黎，1946年；黎吉·斯蒂芬尼尼：“天主教”，1952年。

③ 西奧圖·梅納德：“美國天主教史話”，紐約，1943年，第249頁。

④ 愛德華·英格倫·華金：“天主教中心”，紐約，1943年。

他們仍然是形式上忠实于教会的信条的；作为人而言他們是有罪的，但是作为教会最高級神职人員而言，他們是无可疵議的。例如，意大利教权派历史学家保罗·勃立齐就是这样議論的，他把教皇的伪善提升为最高度的德行。他并不否認許多中世紀的教皇是些卑鄙的人。他同意象这些事实——如約翰八世的被勒死、謝尔塞三世对福尔摩茲教皇尸体的凌辱、約翰十二世淫佚的生活、貝尼奇克脫九世将羅馬教皇皇冠出賣給格里哥里六世等等——証明了中世紀教廷的腐敗。可是立刻又补充道：“这些教皇中間沒有任何人破坏委托他們监护的教义，沒有任何人从教义的观点去批准不道德的行为……。总而言之，站在忠实于我們客觀的(?)教理的立場上，对教廷历史上这一需慎重研究的和引起爭論的时期可以作出結論說：不論教皇有着个人的弱点，羅馬教会仍旧是彼得的教会。”^①

虽然这种“論点”早被中世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嘲笑过了，特别是受到巴卡乔的嘲笑，可是教权派历史学者們(因为沒有更好的)在今天繼續彈着这一老調。

教权派历史学把封建时代教会的活动理想化。

这种观点在意大利教权派历史經濟学者阿明托列·范范尼的著作中表現得特別明显；他現在是天主教民主党的总書記。他在1934年初版的“資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天主教与新教”一書中，把封建主义說成是受天主教“公正”倫理道德思想鼓舞的一种制度，与資本主义作对比，而資本主义似乎是在新教的“利己”倫理思想影响下产生的。^②美国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社会学者克劳宁持着同样的見解。^③可是范范尼、克劳宁和其他一些和

① 保罗·勃立齐：“羅馬教皇”，羅馬，1951年，第96—97頁。

② 阿·范范尼：“資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天主教与新教”，米兰，1934年，第105頁。范范尼的這本書已譯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在西歐和美洲广泛流传。

③ 約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原理，天主教教会的社会教义对于美国經濟生活的适用”，密尔賓基，1951年，第11—12頁。

他們一伙的人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对于天主教倫理道德在如何尊崇封建剝削一事避而不談。关于这一时期的教会和僧侶的“社会”活动，他們往往保持緘默。

教权派历史学者以及許多資產階級历史学者断言教会在殖民地中起过“积极作用”；似乎教会曾經保护过当地居民不受殖民者的压迫，在殖民地传播文化，以及介紹声名狼籍的“基督文明”。他們說天主教教会曾起了某种阻碍作用，減輕了殖民制度所造成的慘禍。

某些教会的頌揚者們甚至企图証明教会曾力图在殖民地，特别是在美国，建立起理想的“基督秩序”，它类似卡姆柏尼拉的烏托邦式的“太阳城”，如果說这一試图未获成功，則罪責在于世俗的殖民者們的反对。阿根廷历史学者茄迪亚断言，例如，甚至西屬美洲的从殖民者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事实，应归功于僧侶們的传布基督教义和福瑪·阿克汶斯基“伟大的”理想，据說它在当地居民中有着广泛影响。^①

天主教历史学者企图把教廷为反对意大利統一而进行的斗争，把梵蒂岡和法西斯和納粹的同盟，以及現在梵蒂岡投靠美国的路綫認為是正当的。同时他們隱瞞梵蒂岡和天主教会与資產階級間的政治和經濟关系，把教会打扮成超階級的传播永恒眞理的，其活动有益于社会上一切階級的組織。

教权派历史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是由耶穌会历史学者組成的，其著名代表之一为耶穌会会徒彼得罗·塔基—汶都里，他曾为墨索里尼的懺悔神父，著有“意大利耶穌会史”一書。^② 在其仿巴斯托尔体裁的也是受里夫十三世委命而写的書中，塔基—汶都里将教会历史分成两个时期：耶穌会成立前时期和耶穌会成

① 欧列魁·茄迪亚：“殖民地和独立”（*厄危地馬拉地理历史学会年鉴*，第二十六卷，第7—8頁，1952年）。

② 彼得罗·塔基—汶都里：“意大利耶穌会史”，第一、二卷，第二版，羅馬，1950年。

立后时期。他认为教会在伊納息·罗耀拉 (Ignatius-Loyola) 之前的一切都是应被指责的，而在罗耀拉以后的一切都是可讚美的。塔基·汶都里引据了数以百計的原始資料，将罗耀拉以前的教会描繪成为污秽不堪的处所。他揭露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二世和巴維尔三世“罪孽深重”的生活。可是当罗耀拉和耶稣会一出世，照这位前墨索里尼忏悔神父的断言來說，就出现了奇迹。罗耀拉和耶稣会会徒“治愈”了教廷所有的癰疽和毛病。在所有上述的耶稣会的这一概念中只发现一个“可是”，这是因为耶稣会本身的活动犯了如此深重的罪孽，以至于象巴尔特齐亚及和其他类似的一些罗耀拉以前的教皇們的行为，同它比較起来簡直象纯洁无垢的少年們所干的淘气事一样。这禁不住要問了：在这种情形下，耶稣会能治愈誰和如何治愈他人呢？

教权派历史学派另一个流派是由所謂自由主义天主教拥护者組成的。这可以举意大利科学研究工作者阿多罗·卡洛·叶摩洛^①和前已提及的美国人約瑟夫·馬迪为例，他們是从事研究现代教会的历史的。自由主义教权派历史学者們对教会的政治活动予以批判性的估价。然而他們总归是信徒，他們企图証明教会并没有过时，教会是可以改正，适合现代潮流和健全起来的，同时教会是可能和应该在现代社会中起“积极”作用的。^②

恩格斯說过，宗教乃是“人所創造的，在它特有的全部真誠的狂热之中，即在初創时期，已非进行欺騙和歪曲历史事实不可了”^③，当宗教在衰落时，更非捏造历史不可了。天主教在这一

① 阿多罗·卡洛·叶摩洛：“近百年来意大利的教会与国家”，都灵，1952年。

② 现代资产阶级“非宗教界”的历史学和自由主义教权派的这一观点相互呼应。大多数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也发表同“理想”教会拥护者們同样观点的文章，即教会不仅要宣揚善行，并且还要躬自亲行。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拥护“健康”的教会，反对腐败的教会。实际上他們同教权派历史学者一样，是从理想的立場出发的。

③ 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莫斯科，1955年，第150頁(俄文版)。

方面并不例外，教权派历史学派理論上的立足点即証明了这一点。

然而天主教历史学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客观的样子，不得已引了大量資料来作科学研究，其中不少資料和作者本来的意图相反，它們把梵蒂岡和天主教会活动的真正性質揭示了出来。

应该指出，近年来梵蒂岡的代表人物愈来愈甚地反对历史科学，反对历史主义。梵蒂岡在这一观点上是有它自己“重要的”原因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胜利的影响，在天主教陣营內出現了所謂进步天主教徒一个派別，他們要求教会不要将自己的命运和必然要灭亡的旧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去和代表将来的共产党人結成同盟。我們看看和进步天主教徒进行辯論的耶穌会会徒安东尼奥·密西尼奥在梵蒂岡的杂志上是如何說明进步天主教徒們的綱領的：

“俄国领导的无产階級群众和以美国为首的資本家之間的民主斗争的結局，历史已經作出了。历史发展的結果必然是正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的和在夺取政权的无产階級获得胜利。新社会将声言劳动的胜利和劳动群众的胜利。所以除了投入历史的潮流之外沒有其他出路，为的是去竭力指导历史的流向，表达它的需要，将无产階級的事业取过来掌握在自己的双手里，和它的领导力量联合起来，去了解共产主义以及接受它的观点。

在进步的天主教徒的理解中，教会和天主教徒对馬克思主义思潮的‘伸手’政策应当不是一种多少有些謹慎的策略，而应是历史发展所导致的无上命令。拒絕这一政策，或更坏些是和保守力量联合在一起，意味着违反潮流开倒車，跳出历史圈子，从而宣告自己的毀灭。在这种情况下无情的辯証运动将会把教会推倒，只因为教会不願去理解历史精神和拒絕立即去领导历史的先进队伍。”^①

这样，甚至連耶穌会会徒密西尼奥也被迫承認进步天主教

徒的观点是建筑在无可争辩的事实上的。比事实还要坏的是，这位耶稣会的颂扬者答道：大家承认的历史是没有的，因此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获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密西尼奥只承认一个“历史”，这个历史的主要人物就是上帝。没有上帝的意志人甚至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上帝创造历史；因此在密西尼奥的理解中，历史不会导致共产主义的胜利。假如将历史视为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一些发展较低的阶段为另一些发展较高的阶段所代替，又假如在历史事件中引用“肉体和物质相互关系的原理”，这就是说假如用真正的科学观点来代替神秘论和宗教故事时，那么“历史消灭了”，消失了，而这显然是一个争论的题目。^②这就是教权派历史学现代代表人物耶稣会会徒密西尼奥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者对梵蒂冈和教权派反动政策有系统的有充分文件作根据的批判，不仅在过去和现在对教权派阵营的下层有着巨大的影响，使他們看清事实。在这一批判的压力之下，教权派领导集团也被迫迂迴作战，有时装得比他們实际上还要“民主”和“激进”。这也反映在教权派的书籍中，因为它无法对进步阵营的观点保持缄默，而是应该起来与之辩论。于是，不管革除教籍和被視為异教，先进思想传播到教会不准进步人士进去的处所：天主教学校和組織，天主教工会，甚至传播到僧侶和寺院中間，它喚醒了理智，打破了过时的理解和战胜了世世代代的偏見。

① 密西尼奥：“前进的历史”（載“天主教文明”，羅馬，1956年5月5日，第247頁）。

② 密西尼奥：“进步的預知”（載“天主教文明”，羅馬，1956年6月2日，第470頁）。

第一章

封建时代教皇的經濟活动

中世紀教皇的“善行”和恶行，被唯心論历史学者解释成为羅馬教皇的个人品質問題，在实际上有着远为深远的根源。中世紀教皇所扮的角色特別因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最大的大地主而决定的，教会所拥用的田产不少于全部天主教田产的三分之一。教会从思想上把西欧各国的封建社会联合起来，尊崇封建社会中的統治秩序，首先就是尊崇对农民大众的剝削和奴役，因为教会本身对此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既然以教皇为首的“基督神秘的身体”——神学家是这样称天主教教会的——代表着封建制度的利益和作为它的产物，那末可以根据教皇的經濟活动来研究它，准确地來說，是根据封建时代他的收入来源和支出項目来研究。

領導早期基督教公社的“先知”和“导师”們在布道时宣传穷困、节慾、蔑視世俗的財富和自我牺牲是进入“天国”的手段。他們和公社中的其他成員一样，不享受特殊权利。

二世紀末叶随着基督教中穩健派的胜利和教会組織的形成，主教便在教会組織中占首要地位，开始掌握公社中的財產和对外代表組織。主教的威信和权力不是建立在他們的“道德声望”上的，而是建立在他們作为公社中的家政管理人，掌管它的物質財富上的。作为帝国首都羅馬的主教具有很大的經濟和

政治势力。教廷是在羅馬主教教区的基础上逐漸形成的。

当基督教成为羅馬帝国的国教后(从公元四世紀初开始),主教的权力就愈加大了。皇帝和大地主們施与教会巨額饋贈,使它巩固起来,結果教会便成为拥有大量連帶奴隶的田地的大地主和殖民地的所有者。

教会的财产由于饋贈而不断地增加。教会的田产在拜占庭和哥特族战争期間也不断地增加,因为当时各处的无政府状态和內乱,甚至使許多貴族上层人物也躲到教会中和求教会保护。当犹斯蒂尼安統治时期,教会的财产增加得还要快,他經常庇护教会和幫助它增加财富。①

田产集中到教会手中的过程是在前羅馬帝国全境內进行的。

例如,在加列当法兰克人改宗信奉基督教时,国王們竟相比賽誰捐獻給教会多。他們捐給教会以土地、金錢、珠宝和貴重家俱等等。

在西班牙也是如此,当中世紀早期,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变成了大地主—封建主。西班牙的僧侶在自己的土地上收租,并且要求农民服劳役。②

意大利的教会特別富有。公元六世紀时,前羅馬皇帝們在西西里和卡拉勃利的大地产是归屬于教皇格里哥里一世的(540—604)。耶穌会会徒奥古斯丁諾·薩白在他的共三卷的“教会史”中,不无驕傲地写到格里哥里一世道:“他是羅馬帝国疆域內最富有的土地所有主”;然而又老实地补充道:“我們的教皇在对奴隶問題上采取了公正的措施,为了象人一样地去对待奴隶,他常常解放他們。然而不应当認為所有的奴隶都获得了自由。”③

① 路察篤:“意大利經濟史”,莫斯科,1954年,第167—168頁。

② 拉法爱里·阿里塔米拉与克立維阿:“西班牙史”,第一卷,莫斯科,1951年。

③ 奥古斯丁諾·薩白:“教会史”,第一卷,都灵,1927年,第463—464頁。

僧侶們为了把田产和其他物質財富弄到手，不惜施展任何手段。为此目的他們采用了各种把戏，詭計和作伪，包括編造奇迹。“为了繼續不断、花样翻新地喚起人們捐獻的兴趣——德国历史学者洛特写道——我們看到，他們所采取的手段是多么卑鄙无耻啊！在天国极乐与地獄之苦这一类的渲染描繪不再見效的时候，他們就从遙远的地方搬来圣徒的遺骨，举行巡迴展覽，盖起新教堂来；这在第九世紀簡直成为一种正式的营业部門了……当薩松的圣弥尔修道院的使者，在羅馬費了极多的周折，乞求到圣瑟罢士梯安的遺体，并将格里哥里的遺骨也一同偷偷运走，而把两者放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跑来那么多的人們瞻仰新的圣者，那地方簡直象是飞来漫天遍地的蝗虫，对于求助者，不是一个一个地，而是成群結队进行治疗的。結果是，修士們只得用升子来量金錢了，所用升子共計 85 个，修道院的黄金儲藏量达到 900 磅。”^①

許多神职人員，包括教皇，从事伪造文件以攫取財產，为了增加自己的財富他們毫无忌憚地利用伪造的文件。教皇和宗教會議热烈地保卫着教会接受饋贈的权利，并以革除教籍威胁与之竞争的人。

中世紀初期的教皇不能控制羅馬范围以外的和意大利南部以外的教会。当地教会的上层权貴是由自己的牧师团体推选出来的，并由王国政府批准，王国政府要把教会收入的极大部分据为己有。公元八世紀时形成了教皇国——“教会区”。数世紀之久的時間内，教皇为爭取羅馬主教的权力居于所有基督教教会之上而进行了頑强的斗争。这些計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實現了。教皇成为大封建主，其势力远远超过教会領地范围以外。

公元十一世紀时教皇的地位大大地巩固了。在这方面克留尼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克留尼运动发生在十世紀，它起源于法

^① 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莫斯科，1938年，第 65—67 頁。譯文根据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刘瀟然譯本第 76 頁。——譯者

国的克留尼修道院。克留尼修道院的僧侣要求进行教会改革以提高僧侣和教皇的声望和巩固教会的纪律。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托钵僧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托钵僧为了“复兴”教会，却成了农民的灾难，他们以讹诈和强要对农民骚扰不休。1131年召开的宗教会议承认“贪婪的火焰燃烧着爱财的僧侣们，他们把真理和谎言混淆起来，以便为自己挣得更多的金钱”。“金钱——法兰西斯教派的蓬那汝多拉在十三世纪时愤慨地说道——这是我们僧团最致命的死敌，金钱使我们的弟兄们激起如此可怕的贪欲，它使行人怕和我们遇见和象见了无耻的路劫者一般地逃跑。说我们贫穷乃是最可怕的谎言。我们象穷人似地在乞求布施，可是生活极其奢侈”。

当里夫九世(1041—1054)这位克留尼纲领热烈的信奉者执政时，教会所有的财产和收入都宣布为教皇的私产。这一决定使教会财产是穷人们的财产这一神话最终地埋葬了，而教皇则有可能不受监督地处理教会的收入，并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世俗权力。

里夫九世的继承者教皇格里哥里七世(1073—1085)开始和罗马皇帝亨利四世争夺“封圣职权”，即争夺授与主教称号及其任命和撤换的权力。在此以前，这一权力是属于世俗的君主的。国王和皇帝们可以出售主教和其他神职，从而得到不少的收入。格里哥里七世要从世俗君主手中夺取封圣职权和将教皇的权力凌驾于皇帝之上这一意图，反映在他公布的著名的教皇“通牒”一文件中。格里哥里七世在这一文件中宣布教皇有权废黜君王，授予和解除主教称号，设立新教区，把教区分开或合并，将主教从一个教区调至另一个教区，解除臣民对“坏君主”所作的效忠誓言等等。

教皇的神权政体的野心没有完全实现，因为遭到世俗封建主和皇帝政权的反抗。封圣职问题在教皇和皇帝政权相互让步下解决了，它巩固了教皇的威望和有助于教会手中财富的进一

步积聚。

格里哥里七世所实行的僧侣独身制度，对教会财富的保存和积累起了一定的作用。僧侣独身制使他人无法繼承神职和教会領地，阻止了教会财产的分散和漏失。^①然而事实上僧侶們从来不遵守这一制度。

十二世紀时建立了教会的中央行政机关——羅馬教皇厅。教会的中央行政机关由一些机构所組成——紅衣主教团和办公厅，其中大部分机构現在仍旧存在。教皇厅中的掌管教会收入的机构起着首要作用。应该指出，教皇厅所有的机构在或大或小程度上都为教廷国库增加财富。按照德国历史学者貝藻立特的話來說，中世紀的教皇厅就象一架专门榨取金錢的巨大机器。它的唯利是图和貪得无厌令人惊异地为所有中世紀的資料一致提到。

“有一句諺語說道，在羅馬什么都可以卖，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事实上用金錢可以买到一切，从微不足道的乡村小教区直到紅衣主教的僧帽，从允許在齋戒期吃葷一直到杀人和血亲婚配”^②。

教皇厅的主要机构是使徒署，它起着国库和財政部的作用。使徒署的存在最初見于教皇貝尼奇克脫八世的自 1071 年起的訓諭中，可是只有当十三世紀时，因教皇的势力增长到能作用于基督教世界，使徒署才具有极高的地位，一直到中世紀末期为止。^③

教皇的收入大部分归入使徒署。使徒署經理鑄造有浮雕的

① “宗教改革时期，教会的财产被世俗君主所攫取，而神职人員則轉而成为国家的官員，支領一定的薪俸，僧侶对保存独身制毫无兴趣是完全自然的。新教的神职人員只要自己願意，养育随便多少子女都可以：他們弄不到教会财产以据为己有和传给子女”（卡尔·卡烏斯基：“最新的社会主義的前驅者們”，第一卷，莫斯科，1924年，第 34 頁）。

② 弗里德里赫·貝藻立特：“德国宗教改革史”，第一卷，1900年，第 7 頁。

③ 尼哥罗·李：“羅馬教皇厅”，羅馬，1952年，第 265 頁。

錢幣和起着教會行政審判廳的功能。當烏爾拜六世時(1379)，所有牽涉到教皇利益的訴訟案件，都由它來解決。根據同時代人的證明，十七世紀時使徒署有權審訊“侯爵、大公、高級官員、主教、大主教、總主教、紅衣主教”。^①

使徒署通常由特別得到教皇信任的有宮庭總管頭銜的紅衣主教領導(稍後為事務總管頭銜的紅衣主教)。擔任這一職位的意思根據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了，即宮庭總管不止一次地被選為教皇(最近幾十年中的教皇中有里夫十三世和庇護十二世曾擔任過此職)。宮庭總管在教皇的宮庭中具有很大的權勢。除了直接的職務外，他還管理教皇宮庭中的工作人員，證明教皇的死亡，在教皇死亡後繼承人未選出期間領導教會和主持選舉教皇的紅衣主教會議。^②

宮庭總管是教皇意志順從的執行者。使徒署真正的領導人應該是教皇自己，教皇確定稅收和捐獻額，監督這些款項的繳納，以及處理使徒署征集來的錢財。法國歷史學者雷諾阿爾在研究過阿維尼翁時期(十四世紀)教皇的檔案後，寫道，財政問題在教皇信札中所占的地位和神學問題一樣多。^③

使徒署的工作人員由宮庭總管任命，由副宮庭總管領銜，副宮庭總管從十五世紀起兼任羅馬總督、收款簽章和負責保管的出納員、書記和信使。

使徒署管理著一大批財政代理人，即負責在當地征收教皇所定的稅收、人頭稅和其他進益的徵稅官。通常整個國家受他的管轄。徵稅官屬下設有副職，負責征收一個或數個教區的教皇稅收。徵稅官的權力超過主教。徵稅官有權把頑抗不向使徒署交稅的債務人革除教籍，並予頑固抗稅的人居住過的地方以禁

① 雷納杜羅：“羅馬教廷關係史”，1950年，第96頁。

② 所有這些職務現在由事務總管—紅衣主教擔任。

③ 伊夫斯·雷諾阿爾：“1316年至1378年之間教皇阿維尼翁與財團間的關係”，巴黎，1941年，第4頁。

止举行宗教仪式的处分。^① 教皇的特派使节起着全权征税官的作用，他们有权课处某个地区或国家以教皇制定的额外人头税。

十二至十三世纪时，使徒署有庙堂僧团因为它贮存、运输和兑换缴入教皇国库的金钱。德国历史学者普鲁兹指出，这一时期庙堂僧团拥有巨额的财富。十四世纪初期，庙堂僧团的财产估价达2,500万至6,200万法郎，它带来200万法郎的收入，据普鲁兹说，折换十九世纪时的市价，还要大上25倍。“教堂、寺院、庙堂僧团在巴黎的总部简直成了一个国际交易所，远居各地的商人来到这里，甚至君王们也来到这里：法国国王们把自己的国库搬到这里来了，并且命令在此付款和收款。很明显，庙堂僧团并不是仅仅因为对亲近的人的爱而从事这种业务，不想为自己谋取利润的。庙堂僧团的军事力量和拥有的大量土地没有人能抗争，循着这条道路发展，它最后成为财政上的强国。”^② 庙堂僧团在十四世纪初被消灭，财产为法国国王攫去。

十三世纪上半叶使徒署开始利用意大利的大银行和大商行，委托它们在基督教欧洲的各区和边区征收教会的税收。

“教会的收入通过银行和商行来征收，工作就进行得远为快捷，而当需要的时候——教皇厅差不多经常是这样的——银行和商行会予先支付教皇尚未收到的款项的全部，以图事后取得利息。存款会带来巨额利润，因为教会在仅仅一个省的收入即达好几千里拉，有时达几万里拉。许多银行为教会征收好几省的收入，有时要征收好几国的收入。”^③

十三世纪时，有塞那银行家庞西尼奥里和佛罗伦萨的莫茨和弗立斯哥巴立达公司为使徒署效劳。十四世纪时为教皇厅效

① 伊夫斯·雷諾阿尔：“1316年至1378年之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間的关系”，巴黎，1941年，第12頁。

② 普魯茲：“中世紀泰西國家史”，第二卷，柏林，第49—50頁。

③ 路登堡：“意大利早期資本主義簡史——十四世紀佛羅倫薩的商行”，莫斯科—列寧格勒，1951年，第76頁。

劳的有以下这些銀行家：路加的里卡其和庇斯托雅的克雅稜蒂，佛罗倫薩的斯宾尼、斯卡里、巴尔其、佩路茲、亚尔培蒂和梯契。

銀行家們为教廷效劳是有利可图的。他們可从使徒署的存款中賺取百分之三的利潤。教皇的庇护对于銀行家們有着不小的意义，教皇贈与他們尊号和特权，发給各种証書和介紹信。教皇重視同銀行家和高利貸者的合作，他以教会的各种处罰包括革除教籍威吓固执的債務人，从而帮助銀行家們收回貸款。在中世紀时期，为教皇服务能增加商号的势力和声望。

商号和銀行除了在財政事务上为教皇服务外，它們还为教皇作其他有价值的服务，包括提供政治和軍事情报。銀行家們的代理人和信使經常在各国旅行，他們收集了各种重要的政治和軍事情报送給自己的主人。教皇有自己的僧侶組成的情报网，然而連絡得不好。教皇从銀行家所得到的机密情报十分准确，并且定期送到，能从根本上补充教皇厅从其他方面搜得的資料。^①

雷諾阿尔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公布一封教皇克里門特六世在1348年1月20日寄給佛罗倫薩銀行家雅柯夫·亚尔培特的信，在信中这位“上帝的全权代表”显然不期待神意的协助，而請求亚尔培特为他組織显然是諜报机关性質的搜集情报的机构。“朕現有热烈的願望——克里門特六世在上述信中写道——确知所有各种消息和进行着的事件，使有可能及时采取措施……关于此事和其他各事，朕完全信賴尔的謙恭。朕令尔立即写信与自己的工作人員，不論他們現居何地，命令他們急速将所知的一切有报导价值的新消息和新事件报告朕，或报告在教廷內的尔的亲信。当每有新情况发生，則立即补充。尔亦毋忘以書面列举他們的姓名报朕。至于尔及尔的亲信因此事而耗費的款項，将根据尔在教皇厅中的代表的請求而偿还，朕将为此发出指示。”^②

^① 伊夫斯·雷諾阿尔：‘1316年至1378年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間的关系’，第395頁。

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和銀行家們及高利貸者的关系特別密切，当时在羅馬有欧洲大銀行梅奇契和富盖洛夫等的办事处。这一时期銀行家們常常是真正的教皇选举人，他們供給教皇宝座的候选人以金錢，借以收买紅衣主教投自己一票。

佛罗倫薩銀行家梅奇契一家，不止一次地以这种方式保証自己的家族成員被选为教皇。里夫十世，克里門特七世和庇护四世——梅奇契的旁裔——的被选为教皇，有賴于梅奇契銀行为他們买得了必需的紅衣主教的票数。

紅衣主教和主教們也經常利用銀行家和高利貸者的效勞。

使徒署是教皇厅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財政机构。許多教皇尚有私人的帳房，其活动不受官庭总管的干預。

紅衣主教团亦有自己的官庭总管(最初的文献紀載为1289年)，他管理使徒署撥来的基金和其他屬于紅衣主教支配的收入。

教皇办公厅同时經營着充实教皇国庫的数目可觀的教皇的私房收入，最早的关于教皇办公厅的資料是叙說八世紀时的情况的。办公厅发給需要的人以教皇的詔書、保护状、褒奖状、証書和其他文件，根据“使徒办公厅稅冊”規定的价格征收代价。

办公厅的官員分別編入各局，規定以教皇某一采邑的收入归該局所有，并以这一收入支付官員們的薪俸。办公厅的收入則直接归入教皇国庫。

十五世紀末期建立日期簽署局，在此以前其职务由办公厅担任。日期簽署局在教皇厅所有的收文和发文上簽注日期——如請願書、申請書和証明書等等，并为此征收費用。每一文件上要簽注十次以上的日期，每簽注一次日期应单独付款。例如在申請書上簽注有呈文日期、批准日期、繳付費用日期等等。此外，日期簽署局发給混血婚配和近亲婚配許可証，以及发給修道院

② 伊夫斯·雷諾阿尔：“1316年至1378年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間的关系”，第397—398頁。

和牧师团体以享受特权的許可証；日期簽署局和教皇國庫的債務人之間訂有彼此照顧的友好協議。日期簽署局另外还征收苛捐雜稅，以作为自己效勞的酬謝費。

教皇廳的審判廳有：聖听悔審判廳、聖羅馬“洛脫”審判廳和聖使徒署名審判廳，也为教皇國庫帶來收入。

听悔審判廳出現在十二世紀末。這一審判廳受理“恕罪”，每恕罪一次須根据特別價格付款。

“洛脫”審判廳出現在十三世紀。这是教會高級審判機構。審判廳的主要收入是从離婚得來的，依据教規信徒只有得到羅馬教皇廳的同意和准許才可以離婚。

聖使徒署名審判廳是在十五世紀時从辦公廳分出來的。它審理呈給教皇的申訴書、申請書和請願書，并从訴訟人收取相當稅款。

教皇廳的其他機構也有着巨額進益。

常常因同一件事須向教皇廳的不同機構分別納費。根据隆脫公布的資料，德累爾大主教助理于十六世紀在教皇廳受了教皇的堅信禮后就付了 51 次款，其中的 19 次是付給辦公廳的，4 次是付給日期簽署局的，4 次付給聖使徒署名審判廳的，等等。^①許多款項直接上繳給宮庭總管，越过所有其他的各級（例如，十五世紀为十字軍東征而出售贖罪券的收入）。日期簽署局的收入亦归宮庭總管支配。

教皇支配教皇廳的一切收益。部份收入得到他的同意划归紅衣主教。剩下来的款項由教皇自行裁奪如何花費。教皇在这方面过去和現在都是無須報銷的人。对教皇國庫唯一的“审查”是在教皇死后进行的，因为需要制作一份他遺留下的財物和金錢的清單。

有关教皇收入和教皇廳其他機構收入的确实数据在文献上

^① 威廉·達脫：“中世紀教皇的稅收”，第二卷，紐約，1934年，第298—299頁。

找不到，虽然关于这题目有着大量的論文。只有对阿維尼翁时期(十四世紀)是多多少少經過仔細研究过的，所根据的是部分保存在法国的教皇厅的档案。有关該时期的資料在雷諾阿尔的主要著作中有着概括的介紹。

教皇厅的进益可以分成兩項：教皇作为世俗的君王而得的收入；教皇作为“上帝在人間的全权代理人”，作为天主教教会的首腦，以教会的圣职和圣礼作买卖，并課处信徒以人头稅和稅收而得的收入。因为教皇的权力有着双重性質，所以严格地把这两項收入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举諸侯进貢为例說明，諸侯进貢起于十世紀，数百年来西西里国王(4万佛罗稜)、阿拉貢国王(8千佛罗稜)、英国国王(8千佛罗稜)、波兰国王以及其他各国的国王都向教皇进貢。諸侯进貢按本身性質而言是“世俗”的，可是大家交給教皇却因为他是教会的首腦！

教皇征收的稅收和人头稅名目极其繁多。中世紀后期时，据隆脫說簡直多得不可胜数。^①

最古老的教皇稅收之一是“财产調查”稅，这种稅是从主教管轄之下掙脫出来而处于教皇庇护下的修道院和乡村小教区交納的。这种情形起于八世紀，很快就发展开了，因为寺院宁願处于教皇的保护之下，从而可以逃避封建主的侵害和主教們的貪婪。其后财产調查稅扩大到所有的教区和寺院都得交納。^②已交納这一稅款者的名单列入特設的清冊中——“查定書”中，清冊是欽邕奧(后为教皇高諾里三世)在1192年首訂的，以后在中世紀时又不止一次地增补过。

在这本清冊中尚紀載着著名的“圣彼得一枚”稅。这一稅收是十世紀起在英国实施的，其后扩展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根据这一稅例，每有一只爐灶应繳納一便士稅給教皇國庫。

① 威廉·隆脫：“中世紀教皇的稅收”，第二卷，第58頁。

② 同上，第61—63頁。

十三世紀起，出售教會中的職位成為教皇國庫最能獲利的收入來源。高級的教會職位被稱作采邑——“肥缺”，因為主教區和修道院擁有領地和農奴，甚至擁有城鎮和手工業工廠，其收入是歸屬主教和修道院長的。例如，英國當沒有土地的約翰（1199—1216）執政時，僅外國的采邑主每年要得到 76,000 馬克的收入，三倍於當時王國國庫的收入。在德國，僅根據十三世紀編年史的記載，大主教的收入年達 20 萬 1,000 馬克，而當時薩克森大公的歲入為 2,000 馬克。十八世紀美因茲大主教歲入 1,040 萬佛羅稜，而他的主教團中的 24 位成員歲入 38 萬佛羅稜。^① 在波蘭，格尼茲諾大主教擁有兩個城市，271 個鄉鎮，83 個莊園和 87 個磨坊，而克拉柯夫則擁有 21 個城市，38 個耕地面積總計 25 平方公里的村鎮。十四世紀時捷克的“教會幾乎擁有全國所有土地的二分之一。捷克天主教首腦布拉格大主教世襲領地特別廣袤。這位大主教不僅是大地主，他的權力差不多和一個獨立的君王相同。他有著自己的武裝部隊和劊子手，在自己廣闊的領地上徵稅，有權審判和處決住在他領地上的居民。”^②

西班牙的一些主教，例如赫隆的主教，擁有廣大的田地、城堡、巨額資金和無數的農奴。教會在托勒多省擁有村莊和城市，甚至自己的軍隊。十五世紀時七個西班牙大主教和 40 個主教每年“可賺”466,000 德克（威尼斯鑄造的金币——譯者）。^③ 這些收入還不斷地在增加。西班牙歷史學者阿里塔米拉引証的資料指出，列昂和喀斯底里王國在 1675 年的歲入為 2,294 萬 6,000 德克，而上述三國中的 31 個主教的歲入為 2,158 萬德克，除了繳給王國國庫 61 萬 4,000 德克外，淨入為 2,096 萬 6,000 德克。

法國甚至在 1789 年大革命前夕，僧侶尚從自己的采邑上收

① 愛特茹·亞歷山大：《德意志的教會與社會》（1789—1950）（“教會與社會”，第 351 頁）。

② 羅勃佐夫：《胡斯戰爭》，莫斯科，第 74 頁。

③ 拉法愛里·阿里塔米拉與克立維阿：《西班牙史》，第一卷，第 457 頁。

到巨額的進益：11 個大主教和主教每年為 850 萬法郎，副主教和大寺院的祈禱牧師——1,300 萬法郎，15 個修道院長——900 萬法郎，700 個修道院主持——150 萬法郎。^①

采邑在中世紀時代被認為是最可靠的搖錢樹，所以教廷竭力要把買賣采邑權攬到自己手中。十二世紀以前，在大多數情形下主教和修道院長是由自己的牧師團體選出，再由國王批准的。這種選舉照例只具有形式而已，事實上國王們是把教會中的職位出售給世俗間的和僧侶中間的人物的，只要誰價錢出得高。教皇自己的領地上也是採取這種做法。

教皇們偽善地攻擊國王出售教會職位（聖職買賣），借以捍衛自己從事聖職買賣的權利——即根據自己的願望支配自己的采邑。中世紀的神學家們在“學術”論文中曾引經據典地辯明教皇這一主張是正確的。^②

教廷得到了封聖職權後，從而保證自己在出售采邑方面的壟斷地位。封聖職是須花很高的代價才能取得的，即著名的“服務費”，也就是被教會宣布為異端的聖職買賣。却爾斯·李譏諷地說道，宗教審判廳從來不因為教皇們犯了這一異端罪而審訊他們，被審訊的卻是控告教廷進行聖職買賣的人。^③

通常服務費的範圍如下：“總服務費”等於采邑年入的三分之一，由教皇和紅衣主教團平分。除此而外尚須付等於“總服務費”一半的錢給教皇廳有關的審判廳官員；再須付上述數額的三分之一的錢給教皇廳的高級官員，以及“小服務費”，或稱茶資，給那些服務人員。此外應該給呈請教皇封取的紅衣主教送些錢，作為酬謝。

① 弗里德立克·尼爾遜：“十九世紀教廷史”，第一卷，倫敦，1906年，第141頁。

② 貝爾納·琪里曼：“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二世的功利政策”，巴黎，1952年，第21—22頁。

③ 亨利·却爾斯·李：“中世紀宗教裁判史”，第二卷，1912年，第581頁。

总的來說，采邑主要將自己采邑所得的近半數交給教皇、紅衣主教和教皇廳的官員們。

十四世紀初期克里門特五世開始用一種統一的稅代替上述複雜的稅制，即著名的“年稅”，年稅等於采邑主的歲入。差不多中世紀的全部時期內服務費和年稅同時并存。通常服務費是在羅馬受封聖職的高級教士交納的，而年稅則是當地受封聖職的教士交納的。交納過服務費的毋須再交納年稅，反之亦然。起初修道院每8年或20年交納年稅一次，從1469年起，根據庇護二世的決定改為每15年交納一次。如果采邑的收入特別可觀，並且有幾個候選人在覬覦這一位置時，使徒署除了要求交納年稅而外還要索取額外的費用。

教皇約翰二十二世(1316—1334)採用的清冊稱為“全世界所有教會和修道院定價表”，表中註明所有天主教世界采邑的收入。這張定價表是計算服務費和年稅的基礎。采邑的價格經常上漲。十四世紀時某些采邑的年稅達12,000盾。

捷克在十四世紀時主教區的价格如下：布拉格主教區值2,800元金幣，奧洛摩茲主教區——3,500元，里頓茂契爾主教區——800元；要知道交納的不是別的，而是金幣。捷克在十四世紀上半葉時有600個采邑向教皇交納年稅。^①

康斯坦丁會議上(1414—1418)法國的僧侶訴苦說，教皇國庫從法國的主教和修道院長身上得到了697,000元金幣。

根據德國歷史學者齊梅爾孟的資料，宗教改革前的德國“每一個高級教士在就職時應納費15,000至20,000盾，甚至更多些。有這種情形，例如在拜塞烏八年之中主教換了三次，而在十八年之中有四次發生空缺；因此在此期間只得交納四次年稅。在美因茲七年之中(從1505—1513)，大主教職位有三次發生空缺，每發生一次空缺就得向早已因苛捐雜稅而破產了的臣屬人民征

① 約瑟夫·瑪采克：“胡斯革命運動”，莫斯科，1954年，第16頁。

收金币两万盾”^①。

捐买教会职位者的道德面貌，教皇是毫不关心的。

教皇任命未成年的孩子为主教，因为他們的父母已預付了年稅，并且任命高級教士和貴族的非婚生子为主教，从教規观点而言，他們因自己的出身关系而被認為是“不端”的。例如，貝尼奇克脫七世登上教皇宝座的第一年就准許将采邑賣給 374 个“非婚生子”，其中的三分之二是僧侶的兒子，而其余的則为貴族的私生子。^②

尘世俗人的被授与圣职，被認為是正常的的事情，这在教皇領域內一直实行到 1870 年为止。德国在宗教改革前，教皇把收入最好的采邑以中等价格出售与大商行，特别是富盖尔的銀行家。

文艺复兴时期采邑的买卖特別兴隆。按照一位神父的話說，教皇象买卖“猪和牛”一般地进行交易。

“在羅馬进行的各种乡村小教区的交易——貝藻立特写道——其公开标价和五光十色实实在在酷似某一个喧鬧非凡的交易所中的賭博。”^③

根据法国历史学者吉里曼的計算，阿維尼翁时期的教皇从出售采邑所得的进益占岁入的三分之二^④，他們特別貪婪地迫逐年稅。現代的史料指出，在阿維尼翁的宗教法庭仅在一年之間把一个总主教，五个大主教，三十个主教和四十六个修道院院长解职和革除教籍，因为他們沒有交納年稅。

这些高級教士偿清了服务費和年稅后，不等于对教皇的錢庫应尽的财政义务已尽完。1245年在里昂會議上由于英諾肯提四世的坚持，通过了一个决定，要求所有拥有采邑的教士(紅衣主教和教皇厅高級教士除外)，如果他們每年有六个月不住在自

① 齐梅尔孟：“德国农民战争史”，第一卷，莫斯科，1937年，第113頁。

② 貝尔納·吉里曼：“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二世的功利政策”，第34頁。

③ 弗里德利赫·貝藻立特：“德国宗教改革史”，第一卷，第79頁。

④ 貝尔納·吉里曼：“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二世的功利政策”，第150頁。

己的教区内，則应在三年期間中繳納給教皇徵稅官自己的一半收入。^①

采邑主必須晉謁羅馬，虽然三年一次也行，算是为了朝拜“神圣”的地方。

伴随着晋謁羅馬就得备份厚礼送給教皇和紅衣主教，这就是晋謁的主旨所在。

十三世紀时实行一个規定，根据这規定采邑主可以豁免羅馬之行，只要交付給教皇國庫巡礼稅即可，稅額等于自采邑主居住地至羅馬及回原地的路費。

此外，主教們必須定期視察自己教区内的乡村小教区。当視察时主教們向教士征收特別的稅。十三世紀时教皇准許主教們不必进行視察即征收此稅，条件为稅金的半数应归教皇國庫。

教皇使节在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教区内居住和旅行期間的一切耗費，責成主教和修道院长担負。教皇使节从主教和修道院长那里得到的金額，通常远远超过他們的实际需要，教皇使节应将其中的一部份移归教皇國庫。

凡違反教規而保持自己职位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非婚生子”，已結婚者等等），应繳納非法运用收入稅給使徒署。

所謂“遺骸权”，准許教皇占有主教的遗产。隆脫說，这一項收入在十四世紀特別可觀。^②

教皇國庫尚把空缺着的采邑的收入据为己有。

为十字軍东征和宗教戰爭奖励金基金而征集的捐稅是教皇國庫的一宗大收入。

十字軍东征稅常常占僧侶年入的十分之一。有时候六年接連着征收。經常十字軍东征稅也向俗人征收。例如，格里哥里九世在1235年要求法国的每一个教徒每星期为当时的一次东征

① 吉塞普·馬丁尼：“十三世紀中叶教皇在法國的財政政策”，羅馬，1950年，第20頁。

② 威廉·隆脫：“中世紀教皇的稅收”，第二卷，第107頁。

軍交納一个德克。当然，教皇的这种奢望只能部份地得到滿足。

教皇为十字軍东征和与“不信者”作斗争而征集的金钱，常常被他們花在其他用途上。这些錢的一部份落到教皇親屬和寵臣的口袋中去了，另外一部份用以償清教皇厅的債務，收買和陷害反对基督徒的君王。

“全欧洲的僧侶階級——意大利历史学者馬丁尼指出——抗拒和反对羅馬教皇及其代理人在經濟上的奴役行为和可耻的貪慾……”^①。教皇对这种抗議毫不在乎，同时繼續想出各种新的借口以榨取金钱。在每一个国家中，除了通常的苛捐杂稅而外，教皇的征稅官还征收数以十計的种种各样的当地稅收。例如，捷克教廷在十五世紀时征收著名的“慈善补助金”特別稅。^②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时有下列各种教皇制定的稅收：十字軍东征稅（或称“詔書稅”）；寺院稅，其數額根据1529年詔書的規定等于僧侶所有进益和收入的四分之一；庇护四世在1529年批准的制造兵船补助金（这笔費用每年达42万德克，从僧侶收入中征收，用以建立艦队与土耳其人和摩耳人作战），以及庇护五世在1561年批准的收入富裕稅。此外还有教会軍团上繳給教皇支配的錢，这笔錢年达20万德克。^③

高級僧侶們不仅从信徒身上榨取他們應該交納給教皇的金額，并且还要为自己挣些賺头，否則就不必打算买进采邑了。就是这样，供養生活得极其奢侈的教皇、紅衣主教和他們周圍的人的重担，就压在人民群众的肩膀上。正如却尔斯·李所說的“用現金买进的采邑是一只空閑和安穩的位置，應該在这一位置上尽可能地捞些收入，不耻于作重利盘剝，也不耻于耍种种各样的阴谋詭計；至于基督牧人真正的职责早已縮減到最小范围了”^④。

① 吉塞普·馬丁尼：“十三世紀中叶教皇在法国的財政政策”，第31頁。

② 約瑟夫·瑪采克：“胡斯革命运动”，莫斯科，1954年，第16頁。

③ 拉法爱里·阿塔米拉与克立維阿：“西班牙史”，第二卷，第179頁。

耶穌會徒塔基一汝都里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主教職位常常由紅衣主教和顯貴的子弟們所僭據，並且一代又一代地傳給同一家族的成員。為了奉行符合他們聖職的宗教職務，主教們雇有“最下賤和不學無術”的僧侶——根據十六世紀一個紅衣主教喀斯巴拉·康泰里尼的話說——來代替自己；這些教士被授“主教執事”的稱號，所有的宗教儀式都委託他們辦理。主教本身只關心如何從自己的下屬處榨取更多的金錢。

宗教法庭為主教們帶來了巨額的收入，遺產繼承案件，發給證書時所收的苛捐雜稅，宗教法庭強加在信徒頭上的各種罰金。

教會的顯貴學習教皇的榜樣，剝削自己采邑中的農奴，把鄉村小教區和聖禮當作商品進行買賣。顯貴們下面的僧侶和鄉村小教區的教士們，同樣地竭力設法從自己的信徒身上榨取更多的錢。

中世紀德國神學家彼得·康托爾談到主教時說，他們是錢財的獵手，而不是靈魂的獵手，他們的從者則是——“葡萄酒的過濾器，把掠奪所得送給了高級教士，留給自己的却是罪惡的沉渣”^④。

僧侶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為什一稅——稅額為田間收穫量的十分之一，教會尚在四世紀時即開始征收此稅。封建主們是不交納什一稅的。這稅的全部重擔落到佃農和農奴的肩膀上。什一稅應分成相等的四份。一份為主教所有，另一份歸鄉村小教區的教士，第三份用以支付教會日常開支，第四份捐贈給窮人。事實上主教和鄉村小教區的教士把稅收的極大部份據為己有。教皇國庫同樣也分得在教會領地上征得的什一稅的一部份。

不繳什一稅被認為是重罪，有時被認作是異端。教會寺院不止一次地將不付這稅的信徒革除教籍。

④ 亨利·却爾斯·李：“中世紀宗教裁判史”，第一卷，第18頁。

⑤ 同上，第14頁。

摩爾頓寫道：英國在十四世紀時，“公眾的意見是這樣的，教士對於什一稅所感覺的興趣遠較拯救自己信徒的靈魂為大。有一張列舉農民典型‘罪孽’的表證明上述意見的公正性；這張表是教士听取懺悔時用的。這張表中列舉的第一宗罪是拒絕交納什一稅，其下的二宗罪是不按期交納什一稅和不繳全此稅。其餘的十九宗罪幾乎都是因為破壞教會制定的法規和不繳納人頭稅，以及農民不向莊園主服勞役”^①。

教士們在向農民勒索什一稅的時候，同時還關心着封建主的利益。在西歐各國“什一稅”一名詞，已成為用暴力和威脅非法強行徵稅的同義詞，對於這一點不應驚奇——英國歷史學者亞歷山大·考爾麥克指出。^②

僧侶們另外一個收入來源是作宗教禮拜和奉行宗教儀式。浸禮和婚禮，懺悔和懺悔禮，塗膏禮和葬禮，追悼祈禱——所有這一切都為僧侶帶來收入。教皇經常在自己的詔書中提到信徒有奉行各種宗教儀式的責任，特別是要奉行僧侶從而可以得到費用的宗教儀式。信徒從搖籃到棺木一生都有教士和僧侶貪婪的手向他們伸着。“這是懺悔費，這是彌撒費，這是聖餐禮費，這是恕罪費，這是傳道費，這是祝福費，這是埋葬費，這是聖水費，這是祈禱費。甚至於老太婆為了使強盜和竊賊找不到起見而藏在頭巾布里的最後一枚銅元，連這枚銅元也被他們奪去……”^③——楊·胡斯在評論僧侶們的貪得無厭時這樣寫道。

教皇約翰二十二世(1316—1334)使懺悔禮成為所有信徒必須奉行的儀式。他禁止醫生探視事前未曾懺悔過的病人。起先僧侶接受懺悔是收費的，由於許多信徒抗議的結果，後改為隨願輸助。事實上僧侶們在接受懺悔後總是要索取相當的報酬的。^④

① 摩爾頓：“英國史”，莫斯科，1950年，第112—113頁。

② 亞歷山大·考爾麥克：“商業與農業”，倫敦，1930年，第52頁。

③ 約瑟夫·馬采克：“胡斯革命運動”，第13頁。

普通僧侶极端不学无术。耶穌会会徒塔基一汶都里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乡間教士連讀書和写字都不会。他們的特点是貪婪和好色。意大利人民說，当教士是入地獄最可靠的办法。修道士的行为和教士同样地不成体統。塔基一汶都里被迫承認：“否認这一点意味着反駁很明白的和不容爭辯的証据。”^④他还引援了許多文艺复兴时期寺院中道德败坏的事实，当时道德墮落在寺院中占压倒优势地位。

管理着“慈善机关”——养老院、医院和教养院，这些机关有着自己的領地——的修道士和教士們在孤兒、病人和老年人身上大发其財，关于这一点十六世紀西班牙神学家路易斯·維凡斯在自己的論文“論救济貧民”中已予証实，塔基一汶都里是經常引証他的文章的。^⑤

由此可見整个教会，上自教皇下至修道士，是靠劳动人民負担其生活費的。教会同所有的封建主們一样地剝削劳动人民。

买卖贖罪券在数百年期間內是教皇国庫最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之一。教会有权寬恕信徒的“罪”，即真正違背教規的要求或仅是被認是違背教規（不仅限于宗教問題），予“罪人”以处罰。早在十一世紀时已利用“恕罪”来賺錢。十一世紀初法国主教庞蒂答应所有該受重罰的人将忏悔費的三分之一移贈蒙脫瑪茹尔寺院以代替捐獻和在寺院命名日朝謁他的教堂。庞蒂的贖罪券正如我們現在所說的那樣，有着很大的財政效果。接着法国以及与法国邻近的国家中的其他主教們，也开始頒发类似的贖罪券。

十二世紀时，法国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阿培列尔抱怨道：“利

④ 亨利·却尔斯·李：“拉丁教会的忏悔与赦罪史”，第一卷，倫敦，1896年，第408頁。

⑤ 彼得罗·塔基一汶都里：“意大利耶穌会史”，第一卷，第一篇，第52—62、70—91頁。

⑥ 同上，第373頁。

慫恿心的主教們在建造教堂、祭坛祓除式、墓地祝福礼或举行其他类似仪式的借口下，召集群众集会，答应所有参加集会的信徒其忏悔費可以較規定日期迟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時間交納，从而达到他們自私的目的”。

由于十字軍东征的緣故，贖罪券得到了很大的推广，起先教皇答应于十字軍东征的参加者以恕罪。其后，所有交納了与到巴勒斯坦所需旅費相等金額的人都可以得到恕罪。

教皇逐漸地将恕罪的原則推广到以金錢贖买一系列罪恶上面去。例如，格里哥里九世在1240年准許法国布道僧团住持寬恕因毆打神职人員而被革除教籍的信徒的罪，代价相等于旅行羅馬并在那里滯留所需的費用。^① 問題在于包括毆打教士在內的各种重罪，是可以得到恕罪的；不过須亲自到教皇厅央求，就是說得付給教皇国庫相应数目的一笔錢。这类罪称为由教皇审判的重罪。正如完全忠实于教廷的天主教历史学者巴斯托尔所承認的那樣，教皇一走上以恕罪来换取金錢的迷途以后，便使頒发贖罪券貶低到商业交易的地位。

十三世紀时神学家亚历山大·茹列斯基首創“过剩神恩宝藏”說，并由福瑪·阿克汶斯基发展了这一学說。他們肯定地說一滴基督的血已足以贖取人类所有的罪恶，而基督所流的其余的血，他的痛苦和死亡，以及“圣徒們”与“德僧們”的功績組成了“神恩”的額外部份，而这一部份神恩是由基督的全权代理人教皇負責处理的。教皇可以将这一部份神恩施舍給或者出售給有罪的人或功績少的人，从而保証这些人进入天国。

“过剩神恩”說比較此前存在过的“理論”对僧侶更为有利。此前的理論也曾为教会带来了不少的收入，根据以前的理論，占有圣徒遺骸和遺物的可以进入天国，罪人所占有的圣徒遺骸和遺物愈多，他就愈有希望避免在死后受懲罰。貝藻立特曾举勃

① 吉塞普·馬丁尼：“十三世紀中叶教皇在法国的財政政策”，第18頁。

兰頓堡紅衣主教阿里勃立赫脫为例，这位紅衣主教曾蒐集了8,933份和42付“完整的”遺骸，据他自己計算可以保証贖39,245,120年.220日的罪。^①然而不管制造和銷售圣徒遺骸和遺物对于僧侶們是如何地有利可图，可是和用贖罪券来做交易一比較就显得太手工工业化了。因为贖罪券（一块羊皮，当发明印刷机后为一小张紙）比起“圣人”的遺骸和遺物来，其制造、携带和保存不可比拟地要容易得多。贖罪券使恕罪这个交易較前大为簡便，并且甚至使这一交易高雅化，因为在此以前僧侶出售的是这一类能为罪人打开通入天国大門的“圣物”，例如“圣母的奶汁”，上帝用来塑造亚当的大馬士革的泥土，“圣灵的手指”等等。

梵蒂岡出售贖罪券的事务是由听悔审判厅經營的，并由它規定贖罪券的价格。貝尼奇克脫十二世(1334—1342)把听悔审判所变成为一只吮取信徒金錢的真正唧筒。他頒行了著名的“圣使徒听悔价目表”，表中列举只有教皇厅才能恕免的特別重的罪孽。这张罪孽价目表的本文在上世紀末第一次为修道院院长琼斐里所公布。

听悔价目表中經常有各种新的罪孽添进去。現在已經有近十种十五世紀的上述价目表的初版为众所周知。其中的一份这种初版被苏联教廷史学者斯·格·罗洵斯基在列宁格勒的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发现，并于1954年公布。^②現在列举一些这张与众不同的价目表上的价格，不需要作任何解释：“饒恕写了虛伪的証明文書的人——7个格罗斯”；“饒恕在教堂內接触女人（肉体上）及有其他淫乱行为的人——6个格罗斯”；“饒恕强奸少女的人——6个格罗斯”；“饒恕弑父、弑母、杀兄弟姐妹妻子以及其他血亲的人——5或6个格罗斯”；“饒恕重毆自己妻子，以致她流产的丈夫——5个格罗斯”；“饒恕和特別恕免对

① 弗里德利赫·貝藻立特：“德國宗教改革史”，第一卷，第105頁。

② 罗洵斯基：“教廷的‘忏悔部’”；拉姆：“教廷的恕罪价目表”（見“历史、宗教和无神論問題”第二卷，莫斯科，1954年，第320—350，412—454頁）。

俗人进行掠夺、縱火和凶杀的人——8个格罗斯”等等。

贖罪券在羅馬制造，裝在箱子內运往欧洲的各个角落，由当地被授全权出售贖罪券的教士和修道士在講經坛上和广场上采用小販的方式四处兜售，同时硬塞給市集上的商販。

“中世紀时期內——却尔斯·李写道——如洪水般泛滥于整个欧洲兜售贖罪券的教士，是社会最致命的灾难；这些圣物的持有者和特权者，滿腹詭計和絮聒不休地强要为人免罪，打开进入天国的大門。他們种种欺騙行为都干得出来，毀損了教会的名譽同时使輕信他們的人傾家蕩产。有时他們是羅馬或某一教区主教的全权代理人；有时他們用一定数目的錢或收益的一部份，买得在某一区买卖贖罪券的包办权；有时他們从教皇厅或当地高級教士买得經商的許可証。”^①

十五世紀时德国成为銷售贖罪券的主要市場。教皇使节、征稅官和贖罪券經售人的貪得无厌不但引起了德国封建主們的抗議，并且也引起了当地教会貴族們的抗議，因为教皇官員們把信徒的財物席卷一空，使他們收入的主要部份被剝夺了。美因茲大主教总管馬丁·馬耶尔写給紅衣主教爱涅紐·西里維紐·庇克柯洛米尼(后为教皇庇护二世，1458—1464)的信，是这方面特出的一封信。馬耶尔写道：“羅馬教皇为了精确地从我們野蛮人身上挤出金錢，已經发明了数以千計的办法……可是現在我們的大公們已經从酣夢中惊醒，他們开始考虑如何从压迫我們的灾难中解脫出来，并且已經最終地决定完全抛掉羅馬的羈絆和重新建立起自己古有的自由。假使大公們真的实现他們的計劃，那么这对于羅馬教皇厅将是一个不小的不幸”^②。

羅馬教皇不管愈来愈大的抗議，繼續发明新的苛捐杂稅以及在德国扩大推銷贖罪券。十四岁便任紅衣主教的里夫十世

① 亨利·却尔斯·李：“中世紀宗教裁判史”，第二卷，第578頁。

② 卡尔·卡烏斯基：“最新社会主义的前驅者們”，第二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7頁。

(1513—1521), 在这方面特别勤奋。里夫十世在 1514 年和德国銀行家富盖尔和二十四岁的美因兹及馬格德堡大主教亚尔培脱(亚尔培脱是通过富盖尔买到大主教称号的), 签订了一张在德国销售价格总值五万德克贖罪券的合同。亚尔培脱在富盖尔的领导下派遣修道士和传教师到德国各地, 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将贖罪券銷售給信徒。贖罪券推銷員修道士瓚采里特别“聞名”于四海, 他的行径是引起馬丁·路德发表演說攻击教会的导火线。

里夫十世在 1519 年曾派遣法兰西斯会徒貝尔納金·薩松作为銷售贖罪券的“总全权代表”到瑞士去。事后这位法兰西斯会徒自夸道, 他在瑞士为三位教皇弄了 18 万德克的收入。虽然十七世紀时贖罪券的大規模銷售由于受到公憤而收束了, 然而交易并未完全断絕, 并且一直繼續到今日; 虽然已无十五——十六世紀时的規模。

教廷在过去和現在还用庆祝所謂“圣年”名义进行恕罪以搜括金錢, 在这些年份中当朝参圣地者来羅馬参拜“圣地”时, 卖給他們贖罪券, 信徒們来朝拜羅馬时显然对教会的捐助、餽贈和送礼是不会吝嗇的。

被迷信的人認為是“凶年”的年份, 他們預言要有灾禍, 而教会則把这样的年份宣布为“圣年”, 例如——末尾数字为 100, 50, 13 的年份。在人民的思想中这些数字是和瘟疫、战争和天灾連結在一起的。僧侶們在他們自己散布的“世界末日”已經到来这謠言上特别发财。黑格尔写道, 在九世紀末“整个欧洲籠罩着普遍的恐惧, 因为預期可怕的审判将要来到和相信世界行将毁灭。恐怖的感觉促使人們干出毫无意义的行为。有一些人把自己所有的财产贈給教会而自己終身在忏悔中度日。大多数人沉溺于淫佚生活中和将自己財富耗尽。而只有教会由于接受贈与和遺囑发了大財”^①。

西班牙历史学者考尔美洛指出, 中世紀时“当一开始有死亡

枕籍的瘟疫或流传世界末日来临的謠言时，人們对教会和修道院的捐獻，远远超过最狂热最虔誠的信徒所为”^②。

第一个“圣年”——1300年——是教皇波尼法齐八世(1294—1303)宣布的。宣布1300年为“圣年”追求着双重的目的。从一方面來說，教会此举防止了在这“宿命的”一年“威胁”人类的灾难，教会的这种威力應該予以显示一番；从另一方面來說，預期朝參圣地者到了羅馬后一定會在羅馬各教堂的祭坛上堆滿大量的獻金。在公元1300年正如众所周知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世界末日；至于談到贈礼，如果相信編年史的話，那么教士們在整个“圣年”期間日以繼夜地連数也不数，用耙子耙集獻在圣彼得大教堂祭坛上的錢币。^③在这一个异常幸运的开端之后，教皇們愈来愈經常地宣布“圣年”或者“紀念年”，有时为此找寻出十分荒唐的借口，例如教皇烏尔拜六世(1378—1389)規定每33年举行一次“紀念年”，“由于我們的生命短促”和“耶穌之死”正在三十三岁的緣故。

“神圣的”1450年，根据同时代人的証言，将如此众多的黄金吸收到羅馬，以致于在意大利其余地区差不多不再剩留下金子了。^④教皇不滿足于到羅馬朝圣信徒們的捐獻，他在一些城市銷售所謂紀念年贖罪詔書，贖罪詔書似乎能够解除信徒們的所有罪孽，他們可不必长途跋涉耗費大量金錢到羅馬去。1392年慕尼黑要花500格罗斯来买一张这种詔書，而布拉格則花100格罗斯。梵蒂岡在今日仍旧奉行“圣年”（最近的一次“紀念年”为1950年）。

① “黑格尔全集”，第八卷，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935年，第352頁。

② 瑪紐尔·考尔美洛：“西班牙經濟政策史”，第二卷，馬德里，1863年，第148頁。

③ 柯里林：“中世紀教廷史中最重要的一些时期”，1901年，第131頁；卡尔·卡烏斯基：“最新社会主义的前驅者們”，第二卷，第142頁。

④ 庞蒂：“羅馬教廷的圣灵銀行及其經濟职掌(1605—1870)”，羅馬，1951年，第7頁。

創始于八世紀的宗教裁判是“起發現、戰勝和防止異端作用的”，它也是教皇國庫的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

尚在英諾肯提三世時(1198—1216)，曾命令“在隸屬於朕的世俗法庭管轄的地區，異教徒的財產予以沒收；至于在其他各國，朕命令，使世俗君主因畏懼受到宗教處罰而接受朕的這一措施。已背棄異端的異教徒的財產，如果因憐憫他們而于某人有所不便時，可不必歸還”^①。

逐漸地在意大利，不論是教會地區或其範圍以外，確定了由“洛脫”審判廳、宗教審判廳和教皇辦公廳共分沒收財物的慣例。教皇辦公廳用發給被法庭起訴的人或恐怕被傳訊的人、因規避宗教法庭審判而被革除教籍的人或居住在教皇轄區外而受到宗教法庭審判的人以保護狀，從而得到大量金錢。

被宗教審判廳逮捕的人應詳盡地供述自己的財產情況，指出自己債務人的姓名，使宗教審判廳可以向他們追還欠款，以遂私利。從另一方面，宗教審判廳決不煩勞自己代異教徒償清債務。為了撤銷異教徒親屬在法律上所受的各種限制，宗教審判廳得征收特別的費用。假如被視為異教徒的嫌疑犯在交納保證金後獲得釋放，那麼保證金一般是不歸還的。宗教審判廳為了渴望擁有雄厚的資財，它甚至經常宣布死者為異教徒。僅西班牙宗教審判廳的沒收所得，在十六世紀初期每年超過100萬德克。

英諾肯提八世(1484—1492)在日爾曼境內大興問罪之師，討伐“巫女族”，其目的則在於鎮壓反羅馬教廷情緒，這場戰爭據同時代人證明最後變成為教皇國庫的“肥湯”了。“巫女族”的財產由宗教審判廳所沒收，每一個婦女因身懷妖術有罪而罰其向教皇國庫交納2.5盾錢幣。無怪乎中世紀有一位牧師考爾涅里·勞斯稱這場討伐“巫女族”的戰爭為煉金術，靠了這場戰爭

^① 亨利·却爾斯·李：《中世紀宗教裁判史》，第一卷，第317頁。

从人的血液中炼出銀子和金子。①

由此可見，和“异端”及“巫女族”斗争是教廷和教会的一宗可观的收入来源。

教皇們为了追逐金錢，大肆买卖教皇厅中的职位，因此，教皇厅官員的数目不断地增多。

教皇西克斯脫四世(1471—1484)建立了由72人組成的縮写局(职务为将教廷的公文压缩成为短文)，并从卖出这些职位中赚了38,400 德克。他在此后还設立了怪异的职务，如羽林軍校尉、近卫軍和近卫騎兵。尤里二世(1503—1513)設立了一个称作档案局的新机构，从而卖得7万德克。里夫十世頒定了1,200个新职务，赚了90万茲庫提。里夫十世并还建立由401人組成的圣彼得僧团，他用这位置奖賞人，总共得了1,000 茲庫提。庇护四世将可以出售的职位增加到3,500个，等等。

教皇厅职位的价格不断地增高。根据洛淘斯基的資料，“在十六世紀中叶的短短一个时期內，羽林軍校尉一职从300 德克漲到1,250 德克，在1503年时司書的职位值700 德克，而到1541年时为1,300 德克；‘誓約收集人’在1486年为500 德克，而在1514年则为1,400 德克。卡里克斯脫三世时代(1455—1458)司書的位置值1,000 德克，过五十年后当尤里二世时則值2,000 德克，而当尤里二世的侄子里夫十世为教皇时，漲到3,000 德克。定价人一职的价值也同样如此，在短短的时期內从2,000 德克漲到5,000 德克。‘誓約部’主任的位置在十六世紀初期值5,500 德克，司閹——2,600 德克，信使——800 德克。申請書收发員一职在庇护二世时只要50 德克，而在1514年則达1,450 德克。因此，教皇厅的每一个官員尽力設法捞回自己的投資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得不到薪俸，于是便将麇集在羅馬請求各种‘恩典’的信徒們的所有血液吮尽。教皇办公厅中的这些职位常常售給那些

① 許柏林格、英斯錫托里斯：“巫女的錘子”，莫斯科，1930年，第41頁。

完全不會在教廷中服務過的人們。這些人們用金錢買得職位，每年從中得到一定的利息（一般為百分之一百），經過十年後本金就全部償還了”^①。買得教皇廳中職位的人往往顧人代他工作和收取賄賂。

根據天主教歷史學者阿道爾夫·戈脫勞勃的估計，自西克斯脫四世起至庇護四世止近百年期間，教皇們因出售職位總共得了192萬3,000茲庫提。

出售職位制度將教皇廳變成了貪污和賄賂的淵藪，官員們毫無忌憚地掠奪“教皇寶座”的被保護者們的錢財。教皇廳中所有的人，自司書到紅衣主教並包括教皇在內，都收取賄賂和要求納賄。關於這一點有同時代人和教會的歷史學者無數的証言，以及寺院的決議和其他文件可以證明，這裡沒有必要引述，因為上述事實甚至連教會的頌揚者們也不想反駁。

教皇們出賣自己私有產業的方法很巧妙。他們組織了獨特的股份公司以管理某些采邑的收入。持有這種公司股票股東保證可以得到公司平均年入的百分之十。這一制度的創始人是克里門脫七世，他在1526年創辦“信心公司”，資本額為20萬茲庫提。其後創辦了經營制鹽、磨粉和其他壟斷性行業的公司。當格里哥里十三世時（1572—1585）已有十二個這樣的公司，資本額共達472萬茲庫提，公司年入的4%—12%作為股息分給股東。^②

巴維爾五世在1605年創立“聖靈”儲金銀行，這家銀行直到今日還開設着，其投資出自擁有無數田產的聖靈修道院。

十五和十六世紀時教皇國庫因壟斷白矾的買賣而得到了不少的收入，對明矾買賣的壟斷教皇們是在十五世紀下半葉才建立的。在此以前是從土耳其人那邊購買明矾用於染織物、鞣制

① 羅洵斯基：“教皇的‘忏悔事務局’”（《宗教與無神論歷史問題》，第二卷，莫斯科，1954年，第338—339頁）。

② 法蘭契尼：“十七世紀羅馬經濟的方向和史實”，米蘭，1950年，第3031頁。

皮革及其他用途。当在教廷的土地上发现埋藏着明矾后，在一个名叫托里夫的小地方，教皇用革除教籍威吓信徒，不准他们从“异教徒”那里买明矾，同时责成将在教廷土地上开采到的明矾归还教会。教廷在1461年建立了买卖明矾为业务的“铝业公司”，教皇将这家公司租给各种商人和银行家（基特齐、密奇契以及其他银行家）。买卖明矾为教皇国库每年带来了10万德克的利息。

在罗马和教皇地区对粮食买卖的垄断，也是教皇国库的一个收入来源。例如，西克斯脱四世在意大利南部以每斗一德克的价格购进粮食，卖给罗马人时每斗为四到五德克，败坏的粮食也要卖到三德克一斗。尤里二世创办的“阿诺娜”从事粮食的投机买卖，供应和出售粮食制品给罗马居民是该机关的官定职责。“阿诺娜”被教廷的颂扬者们描摹成为一个慈善机关，商人们可以从它那里买到许可证，抬高粮食的售价。尤里二世从出售上述许可证得到91,000德克。

根据荷兰驻教廷大使勃林维里（十七世纪）的话，“阿诺娜”的仓库是一个小秘鲁，它和秘鲁一样缴纳银子和金子给其主人——罗马教皇。“将这些仓库称作为公共的粮仓是完全错误的——勃林维里写道——这些仓库仅仅是追求通常商业利润有利可图的商行而已，并且它常常使教皇国挑起重担，因为教廷纵容某些自己的宠臣们使教皇国濒于灭亡和使教皇国库破产。空虚的教皇国库反正是要靠各种苛捐杂税来充实的，而这些税收终于使教皇领域内的居民完全破产”。

除上述而外，以下各种收入在中世纪的各个不同时期也是教皇国库的收入项目：1. 信徒遗赠给教皇的财产和珍宝。2. 罗马各教堂祭坛前的捐献（半数归该教堂的僧侣，半数归教皇）。3. 信徒给教皇的各种赠与、捐献和赠礼。4. 庇护五世（1566—1572）实行的渎神罚金，因辱骂上帝和圣徒得交纳罚金25—100德克。5. 以罚金代替监禁。6. 出售贵族称号或批准贵族称号使其

合法。7. 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的捐款, 捐款的三分之一(有时更大些)归教皇国库。8. 教皇厅的顾客因直接从教皇那里得到恕罪或准予作从教规观点认为是不合法的行为(收养“非婚生子”或异教徒子女等)而缴纳的费用。这笔费高于教皇办公厅和教皇厅其他机关的普通税额, 其数额根据请求人的财产状况和得其同意而定。^① 9. 垄断食盐买卖的所得。10. 向住于教廷领地上异教徒征收的税。11. 偶尔铸造成色不足的钱币。12. 妓院税, 妓院在十五世纪时每年为教皇国库带来两万德克进款。13. 彩票和打赌税; 其中包括赌任命新红衣主教、教皇的死期和新教皇的名字等, 这税为西克斯脱五世颁布的(1585—1590)。14. 轮盘赌税, 这种赌博是克里门特十二世在1732年采行的, 以及其他等等。^②

进入教皇国库的巨额财富究竟往哪里去了和如何耗费的呢? 雷路阿尔在研究阿维尼翁时期的财政情况后, 根据不完备的资料制了一张收支表。下面我们援引克里门特六世和英诺肯提六世统治时期(十四世纪中叶)的材料(以佛罗伦萨的佛罗梭计算), 这些材料能部份地回答上述所提的问题:

收 入	克里门特六世	英诺肯提六世
1. 服务费.....	501,270	455,870
2. 巡察税.....	293,792	223,800
3. 十字军东征税.....	98,359	24,840
4. 征税官收得的税(年税等).....	680,102	581,765
5. 什一税及其他税.....	—	221,356
6. 各种收入包括借债在内.....	405,154	1,010,636
总 共	1,978,977	2,536,267

① 威廉·隆脱:“中世纪教皇的税收”,第二卷,第129—132页。

② 庞蒂:“罗马教廷的圣灵银行及其经济职掌(1605—1807)”,罗马,第11—13页。意大利政府从教廷继承了轮盘赌税这一份遗产,直到今日仍为意大利预算中的一项收入。

支出項目	克里門特 六世	%	英諾肯提 六世	%
1. 飯菜.....	174,718	10.11	76,838	3.84
2. 面包.....	13,138	0.73	8,668.5	0.40
3. 酒.....	40,647	2.30	38,851	2.20
4. 車馬費.....	23,421	1.27	15,628	0.89
5. 服裝.....	95,907	12.00	—	—
(五年之間)				
6. 艺术品.....	39,573	2.50	9,729	0.56
7. 書籍.....	2,290	0.13	319.5	0.01
8. 修建房屋.....	202,537	12.20	35,755	2.00
9. 法庭維持費.....	2,358	0.14	969	0.05
10. 武器.....	20,820	1.18	1,150	0.05
11. 軍隊維持費.....	213,155	12.00	176,676	8.80
12. 宮庭維持費.....	340,806	20.10	282,482	14.12
13. 房租.....	2,414	0.14	3,144	0.16
14. 不動產購置費.....	42,656	2.86	1,441	0.7
15. 慈善事業費.....	287,027	17.00	144,529	7.20
16. 戰爭開支.....	161,806	9.80	797,605	40.00
17. 巩固阿維尼翁城 堡的費用.....	—	—	124,737	6.20
18. 教皇個人的貪污...	—	—	240,915	12.00
總計	1,663,373	100	2,122,728	100 ^D

甚至于这些远不完备的資料也大可借鏡。这些資料說明教皇因個人的需要而耗費掉了羅馬教皇厅过半數的收入。至于教皇对貧苦人的施舍,那是不得已的事,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在信徒中的威望,另一方面为了使居住在教皇領地上貧困不堪的人民大众不致騷动起来。克里門特六世耗費在自己的飲食和服飾上的錢比施給自己所有的貧苦的臣下为多,而“俭朴的”英諾肯

① 伊夫斯·雷諾阿尔德:“1316年至1378年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之間的關係”,第32頁。

提六世放在自己口袋中的錢則為施舍給自己領地上窮人們的兩倍。

教皇們是生活上極為放蕩不羈的人。他們的慾壑遠遠超過教皇廳的收入。除以慳吝聞名的約翰二十二世及巴維爾二世外，其餘大多數教皇遺給自己的繼承者的只有債務。約翰二十二世在死後遺有1,700萬盾的現金和價值達700萬盾的銀器和珍寶，而巴維爾二世死後則遺有價值100萬德克的珍寶，30萬德克的珍珠和7,000德克現金。新即位的教皇即刻開始自己的事業，請求高利貸商人幫助，使有可能支付加冕禮的各項耗費。教皇馬丁五世(1417—1431)為此目的在當選教皇以後曾以教皇皇冠作為抵押品抵押給別人。人們議論馬丁五世時說他一文銅枚都不值。可是他的繼承者叶夫根尼四世為自己買了一頂價值38,000德克的新皇冠，製造這頂皇冠曾用了15磅黃金和5.5磅珍珠。巴維爾二世也為自己定制了一頂價值13萬德克的皇冠。

教皇們愛好豪華和奢侈，如帝王般地賞賜自己的情婦和寵臣，在建造和裝飾自己的宮殿方面耗費了以千百萬計的金錢。甚至僧侶比拉依奧曾對吝嗇鬼約翰二十二世說，教會的財富被教皇們花在小丑和狗上面了。西克斯脫四世的同時代人在寫到他時說，

城市的毀壞者，天國的羞辱

掠奪孩童的強盜，淫夫和小偷^①

他曾以宮庭、別墅、田產和公國贈給自己的寵臣。根據亞歷山大六世的司禮官波爾哈爾特的證明，亞歷山大六世在梵蒂岡的宮殿內廣設盛宴，將所有的財產都吃光。人們在談到里夫十世時說，他將三朝教皇的財產都花得蕩然無余：自己的、前人的和繼承者的。如波爾哈爾特所敘述，里夫十世為了搜求金錢甚至到了這種地步，他把自己宮庭中的地毯、銀器、甚至教廷小教堂

^① 斯蒂芬諾·英菲蘇拉與約翰·布哈爾特：“日記”，莫斯科，1939年，第90頁。

中的使徒圣象都交给高利贷者作抵押品。

里夫十世遗下的债务如此众多，甚至为了偿清债务而拍卖教廷的珍宝，其中教皇宝冠也在内。拍卖所得的金额仍旧不敷应用。“罗马教廷的所有银行家——柯里林写道——都因圣彼得挥霍无度的继承者破产的缘故而破产一半”。^①

塔基一汶都里引据巴维尔三世同时代人的证言说，巴维尔三世在“使徒”宫设宴庆祝谢肉祭，红衣主教们届时戴着假面具身背裸体妇女参加。耶稣会会员塔基一汶都里被迫承认，教廷圈子内的放荡和腐化行为是早已肯定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②

教廷中的任用私戚的风气象不知饜足的吸血蛭一样不断耗费着“宗座”的国库。照例，教皇们是从年迈的红衣主教中选出的。他们知道自己已经风烛残年死期不远，所以急忙设法使自己的家族发财。教皇们赠与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侄子）巨额的金钱、土地、庭院和艺术杰作。

按照当时的传统，教皇们任命自己儿子、兄弟和侄子们为红衣主教，授与他们教皇厅的重要职位：红衣主教团的首领、国务卿、罗马总督、教皇各行省的总督等。教皇的亲属们在身居高位后，始终受他们的庇护者不久就要逝世的威胁，因之积极展开搜刮财富的活动。他们如同蝗虫一般，以惊人的速度把从基督世界四面八方汇集到梵蒂冈的财富充实私囊。

西克斯脱四世时，其侄子彼耶罗·洛维列、柴凡宁·洛维列和朱里亚诺·洛维列差不多把教皇厅的所有收入都据为己有和荡尽了。彼耶罗·洛维列用四万德克为自己买下了依摩拉城。柴凡宁从教皇处得到西涅茄里公爵头衔和教会在蒙泰维奥的领地及与之毗邻的地区；教皇尚逼迫弗列德里各·乌尔宾诺的女儿嫁给柴凡宁，因此乌尔宾诺公国就归属于洛维列家族。

① 柯里林：“中世纪教廷史中最重要的时期”，第157页。

② 彼得罗·塔基一汶都里：“意大利耶稣会史”，第一卷，第一篇，第33页。

英諾肯提有着七个他承認的兒女。他被称为羅馬“真正的爸爸”，因为大家認為“永恒城”的街道上充斥着他的孩子。英諾肯提贈与自己的兒女們以庭院、田产和巨額金錢。

热那亚駐羅馬教廷的使节鮑卡巧在談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親屬时写道：他們是如此貪婪，即使有十位教皇也无法填滿这群餓狗的肚皮。里夫十世把自己的四个侄子擢升到紅衣主教的尊位。他們的慾壑难填，以致于里夫十世的繼承人巴維尔三世不得不判处他們死刑。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本人任命自己年幼的孙子为紅衣主教（十四岁的亚历山大·奥尔西尼和十六岁的格維杜·斯福尔蔡），和把巴尔姆和比雅欽茨公国給自己的孩子們操縱。尤里三世將卡梅林諾公国贈与自己的兄弟巴尔杜維諾·蒙梯。格里哥里八世封自己的兒子柴柯摩·庞康帕尼为維尼奧拉的侯爵并为他在那不勒斯王国物色了四位有女公爵銜头的小姐。西克斯脫五世使自己的两个侄子成为紅衣主教，每年付以10万茲庫提年金，另一个侄子則封为侯爵，其后升作公爵，两个侄女則嫁給公爵为妻。格里哥里十四世使自己的侄子成为蒙梯·瑪尔却諾公爵。

利奧普·朗盖在研究羅馬教廷的档案后写道，根据他所发现的文件，克里門特八世在統治教会的十三年期間曾贈与自己的親屬百万以上的“現錢”。^①巴維尔五世的侄子斯切邦·鮑尔盖澤一个人就从自己叔父那里拿到这样大的款子。格里哥里十五世任命自己的侄子路德維柯·路德維希大公为教廷总管，当教皇国库年入为150万茲庫提时，他的年俸达20万茲庫提。根据同时代人的証言，烏尔拜八世曾交給自己的親屬神話般的款項，达一亿零五百万茲庫提。他巧妙地把考里齐宮的全部大理石剝下来，为自己的家族建造庭院。羅馬人因此說，“羅馬不是野蛮人破坏的，而是巴尔比林尼破坏的。”

^① 利奧普·朗盖：“最近四百年来的羅馬教皇”，1847年，第363頁。

烏尔拜八世无比的徇私引起了羅馬显貴社会的极大不滿，他們畏惧巴尔比林尼家族势力过份强大。为了緩和敌視他的情緒，烏尔拜八世在1640年召集了一些有权威的神学家組成委员会开会，并授权委员会解释教皇是否有权庇护自己的亲屬。委员会議决說，教皇可不受拘束地使自己的亲屬們享受长子繼承权，其年入不超过八万茲庫提現金，而其女兒們(1)——贈与价值18万茲庫提的嫁妝。烏尔拜八世死前不久曾向另一个神学家委员会提出問題說“教皇庇护自己的侄子們是否过份了？”。委员会在回答这一問題时說：“教皇侄子們的敌人十分众多并且势力雄厚，为了宗座的荣誉，給与他們其数量足以保持自己尊严的財富，使敌人的阴谋詭計不得逞，这是公正的甚至是必要的，而他們的尊严在教皇崩駕后不应有所降低。”①

英諾肯提十世时，梵蒂岡的国庫是由其弟妇奥琳庇阿·瑪依达奇尼掌管的，她是一个貪財的屬於上流社会的风流貴妇。②

教权派历史学者讚美庇护六世(1775—1799)把庞济区块澤地抽干了，然而他們对下列事实却不好意思說出口，就是这位庇护六世封自己的侄子为公爵，并且把用教皇領地上千万农民服苦役抽干的庞济澤地的最好部份贈給了他。

和教皇們搭挡的是紅衣主教們，教皇就是从中选出来的。紅衣主教的职位是和采邑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也是这项交易的客体。紅衣主教們是教会中最富有的采邑主。他們拥有田产、森林、河川和城堡，向隶属于他們的修道院、寺院和乡間小教区歛錢。

紅衣主教除了采邑的收入外，还要参加分取教皇厅的利潤。戴上紅衣主教僧帽的价格异常昂貴。后面一个事实說明了教皇为什么要不断地增加紅衣主教团成员的数量。紅衣主教团在中世紀早期时由12人組成(根据神話中使徒的数量)，至西克斯脫

① “意籍教皇”，巴黎，1860年，第76—77頁。

② 馬利·倍尔：“教皇簡史”，倫敦，1951年，第355頁。

五世(1586)时增为70人。教皇对待紅衣主教职位的态度,和对待其他的采邑相同。教皇們常常解除已成为紅衣主教的僧侶們的这一头衔,重新把它卖给別人。里夫十世曾控告以紅衣主教彼得路契为首的四个富有的紅衣主教以阴谋罪。教皇命令处彼得路契以絞刑,并把他的财产据为己有。其余的三个紅衣主教受到了严刑拷問,同时被迫交納巨額贖罪金。紧接着这件事,里夫十世以一笔交易卖出了39个紅衣主教的头衔,共得了22万9,000德克,其数額超过教皇厅的年收入。

塔基一汶都里驕傲地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紅衣主教都出于欧洲最有权势的貴族家庭。他們是在王宮的奢侈和豪华的环境中熏陶成长的;他們耽于犬馬声色之娛,对旅行和战争的爱好的远較对宗教礼拜为深。作为他們是教士的唯一标志祇有僧衣僧帽,可是也不是經常穿戴的,他們把主教区和修道院視作为享用不尽的財源。塔基一汶都里就是这样描写他們的。^①

紅衣主教們則在选举教皇时出卖自己的选票攫取教皇厅的巨額款項,收受賄賂——一句話,他們的“嘉言懿行”同教皇及其親屬們的如出一轍。

紅衣主教們的行为不但与“公正”一詞无缘,甚至连最起码的体面也不顧。关于这一点有中世紀时期的一个慣例可以証明,根据这一个慣例,教皇在灵床上举行特別仪式赦免紅衣主教們的盜窃行为,但所盜窃的財富不得超过600盾!

十六世紀时天主教教会虽然失掉了英国和德意志,然而教皇厅的收入却不断地增加着,主要是由于从美洲和亚洲殖民地流入黄金(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部份通过法国)。但是教皇国庫的債務增加得还要快,因为教皇及其周围人士的食慾是以几何級数增加的,而收入却是以数学級数增加的。教皇們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风格頗为欣賞,于是为自己建筑了宮殿,为自己

① 彼得罗·塔基一汶都里:“意大利耶穌会史”,第一卷,第一篇,第10頁。

建立紀念碑、巍峨壯麗的寺院(例如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宗墓等,而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大量資金。

結果是教皇廳的債務不斷增加和經濟上長時期入不敷出。這有下列數字可以證明。里夫十世時教皇國庫年入為32萬茲庫提,而債務為100萬茲庫提;當尤里三世時收入增為35萬茲庫提;巴維爾三世時年入增加為70萬6,000茲庫提;至1576年時已為100萬茲庫提,至1587年時增至135萬8,000茲庫提,可是在這一年債務卻為750萬茲庫提;1592年時為158萬5,000茲庫提,而債務為1,224萬2,000茲庫提,因此教廷收入的三分之二是用以償付高利貸者和各種教廷企業股票持有人的利息的。烏爾拜八世時(十七世紀上半葉)債務增為3,000萬茲庫提,到1672年英諾肯提十一世債務達70,200萬茲庫提,這個數目在當時是神話般的。利奧普·朗蓋在教廷檔案中發現這些數據後,幽默地作出結論說:“假使中世紀票據交換的發展主要應歸功於教皇收入的性質,因為從世界各國都有金錢交到教皇廳,那麼教廷在國家推行公債制度方面的功績亦不在其下,現在公債是和每個人有關的並為所有商業服務,因為這一制度也是首先在教會領域內發展起來的。”^①

隨着專制政體的鞏固,王國政府開始限制教會的收入,由於這一緣故外國上繳給教皇國庫的金錢也開始減少。教皇們為了彌補損失,就增加教會領域內的稅收和加強對居民的剝削。關於教會領域內居民的窮困狀況有同時代人的無數証言提到。薩凱蒂在1664年寫給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的信中說:“根據我昨夜的計算,使徒署的債務已經超過5,000萬。不但沒有任何希望使它減低,還確信它將不斷地增加。不幸的臣民們(教皇領地的臣民——作者)因為無力挑起沉重担子和失去了對債務总有一天會減少的希望,大批地拋棄了自己的房屋和故鄉逃往異鄉,舉家流

^① 利奧普·朗蓋:“最近四百年來的羅馬教皇”,第一卷,第321頁。

浪，以乞食度日；他們或因精疲力盡而倒斃道途，或逃往羅馬境外，希冀作其他領主的臣民，這是我們的耻辱。因為這個緣故，羅馬境內居民已減少了一半……聖父啊，這些災難（教皇臣民遭到的——作者）要比猶太人在埃及遭受到的還要壞；這些不是被刀劍所征服的人民，而是隸屬於或者自願地臣服於羅馬教皇寶座之下的君主們的百姓，所受到的待遇比在敘利亞或者非洲的奴隸還要不人道。”^①

但是在專制制度的土壤上却生長起新的力量——資產階級。可是教會和整個封建制度的經濟地位對於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是一個嚴重的障礙。主教區以及小的公國擁有自己的領地，城市和鄉鎮，它們和其餘世界相隔絕，並且還有自己的稅卡和千百種其他奇特的規定，這些都妨礙民族市場的建立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教會領地大多數都不納稅，這是引起城市資產階級對僧侶不滿的另一個原因。民法和宗教法規承認教會財產的永不割讓權。財產祇能落到教會手中，而不可能從中解放出來。而這些“僵死的手”使經濟發展滯緩，使資本活動的場所變得狹窄。十八世紀時天主教僧侶們（新教徒們要早二百年）在資產階級的積極支持下，開始“減輕”教會的財產負擔。在葡萄牙有龐巴里，在西班牙有卡爾三世的大臣阿朗達、卡姆巴馬尼斯和弗洛里達—勃蘭卡，他們實施了一系列改革以限制教會的權利。耶穌會被逐出“天主教”國家。十八世紀時教皇的威望降落到如此地步，甚至克里門特十四世（1769—1774）被迫解散他異常珍愛的“耶穌會”，況且即使這樣做了，還不能從中取得金錢方面的利益；他將耶穌會的將軍李奇囚禁在聖安琪兒城堡的監禁室里並下命令拷問他，要他交出耶穌會的庫存。李奇正象貪財的耶穌會徒所應做的那樣，寧可把生命交給上帝，不願將黃金獻給“教皇陛下”。

^① “意羅教皇”，第170頁。

意大利启蒙学者安东尼奥·杰諾維奇(1713—1769)以愤怒的言辞痛斥这一时期的教廷道：“教会早已变成政治的和经济的企业了。請你来到羅馬和煦煦紅衣主教的宮殿，童話般的別墅和堆滿純金做的器皿的桌子。唉，不幸的教会，唉，你已經成为庸俗和肮脏的娱乐場所；你的主教們早已成为說謊和詐欺的教授，在以上帝的法律作买卖。誰在說宗教，事实上是在說財富……”^①。

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前夕教皇領地中的情况就是这样。

上述的事实指出，教廷领导着的天主教教会下不仅保护着封建主的利益，并且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封建剝削者。以教皇为首的僧侶大軍依賴劳动群众为生，而农奴在劳动群众中占最大多数。他們以自己的血汗承担着教皇厅的一切开支，同时最起碼的修道士的生活亦由他們負担。

教皇和在他屬下的教会各教阶的僧侶对财富是毫不客气的，拚命从信徒身上榨取金錢。舞弊、謊話和欺詐，在宗教偏見上做的投机买卖——所有这一切都为上述目的服务。羅馬教皇厅的全部机构，教皇厅高級教士的所有才干都用来撈取万惡的黄金。教皇們的本領駕凌于中世紀炼金士之上。他們确实是从空气中炼出黄金来的。教会以圣徒遺骸和遺物，以“圣餐”以及恕罪作交易。教会从宗教审判和十字軍东征，从“圣徒”和“巫女”，以致于从为信仰而殉教者的血及异教徒的尸灰中，都能得到利益。教会对明矾买卖和向妓院征税也沒有忽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放弃世俗的幸福和非难“罪恶的肉欲”这种伪善的表里不一致的說教掩盖下进行的，但这并不妨碍教皇本人和教会显貴們的奢华生活和耽于罪恶的淫乐。

教会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剝削备极尊崇，認為是合法的，并奉之为“最高的荣誉”。

^① 勞察：“意大利恢复統一的开始”，第二卷，米兰，1948年，第725—726頁。

随着专制政体的巩固，教会成为王国政权的工具，与王国政权处于平等地位地繼續参与剝削劳动人民。教会在群众間传布信仰現存制度的神圣性質和不可动搖性，号召服从“羅馬皇帝”不得稍違。教会宣传对恶势力不要反抗，它答应給受苦受难的人入天国，以之麻醉人民群众，教他們如同奴隶般的俯首听命。因此权力和法律总是站在教会一边的。

但是应该指出，教皇和教会在数百年期間在群众中所以拥有势力，并不是因为他們保护了剝削者的利益，而是因为他們在信徒的心目中是神奇力量的代表——上帝的代表。而在注定过穷困生活和无教育的普通人之間，对上帝的信仰是特别强烈的。僧侶們应許在“来世”解脫所有的苦难，然而被蒙蔽的农民群众却是相信地接受了这个虛妄的和神話式的解脫。

亞当·斯密斯在十八世紀时不无嘲諷地写道：假使对这一个在封建时代形成的天主教教会，对这一个机构，不是由人类理性它的这一敌人来攻击的話，那么它将会永久存在。这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組織，根据这位英国經濟学家的說話，是人的全部智慧所不能震撼的，更不用說推倒它了；可是它起先被封建社会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削弱，后来部份地被破坏了。“正如富裕的男爵們一样——斯密斯指出——僧侶們也力图从自己的田产上收取更高的田租，以同样的方式揮霍，滿足个人的虛荣心和怪癖。然而只有将田地租与自己的农民才能保証提高田租，租得田地的农民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独立的农民。因此把下层各階級人民束縛在僧侶身上的枷鎖，逐漸地松开和完全地断裂了……。下层階級的人民不再象从前那样把这一阶层視作为自己需要时和生病时的助手和治疗者。相反地，他們被更富裕的僧侶們的空虛无益、奢侈和揮霍无度所激怒了。因为这些僧侶現在似乎在耗費一向認作是穷人們的财产，以滿足自己的慾望。”①

宗教改革是天主教教会危机的第一幕，这一次危机是声势

浩大的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人民运动所引起的；第二幕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动摇了教廷的势力，然而并没有摧毁它，特别由于西班牙和法国的支持，教廷仍旧保持了自己的部份地盘。“天主教”强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成为殖民帝国，这些强国的侵略美洲和对其居民的奴役，以及他们的势力渗入东方——亚洲、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对于宗教改革后时期内天主教教会的巩固和统一起着不小的作用。在揭露天主教教会参与对新大陆人民的奴役和剥削方面，研究上述情况也有着很大的意义。阐明教会的殖民者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更不必说教权派的历史学，显然是站在颂扬教会的立场上来说明这一问题的。

由于上述原因，在分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发生的事件之前，首先将教廷和天主教教会在十六、十七世纪期间参与扩展殖民地的情形详细地介绍给读者。

① 亚当·斯密斯：‘对于自然和各民族财富原因的研究’，第二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第322—323页。

第二章

天主教教会在殖民地(十六至十八世紀)

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在美洲的殖民侵略，以及欧洲各强国势力的渗入亚洲、非洲和菲律宾，是在教廷和天主教教会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菲迪南和伊薩培拉在得到哥倫布首次出海航行結果的情报后，即要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巴尔特齐亚)頒发給他們詔書，使西班牙对新发现陆地的权利合法化。西班牙需要这种詔書以保护自己不受葡萄牙人的排挤，因为葡萄牙人也在哥倫布活动的同一区域内进行探險。

1493年亚历山大六世頒发了四张詔書，两张是5月3日頒发的，第三张是5月4日頒发的，第四张是在同年9月25日頒发的。詔書之多說明西班牙与葡萄牙竞争之烈。如果說最初两张詔書是为了确認西班牙对哥倫布所发现的島嶼和陆地的“权利”，第三张詔書則是規定西班牙的势力范围的，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是在离綠角100里格(約550公里)的子午綫之西。教皇将这条綫以东的“土地占有权”归于葡萄牙。^①

由于葡萄牙人的抗議，第四张詔書将分界綫稍微推向西一

^① 根据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494年訂立的托尔杰西里亚条約，規定以离綠角370里格的子午綫作为分界綫。1493年5月4日的詔書和托尔杰西里亚条約的譯文見“哥倫布旅行記”，莫斯科，1956年，第240—243, 375, 377頁。

些。

教皇將歐洲人已發現的和尚未發現的土地劃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勢力範圍這一舉動，引起了與這項決定無緣的天主教國家君王們的不滿。法國國王弗蘭西斯克一世拒絕承認教皇的決定。“太陽照射我也如照射着別人一樣——他聲言道——假使給我看亞當的遺囑，而遺囑中有條款規定瓜分世界與我無份，我將是幸福的。”^①

教皇是在什麼權力的基礎上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個侵略者分攤新發現的土地的呢？詔書中說，這是基於全能的上帝的權力，這一權力是由聖彼得傳給教皇的，同時還由於教皇是耶穌基督在人間的全權代理人而有权這樣做。教皇們是在為自己爭取教會和平民社會中的首要地位而鬥爭的期間，開始把這種權力歸諸己有。

然而教皇為何如此急急忙忙地將差不多整個大陸“贈與”西班牙呢？當時有着各種原因。主要原因顯然在於當教會的威望在德意志和英國顯著地下降的時候，作為天主教教會在歐洲的主要堡壘之一的西班牙，其鞏固對於教廷有利。隨着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這一情況越發有着重大的意義。羅馬希望天主教勢力在新發現土地上的擴大，會抵消天主教教會在歐洲所受的損失，它不但鞏固了西班牙，同時也鞏固了教皇寶座。十六世紀的天主教神學家們曾不止一次地披露了這個主意。其中之一的侵略美洲的參加者蓋洛尼英·梅杰泰認為，墨西哥征服者考爾戴斯的行動是上帝親自領導的，並且認為這一次侵略補償了“萬惡的”路德為教會帶來的損失。^②

宗教改革的威脅迫使教廷以一系列重大讓步的代價，來鞏

① 雪爾維奧·柴伐拉：“西班牙殖民主義在美洲的新基點”，費城，1943年，第27頁。

② 倍萊·迪非：“拉丁美洲的文化”，哈里斯堡，賓夕法尼亞，1945年，第247頁。

固与西班牙之間的关系，其中包括把对美洲殖民地的保护权移交给西班牙国王。保护权使西班牙国王成为殖民地中的教会和僧侣的实际首領。根据保护权，高級僧侣的任免由王国政府决定，而羅馬教皇厅仅予以批准而已。教皇祇能通过設在西班牙的塞維尔的經管殖民地一切事务的印度公司，和在殖民地的僧侣作正式的联系。教廷供給殖民地僧侣的物質需要的全部责任由西班牙国王取代，特别是保証征集什一稅。其后教皇又被迫将保护权讓与葡萄牙和法国的国王，他們也同样成为自己殖民地中的“基督在人間的全权代理人的助理”。

出讓保护权并不意味着教廷不再干預殖民地事务。从1568年起教廷对殖民地事务的干預是經常性的，特别是当庇护五世根据耶穌会將軍弗兰西斯哥·鮑尔特奇亚的提議建立“宣传信仰”主教会后，名义上它是組織传教士的活动，实际上这个主教会实现的是对殖民地教会的控制，繞过保护权为教皇厅利益而服务。关于这一点有下列事实証明，即組織这一主教会的决定是在菲利浦二世拒絕教皇圣使进入西班牙殖民地以后施行的。^①巨額金錢和大量貨物通过“宣传信仰”这一机构从殖民地流入羅馬。为了管理“宣传信仰”主教会迅速增加着的收入和財產，在1632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經濟机构，它一直存在到1908年为止。^②

教皇因不得已而将保护权讓与他人，从而損害了“天主教的尊严”，但是仍坚决地捍卫着殖民地中教会权力应駕凌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原則。当十七世紀时西班牙神学家兼法学家薩洛尔山諾·毕萊拉在“印地安的政治”一書中宣称在美洲殖民地中王国政权应領導教会时，他的著作立刻被羅馬列入“禁書目录”之中。^③

① 尼爾羅·李：“羅馬教皇廳”，第81頁。

② 同上，第86頁。

③ 馬格納斯·莫納：“耶穌会徒在拉柏拉达区域的政治与經濟活动”，斯德哥尔摩，1953年，第87頁。

教廷不敢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因为和西班牙合作,一起剥削殖民地,为教皇国库带来了利益。十六世纪时,当美洲被开发后,黄金和珍宝如同泉水般地湧入西班牙。因此西班牙国王赠与教皇的金額也增加了,同时循其他途径自西班牙流入教皇国库的进益也增加了。众所周知,教皇从西班牙国王那里得到巨額款項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并收到黄金以作裝飾之用,此外还有部分珍宝。这些珍宝现在还保存在梵蒂岡博物館中,是考尔戴斯在墨西哥和庇薩洛在秘魯掠夺得来的。根据十七世纪西班牙历史学者刘易斯·卡勃萊拉的証明,教廷錢庫在三十年期間內(从十六世纪末期至十七世纪初期),从西班牙得到160万德克,这还仅仅是根据西班牙和羅馬教皇之間簽訂的宗教条約而每年支付的王国补助金。^①

前面已經叙述过,黄金是直接 from 殖民地通过“宣传信仰”主教会流进教皇国库的。虽然西班牙国王禁止私人,包括僧侶在內,自殖民地运出黄金和珍宝,然而“宣传信仰”主教会仍能找到千百种方法規避上述的禁令。关于这一点在西班牙国王向教皇抗議僧侶非法自殖民地运出黄金的抗議書中可以看到。^②特别是許多珍宝是通过耶稣会交到教皇厅的,耶稣会在殖民地的代表人物不顧教皇已經出讓保护权,它直接隶属于羅馬,并和羅馬保持直接联系。

西班牙占有殖民地为僧侶們带来了巨大的物質利益。差不多有三百年期間內,殖民地的僧侶都是西班牙的教士和修道士。甚至生于拉丁美洲的白种人(即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也无法得到教会的进身之阶。1493年期間,在369个在殖民地的主教之中,生于拉丁美洲的白种人連10个也不到。^③西班牙人和美

① 犹圭·拉米萊斯·加巴涅:“墨西哥与梵蒂岡之間的关系”,墨西哥,1928年,第48頁。

② 路卡斯·阿拉茄罗:“美洲的教会与西班牙的統治”,布宜諾斯艾利斯,1935年,第43—44頁。

③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264,569頁。

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兒祇在十七世紀末叶才开始可能得到神职，但也有一个条件，他們須能證明自己是“白种人”，就是說有西班牙血統。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黑人和黑白混血兒是不准成为教士的。因此，西班牙的僧侶完全統治了殖民地的教会。

从西班牙国王的利益观点来說，天主教的僧侶、教会和宗教是成功地征服和鎮撫印第安人，使他們甘于戴上殖民者的枷鎖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历史学者派克斯指出，“传播天主教是西班牙殖民制度的一个組成部分，而教士們实际上是王国官僚政治的成員”^①。許多教会的显貴人物被授以殖民地的官职——总督。

曾經尊崇欧洲封建制度的教会，也尊崇在美洲的殘酷的殖民地制度，因此西班牙国王認為僧侶的活动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卡尔一世給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梅陀西(1535年)的訓令中說：“当您剛到一个国家和开始了解它的时候，您首先要知道在宗教和政府事务方面已經和現在采取了那些措施，这主要是关于教堂的建造，宗教仪式的奉行，使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和以基督精神教导他們一方面的事情。”^②二百余年以后，在署期为1786年7月3日的印度公司的批示中写道：“在如此遥远的国家里严格遵守宗教义务是最坚牢的繩索，它使人民能够循規蹈矩，在印度的主要法則就在于此。”^③然而，能够証明宗教和教会对于殖民者的意义的最清楚不过和最雄辯的文件，要推著名的“要求書”。这一文書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中南美开拓者在征服美洲时，作为最后通牒讀給和呈交給印第安人的。这张独树一帜的檄文的作者是西班牙神学家劳毕斯·德·派拉西奥斯·罗皮奥斯。“要求書”通知印第安人說，他們本人以及他們的土地已

① 派克斯：“墨西哥史”，莫斯科，1949年，第109頁。

② 倍萊·迪非：“拉丁美洲的文明”，第251頁。

③ 李嘉图·考涅茲克：“西班牙美洲社会形成历史文件彙編(1493—1810)”，第一卷，馬德里，1953年，第17頁。

由教皇交給西班牙國王了，並且要求印第安人承認教會是“聖母和宇宙的主宰”，承認教皇和西班牙國王是“這些島嶼和大陸的主人和君王”。印第安人被通知，如果他們抗違命令，則將受到“不能言喻的災禍和損失，如同不願承認自己的君主並起來反抗的諸侯所應受的那樣”^①。

在西班牙國王的聖旨中，命令中南美的開拓者將這篇神學家和殖民者的深奧奇文為“大海和大洋中各島嶼和大陸上的所有居民”高聲朗讀，令其知悉，並命令根據“要求書”進行行動。侵略行動的參與者拉斯·卡薩斯在事後寫道，當他知道“要求書”的內容以後，他不知道究竟對它哭好還是笑好。至於印第安人的態度又如何呢？他們說教皇顯然是個醉鬼，他把不是他所有的東西贈了人，而接受贈禮的西班牙國王則顯然是個瘋子。^②

然而，印第安人不是常有可能對殖民地開拓者發表自己對“要求書”的意見的，因為在大多數情形下，殖民地開拓者一讀完上述文書，立刻對印第安人施以“不能言喻的災禍和損害”。因為西班牙文的“要求書”印第安人反正是一點不懂的，而殖民地開拓者手下又不是經常有翻譯人員。

墨西哥歷史學者柴伐拉指出，“要求書”中所宣布的原則雖然極為荒謬，它在長時期內是作為西班牙王國的官方政策的，侵略墨西哥和秘魯就是根據這些原則。^③ 梵蒂岡、教會和僧侶們曾贊許這一可耻到極點的文件。直到今日，當教會的頌揚者們被迫記起“要求書”時，他們還為它辯護，他們斷言不是“要求書”的內容不好，不好的是拒絕服從它的印第安人。西班牙耶穌會會徒康斯坦丁諾·巴萊在不久以前干脆這樣寫道：“‘要求書’的

① “發往海外的文件”，第二集，第二十卷，馬德里，第 311—314 頁。

② 琼那洛·茹尔西亚：“西班牙征服美洲和墨西哥之性質”，第二版，墨西哥，1940 年，第 56 頁。

③ 魯爾維奧·柴伐拉：“西班牙殖民主義在美洲的新基點”，第 45 頁。

不好在于它是为人而写成的，可是被讀給半动物听了。”^①

如果在今日教会的代表人物尚且捍卫着这种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观点，那末很容易想象在四百年以前，殖民地开拓者及伴随着他們的僧侶們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

在殖民地开拓者的意識中，上帝的观念和宗教是紧密地与掠夺和发财的观念編結在一起的。考尔戴斯的一个兵士名叫貝尔納·琪阿斯的，当他一登上墨西哥的土地就欢呼道：“我們是为发财和荣耀上帝的名声而来到这里的！”他的司令官考尔戴斯在侵占墨西哥和进行有系統的掠夺和屠杀印第安人的时候，却一再声称他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这样做的；而是由于“理想的驅使”，他的唯一任务是“消灭偶像和使当地土著改信基督教”^②。

教会以其威望巩固这一謊言，它尊崇殖民者的劫掠行为，因之从掠夺者手中分得部分贖款。貝尔納·琪阿斯在其回忆录中不胜羨慕地說到，在瓜分印第安人阿茲台克族(墨西哥土著)最高領袖蒙蒂苏木的贖身金时，除了西班牙国王和考尔戴斯之外，僧侶們分得最多。这种情形在有殖民地开拓者出現的地方，到处都发生。僧侶不仅仅認可侵略者們的邪恶行为，他們还亲自积极参与其事。僧侶們的活动，与殖民地开拓者的侵占土地、消灭有組織的抵抗中心印第安人的“帝国”等行动，相輔而行；他們到处杀戮印第安人的祭司，毀坏他們的庙宇、手稿、裝飾物、圣象、壁画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文物和崇敬物品，力图在精神上使印第安群众无抵抗能力。当印第安人的圣庙根据僧侶的命令被烧成灰烬的时候，成群的印第安人弯着腰在修建着雄伟庄严的天主教寺院和教堂，仅其外表就应该迫使印第安人战慄在侵略者的威力之前。在保存下来的十六世紀瑪雅族(居住于北美和墨

① 刘易斯·亨基：“西班牙在征服美洲时为正义而斗争”，費城，1949年，第35頁。

② 罗伯特·里查：“墨西哥之精神征服”，巴黎，1939年，第23頁。

西哥南部)的文籍中談到修建教會時,如同談到可怖的大災禍一樣。然而西班牙世俗的和宗教界的編年史者,對以印第安人的奴隸勞動修建教堂一事並不諱言。梅杰泰、李密薩爾以及許多其他進行殖民地侵略活動的參與者在寫到這一點時,如同寫某種應該如此的事一樣。下列數字說明修建教堂的規模,從而也說明了為此目的而採用奴隸勞動的程度: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人開始開拓殖民地以後至1623年間的一百餘年中,僧侶以被奴役的印第安人的勞動在西班牙美洲建造了總共7萬所教堂和小禮拜堂。①

為了保證基督教的成功,在美洲的僧侶如同在非洲和亞洲的僧侶一樣,把當地居民中流傳的偏見和迷信普遍地加進到基督教的教會儀式中去。教堂照例是修建在印第安人認為神聖的處所,新的廟宇飾以印第安人的圖案,耶穌和聖徒們的形像塑成印第安人模樣,甚至教會的節期也使之與印第安人的宗教節日相符合。聖母的奇蹟和顯聖等等更是不計其數。

僧侶對於印第安居民的殘酷不遜於世俗的掠奪者。我可以舉十六世紀下半葉在於加敦橫行霸道的法蘭西斯會徒季叶伏·德·朗達的事業為例。朗達把古代印第安人的手稿焚毀,破壞印第安人的廟宇和藝術品,並且用酷刑折磨他們。有叛教嫌疑的印第安人根據朗達的命令要受二百皮鞭,作為“最初的儆戒”。受朗達拷問和被處肉刑有6,330個印第安人,其中157個印第安人在受肉刑之後立刻死去,而大多數則終身殘廢。1562年7月12日朗達在馬尼設了一個盛大的火刑會,參加的有西班牙當局和印第安族的顯貴。在這一次“節日”中有許多瑪雅族古代文化遺物——象形文字書寫的手稿、立象、繪有花紋的器皿——都被消滅了。被審判的印第安人在火刑會以前在獄中自殺而死

① 上述數字引自可以征信的耶穌會會徒季米特里奧·洛馬斯·庇里茲所著的“西班牙殖民史”一書,馬德里,1947年,第459頁。

或受酷刑而死。他們的尸体被僧侶們拋入火中燒成灰燼。^①

根據同時代人證明，寺院中設有特別為拷問印第安人而準備的房間，其中備有老虎凳、鎖銬、鞭子和其他刑具。^② 僧侶階級的代表人們要求對印第安人施行強暴。墨西哥主教蘇馬拉茄等在1531年寫信給國王說，印第安人之所以降服祇是因為恐怕受刑罰。^③ 開拓殖民地的參與者修道士蓋洛尼莫·梅杰泰宣稱“教士們為了印第安人的幸福應該鞭打他。鞭子對於他們（印第安人——作者）是如此地必需，猶同麵包對於他們的嘴巴一樣”^④。

西班牙學者安東尼奧·烏魯阿偕同霍爾黑·璜在十八世紀上半葉考察了美洲各殖民地後，得出結論說，在所有西班牙領地上鞭打印第安人是普通的懲罰。烏魯阿在敘述對印第安人施行體罰時指出：“從前祇有‘愛康梅迪羅’^⑤才這樣干，而現在市政官、地主、種植園主，特別令人憤怒的是——連祭壇的神職人員都可以鞭打印第安人。所有這些人，包括僧侶在內，以對待黑奴們的殘酷手段對待印第安人。”^⑥

殖民地開拓者不僅把僧侶們作為自己的同盟者，並且還把他們視為剝削和掠奪印第安人的競爭者。考爾戴斯和其他一些劫掠殖民地的魁首們曾不止一次地向西班牙國王訴苦，要求管束一下這些上帝的侍從們，因為他們過分貪嘴了。^⑦ 僧侶們馬上

① 克諾洛索夫：“作為人文學史料的季叶伏·德·朗達的‘關於于加敦事件的報導’”（季叶伏·德·朗達：“關於于加敦事件的報導”，莫斯科—列寧格勒，1955年，第31—32頁）。

② 琼那洛·茄尔西亚：“西班牙征服美洲和墨西哥之性質”，第65頁。

③ 同上。

④ “關於管理新西班牙的印第安人的研究”，第三卷，巴克萊，1938年，第21頁。

⑤ “愛康梅迪羅”是擁有連同東屬於土地的印第安人的田產的殖民者。

⑥ 霍爾赫·璜與安東尼奧·烏魯阿：“有關美洲的秘密資料”，第一卷，馬德里，1918年，第301—302頁。

⑦ 却爾斯·勃蘭頓：“征服墨西哥時的宗教面貌”，却波爾山，北卡羅萊納，1930年，第15、219頁。

以牙还牙，控告殖民地开拓者的残酷和贪得无厌，这就是說控告他們自己也犯的罪行。我們应当感謝留传到今日的大量揭发性材料为我們提供了这种相互責难的資料，資料中有叙述殖民者的行为的(主要是僧侶代表們提供的証据)，也有关于僧侶們行为的資料(主要是非僧侶殖民者們提供的証据)。

开拓殖民地的参与者拉斯·卡薩斯(1474—1564)曾起来反对殖民者和僧侶們的橫暴行为，他是在1510年第一次到美洲的。殖民者和伴随他們而来的修道士和教士們的兽行和貪婪，使他极为憤慨。

拉斯·卡薩斯在墨西哥时忍受殖民地当局的迫害，因而加入了多米尼加教派，这个教派是不受殖民者的干預的。拉斯·卡薩斯勤奋地搜集有关殖民者和僧侶罪行的資料，其后运用了这些資料写成了許多使他得到美譽的揭发性著作。

1542年拉斯·卡薩斯写成了著名的“关于印第安人灭亡的簡短报告”，^①这本书十年后在西班牙的塞維尔問世。他在这一著作中叙述了殖民者和教士們駭人听聞的暴行，叙述了对印第安人的大規模屠杀，以及他們所受的惨无人性的剝削等等。

教权派和反动历史学者在不久以前仍企图全力摆脱拉斯·卡薩斯。他們断言拉斯·卡薩斯把殖民者的残暴行为夸张了，扩大了牺牲者的数目，說他“誹謗”教会，憑空写出关于教会在殖民地活动的“妖書”。

随着历史科学在拉丁美洲的发展，随着开拓殖民地参与者的証言和新的档案文件的发表，这些資料証实拉斯·卡薩斯所援引的事实都是确凿不移的，因此甚至連耶穌会会徒們也无法反駁拉斯·卡薩斯。此后，在教权派陣营中出現了一个新的正与前相反的企图：即将拉斯·卡薩斯認作为教会和殖民地真正的代表人物。現在有一些教权派的和反动的历史学者在說：請看

^① 巴尔托洛美·拉斯·卡薩斯：“关于印第安人灭亡的簡短报告”，塞維尔，1552年。

拉斯·卡薩斯，殖民者是怎樣的啊，天主教僧侶是怎樣的啊！他們還可以同樣“成功地”斷定布魯諾和卡姆柏尼拉是十六世紀時教會的典型代表。當拉斯·卡薩斯生時，僧侶們辱罵他和損害他的名譽，因為他不僅揭露了“愛康梅迪羅”，同時還揭露了僧侶。拉斯·卡薩斯在逝世前不久曾寫給羅馬教皇一封信，信中說：“新地的主教、修道士和教士們的行為，使我們神聖的基督信念蒙了無比的詬辱和受了不小的損失；他們神話般地在發財，而他們的不久前接受信念的屬下却處於完全的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窮困狀態中，以至於每天有許多人由於橫暴行為、飢渴和過度的勞動而冤屈地死去。我謙恭地懇請陛下命令這些教士們應在自然的和上帝的法律的基礎上，把他們掠奪來的所有金銀和寶石歸還原主，這正是他們事實上應該這樣做的。因為他們是從遭受着極端貧困和目前正因而受苦難的那些人手里得到和奪取來的，而根據上帝的和自然的法律教士們正應該把自己的財產分發給他們。”^①因此，殖民地僧侶們極為仇視拉斯·卡薩斯，稱他為基督之敵，那是毫不奇怪的。

拉斯·卡薩斯是一位殖民地制度不容情的揭露者，他不是西班牙僧侶中的典型性人物，而是規例中的例外：占壓倒多數的僧侶們如同一切殖民者一樣殘酷地對待印第安人。

“教會如同其他西班牙機構一樣地依靠印第安人的勞動為生——美國歷史學者里斯萊·辛浦遜寫道——僧侶們的利用印第安人的強制勞動，和其他階層的作法（殖民者——作者）沒有任何根本性的區別。無數教堂和修道院的修建工作及其維護，大量僧侶的供養——所有這一切都落在印第安勞動者的肩上……此外，僧侶們還非法地參加商業活動，許多教士為了個人利益而入了魔道，他們在印第安人中間利用自己的勢力。”^②

^① 奧斯汀·錫涅茲：“巴爾托洛美·拉斯·卡薩斯神父傳”，墨西哥，1942年，第12頁。

^② 里斯萊·辛浦遜：“新西班牙和危地馬拉土著的租佃制度”（“管理新西班牙印第安人之研究”，第三卷，巴克萊，1938年，第82—83頁）。

教會成為殖民地中強大的物質和宗教力量。到處最好的土地照例是屬於僧侶的。“殖民時期末期——墨西哥保守派歷史學者羅卡斯·阿拉芒宣稱——差不多墨西哥①、秘魯、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所有財富的一半左右，和其他拉丁美洲各國財富的半數，掌握在教會和有錢的天主教僧侶手中”。其餘部分的大部分也抵押給教會了。②

富裕的“愛康梅迪羅”們以大量田地贈與教會。誰不給教會捐獻，就可能蒙上異教徒的嫌疑。根據一位十八世紀末期住在委內瑞拉的人的証言，“誰在遺囑上沒有記載給與寺院遺贈，那末作出這種錯誤的人其靈魂應否被超度就會引起疑問……”③。

教會的顯貴除了田地外，還在城市里擁有不動產。墨西哥、利馬和其他殖民地中心城市的最好街坊是屬於教會的。利馬在十七世紀初期，寺院所占的地面比市內非僧侶區為大，而利馬的大多數居民被迫向僧侶付租金租屋或租土地。

僧侶們普遍做高利貸生意。在墨西哥，“教會是高利貸機構，它擁有的資金至少為活動資金的三分之二。教會借債給地主們，並取得田產作為抵押”④。希姆博爾特說，十八世紀末葉時墨西哥教會所擁有的抵押品共值 23,365 萬法郎。⑤

僧侶們精通商業。許多教派組織聯合成為資本雄厚的進口公司。他們以批發價格從西班牙、菲律賓、甚至從亞洲大批購進貨物，然後以高價售出。根據保存在梵蒂岡“宣傳信仰”主教會檔案庫中呈給教皇的報告，僧侶們廣泛地在西屬殖民地的居民

① 關於教會在墨西哥領地的詳細資料，參見法蘭西斯·歐瓦里爾：“墨西哥大領地的形成（16—17 世紀的土地及社會概況）”，巴黎，1952 年，第 301—344 頁。

②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莫斯科，1955 年，第 125 頁。

③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 264、569 頁。

④ 派克斯：“墨西哥史”，第 114 頁。

⑤ 亞歷山大·希姆博爾特：“新西班牙王國政論集”，第一卷，巴黎，1825 年，第 441 頁。

中間，特別是在印第安人中間，販賣酒類。他們還常常強迫印第安人買酒。^① 僧侶們在聖地亞哥（智利），當齋戒日時在市集上購進所有的魚，然後在寺院的大門前以高價賣出。^②

教會自 1569 年起在西班牙殖民地實施的宗教審判的罪惡行為中得到不少進益。^③ 宗教審判廳擁有自己的種植園和田產，然而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出售被控為“異教徒”們的被沒收的財產。在墨西哥有幾年間宗教審判官因沒收所得達 300 萬比索（1649 年）。^④ 1665 年宗教審判廳在哥倫比亞的喀大吉納因沒收被控為異教徒及有異教徒嫌疑的人的財產，除去所有開支之外淨得 430,414 比索。殖民制度還存在著的時候，宗教審判廳就年復一年地繼續著“自己的審判和沒收財產的獨占行業”。^⑤ 當墨西哥在 1813 年廢除宗教審判時，宗教審判廳從沒收財產中賺得 1,775,676 比索（其中有 1,394,628 比索投資於各種企業）。^⑥ 與此同時當秘魯廢除宗教審判時，宗教審判廳沒收了近 2,500,000 比索的財產。^⑦

什一稅是教會收入的另一個經常性來源。根據法律作為上繳給王國國庫稅收之一的什一稅，應以下列比例分配：四分之一歸主教，四分之一作寺院資金。其餘的一半分成九份，九分之七

① 路卡斯·阿拉茄羅：“美洲的教會與西班牙的統治”，第 43 頁。

②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 595 頁。

③ 在西班牙殖民地中宗教審判的犧牲者是教會所不滿意的西班牙移民及其後代——生於拉丁美洲的歐洲人。宗教審判廳不審訊印第安人，因為他們完全在殖民者的控制下，殖民者可以自由處置他們，沒有煩勞宗教審判廳的必要。同時一有控告印第安人為異教徒的事就會造成大屠殺，因為印第安人遠非信奉一切教會儀式和教規的。這種屠殺對於作為大封建主的教會既無利，對於非僧侶的殖民者也沒有好處。

④ 亨利·却爾斯·李：“西班牙附庸國中的異端裁判”，紐約，1908 年，第 219 頁。

⑤ 柏納·羅西斯：“南美的西班牙附庸國”，倫敦，1914 年，第 348 頁。

⑥ 亨利·却爾斯·李：“西班牙附庸國中的異端裁判”，紐約，1908 年，第 288 頁。

⑦ 同上，第 354—355 頁。

归乡村小教区的僧侣，而九分之二则入王国国库。在实际上正如许多资料所指出的那样，王国国库不仅把它份下的九分之二金额献给僧侣，并且还拨给教会巨额津贴费。^①

教会还出售以所谓十字军东征诏书名义出现的赎罪券，从而得到大量金钱，赎罪券的价格等于往巴勒斯坦参拜“圣地”的旅费。“在美洲每年或每二年买一张诏书已成为宗教上的义务，是天主教教徒忠贞的证明。”^② 1786年教会仅在墨西哥一地从出售十字军东征诏书而得了416,883比索。^③

下面有关新西班牙国总督的一些数字；给我们一个关于教会在殖民地收入规模的概念。根据一位对教会有好感的历史学者伐斯康锡洛斯的计算，十八世纪末叶时，在这一殖民地每年有近2,200万比索的款项进入教会的钱库。我们可以根据下列事实来说明这一数目所具有的意义，即在同一时期王国国库在墨西哥的收入为2,000万比索，其中只有350万比索是上缴给宗主国的，而其余部份是用于当地殖民地行政当局的开支。因之，西班牙国王在墨西哥的收入总共只等于教会收入的15.5%。

其他教区的收入，例如库斯科(秘鲁)，年达40万比索(1781年)。^④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教区的收入和库斯科同样的高。

教会收入的最大部分落入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其他宗教界显贵人物的荷包中去了。

十八世纪末期，墨西哥大主教的年入将近13万比索。任何一个西班牙总督都会羡慕这个数目的。拍布拉主教(墨西哥)——11万比索，法拉多利主教(西班牙)——10万比索，瓜达拉哈拉主教(墨西哥)——9万比索。其他的主教们，宗教审判

① 琼那洛·茄尔西亚：“西班牙征服美洲和墨西哥之性质”，第64页。

② 培莱·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92页。

③ 却尔斯·却普曼：“殖民主义西班牙的美洲：史实”，纽约，1933年，第159页。

④ 季米特里奥·庇里兹：“西班牙殖民史”，第439页。

厅的法官以及教会的其他权贵们都有这样高的收入。在1799年访问过美洲的希姆博尔特说，高级僧侣的收入比许多德国的大公为高。^① 根据亨利·李的计算，十八世纪僧团的修道院院长在抵达殖民地后三年期内可以“赚进”30万至40万比索。^② 十八世纪末期僧侣们在委内瑞拉数年间即可为自己积聚6,000—8,000美元家产。^③

无论教士或者修道士都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和荒淫无耻的生活。整个十六世纪期间内，总督们在关于殖民地状况的定期简报中经常指出：僧侣们纳妾，进行盗窃，不服从当局，讲究奢侈豪华和忽视教会清规等。托立杜总督在1569年的一份简报中写道，秘鲁的僧侣们以全部时间从事商业、进行赌博和寻花问柳等勾当。^④

乌鲁阿在二百年以后在谈到秘鲁的僧侣时论道：“秘鲁的僧侣们的生活是如此荒淫无耻和丑恶不堪，什么寻欢作乐的事都干，虽然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包括秘鲁居民在内——都有弱点，可是这些僧侣的乱七八糟的生活和淫佚的恶习却超过了所有其他人。”^⑤

僧侣阶层耗费了巨额财富以装饰教堂、寺院、修道院和主教私邸。教会中显贵们的寺院和私邸，其奢侈和豪华，比起其他殖民者的官庭决不逊色。里面经常举行盛宴、晚会和谢肉祭。牧师协会的会所中堆满着银子和各种珍宝。有时候仅仅三个修道士就占据了一所拥有大片土地的寺院。

乡村中的教士们也过着和修道士们同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① 亚历山大·希姆博尔特：“新西班牙王国政论集”，第一卷，第439—440页。

② 亨利·却尔斯·李：“西班牙附庸国中的异端裁判”，第515页。

③ 弗莱德·列比与琪恩·汤麦斯·纳尔逊：“热带丛林中的十字军”，却泼尔山，北卡罗来纳，1936年，第320页。

④ 倍莱·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266—267页。

⑤ 霍尔赫·璜与安东尼奥·乌鲁阿：“有关美洲的秘密资料”，第一卷，第169页。

印第安人在拷問和革除教籍的威脅下，被迫挑起重担，使僧侶們能过着养得肥头肥腦的安逸生活。

印第安人在教皇的領地上服勞役作为奉行圣礼，給教士送各种的礼品，然而他們老是被認為未償清債務。“尽管債務人已經把自己的母雞、洋山薯甚至女兒(1)送給教士們以清償債務，可是不幸的印第安人仍旧还欠他們的債。”^①关于这一点还必須补充的是，教士的妾(教士的情婦)剝削着印第安人的妻子和子女，强迫他們为自己工作。乡村小教区的住持根据已定的慣例，通常在乡村小教区自己的“圣节”里，举行每年一次的印第安人极簡單的日常生活用具的总清除。“每当乡村小教区的圣节来到的时候——烏魯阿写到——教士将印第安人一年間儲集的东西，其中包括印第安人的妻子和子女在自己的陋屋中养育起来的家禽和家畜，全部囊括而去。印第安人因而无粮可食，祇能以野草和草根充飢。”^②

怪不得印第安人要这样說了：公牛得提防它正面冲来，騾子得提防它后腿踢人，可是神父得从四面八方提防他。

耶穌会在剝削印第安居民和积累財富方面成績特別卓著。

耶穌会会徒在西屬美洲的僧侶中居领导地位。耶穌会与白种人僧侶以及自己的对手——多米尼加教派、弗兰西斯教派和奧古斯汀教派不同，它在各殖民地有着統一的組織和配备着有毅力的和有进取精神的干部。同时耶穌会是殖民地中唯一和羅馬教廷保持直接联系的教会組織，它代表着和保护着教廷在殖民地的利益。

耶穌会在殖民地中的领导人物和其他教派不同，并不是由王国当局任命的而是羅馬直接任命的。迪菲指出，美洲的耶穌

① 爱米利奧·罗美洛：“秘書經濟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49年，第162頁。

② 霍尔赫·瑣与安东尼奥·烏魯阿：“有关美洲的秘笈資料”，第二卷，第10頁。

会徒經常寄給設在羅馬的总部以巨額金錢。①

各省的省长、市政局和“爱康梅迪罗”們慷慨地以田产贈与耶稣会会徒。当新城市奠基的时候，隣近中央广场的一些地段是留給他們的，此外还有大片已开垦的土地。耶稣会会徒既拥有巨額資金，他們同样也从已破产的殖民者手中以低廉价格大批地买进田地和不动产。

所有在他們的种植园中种出来的和在他們的採購站中所制作成的东西，都是奴隶劳动和印第安农奴劳动的产物，而耶稣会会徒則在当地市場上銷售它們或者裝运出口。耶稣会在殖民地中建立了分支众多的商业組織，其下有倉庫、小店和运输系統。

迪非說，奴隶組成了耶稣会在美洲的动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② 耶稣会会徒不仅拥有奴隶，并且还参加奴隶买卖。“为了滿足設在喀大吉納(哥倫比亞)和基多(厄瓜多尔)間自己的大企业对劳工的需要——格里齐盖尔指出——他們每年派遣几只船到非洲西海岸的哥拉去，因为那边奴隶十分便宜。他們将一部分黑人卖给墨西哥的种植园主，因此，在抵銷購買和捕捉黑人的費用以及奴隶船的开支外还有盈余。”③ 法国販賣奴隶組織的經理庞夏脫林(十八世紀初期)的一封信至今尚保存着，他在信中通知巴黎說，耶稣会会徒运了两船共800名“健康的和有病的”奴隶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这些奴隶由他經手以每名250和150泰立尔售出”④。

根据罗耀拉制訂的至今尚遵行的耶稣会章程(宪法)的規定，地方领导人(修道院院长)每年应向羅馬耶稣会將軍作三次报告。这就是所謂“秘密名冊”，其中載有會員的名单及其行为的鉴定；“总目录”，或耶稣会掌握的财产和其他珍宝的清单；以

① 倍萊·迪非：“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84頁。

② 同上。

③ 西奧圖·格里齐盖尔：“耶稣会徒”，第一卷，1863年，第338頁。

④ 薩尔伐杜·馬德里阿格：“美洲西班牙帝國的復亡”，紐約，1948，第285頁。

及每年的关于收入、商业和其他经济行为的财政报告。瑞典历史学者莫纳尔在研究了一些考尔杜巴城耶稣会的“总目录”后宣称,1686年当地共有66名会徒的耶稣会组织拥有300名奴隶,11,000头羊,5,000匹马和13,000头家畜。同年考尔杜巴的耶稣会的新信徒会,其中有29名耶稣会会徒和新皈依者,拥有300名奴隶,30,000头羊和13,000头家畜。至1692年时,作为公共财产的奴隶增为455名。^①

根据1767年的材料,在智利有50个大种植园,数目众多的农奴和黑奴是属于耶稣会会徒们的。^②

耶稣会在西班牙属地的主要活动中心是秘鲁、墨西哥和巴拉圭。耶稣会会徒在西班牙属地中最富裕的地方秘鲁拥有土地、采购站和种植园,1767年有数万名印第安农奴和5,200名奴隶在上述场所工作。“在秘鲁和在其他各处一样——根据美国历史学者摩西斯的话——耶稣会会徒们力求达到世俗的积聚财富的目的。他们竟求赠与和追逐遗产,同有钱人打交道,并利用祇有僧侣才有机会运用的使人深信这一手段;他们攫取无数的田产,以其产品做买卖;他们寄给在欧洲的企图征服欧洲各国政府的同行们以巨额钱财;他们使在教会和国家中有声望的人士屈从于他们的势力之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利用他的财富的力量。”^③

许多耶稣会会徒—投机商人从各个殖民地湧往利馬,因为利馬是耶稣会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耶稣会的最高司庫(检察长)常到那边。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商人的抗议,亞馬脫总督在听取了商人们的控诉之后,在十八世纪初期签发了一张要求所有非常住在利馬的耶稣会会徒出境的命

① 馬格納斯·莫納:“耶穌會徒在拉柏拉達地區的政治與經濟活動”,第789頁。

② 高德麥斯:“智利史”,1941年,第86頁。

③ 柏納·摩西斯:“西班牙在南美垂亡的政權(1730—1806)”,巴克萊,1919年,第128—129頁。

令；其根据是，他們“在光天白日之下在广场、街道和市場上，甚至在小酒肆和其他公共场所，連最下等的处所也在內，施展着肮脏的商业上的詭計”^①。

墨西哥耶穌會會徒拥有田产、制糖厂、农場和其他不动产。关于耶穌會在墨西哥的财产，大主教兼总督璜·派拉福克斯在写給教皇英諾肯提十世(1644—1655)的信中說道：“他們的家畜群和羊群是数不尽的。我知道两个耶穌會分支，其中一个拥有30万头羊，而另一个拥有六万头牛。所有的普通教士总共祇有三家不大的制糖厂，而屬於耶穌會會徒的——墨西哥首都就有十个耶穌會分支——有六家中美洲最大的制糖厂，每家厂价值在50万到100万比索之間。其中的一些制糖厂的純利大于10万比索，甚至最小厂的純利亦不低于25,000到30,000比索。此外，耶穌會會徒还拥有連綿不絕以英里計算的广袤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出租給別人的；所有这些土地特別肥沃，盛产玉蜀黍、烟草等等。还有产量丰富的銀矿也是屬於他們的，总而言之，他們的資財是如此雄厚，普通教士很快就不得不向他們恳求布施了”^②。

法国学者法兰西斯·歇瓦里尔不久前在墨西哥档案庫中所发现并由他公布的“对掌管财产的耶穌會弟兄的訓令”(是十八世紀初期的)証明，在墨西哥的耶穌會的田地上到处采用奴隶劳动。^③耶穌會會徒無論对兒童、对妇女都毫不怜悯。訓令中指示利用五岁起的印第安人做工。另有专门一章列举耶穌會領地上印第安人所受的各种肉刑，及其采用的方法。訓令中說，宗教應該有助于更有效地剝削奴隶，訓令教导道：“你們要把奴隶改造成成为忠誠的基督徒，那末你們也就将因此得到很好的工人。”^④

①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85頁。

② 派拉福克斯与曼陀惹：“著作集”，第十一卷，馬德里，1762年，第30—32頁。

③ “对掌管财产的耶穌會弟兄的訓令”，法兰西斯·歇瓦里尔作序并注释，墨西哥，1950年。

④ 同上。

上面援引的文件是耶穌會羅馬領導機關發往新西班牙的。因此，訓令証實了耶穌會在殖民地的活動是羅馬直接領導的。

耶穌會會徒在美洲最富的和果實累累的搖錢樹是他們在巴拉圭的領地。反動的历史學者們(例如阿根廷的洪特拉)費了許多筆墨，企圖証明耶穌會在巴拉圭的領地乃是“公平理想”的體現處。實際上這個理想又是怎樣的呢？

十七世紀初期，耶穌會利用西班牙人對巴拉圭不特別重視的機會——因為在那邊不會發現金子和其她珍寶，將這一居住着勤勞的印第安古阿拉尼族(居住南美和巴拉圭)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的地區攫取到手。耶穌會對印第安酋長(世襲的領袖)以威肋利誘和佯予縱容和略施小惠的手段，達到了奴役古阿拉尼族的目的，建立了一個居民人數約15萬，土地面積為20萬平方公里真正的奴隸制國家。耶穌會會徒使印第安人聚居一處，規定他們的行動，依靠起着奴隸監工角色的酋長，驅使印第安人在種植園、牧場和采購站從晨曦初現到日落不斷地工作。工余時間內，印第安人被迫去做禱告和奉行宗教儀式。被驅入集中地區的印第安人甚至禁止有自己的衣服或家禽。伏爾泰諷刺地指出，耶穌會的領地實實在在乃是理智和公平的“標本”，領地中“神甫們”擁有一切，而人民却什麼都沒有。^①古阿拉尼族在耶穌會的淫威下由於過度的勞動、精力疲竭、飢餓和經常作戰，很快地就絕種了。集中地區的居民在十六世紀時為15萬人，至十七世紀初期降為12萬人，而至1739年則減少到74,000人。^②

耶穌會建立的奴隸制國家擁有自己的軍隊、兵工廠和無數的采購站和工場。許多印第安人集中地區有着5萬至10萬頭牛羊。皮革、巴拉圭茶葉、干肉和咸肉的出口，是巴拉圭耶穌會的一宗主要收入項目。皮革的輸出在十八世紀時年達29萬件。

① 伏爾泰，“哲學札記”，莫斯科，1954年，第129頁。

② 米赫涅維奇，“天主教反動派簡史(耶穌會徒)”，莫斯科，1955年，第204—205頁。

巴拉圭茶叶的采植和輸出是耶穌會的独占事業。耶穌會會徒還從巴拉圭運出烟草、糖、羊毛、棉花、玉蜀黍、大米、棉織品、地毯及其他許多產品和商品。他們從歐洲以走私方式運入大宗各式各樣的貨物(就是說不給殖民地行政當局付關稅)。

巴拉圭的耶穌會徒還在巴西、智利、秘魯和阿根廷等地經商。他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聖大非有着自己的商業基地和倉庫。法國旅行家法朗索阿·科里爾在十七世紀下半葉訪問阿根廷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差不多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整個巴拉圭的商業，全部掌握在耶穌會徒的手中。他們要多少利潤就可以得到多少利潤。耶穌會徒是如此地資本雄厚和有勢力，不久以後將沒有人能夠和他們競爭。他們多次強迫政府趕走妨害他們的官吏們，因為他們有能力付出巨額賄金，經過這些事耶穌會徒們知道如何逃避政府的管理。”^①

巴拉圭世襲的奴隸制領地為耶穌會徒們帶來了神話般的利潤。耶穌會每年的純益達1,000萬比索之巨，^②這一數目遠遠超過十七和十八世紀時教皇廳的年入。

耶穌會徒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中的勢力十分雄厚。當他們在1767年被趕出去的時候，經查明在2,260名耶穌會修道士名下有717,000名印第安人供其驅使。^③

當討論到西班牙美洲的僧侶時，特別應該提提傳教士們的事業，他們在所謂殖民地內地活動，所謂內地是指尚未被征服的印第安部落所屯處的地區。

西班牙殖民地中的傳教士是在軍事當局部門中服務的，薪俸由軍事當局支付。殖民地中傳教士僧團的領導人不是由教會當局任命的，而是由王國政府任命的。在殖民地尚未被征服或

① 法朗索阿·科里爾：“東印度遊記”，記述作者在1666年至1697年在東印度逗留期間印象最深刻的見聞，第一卷，阿姆斯特丹，第203頁。

② 西奧圖·格里齊蓋爾：“耶穌會徒”，第一卷，第337頁。

③ 威康·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第138—139頁。

者尚未平定的地区内，传教士会建造得象要塞或城堡一样。这种地区很多，说明印第安人对殖民者的侵略是坚决抵抗的，传教士会数目之多即其证明。1780年（殖民制度将没落时！），传教士会的数目超过600个，其中的120个属于耶稣会。^①

同时代人的无数文件和证言，揭穿了所谓传教士和平地渗入殖民地这一神话，证明了传教士会的军事性质。在新西班牙地方国库的一个官吏于1758年写的报告中，可以读到下面的话：“在大陆上特别强固的军事设施的修筑和传教士会的建立是在下列情形下才进行的：即当必需保护已占领的地区不受敌人的侵略（外国人）和武装的野蛮部落的袭击，以及在必须巩固和传播我们神圣的信仰的时候，这一般是军事—经济会议上所讨论的议题。”^②

换句话说，传教士是受殖民地军事当局领导的。传教士们照例是由驻防军保护和支持的。传教士罗摩阿里杜·卡泰兴那在一封1772年写给殖民地首长的报告中指出，在没有驻防军支持的一些居民点内，印第安人杀死传教士，抛弃了村落逃到森林里去。“没有兵士的地方——卡泰兴那恨毒地写道——就没有成功可言。印第安人是恐怖之神的子女，对他们来说，闪闪发光的马刀所产生的印象，远较最善子宣道的传教士的辞令为深。”^③ 耶稣会徒历史学者埃盖阿·路易斯承认传教士们是和西班牙的军队合作的，因为“运用这一种或那一种武器的最终目的是同样的，为上帝争取臣民”^④。然而这样的“利他主义”的目的并不妨碍传教士们掠夺印第安部落，以极可耻的手段为自己积聚财产和使自己教派的财产增加。

① 季米特里奥·庇里兹：“西班牙殖民史”，第469页。

② 赫伯·布尔顿：“美国通史”，纽约，1939年，第129页。

③ 同上，第131页。

④ 马格纳斯·莫纳：“耶稣会徒在拉柏拉达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第285页。

根据同时代人的証言，传教士以抬得不能再高的价格卖东西給印第安人。传教士們为印第安人举行宗教仪式时要求他們付出自己的劳动果实作为代价，然后卖出，以所得的金錢据为己有。^①

印第安居民仇視传教士。耶穌会历史学者邓是贊美在加利福尼亚和其后被美国攫去的新西班牙其他各地的传教士的活动的，他所写的一些書几乎有一半文字是叙述传教士会区域内印第安人的起义和暴动的。^②教会在这些事件中得到的独树一格的好处是：教会宣告在和印第安人冲突时被击斃的传教士是“神圣的殉教者”。

西班牙人統治了墨西哥凡三百年，在这期間，按照最保守的統計，教会向当地居民榨取了60亿比索，僧侶总共創办了29所教育机构，其中10所是小学。^③宗教审判厅严密地注意着，不使革命書籍流入殖民地。

在西班牙人統治期間和他們被逐出后的长时期內，教会一直是殖民者的同盟軍。对1810年爆发的独立运动表示同情的祇有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兒教士，他們在教会阶层中是被視作賤民的。^④教会中的显貴們差不多和世俗的殖民者們一致反对爱国者。普通教士們，如墨西哥的混血兒依达里各和馬立洛斯，参加爱国者的一方，被教会詛咒和革除教籍。例如，墨西哥总督和宗教审判厅对爭取独立而斗争的英雄馬立洛斯的

① 倍萊·迪非：“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82頁。

② 彼得·邓：“西海岸神职人員的前驅者”，1940年；“墨西哥北部的耶穌会前驅者”，1944年；“塔拉希瑪拉的早期耶穌会传教活动”，1948年，巴克萊—洛杉磯。

③ 拉法哀尔·潘特路查：“墨西哥历史中的阶级斗争与被歪曲的史实”，墨西哥，1935年，第31頁。

④ 墨西哥为独立而斗争的年代中（1810—1821），在六千名教士之中祇有140名站在爱国者的一边。犹荣吉利：“天主教对美洲的兴耀”，第二卷，墨西哥，1863年，第253頁。

联合判决书中宣称，他被处极刑因为他是一个“异教徒和异端的传播者，教会首长的压迫者和迫害者，圣餐的褻瀆者，分离派信徒，淫乱者，伪善者，基督难以教化的敌人，霍布斯、格林威治、伏尔泰和路德以及与上述諸人同样患麻疯病的作者，唯物論者和无神論者的信徒，上帝、国王和教皇的叛徒”^①。甚至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密欽，他力图在自己的“拉丁美洲的教会与国家”一書中为教会的活动辯护，但被迫承認道，“美洲教会史中沒有比僧侶对待独立运动更为黑暗的史实了。”^②

教会显貴們对西班牙殖民地中独立运动的态度是符合教廷坚决捍卫殖民者統治的立場的。著名的阿根廷社会活动家罗道尔福·基奥尔奇写道，梵蒂岡为反对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而斗争。^③ 庇护七世在1816年1月3日給新西班牙僧侶的詔書中，頌揚西班牙国王菲迪南七世“非凡的德行和才干”，要僧侶号召信徒“順从国王和向其表示应有的忠誠”^④。一直到1827年西班牙人已被驅逐出美洲的时候，教皇在当地有建立独立教会可能的威胁下，不顧保护权已經讓出——当时西班牙国王菲迪南七世对保护权还仍旧不肯放弃——逕自任命一些拉丁美洲共和国的主教。可是当时庇护七世还急于使西班牙国王相信，他——教皇——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关心教会的利益，同时也关心国王的利益，因为“宗教联系是唯一能够号召已經掙脫臣民桎梏的人（即指拉丁美洲的人民）重新归順于您的保証”^⑤。

梵蒂岡任命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中的主教这一举动类似事实上承認这些新的共和国。西班牙国王对这一举动不能容忍。

① 汶逊蒂·桑茲：“馬立洛斯与披里伐”，墨西哥，1947年，第87頁。

② 劳依特·密欽：“拉丁美洲的教会与国家”，却泼尔山，北卡罗来納，1939年，第47頁。

③ 罗道尔福·基奥尔奇：“天主教与联合行动的政策”（“文化的捍卫者”，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5月号，第12頁）。

④ 路卡斯·阿拉茄罗：“美洲的教会与西班牙的統治”，第179頁。

⑤ 同上，第262頁。

由于菲迪南七世的抗議，新教皇——庇护八世暂时停止任命主教和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在羅馬的非正式代理人予以百般冷淡和侮辱。

祇是因为害怕丧失自己的地盘和企图在前西班牙殖民地重新博得收入才迫使梵蒂岡——这也仅在解放运动开始之后25年——承認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但是教会在承認之后，在拉丁美洲繼續依靠未完全推翻的殖民者、地主、种植园主和买办以及其他反动分子，鼓励他們和进步力量斗争。

教会在墨西哥曾进行战争，反对华累士总统领导的宗教改革进步运动。天主教僧侶在1861年时欢呼麦克西米倫和法兰西——西班牙的干涉。梵蒂岡和天主教会同国内和国际反动势力一起，企图扼杀墨西哥1910年的革命。

教会在其他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中也奉行这种反动政策。十九世紀及其后美国的侵入拉丁美洲各国，照例也得到教会阶层的支持，教会阶层为了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财富，总是准备背叛民族利益的。拉丁美洲的反动独裁政权在今日仍然依靠着教会的支持。天主教教会在許多共和国中繼續拥有土地和其他不动产，如同在殖民时期时一样。天主教教会与当地的反动势力，与国际垄断資本，特别是与剝削着拉丁美洲的美国垄断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天主教教会在西班牙統治菲律宾期間所起的作用，本質上和它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所起的作用没有什么不同。西班牙人是在十六世紀下半叶开始侵略菲律宾的。1564年从墨西哥港口拿維大特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开拓殖民地探險队在罗柏斯·德·兰茄斯披率领下开往菲律宾。同行的有一群以安德逊·德·烏尔大涅达为首的属于奥古斯丁教派的僧侶，烏尔大涅达曾在西班牙軍隊中混过30年，并且参加过西班牙侵略者的許多次征

战。烏尔大涅达领导的奥古斯丁教派的僧侶們帮助罗帕斯·德·兰茹斯披侵略菲律宾。不久以后，在菲律宾出现了其他教派的代表（1575年——法兰西斯教派，1581年——耶稣会，1583年——多米尼加教派，1606年——列可立特教派）。“西班牙传教士这种异常敏捷地脱下袈裟换上盔甲和放下十字架拿起宝剑的本領，在菲律宾全部施展出来了。在侵略菲律宾期間我們遇见的西班牙僧侶，特别是耶稣会徒，他們不仅是进一步扩张殖民地的倡議者，而且还是軍事討伐的直接领导者。”^① 王国当局奖励僧侶移居到菲律宾去，付給他們旅費（約700比索），并且保証其年俸达100比索。

行政上菲律宾是受墨西哥总督統制。西班牙殖民者們把他們建立在美国殖民地的一套秩序，拿到菲律宾如法泡制。殖民者在菲律宾設立监护区，而僧侶們得到的权利和特权与他們在美国殖民地所享受的相同。

西班牙統治菲律宾时期的特点是各教派僧侶的飞揚跋扈，教派之間虽然为爭取优势而进行残酷斗争，然而在对付偶尔有时企图抑制僧侶的食欲的殖民地当局时，是团结一致的。僧侶和殖民地当局的冲突通常是以僧侶得到胜利而告終。

天主教会直至十九世紀时，尚不准菲律宾人担任圣职。甚至在十九世紀中叶时，792个菲律宾乡村小教区中祇有181个教区是由菲律宾人或混血种领导的，其余的都在西班牙人掌握之中。

菲律宾人是不被接受为僧侶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菲律宾人阿波里拿利奧·德·克罗斯因不准成为僧侶而脱离天主教，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基督教会。1841年西班牙人在僧侶的支持下，对克罗斯的拥护者們大肆毒打。

各教派在菲律宾攫取土地和当地居民的不动产。耶稣会徒

^① 古貝尔：“1898年間的菲律宾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莫斯科，1948年，第26頁。

們积聚了大量的財富。1767年当耶穌会被查禁时，虽然耶穌会的大部分財產已被藏匿起来和逃避了，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巴罗斯指出的那样，可是从耶穌会沒收到的財產仍值132万比索之巨。^①十九世紀末期各教派在菲律賓占有42万5,000英亩头等的田地，其中27万2,000英亩在馬尼拉地区。^②

指控信奉异端和犯了反对西班牙国王的罪行，是教会沒收当地居民土地和財產的借口。各教派为了占夺大片土地，他們設法在菲律賓上层階級中找寻“异教徒和犯罪者”，起先許多菲律賓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因而被迫逃往国外，后来却推动他們参加解放斗争。^③

菲律賓的农民群众是受僧侶剝削的主要牺牲品。成千成万的农奴在寺院的种植园里工作。他們的劳动果实被僧侶卖给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从而得到巨額利潤。十九世紀菲律賓爱国者霍山·列薩尔在他曾起过解放运动旗帜作用的“不要冒犯我”那本书中，叙述到僧侶对农民的史无前例的残酷剝削。列薩尔的著作被梵蒂岡列入“禁書目录”之中。^④

在整整三百年期間內曾作为西班牙殖民者支柱的天主教僧侶，当十九世紀末叶美国军队占领菲律賓后，便轉而为新的奴役者服务了。“当地僧侶唯一考虑的是教会的物質利益，唯一关心的是教会在西班牙已失去的殖民地中的前途——俄国駐馬德里大使在1899年报告道——当他们确信西班牙欲保存自己殖民地的努力是徒劳无益时，就公开地站到新的征服者的一边，既忘記了自己的国籍，又忘記了自己对西班牙政府应表示感謝的义务，正因为由于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他們才能够在殖民地橫行霸道达三百年之久。”^⑤从美国政府一方面为了希望得到天主

① 台維·巴罗斯：“菲律賓史”，修訂本，芝加哥，1925年，第257—289頁。

② 同上，第40—42頁。

③ 古貝尔：“1898年間的菲律賓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第67頁。

④ 霍山·列薩尔：“不要冒犯我”，柏林，1887年。

⑤ 古貝尔：“1898年間的菲律賓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第300頁。

教僧侶的支持，所以對待他們極其友好。在簽訂巴黎和約的前夕，梵蒂岡國務卿滿意地在羅馬對俄國的代表却留柯夫說，“美國公正地對待羅馬天主教會在他們新領地上的利益。”^① 1903年美國政府向寺院買得屬於它們的部分田地，付與723萬7,000美元補償費，這筆數目在當時是十分巨大的。1908年美國國會撥付403,030美元附加費給天主教會，作為美國軍隊侵占菲律賓時教會所受損失的賠償費。^②

天主教會積極參加葡萄牙的殖民地侵略活動。這首先還是那些耶穌會徒。當1549年時，即耶穌會成立後二年，耶穌會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設立了一個訓練傳教士的學院。耶穌會利用葡萄牙殖民地的庇護，以當時驚人的速度在巴西、非洲和亞洲奠定基礎。1542年他們出現在印度的果阿，1543年——錫蘭，1546年——印度尼西亞的摩鹿加群島，1547年——剛果，1549年——巴西，1555年——埃塞俄比亞，1560年——東非洲、安哥拉和日本，1565年——澳門，1579年——中國，1598年——緬甸的底固和印度的孟加拉，1604年——綠角地區和几內亞，1613年——馬達加斯加島，1616年——柬埔寨，1624年——西藏，1626年——東京灣和暹羅灣地區，1642年——老撾。^③

1551年葡萄牙國王從教皇處得到保護權，然而教皇通過耶穌會仍舊繼續控制葡萄牙殖民地中的僧侶。

由於人員的不足，迫使葡萄牙人在殖民初期主要依靠僧侶和傳教士們的“外交”才幹，他們用誓約和欺詐騙得當地居民的信任，從而使殖民者能長驅直入。

葡萄牙歷史學者劉修·德·阿齊維杜宣稱，十七世紀初期巴西葡萄牙當局的預算中，撥給傳教士的補助金是最大的一个

① 古貝爾：“1898年間的菲律賓共和國和奧帝國主義”，第900頁。

② 合維·巴羅斯：“菲律賓史”，第303頁。

③ 安東尼奧·馬托索：“葡萄牙史”，第二卷，里斯本，1939年，第56—57頁。

支出項目——6,500 克羅薩杜斯。上述補助金的分配方法如下，在巴義亞(薩爾瓦多)的耶穌會得 3,000 克羅薩杜斯，在里約熱內盧的耶穌會得 2,500，在畢爾南埠柯的耶穌會得 1,000。阿齊維杜在評論這些款項時指出：“撥給傳教士的津貼是最合算的支出項目。為土著舉行洗禮照例是奴役低等民族的前奏曲。在宣講基督福音之後，經常是與此同時地出現了尋找利潤的兵士和殖民者。改信基督教為強占田產、甘蔗種植場和驅使土著為殖民者服勞役开辟了道路。”①

依仗着殖民當局的庇護，耶穌會徒在巴西強占了大量的土地和奴役着成萬的印第安人。十七世紀在馬拉雅姆、巴拉、畢爾南埠柯、亞馬森和聖保羅各省中有廣大地區是在他們掌握之中。甚至對耶穌會徒殖民時期的活動抱好感的巴西歷史學者吉布多·弗萊列，也稱他們的政策為“宗教帝國主義”。耶穌會徒一方面奴役印第安人，同時又反對世俗的殖民者，要求以奴役黑人代替奴役印第安人。提出這一要求有着兩種原因：一方面耶穌會徒力圖把當地居民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由他們去剝削；另一方面他們企圖增加販賣黑奴的收入，他們是積極參與販運黑奴的活動的。②

要想把在巴西的耶穌會徒描繪成為使印第安人不受殖民者橫暴虐待的保護人的種種企圖，是經不起批駁的。主張用黑人代替印第安人的耶穌會會員諾勃立加、安基塔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們同時号召自己的同行們對印第安人施加有意的殘暴行為。印第安人的“使徒”耶穌會徒諾勃立加在 1559 年教導他人道：“不可予印第安人以自由，因為他們是原始人。”③ 另外一個“使徒”安基塔教導他人道：“寶劍和兵器是最好的傳道工具……由

① 劉修·阿齊維杜：“葡萄牙經濟史”，里斯本，1947 年，第 256—257 頁。

② 耶穌會徒們甚至強迫印第安人和黑人同居，為了要把他們的子女——混血兒——賣出為奴。

③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 725 頁。

于恐怖而改信基督教，比由于爱的緣故應該快的多。”^①

“耶穌會徒既是印第安奴隸們的主人，又是黑奴們的主人——殖民地美洲史學者迪菲指出——早期的移民們認為他們的反對奴役印第安人是出于偽善，同時責難他們說，耶穌會徒們的傳道可以用下列幾句話來總括：“不要觸犯印第安人，因為我們要利用他們。”^②

馬拉雅姆省的總督在 1751 年給里斯本的報告中說，耶穌會的傳教士們“使受自己監護的印第安人處於極可憐的被奴役、無教育和貧困狀態中，而自己則靠他們發財致富。他們的權勢慾和貪婪心同樣可怕；他們不僅力圖管理，而且還企圖占有整個馬拉雅姆省”^③。

傳教士在葡萄牙殖民地對待印第安人的殘酷程度，和奴隸主對待黑人一樣。“傳教士會中的暴虐無道絲毫不遜于奴隸制種植園”^④——弗萊列承認道。

巴西的教會全部掌握在葡萄牙僧侶的手里。印第安人不准擔任聖職。

鄉村小教區的教士們為種植園主——奴隸主服務。隨着十七世紀末葉在米那斯——才拉易斯省發現寶石礦後，許多世俗殖民者和僧侶殖民者蜂湧而往，希望能輕易發財。甚至葡萄牙的教士和修道士聞訊後，亦急忙前往巴西搜尋寶石。“僧侶們忘記了他們所作的甘於貧困的誓言和被可恥的貪慾所攪住了，他們的行徑十分醜惡，以致于政府命令禁止他們進入礦區。可是政府的法令仍舊無法阻擋他們。占有黃金的貪慾比禁令更有力量。聖保羅省總督最後的對策是要求主教革除幾個僧侶的教籍。然而教規的處罰是否比王國政府的命令更有效果，這是有

① 吉布多·弗萊列：“主與奴”，紐約，1946年，第136頁。

② 倍素·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724頁。

③ 海利魁·漢特曼：“巴西史”，里約熱內盧，1931年，第297頁。

④ 吉布多·弗萊列：“主與奴”，第174頁。

問題的。”^①

僧侶們的道德異常敗壞。僧侶們和情婦共居。“放縱”的風氣在寺院中占統治地位。迪菲在談到巴義亞(薩爾瓦多)——巴義亞在二百年期間內曾為巴西殖民當局的行政中心——的修道院時寫道：“修女大多數是富裕階級的玩物，她們僱有許多女僕。有時候四個女僕侍候一個修女。修女通過女僕和青年人保持聯繫，因此“醜聞”迭出。裝着鐵檻的窗戶底下演奏小夜曲、讀情詩和種種殷勤獻媚，對於修女來說是慣常的事，正如對於沒有拋棄慾念的人世的少女們一樣……不管教會是如何地莊嚴，然而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教會在巴西的活動同它所宣布的理想毫不相稱”。^②

天主教僧侶是在葡萄牙侵略者的支持下滲入亞洲和東方各國的。如同在巴西一樣，在這裡活動着的主要是耶穌會徒，其代表人物法蘭西斯克—克薩維爾(其後他被列入“聖徒畫象”之中)在十六世紀中葉在印度、日本和中國建立了最早的耶穌會據點。法蘭西斯克—克薩維爾兼有殖民地開拓者、商人和宗教狂熱者的性格。美國耶穌會徒歷史學者林說，法蘭西斯克—克薩維爾極其了解商業對於宗教滲入的意義。^③當時經常有一大群葡萄牙商人跟隨着他。

在亞洲葡萄牙人的活動不得不更為狡滑，同時他們不得不進行更多的欺騙，因為他們的人數不足以用武力來征服這些大國，如印度、中國或日本。所以對於葡萄牙侵略者來說，耶穌會的幫助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因為耶穌會徒在傳教士的假面具下，已經深入到亞洲和馬來亞群島的最偏僻的角落。

① 劉修·阿齊維杜：“葡萄牙經濟史”，第310—311頁。

②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736頁，以及吉布多·弗萊列：“主與奴”，第447—448頁。

③ 喬奇·林：“遠東的宗教”，密爾賓基，1950年，第123頁。

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是耶穌會在東南亞的主要據點，而澳門則是亞洲東北部的的主要據點。耶穌會從果阿把他們的觸鬚伸向印度、錫蘭、暹羅、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耶穌會以澳門為據點在中國和日本進行活動。梵蒂岡曾宣稱葡萄牙國王為東方的“信仰的捍衛者”。葡萄牙駐果阿的總主教是印度和亞洲其他各國所有天主教僧侶的最高領袖。這種情況持續了將近四百年，直到1953年梵蒂岡為了要保持自己在印度的勢力，任命印度人伐梁·格拉西阿斯為紅衣主教時為止。梵蒂岡這一措施引起了葡萄牙政府的抗議，葡萄牙政府在其大西洋彼岸庇護者的支持下繼續死守着果阿不放，同時對這一地區的解放運動予以恐怖鎮壓。

美國歷史學者潘羅茲指出，自從法蘭西斯克·克薩維爾起，“耶穌會徒不惜使用任何手段，進行賄買、恐嚇和拷打，以達到使亞洲人改信基督教的目的”^①。印度天主教士阿爾浦達塞米在他所寫的“印度天主教會”一專論中，承認在印度活動的包括天主教徒在內的傳教士們，追求着自私的目的，正如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剝削印度的列強一樣，屬於不同牧師協會和不同國籍的歐洲傳教士們，大多數也祇考慮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光榮。”^②

英國人出現在印度以後，在印度活動的耶穌會徒和天主教其他教派的代表們轉而為東印度公司效勞，東印度公司承擔付與僧侶們經常俸給的義務。1720年5月27日教廷駐印度的使徒助主教（教皇的代表和當地僧侶的首腦）馬里齊以天主教會名義舉行隆重的宣誓儀式，表示以信仰和正義為英國人服務。他保證“印度的天主教僧侶將對大不列顛陛下表示忠誠，並拒絕作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大不列顛陛下和尊敬的公司（東印度公司）的利益與聲望的行動，天主教僧侶將服從總督及其繼承人的一切命令”^③。

① 布依斯·潘羅茲：“1602—1639年間在東印度的海戰”，劍橋，馬薩諸塞州，1936年，第14頁。

② 雷契爾·阿爾浦達塞米：“印度的天主教會”，弗利堡，1948年，第48頁。

③ 同上，第60—61頁。

耶穌會徒从印度以殖民地出產的貨物与歐洲市場进行貿易。1697年法屬東印度總督馬丁从本地雪里報告自己的政府道：“除了荷蘭人以外，耶穌會徒的生意做得最大，在这一方面英國人、丹麥人、法國人、甚至使耶穌會徒在这里安頓下來的葡萄牙人都不及他們。”^①馬丁還指出：“从沒有一艘从歐洲來到这里的船隻不載有耶穌會徒們的貨物的”。

耶穌會徒在中國從事商業和財政活動的積極性并无遜色。在十八世紀初期游歷過中國的教皇使節法國人李多爾農的報告中談到：“耶穌會在北京開設三家錢莊做高利貸生意。每家錢莊擁有五萬到六萬串錢的流動資金。”^②

在中國的耶穌會徒以達到對皇帝宮庭中人士能產生決定性影響為其目的。為了易于博得中國人的信任，耶穌會徒以“科學”活動作為偽裝，以掩蓋住自己真正的意圖；他們從事天文、數學、煉金術和妖術；繪制地圖，充當譯員，嚴格遵行一切中國人的儀式和禮節。十七世紀的一個時期中，他們打算把羅馬教皇的親屬嫁給中國皇帝，使兩個“天朝”結為親戚。

*

* *

現在我們簡要地敘述天主教僧侶在法屬殖民地中的活動。

十七世紀時法國人滲入加拿大、新奧爾良地區和美洲的圭亞那，佔據了安的列斯群島，并在本地雪里（印度）扎下了根。由于這種殖民地的擴張，1659年在巴黎成立了外國傳教士協會，該協會的任務之一為訓練在殖民地特別能保護法國殖民者利益的法籍傳教士。

1664年在考爾貝爾的倡議下，成立了法國東印度公司，其任務為在東南亞佔領殖民地。法國東印度公司廣泛利用傳教士們的服務，後者為公司創造了深入這一地區的条件。法國歷史

① 西奧圖·格里齊蓋爾：“耶穌會徒”，第一卷，第330—331頁。

② 阿諾爾特·洛柏遜：“傳教士與官僚”，巴克萊—洛杉磯，1942年，第154頁。

学者托馬吉写道，“法国的传教士們‘如果’不是已經成为法国殖民地扩张政策的决策者的話，則至少已成為最好的助手”。^① 葡萄牙人阻碍法国传教士們向东深入，把他們看作自己的竞争者。法国传教士莫脫—朗培尔和巴蕾曾在十七世紀下半叶出发前往暹羅，但是由于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被迫不是經海路而是經陆路，也就是經過小亚細亚、波斯和印度而抵达暹羅。由于莫脫—朗培尔、巴蕾和其他传教士們的奸計得逞，法国人終於获得了在暹羅經商的自由，法国人在暹羅設立貨物采購站和得到在曼谷和馬尔其駐扎卫戍部队的权利。^②

同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竞争的法国人不得不运用更为狡黠的手段和詭計。法国传教士的策略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更具有弹性。他們准許当地居民的代表人物加入僧侶阶层，广泛賄买当地領袖。传教士在当地居民間販賣酒类，在法国殖民地中酒是被称作法国国王的“牛奶”的。在其他方面，法国僧侶和西班牙或葡萄牙僧侶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教会在加拿大是一个最大的土地所有主，如同教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中一样。法国統治加拿大期間，教会攫得所有已开垦土地的三分之二（2,096,754 英亩最肥沃的土地），其中的 891,945 英亩屬於耶穌会会徒）。^③ 甚至今天的加拿大天主教会也仍旧是一个最富有的土地所有主。蒙特累尔市将近三分之一的不动产是屬於各教会机构的。这就无怪乎人們将蒙特累尔称为美洲的羅馬了。

耶穌会徒是法国人侵入加拿大的响导員。耶穌会徒是加拿大的最初殖民者，最初的一些总督就是依照他們的指示而任命的。对于在加拿大的殖民者而言，收購和銷售皮貨是具有首要意义的事业。殖民者把印第安部落的财产洗劫一空，在收購

① 托馬吉：“印度支那之征服”，巴黎，1931年，第11頁。

② 同上。

③ 法兰克·格兰脫：“作为宗教的俘虏的加拿大”，莫斯科，1930年，第24頁。

皮貨時欺騙他們，用酒灌醉他們，1632年時印第安衣洛克族起義反抗法國殖民者，這場戰爭延續了30年，直至1665年結束。僧侶們，特別是耶穌會徒，積極參與鎮壓印第安人，宣稱這場與印第安衣洛克族的戰爭為十字軍戰爭。^①耶穌會徒在各地遍設分支進行皮貨貿易，他們對於鎮壓印第安人的反抗特別感覺興趣。十七世紀下半葉新法國（加拿大）總督寫信給考爾貝爾說，耶穌會徒追逐皮貨的熱忱不下於捕捉奴隸，傳教士會大多數是貿易據點。^②

十八世紀中葉，傳教士賴伐立脫領導下的耶穌會徒們在安的列斯群島的馬提尼克島上的勢力很大，他們擁有棉花、煙草和甘蔗種植園。數千個奴隸在馬提尼克島上的種植園中工作。耶穌會徒把食糖、煙草和棉花販至法國。當賴伐立脫還沒有從事各種投機事業之前，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賴伐立脫最後因為不能使他所開出的金額共達250萬法郎的票據兌現而破產了。賴伐立脫與法國各大銀行有往來，他的破產在法國引起了一場風波，同時促使耶穌會徒在1764年被逐出法國。

綜合上述，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殖民地的歷史證明了教廷協助殖民侵略，和以“天主教”的君王們奴役殖民地人民。

教會本身在殖民地就是當地居民殘酷的剝削者。教會以掠奪所得的不少一部份繳給教皇國庫，從而使教廷也成為殖民者的同謀。

天主教僧侶和教廷支持殖民者同解放運動作鬥爭，而在殖民者被逐出以後則轉而捍衛當地反動派的利益。

① 里昂·潘琪歐脫：“對新法蘭西與耶穌會徒之間的研究（1632—1672）”，蒙特婁—巴黎，1940年，第263頁。

② 克勞第·明納爾特：“法屬加拿大史（1534—1763）”，巴黎，1950年，第85頁。

第三章

梵蒂岡走向資本主義

天主教會把法國革命看作啟示錄中的災難。在法國，政教分離了，教會的財產被沒收了。^① 教會的管理機關遭到嚴重的破壞。教會在人民中的威望降低了。

天主教歷史學者庫爾脫被迫承認，教會只配遭受這一命運。“教會和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寫道——因此教會已成為它的支柱，同時社會輿論認為教會對當時制度下的一切缺點應負責任，因為教會是這一制度的組成部份。教會同社會精神毫無聯繫，它缺少激動人心所必需的內蘊力量，理想世界不會屈從於它的影響。”^②

當時教皇庇護六世認為歐洲反動力量將會把革命扼殺，所以把法國人民及其革命領袖革除教籍。教皇在1791年6月30日致所有隸屬於他的教會的通諭中，號召反動派不要垂頭喪氣。“我們將來援助你們”——天主教會的首領這樣好戰地宣告。“而你們這些法國人，王位的敵人，為全世界所厭棄的暴虐者，發抖吧！——庇護六世威嚇法國人民道——我們的力量將聯合起來反對你們。我們為了提醒你們擔負起你們的義務，已經祈禱得

① 法國革命時期所沒收的教會財產估價值2,000萬法郎（尼爾遜·弗里德利克：“十九世紀教廷史”，第141頁）。

② 庫爾脫：“歷史轉折時期的教會”，布魯塞爾，1929年，第176頁。

太长久了。而你們却不断地愈加强硬，比岩山还要硬……你們敗坏的議會沒有得到你們統治者的批准，就决定使宪法生效，这一宪法将在你們的民族史上永远留下可耻的污点……”。^①

1792年2月25日庇护六世写了一封諂媚奉承的正式信函与叶卡特琳娜二世，号召俄国女皇加强反对法国革命的干涉。教皇在感謝叶卡特琳娜二世对反动派的支持时写道：“您不会相信，不可战胜的女皇，您的同情的赫赫明証是如何地鼓舞着我的灵魂，我是多么地應該感謝您。我对女皇陛下的真誠感情无法隱藏在我的心头，所以决定那怕就利用这一封信来表达也好。請您接受我最深切的感激之意，接受我的謝忱，我没有适当的辞彙来表达出我所体驗到的亲切之感。”^②

“上帝的全权代理人”以同样的正式信函向奥地利皇帝法朗士二世呼吁。庇护六世在其中的一封信函中(1792年8月8日)曾为将反对法兰西的战争进行到底而祈祷。教皇感謝法朗士二世时說到：“您具有这种精神，上帝已經以秋收丰盛的神恩証明了这一点，因为自从您一开始执政，您就仅致力于以武器的力量征服您强大而頑固的敌人，致力于在他們的国家中重建教会和重建法兰西，把所有用武力从我們手中夺去的东西归还給我們。”^③

可是無論僧侶們为此目的而如此热心地在祈祷，無論对革命的法国如何詛咒和以革除教籍来威胁，都不能使历史倒退。1796年法国军队进入教皇区，强迫教皇付出 2,100 万茲庫提賠款。1798年，拿破侖以法国將軍裘福在羅馬被杀为借口，命令自己的军队占領这一“永恒”城。同年根据托兰蒂条約，教皇應該付与法国人1,000万茲庫提补充賠款。拿破侖取消了教皇世俗的权力，庇护六世本人則命令放逐到法国去。1799年 庇护六世死

① “伟大的法国革命时期内的无神論和同教会进行的斗争”，資料彙編，第一部，莫斯科，1933年，第69—70頁。

② 同上，第76頁。

③ 同上，第78頁。

于异国，然而他始終不懂得自己目击的那些事件的意义。

出而拯救教廷的却是教廷对他期待最少的人。拿破侖在背叛革命以后，决定利用教会和教皇为他效劳。拿破侖認為宗教麻醉剂能为他作出有益的服务，帮助他使法国人民群众和他所征服的国家順从和听話。

“沒有社会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拿破侖議論道——而缺少宗教时，社会不平等也无法存在。当一个人在另一个正在大嚼大喝的人面前因飢餓而将要死去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容忍这种不平等的，假使沒有一个权威者指示他說：这是上帝所希望的，有穷人和富人同时存在是必要的，而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上財富的分配将按照另一种方式。”^①

从同样的“原則”出发，拿破侖在1801年同新教皇庇护七世（1800—1823）簽訂了宗教条約，以这一条約为根据在法国重建天主教会，从而僧侶与官吏和宪兵同列，轉而成为新制度的支柱。內政部开始掌管教会的一切事务。內政部不仅发給僧侶俸給（大主教—15,000法郎，主教—10,000法郎，神父—1,000至1,500法郎，这还不包括公家房屋和菜园在內），它还指示在宣道文內該写些什么。拿破侖有充分根据把三者联在一起說：“我的地方官吏，我的主教，我的宪兵”。宗教条約簽訂以后，教会奴才般死心踏地为新主子效力，宣称新主子是“上帝所賜的为人类謀福祉的人”。^②法国的教会采用了拿破侖亲自审定的新的教义問答，新的教义問答頌揚拿破侖的独裁政治和号召信徒遵行帝国当局的命令。“基督徒对統治他們的君王，特別是拿破侖一世，我們的皇帝，負有那些义务呢？”——这是新的教义問答中的問題之一。答案是这样的：“基督徒應該对統治他們的君王，特別是拿破侖一世皇帝陛下，表示爱戴、尊敬、順从和忠誠。他們为了

①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巴黎，1939年，第35頁。

② 安德列·拉特勒依耳：“天主教会与法国大革命”，第二卷，巴黎，1950年第126頁。

保卫帝国和皇帝陛下应该服军役和纳税，为他的健康和国家在精神上的和世俗的福祉而热忱地祈祷”。“为什么我们应该履行所有这些义务呢？”——教义问答在其后提问道。“首先因为上帝是依据自己的意志创立各帝国和分配各帝国以使命的，上帝不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以神恩保佑我们的皇帝。这是上帝使他成为专制君王的，上帝使他成为自己形象在人间的体现者和表现自己威力的工具。”①

拿破仑对教廷的支持极为重视，因为教廷的支持有助于他的独裁政权的巩固。他不仅在法国恢复天主教，还千方百计地在德意志新教区域内袒护天主教，在这些区域内，天主教在宗教改革后首次获得同新教处于平等地位进行活动的可能。拿破仑准许庇护七世住在罗马，规定给他一定的补助金，可是这位“神圣”的人为了要增加补助金还想出了各种办法。庇护七世本人和通过自己的使者，以值得人们好好地去学习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再地提醒拿破仑说，仅仅依靠补助金是“完全不可能过活的”，同时恳求就是归还从前属于他的领地的一部份也行，似乎这些领地对维持教皇的威望是异常必需的。②

然而恢复教皇国一事不在拿破仑的打算之中。他希望教廷屈从于自己的政策。庇护七世及其最亲近的顾问们（红衣主教亢柴尔维等人）对这一点极为了解。表面上庇护七世表示服从法国皇帝，经常向他央求增加补助金和施以小惠，同时又和英国人秘密地交往。当时英国人的舰队的特拉法加角一役后已称霸地中海，这一事实经常提醒教皇说，拿破仑的威势已不如昔了。

1807—1808年间拿破仑重新占领教皇领地，而这一次是正式将这些地方并入法国，1809年剥夺了教皇的世俗权力，最初把他流放到意大利的萨沃那，随后流放到法国的枫丹白露，所有梵

① 安德列·拉特勒依耳：“天主教会与法国大革命”，第二卷，巴黎，1950年第127页。

② 茹泰诺·塞而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巴黎，1952年，第275页。

蒂岡的档案也运至該地，庇护七世的两面把戏就此告終。

1813年拿破侖强迫庇护七世簽訂新的宗教条約，根据条約教皇应定居法国，拿破侖則答应每年付与教皇200万法郎补助金。然而新条約沒有实施。联軍的迅速迫近巴黎，迫使拿破侖放庇护七世回羅馬去。

維也納會議恢复了教皇国。“神圣同盟”的参加者把教皇看作与革命作斗争有价值的同盟者并非沒有根据。庇护七世一回到羅馬，就急忙重建宗教审判厅和耶穌会。“如果我們在基督教受到威胁时拒絕神賜与我們的有益帮助，推开圣彼得在狂暴风浪中颠簸前进的独木船，推开那些准备冲破随时都会吞沒我們的海浪的坚强的和經受过考驗的橈夫——庇护七世在恢复‘耶穌会’的詔書中写道——那么我們在上帝面前将是有罪的。”^①

“坚强的和經受过考驗的橈夫們”很快地就把教会的管理机构攫取到自己不肯放松的手里，并滲入到教会生活的所有毛孔中。1814年1月，即在耶穌会正式恢复前几个月，耶穌会徒在巴黎建立了“法兰西传教士协会”，这一組織似乎以使法国的“不信者”信奉基督教为其宗旨。实际上“法兰西传教士协会”是波旁王朝警察的一个分支机构，它帮助警察查明革命活动家和把他們一网打尽。

耶穌会的“长手”在意大利特別活跃，意大利反动的保皇党极願利用罗耀拉僧团耶穌会的效劳。同时代人指出，僧侶势力在披也蒙脫区特別跋扈，上世紀三十年代間在这一不大的区域内有600个寺院在活动着。

教会在托斯加那、巴尔馬和那不勒斯王国帮助恢复“秩序”。然而教皇国居民的境遇比誰都还要坏，他們从1814年起，重新得嚐“上帝的全权代理人”残酷的刑具的滋味。自从庇护七世返回羅馬时起，以前的秩序和慣例又在教会区域内占統治地位。

^① 古貝尔：“耶穌会徒”，1899年，第314頁。

买卖职位和圣物，教廷的横暴和縱慾无度……政治上不可靠分子每十五天要向警察所指定的教士作忏悔。“事情甚至于发展到这般地步——法国历史学者索林說——在羅馬街上禁止点煤气灯，因为这一有益的发明使人联想到异教徒来到羅馬；根据同一理由接种牛痘也被禁止。”^①

梅特涅的秘密代理人在1822年，即庇护七世統治教廷的末期，报告維也納說：“可以肯定地說，今日的羅馬在宗教方面是心灵荒蕪的中心，在世俗事务方面則一团糟。居民大多数习于偏見，而不是真正的信仰。在这一个由紅衣主教、高級僧侶和教士們組成的政府中，其政策可以总结为不断地耍弄法利賽人的把戏和玩权术。經濟生活混乱透頂……財政情况到了言辞无法形容的恶劣地步。部长的貪污和不学无术为教皇国庫带来可观的損失……在所有教皇的区域内，法庭是公开行賄的……。”^②

里夫十二世(1823—1829)統治期間，对异端份子的迫害愈发厉害，稅收层出不穷，对劳动居民的剝削更加强了。教皇的宗教审判厅审判官之一紅衣主教里伐罗洛，在1825年一年間就判处了568个“自由主义者”以死刑。1825年紅衣主教裘斯济阿尼尼，依馬拉教区主教，命令把被控“瀆神罪”的犯人的舌头刺穿（所有意大利的为教会所疾視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都被控犯此罪行），他允諾发给告密者有效期为10年的贖罪券作为奖励。甚至于梅特涅的代理人也对教皇区域内的各种制度表示不滿。1825年10月間他报告自己的主子說：“巴比倫，这才是和羅馬相称的名字。这里什么事都能用黄金办到……羅馬的僧侶足足有三分之二是伪善的，可收买的；教士大多数对自己的职务漠不关心或者是不信者。这个政府（即教会——作者）是土耳其神权政体政府。”^③

① 索林：“意大利史(1815年起至維克托·爱麦虞埃死为止)”，1898年，第36頁。

② “意羅教皇”，第84頁。

③ 同上，第86—87頁。

为了恐怕这种制度会引起革命，列强在1831年当格里哥里十六世(1831—1846)被选为教皇之际，向梵蒂冈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梵蒂冈进行某种改革。可是格里哥里十六世的统治方法和他的前人没有多大区别。格里哥里十六世是一个“愚蠢而酗酒的恶棍”；由于过度酗酒马尔萨拉葡萄酒而死，赫尔岭谈到他时这样说，格里哥里十六世并且还是他“全能的”僕人茄当诺·莫洛尼手掌间的玩物……

红衣主教们是能和教皇搭配的人物……“这是怎样令人可怕地僵硬而多疑的脸(使人联想起宗教审判厅和火刑的惨状)，这些透露着死意的头髮寥寥无几的秃顶；在他们衰老的面貌中可以看出独身老人的冷酷无情和外交官—祭司的残忍性情。是呀，他们是宗教审判厅和反动阵营中的人物……”^①——赫尔岭在其著名的“来自维阿·德·考尔索的书信”中这样描述红衣主教们。

赫尔岭显然没有夸大。当时还有一位正统的天主教徒拉美涅在1832年参拜罗马以后写道，格里哥里十六世的同事们是些“追求官爵者、吝啬鬼、堕落者、耽于幻想的白痴”^②。

教皇领地内遍布暗探。祇要根据简单的告密就可以逮捕人。那些在教会—警察机关的文件上被列入“所谓思想阶级”的人，特别受到迫害。

“乡村小教区的住持们——意大利历史学者台马尔珂写道——有权在白天或夜间的任何时间内闖入居民的家中，检查是否有破坏诫规和教规的行为……教士们以未奉行宗教仪式为借口，可以举行搜查和逮捕人。”^③

① 赫尔岭“法兰西、意大利书信集，来自彼岸”，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第87页。

② 胡华特：“关于欧洲保守主义的三篇专论(梅特涅、基佐、十九世纪的天主教会)”，伦敦，1929年，第268页。

③ 多明尼柯·台马尔珂：“教廷的没落(教皇格里哥里十六世)”，都灵，1949年，第97页。

成干个政治犯在宗教审判厅的刑訊室中和監獄的囚禁室中被折磨着。“羅馬和教皇領地中的監獄在教皇陛下死前(即格里哥里十六世)——赫尔岑証明道——已經是滿坑滿谷的了,以致于开始在所有的公共建築物中囚禁政治犯。”^①許多人逃往国外以免受到迫害。

“参加秘密社会的會議被視作叛乱行为,因而会招致死罪和沒收财产——金格写道——任何人协助秘密社会的會員逃亡則被判处終身服苦役,任何吸收新會員的企图其罪与上相等。盜窃圣物虽然和政治風馬牛不相关,也算作叛乱行为并得处以死刑。”^②

論述經濟問題的書籍被認為是反上帝的和危險的,因此被教会检查机关禁止发行。書刊上不准提到地球是在迴轉着的。教会当局灌輸蒙昧主义,其原因正如梵蒂岡的一个高僧阿捷利奧所說的那樣:“无学識的人民容易管理”。

然而“无学識的人民”仇視教皇当局,仇視那些穿袈裟的官吏和警察,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压迫者和剝削者。教皇区域内到处都有烧炭党的組織和地下会在活动着。

“这不可能有別种結果——金格在評論教廷的臣民的共同的情緒时指出——所有这些严厉的防范性的法律,与护法者道德败坏的行为是如何駭人听聞地矛盾着。当时虽然在复活节期間要求信徒上教堂做礼拜,但僧侶經常用行圣餐礼做买卖和以終身免罪符作投机生意,其无耻程度同路德时代相同。当时虽然对拒絕行圣餐礼的人不准予以治疗,但是在羅馬僧侶間暗中的自由思想很活跃。检查机关正在关怀着戏剧节目的道德純洁性时,而当时的教会却是淫乱和陰謀的中心。兒童在学校中被迫严格奉行宗教仪式,可是他們在教堂中听到的却是对虔信的强

① 赫尔岑:“法兰西、意大利書信集,来自彼岸”,第84頁。

② 鮑尔頓·金格:“意大利統一史”,第一卷,莫斯科,1901年,第82頁。

盜的贊美，這些強盜還受到聖徒的保護而免受絞刑。教會由於財政上的需要公開在禮拜天賣彩票，而小酒店和咖啡店在這一天的時候應該關門停止營業。”^①

教皇國的前途由以教皇為首的僧侶階層和“黑色”^② 貴族們決定。黑色貴族就是教皇的後裔和紅衣主教的親屬，其首要人物有柯隆那，奧西尼，羅斯保里，阿爾杜勃朗奇尼，杜里亞，奧德斯卡爾基，鮑爾格什，洛斯波爾奧西，麥西莫和托爾洛尼，正是他們及其妻女和情婦們，決定着“宗座”的政策。統治着各省的紅衣主教們，其權限無邊，因此他們可以橫行霸道無所不為。最好的田產、宮庭——總而言之，所有的財富都歸屬於教會的顯貴們和“黑色”貴族，而廣大群眾則忍受飢寒和窮困。“不論哪個地方的無業流民、失業者和乞丐，都沒有羅馬這樣多”^③——台馬爾珂指出。居民們長期地挨餓。1837年時，麵包房得在兵士的保護下分送麵包到店鋪里，因為怕受到飢餓的群眾的攔劫。羅馬城內竊賊十分眾多，而在郊區則強盜十分猖獗。為了保護旅客起見，道路兩旁的樹木盡行砍去，這種情景和英國在八世紀時相同。

教皇領地在經濟方面是歐洲最落後的封建國家。至於要築造鐵路一事連想也不會想到過。教皇格里哥里十六世宣稱築造鐵路是魔鬼的事，是上帝為了亞當和夏娃的原罪對人類誘惑。每一省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單位；各省都設有卡收稅。沒有開辦過工廠。教皇國庫把酒類、食鹽、魚類和糖食的買賣交給投機商人包辦。

雖然教皇國庫仍舊象從前那樣地繼續收進黃金，可是教廷

① 鮑爾頓·金格：“意大利統一史”，第一卷，莫斯科，1901年，第86—87頁。

② 在意大利，人們把數百年間和教廷有着聯系的保皇派家族（貴族）稱作“黑色”貴族。

③ 多明尼珂·台馬爾珂：“教廷的沒落”，第97頁。

的财政却处于“长期的混乱状态中”^①。六十年代时，仅每年收进的“圣彼得一枚捐”就达800万兹库提。意大利统一前夕，教皇领地的收入超过5,000万里拉。即使有了这么多钱，然而“上帝的全权代理人”还嫌不够用。教廷收入的大部份照例被教皇的亲属、宠臣和红衣主教们归入私囊。赤字和国债每年都在增加。格里哥里十六世在重新把犹太人赶进犹太区以后，就不以为向巴黎的洛希尔银行借债度日是降尊纡贵了。1831年、1832年及1837年，教皇向洛希尔借得1,200万兹库提。^②其他较小的银行家和高利贷者也为教皇效劳；托隆尼亚（罗马）、派洛奇（热那亚）、以及其他等等。格里哥里十六世统治教廷的最后一年，教皇国的债务超过2,600万兹库提，而每年的赤字达90万兹库提。

所有这些事实证明，教廷同法国的波旁王朝一样，在复辟以后什么也没有学到。最后的一个教皇兼国王——庇护九世统治时期（1846—1878）在这方面是最特出的。

麦斯泰·弗立蒂大公，后来的庇护九世，最初选择军界为立身荣名之途。他在十九岁时投身军界为拿破仑效劳，以中尉军衔在拿破仑皇帝的羽林军中服役，在巴黎逍遥度日。拿破仑失败以后，这位未来的教皇脱下法国制服换上奥地利的制服，其后又转而在教皇庇护七世的近卫军中服务。^③不久后这位年青的军官由于患羊癫疯被迫抛弃军职。他轻而易举地脱下军服披上袈裟。麦斯泰·弗立蒂在成为高级教士后得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以教皇厅非官方代表的身份访问拉丁美洲，与大西洋彼岸各共和国中的天主教僧侣进行接触。1823—1824年间他在

① D·A·宾契：“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与教会”，伦敦，1937年，第304页。

② 多明尼珂·合马尔珂：“教廷的没落”，第145页。教廷向洛希尔借的最后一次著名的债，是在教廷世俗权力被剥夺的前夕——1870年7月，债额为20万兹库提。

③ 索林：“意大利史”，第123—124页。

美洲各国旅行，回到羅馬后晉級很快。麦斯泰·弗立蒂在三十余岁时已是主教了。外面有流言說他对自由主义精神并不抵触，甚至于說他同情于統一意大利的思想。1846年当格里哥里十六世死去和空气中能嗅出革命风暴的气息的时候，自由主义化的麦斯泰·弗立蒂主教是被选为“上帝的全权代理人”最合适不过的候选人了。虽然当时他祇有50岁，这一年齡对于教皇而言是“不体面”的，但是紅衣主教們投票选他，因为教皇厅需要一个年青的、有进取精神的首領，他能够在正在迫近中的新的革命风暴面前，强有力地保护教皇厅的利益。

新教皇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向所有属于教廷管轄的教会发出一张詔書，他斥責共产主义为罪恶的学說，从而取得梅特涅和俄国沙皇的欢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最初的几行里，把教皇和旧欧洲联合在一起为“神圣地驅除共产主义”的势力列在一起，所指的就是这张詔書。可是无论是恐怖手段，是咒語，都不能阻止革命。1847年时庇护九世恐怕人民起义，不得不对社会輿論作了某种讓步：允許发行报纸和筹組国家會議——类似議會性質的組織。教皇向民主势力献媚的时间并不长。1848年底庇护九世反对同当时占領着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奥地利作战，他还企图撕毀自己宣布的改革方案。这事在羅馬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憤慨。教皇逃往海他島。人民在羅馬宣布成立以馬志尼和加利波的为首的共和国。

逃亡在海他島上的教皇向那不勒斯国王菲迪南二世，向未来的拿破侖三世，向西班牙和奥地利求援，他們派遣了自己的軍隊攻打羅馬共和国。①祇在羅馬共和国被扼杀和羅馬人民被鎮压下去以后，庇护九世才回到自己的首都，他在外国刺刀的保护之下又作了长长二十年的世俗君主。

庇护九世依靠了法国駐軍和瑞士雇佣近卫軍，后者实际上

① 庇护九世为了感謝拿破侖三世的武装干涉，其后称他为“先知”（尼蒂：“沉思与纪录”，米兰，1953年，第20頁）。

是类似現代外籍軍团的由国际冒險家組成的五花八門的杂脛部队，在人民面前經常惶恐不安地度日。

紅衣主教柴柯摩·安东尼里在将近三十年期間是庇护九世的左右手和他的政府的首腦。虽然安东尼里有着紅衣主教的头衔，然而他甚至連神父都不曾当过。教皇的全权代理人极端憎恨所有的进步事物，他对金錢的貪欲永无餍足的时候，并且好色如命。安东尼里的非婚生女在他死后和梵蒂岡涉訟多年，企图得到被里夫十三世所侵吞的他父亲的遗产。安东尼里的兄弟之一菲利浦領導着梵蒂岡開設的“羅馬銀行”，該銀行的資本不但全能的紅衣主教能自由应用，連其人数众多的親屬也可以自由应用。紅衣主教的另一个兄弟路德維格掌管着教皇区域的經濟事务。在庇护九世其余的同事之中，應該提提作为警察总监的高級教士菲利浦·那杜尼，他曾經是刑事分子，年青時曾因盜用公款而坐过監獄。

庇护九世領導反动势力与意大利統一运动作斗争，因为意大利的統一威胁着“宗座”的中世紀特权，威胁着教廷在亚平宁半島上的势力。教廷是意大利封建反革命势力的主要急先鋒，耶穌会徒們根据庇护九世的指示組織了为宗教狂热所鼓动的圣菲奇斯脫匪帮，以恐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匪帮在意大利南部施行恐怖政策，为了“圣父和上帝”的名义搶劫和杀戮意大利爱国者。意大利全国統一后的一个长时期內，政府还得和这批暴徒作斗争。

教皇把馬志尼、加利波的和一切为統一意大利而斗争的爱国者都革除教籍。教皇为了詛咒意大利的爱国者們，用尽了一切的詈罵辞彙和秽言。狼、叛徒、法利賽人、賊、謊言者、伪善者、酒魔、不洁者、撒旦的后代、死亡、罪恶、上帝的敌人、地獄的精灵、現世的恶魔、发臭的尸体、变节者、犹太——以上这些还远非“圣父”用来咒罵为自己祖国的統一而斗争的人的全部形容詞。^①

庇护九世在1864年公布的“异教謬論”，或称“現代的各種謬論目錄”，是他的思想上的信條。庇护九世不僅詈罵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對現代文明統統詛咒。庇护九世特別詛咒那些斷言“教會在活動中不應使用暴力和具有世俗當局的特權（謬論之二十四）；教會沒有自然的和合法的權利占有人世間的財產（謬論之二十六）；教皇應該同進步思想、自由主義和現代文明和解，以及贊同這些觀點（謬論之三十）”和其他等等的人。庇护九世在“異教謬論”中——梵蒂岡直到今日還沒有把它廢止——把信仰自由稱作瘋狂，把言論自由稱作發惡臭的謬論。

庇护九世為阻擋歷史發展的掙扎是徒勞無功的。獨立的教皇國的存在及其古代的封建制度、宗教審判廳和披着袈裟的警察，乃是統一意大利的主要障礙，意大利人民最後終於剝奪了教皇的世俗權力，而教皇國的領土成為統一的意大利的一部份。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人民對准通往羅馬的要沖“聖門”（庇護港）而發的幾次排炮，結束了教皇國的存在。接着舉行的全民投票中，全羅馬只有42個人投教皇的票，即反對把羅馬歸併入意大利。庇护九世最後一次專制的行動是宣布教皇絕對無謬說，這一信條是在羅馬被意大利軍隊占領前不久教皇召開的“全體基督徒”會議中，在耶穌會徒們的壓力下通過的。會議的參加者之一，克羅地亞主教約瑟夫·許脫勞斯馬耶爾不願投票贊成教皇絕對無謬說，他說：流經羅馬的台伯河的全部河水，都不足以洗清教廷可耻的歷史上最短一時期內所沾的污點。這些話可以作為具有千年歷史的、終於在1870年可耻地結束自己時代的教皇國最確當的墓志銘。

① 威廉·格拉斯頓：“羅馬和教皇在良知和歷史的法庭前”，莫斯科，1903年，第193頁。庇护九世在各方面都是庸庸碌碌的一個人。他愛好舞會和盛宴，喜歡听上流社會間的流言蜚語。在他的官方傳記中驕傲地記載着：他每天都得換衬衣和噴上大量香水（凱薩萊：“羅馬與教皇國”，第一卷，羅馬，1907年，第140頁）。

意大利資產階級在達到剝奪教皇世俗權力的目的以後，就此罷休，對天主教會本身不再攻擊。用意大利歷史學者法皮奧·柯新的話來說，經濟實際產生了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反對僧權擴張運動，可是也限制了這一運動的發展。^①事實上的確如此，意大利資產階級如同法國資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下一樣，大量購進從教會處沒收得來的田地。意大利資產階級幻想將資本和十字架結成同盟，因為他們發現了宗教、教會和教皇“有益於社會”的部份。卡扶爾在1850年時就在披蒙蒂地方議會中發表了這個思想，他說：“為了現代社會的進步，必須有兩個對社會能產生強大影響的道德力量參加工作：宗教和自由，”^②所謂自由他指的是資產階級政權。這就是為什麼根據意大利議會在1871年通過的“保障法規”，意大利政府不僅保證教皇和教皇廳的行動自由，不去冒犯梵蒂岡和其他教皇所使用的宮殿和建築物，還要規定每年付給教皇322萬5,000里拉的補助金（1,622,425美元），這筆補助金等於教皇國最後的幾年中教皇宮的支出費用。自由主義還表現在對待教會財產方面。意大利政府將94萬英畝教會領地充公，然而其中主要是收益甚少的生地；1906年教會田產大傾銷以後，在僧侶手中還有40萬以上英畝的上好田地，其中包括在勞列篤、阿西澤和派陀哀最富裕的大地產。換句話說，教會在被意大利資產階級“搶劫”以後，梵蒂岡仍然是意大利最大的大地主。

在政治方面，柯新說，“意大利政府對待繼續在向它進攻和號召全世界仇恨和敵視它的教權派對手，態度同樣地軟弱。所有這一切都使安東尼奧·葛蘭西有權利作出推論說，統治階級是如此地傾向於保守，他們几乎是滿意地瞧着自己敵人得到成功，而從本質上來看教會不是什麼敵人。事實總是事實，不管左翼自由主義者們的尖銳抨擊和唇焦舌敝的抗議，也不管抵制僧權擴張法的草案在每屆會議上都交付議會審查，並且在1874年

① 法皮奧·柯新：“統一的意大利，1860—1876”，羅馬，1952年，第62頁。

② 劉易奇·薩爾伐多列利：“教會與世界”，羅馬，1948年，第115頁。

还采纳了一部份，天主教会仍旧可以享受殉教者的一切特权，实际上这些殉教者生活得很逍遥自在。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指出的那样，在意大利“人们象服侍一个期望她死去的疯老婆子似的，服侍着又可鄙又可恨的教会。”^① 卡扶尔及其继承者们“可怕地”反僧权扩张主义在事实上就是这样。

庇护九世在被剥夺世俗权力以后，一直到死为止，对依靠法国或奥地利的刺刀来收还他所失去的东西没有失却过希望。他拒绝接受政府的补助金，因为接受补助金意味着承认意大利国家，教皇把他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意大利很快的复灭上。

然而当时教皇不十分需要钱用。罗马和世俗权力的丧失使教廷的财政得到巩固，虽然初看起来这事非常奇怪。随着世俗权力的被剥夺，教皇几乎立刻从全部自己的债务中解放了出来，在此以前教皇的一半左右的收入，是用以偿付这些债务的，因为“囚徒”不负担义务，同时也由于“非取决于他的情势”而无力清偿债务。其后教皇厅用以维持一般警察和秘密警察、军队和官员等的开支大为减少。意大利政府为教会保留了价值达10亿里拉的财产（约为今日的五亿美元），这些财产继续为教会带来可观的租金。此外，当教会财产大出售的时候，一部份财产为梵蒂冈的亲信人士所买得，因此仍旧是梵蒂冈的领地。许多教会开设的经营面粉食盐等业务的企业，在罗马归并入意大利之前不久，改头换面地成了“私人”股份公司，继续在梵蒂冈的控制下做买卖。^② 庇护九世被“幽禁”以后，“圣彼得一枚捐”（自1860年起在各国征收）的收入仍不断地增加着。1866年时，“圣彼得一枚捐”的收入等于180万美元，而在七十年代之初则已经超过400万美元。^③ 梵蒂冈的收入还不限于此。通过“宣传信仰”主

① 法皮奥·柯新：“统一的意大利，1860—1876”，第126—127页。

② 亚尔倍托·卡拉基奥洛：“罗马首都——从意大利的恢复统一到自由国家的危机”，罗马，1956，第121—122页。

③ 米海尔·威廉士：“行动中的天主教会”，纽约，1934年，第153页。

教会有大宗款項上繳給梵蒂岡，例如在 1850 年時即達 3,309,646 金法郎。^①

根據美國教士威廉士所著的“行動中的天主教會”一書中的材料——這本書的出版得到教會當局的同意——除了上述各項收入以外還應加上：教皇辦公廳和日期簽署局的收入，出售教廷各種勳章和貴族頭銜的收入，因准許血親結婚和“洛脫”審判廳准許離婚所得的費用，巡禮者的捐獻，信徒巨額的贈與和遺囑中規定給與教會的遺產等。^② 意大利歷史學者薩爾汶米尼指出，有價證券的股息也是收入的一項，梵蒂岡尚在庇護九世統治時期即開始積累有價證券了。^③ 此外還應該加上出售贖罪券所得，梵蒂岡雖然命運多乖，可是繼續以此為業。

如果考慮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根據英國紅衣主教伏庚的正式聲明，梵蒂岡的開支祇在 200 萬美元左右，那麼顯然梵蒂岡是會經受任何財政困難的。^④ 然而教皇經常為自己的“窮困”而訴苦。教皇廳的哀泣和嘆息，幾乎把教皇描繪成一個身穿破舊衣服和行將餓死的人（在天主教各國中，僧侶們在信徒間散發一種粗制濫造的圖片，圖上所印的教皇是一個睡在牢獄中草蓆上的囚徒），其目的正如何新公正地指出的那樣，即要求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把錢袋張得更開些，而事實上這和教皇國庫的實際情形毫無共同之處。^⑤ 由於所有這些情況，“貧窮的”庇護九世創造了真正的“奇蹟”：他不但沒有給自己的繼承者留下債務，甚至還留給他 3,000 萬里拉的遺產（約 1,500 萬美元）。

世俗權力被剝奪後所產生的另一個對教廷而言意義不小的後果，亦必須指出。世俗權力的被取消，從而把教廷在社會輿論

① 艾德蒙特·卜瑞桑司：“法國的天主教”，巴黎，1851 年，第 35 頁。

② 米海爾·威廉士：“行動中的天主教會”，第 155 頁。

③ 茹索茄·薩爾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 269 頁。

④ 喬治·賽爾特：“梵蒂岡——過去、現在與未來”，紐約，1934 年，第 248 頁。

⑤ 法皮奧·柯新：“統一的意大利”，1860—1876，第 116 頁。

間最醜陋最可耻的标志也“清除”掉了，恐怖鎮压机构（警察、監獄、战争机器），职位的买卖和整个經濟部門操縱权的出讓等，“經濟”政策的表現，各种稅收。教皇只是教会的首腦，这有助于教皇个人威望以及教会威望的提高，有助于“基督教的美德”这一幻想在群众間复活起来，似乎这种美德是僧侶所固有的，特别是教皇所固有的。为了巩固梵蒂岡的威望，尚在庇护九世时教会的宣传机构就沒有忘記利用所有这一切手段。庇护九世繼續是一个典型的教皇兼封建主。

十九世紀中叶，当欧洲为最初的資本主义大危机所震动的時候，当資本主义生产和国际交換的法則調整着各国人民的生活和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命运的時候，当美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和角逐殖民地的斗争具有狂热性質的時候，当在巴黎燃烧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的時候——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庇护九世所統治的教廷，不仅从它所捍护的地位一方面而言，同时也从它在保护自己的地位时所使用的武器方面而言，基本上仍旧是一个封建政权。教廷把自己和意大利政府的冲突，看作封建主之間和王朝之間的冲突。^① 庇护九世幸灾乐禍地迎接巴黎公社的建立。梵蒂岡的报刊为“普遍的群众騷动”而欢呼，因为教廷期望资产阶级将会懂得强有力的教会对他是如何地需要。“用火炬和煤油武裝起来的工人国际——这是上帝憤怒的工具。請你們选择吧，和教皇在一起或者和工人国际在一起！”^②——70年代之初耶穌会在意大利的机关报“天主教文明”上疾声大呼道。

但是政治和物質利益不断地推动教廷，某些国家中的天主教会和教权派組織同资产阶级合作，吸引他們走上資本主义的途径。教廷和资产阶级共同把社会主义运动視作他們的敌人。随着这一力量的增长，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各政党的发展，

① 爱珂里：“‘羅馬問題’的結束”，“工人国家”，1929年2月，第125頁。

② 菲特列克·却鮑：“意大利外交政策史（1870—1896）”，第一卷，巴里，1951年，第407頁。

教会和资产阶级亲密起来了，他们彼此忘却了多年的宿怨和旧帐。

法国的天主教会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1848年初次公开的，当时这两股力量为了共同和工人阶级作斗争而联合起来了。当时退耳欢迎教会的支持，他说“祇有教会能够教导穷人人们顺从，答应给他们永世得救”^①。国民议会中教权派的首脑蒙泰朗倍尔就把这一论据用各种调子到处唱。“基督教的人民——这个现代天主教理论家劝说他的资产阶级同事道——除了用刺刀以外，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去恫吓他们：凡是得遵守上帝法律的地方，上帝本人就在执行着警察的职务。”^②他声称，宗教不但应该服从政权，并且应该衷心地尊敬它。“我没有必要重复地述说宗教对于私有财产的意义——蒙泰朗倍尔感叹道——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使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养成尊敬私有财产的习惯。我不知道除此而外还有其他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强迫他们去信仰上帝！不是去相信各派折衷论者的泛神论，而是去信仰制订十诫和教义问答的上帝，去信仰诅咒不信者永世为贼的上帝。这是唯一切实可行和有效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办法。”^③

教会公开地通过蒙泰朗倍尔的嘴宣称，教会准备以上帝荣耀的灵光护佑资本主义制度，和作为这一制度精神上的警察。

资产阶级和教会的联盟是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基础。

在德国天主教会和资产阶级的亲密关系也是在1848年革命期间开始的，当时最初出现了一批专事讨好工人的天主教联合会和联盟。这些组织的理论家是美因兹的大主教凯脱雷。凯脱雷在其1864年刊行的“工人问题与基督教”一书中以愤怒的言辞抨击资本主义剥削，但只不过是為了号召工人们信仰天主教求

① 馬迪：“天主教社会与政治运动（1789—1950）”，（“教会与社会”，第134頁）。

②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第34頁。

③ 同上，第37頁。

上帝拯救而已，这是完全能使资产阶级满意的。马克思在德国旅行以后，在1869年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次旅行，经由比利时，小住亚亨，溯莱茵河而上，使我确切相信，必须大力地，特别在天主教盛行的地方，对神甫进行斗争。我将按照这意思通过国际去努力。这些狗（比如美因兹主教凯脱雷，杜塞尔多夫大会上的神甫们等），只要觉得有机可乘，就和工人问题眉目传情。我们在1848年事实上为他们辛苦了一番，只有他们在反动时期享受了革命果实。”^①天主教会因工人阶级已经觉醒而惶恐万状，它力图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同时又荐身于资产阶级，以驯服无产阶级为自己的职守。

天主教会和资产阶级的亲密过程在意大利进行得较慢些，同时所遇到的困难也较其他国家为多。但是甚至于在70年代当庇护九世对他所仇恨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抱恶感的时候，教权派仍力图扩大自己对劳动群众的影响以与社会主义者相抗衡，这种意图不能不博得资产阶级的同情。1874年，意大利教权派组织的联合组织“行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号召建立天主教工人联合会，联合会应以“基督教爱人精神”和“对恶不予反抗”等原则为行动准则，所谓对恶不予反抗就是说不要反抗资本主义剥削。至于在农民问题方面，会议责成天主教组织保护他们免受“反宗教、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罪恶的熏染”，教会就这样又一次地讨得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欢心。

如果说教廷和意大利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内的争执持续得较长久，那么在物质关系方面由于梵蒂冈进行企业活动，所以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克服得不可比拟地迅速。

1830年成立了梵蒂冈的“贴现银行”。1834年梵蒂冈建立了“罗马银行”，资本为30万兹库提，从事不动产的投机买卖。同年创立“圣灵银行”。1836年高级教士泼·米里尼和克·勒·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36页（俄文版），译文采用武剑西译“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4页。——译者

里尼尼在羅馬建立了儲金所，十年以後其存款已達1,000萬里拉。1852年梵蒂岡增加“羅馬銀行”的資本，並吸收羅馬最大的金融家參加。^① 1845年成立了至今猶在的梵蒂岡股份公司“安濟加·瑪爾却聖水公司”，該公司經營羅馬的自來水。1871—1875年間該公司的股息增加了十倍。1852年梵蒂岡在英國資本的參加下組成了“英吉利—羅馬煤氣公司”。1875年該股份公司的資本與股息分別為325萬里拉和289,683里拉，而在1890年時分別為1,400萬里拉和1,928,366里拉。1883年從“英吉利—羅馬煤氣公司”中分出梵蒂岡的另一個企業——“英吉利—羅馬電氣公司”^②。

從40年代起出現了數量眾多的天主教刊行的雜誌和報紙，其中包括“羅馬觀察家”，後來這張報成為羅馬教皇廳的半官方報，梵蒂岡“理論”機關耶穌會的雜誌“天主教文明”，這本雜誌在第一期就號召同“社會主義可怖的禍患”作鬥爭。就在當時已經出現了教權派群眾性政治組織的萌芽。

所有這些是梵蒂岡走上和資本主義親密途徑的最初的幾步路。庇護九世死後這種親密關係就一日千里地發展着。

新教皇里夫十三世（1878—1903）是坐在聖彼得寶座上的第一個“資本主義的”教皇。他的統治教廷在教會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時期。甚至教權派歷史學者馬迪在談到在他以前的十九世紀的教皇們時寫道：“他們既落後又愚蠢，沒有能力去管束政治力量，反而去抵抗它們，特別因為他們不能正確地理解這些力量。正在改造着歐洲面貌的各種經濟因素，不在他們的視野以內。總的來說，他們不能提出建設性的辦法，以解決因政治和社會發生變化而提出的種種問題。結果在歐洲各古老的天主教區域內，宗教所受的損失異常重大”。^③

① 凱薩萊：“羅馬與教皇國”，第一卷，第51頁。

② 亞爾倍托·卡拉基奧洛：“羅馬首都——從意大利的恢復統一到自由國家的危機”，第126—127頁。

③ 馬迪：“教廷”（“教會與社會”，第47頁）。

梵蒂岡轉向資產階級這一轉變是里夫十三世實行的。

天主教歷史學企圖把里夫十三世描繪成社會正義的捍衛者，工人的朋友和一個正直的教皇。實際上庇護九世的這個繼承者是一個反動分子，他的所有計劃都是為了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以反對勞動群眾。中世紀教皇們的敗行和資產階級政客的慣技在他身上已溶為一體了。里夫十三世和大多數他的前任者一樣，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教皇們一樣，他熱心地庇護自己的親屬。他任命自己的兄弟朱席庇為紅衣主教，侄子路德維格和李卡圖為秘密侍從，侄子卡密洛為教皇宮庭羽林軍的上校和宮庭警衛隊的首長，侄子米開列為教皇辦公廳的高級官吏。甚至於聖彼得教堂的祭司長也是里夫十三世的侄子。他另一個侄子斯丹尼斯拉奧·畢琪得到大公的稱號，被任命為屬於梵蒂岡的羅馬儲金所的經理。其後他成為美國大康采恩“奧立佛·勃拉席爾斯公司”的意大利代表。^①

里夫十三世在被選為教皇之前曾為駐比利時的聖使，他在比利時多年居住期間看到了資產階級天主教運動的產生經過，這使他確信在現代條件之下，教會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應當採取較庇護九世時代更靈活的做法。庇護十三世認為，教會應該同歐洲主要強國的政府取得協議，特別是和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反對意大利的國家取得協議。根據他的意見，意大利的削弱是教廷的“復興”必不可缺的先決條件。斯福柴說，里夫十三世夢想意大利分裂成為許多由羅馬教廷領導的小共和國。^②

里夫十三世在25年期間內玩弄着錯綜複雜的國際把戲，旨在使“神聖同盟”復活，這一同盟理想的領導者當然是梵蒂岡。里夫十三世期望俄國沙皇政府能在同盟中擔起重責，因為他看出俄國是歐洲最可靠的反革命堡壘，他力圖和俄國建立起密切

①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黎里的梵蒂岡銀行”，華沙，1952年，第13—14頁。

② 卡羅·斯福柴：“現代的意大利”，倫敦，1946年，第96頁。

的友好关系，建議沙皇支持波兰和巴尔干半島諸国中的天主教会。1931年时E·A·阿达莫夫公布的俄国駐梵蒂岡外交代表的部份报告，其中包括A·伊茲伏里斯基的报告，詳尽地說明了里夫十三世的外交計劃。

在1888年3月第一次和伊茲伏里斯基談話时，里夫十三世“列举了他所采取的各种旨在維護秩序与和平的原則以及制止破坏性企图的行为之后”，便开始使人相信，“他得出一个結論，即在俄罗斯帝国范圍內沙皇政府和羅馬教廷的联盟祇能有助于前者达到高貴的国家目的”^①。伊茲伏里斯基接着說：“教皇热烈地声明，教导僧侶和信徒們順从合法当局是他的不变的原則，他准备在事实上証明他对主教們的影响总是和俄罗斯当局的利益相一致的”。里夫十三世在結束談話时建議亚历山大三世和梵蒂岡締結同盟。“为什么象俄罗斯这样一个竭力支持自卫原則和希望在欧洲出現持久和公正的和平的国家，沒有这一种力量（指天主教会——作者）作为自己的同盟者呢？”^②——教皇向沙皇外交官問道。同年9月伊茲伏里斯基又和里夫十三世会見，教皇“照常即席发表长篇累牘的政治演說”。这篇演說的主要思想是証明“在兢兢业业地为維護欧洲道德和政治秩序而工作着的伟大的保守派强国，特别是俄国和教廷，其同心协力和联合一致的必要性”。在触及波兰問題时，教皇声明，他的声望将永远用于“教导波兰的天主教徒服从他們君王的法律，和对他們君王表示忠誠”。^③

里夫十三世以同样坚忍不拔的精神謀求和德国威廉二世結成同盟。

里夫十三世認為与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作斗争，是天主教

① 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岡的外交”1877—1900，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第72頁。

② 同上，第73頁。

③ 同上，第89頁。

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尚在最初一批致所屬教會的通諭中，他号召統治階級“确信教會和國家的目的是密切地結合着的”，“基督的教會比起人間的法律、法庭的鎮壓和武裝的力量，在與社會主義災害作戰時更有力量”^①。在1891年時意大利為群眾性罷工運動所籠罩，里夫十三世公布了自己的通諭“新事物”，這一通諭直到今天仍舊是天主教會社會政策方面主要的綱領性文件。^②在“新事物”中里夫十三世並不諱言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們的勞困狀況。他指責資本家過份地剝削工人。然而他又說，世界上總是有窮人和富人的，將來也是如此。工人們不應該和資本家作鬥爭，而應該和他們合作，因為他們缺少資本家無法生活，正如資本家不能缺少工人一樣。里夫十三世宣稱私有財產是上帝賜與的和神聖的。里夫十三世故意把個人財產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的概念混為一談，他勸說工人們說，廢除私有財產制對於他們所產生的害處和對於資本家的相同，因為工人失卻了增加自己的財產的可能，即失卻成為資本家的可能，否則的話，如果工人能夠忍受剝削、勤奮工作和節儉持家，他似乎有可能達到這一目的。里夫十三世搜索枯腸找出各種最難以想象的論據，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例如，他斷言廢除私有財產制將會使人和動物相等，因為動物是沒有私有財產的！里夫十三世同樣還非難土地國有化。“甚至如果土地在私有主之間進行分配——他肯定說——土地還是為所有人的需要而服務，因為大家是依靠土地上的產物為生的”。至於大部份田地落在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手中一事，里夫十三世認為不廣為宣傳的好。里夫十三世号召勞動人民參加基督教工人協會，去保護上述原則。

“新事物”公正地被人們稱作“反共產主義宣言”，它為國際

① 菲特列克·却鮑：“意大利外交政策史（1870—1896）”，第一卷，第407頁。

② “新事物”是里夫十三世的顧問、紅衣主教齊爾雅里和高級教士鮑卡里和伏爾比尼受教皇的委托而寫的。（法蘭契斯哥·馬格立：“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動”，第一卷，米蘭，1953年，第82頁。）

資產階級所熱烈歡迎，因為在這個文件中資產階級得到了同工人階級鬥爭的思想武器，而這武器資產階級本身却是無法想出來的。

當里夫十三世統治教庭的時候，教會開始積極參加歐洲各大國的政治生活：在里夫十三世的同意下，在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和法國成立了資產階級天主教政黨，並開始活動。意大利的一個群眾性天主教組織“行動會議”在教皇支持下獲得了發展，這一組織由於梵蒂岡不承認意大利國家而不能參加競選，雖然如此，可是它在全國進行着積極的鼓動宣傳活動，在教會機關的支持下網羅反動力量。“不承認”意大利國家事實上意味着與這一國家的進步力量作鬥爭，意味着和該國的反動力量結為同盟，但並不意味着放棄政治活動，如同某些自由主義和教權派的历史學者所稱的那樣。

梵蒂岡的鞏固與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遇到一定的障礙，這種障礙既來自畏懼教權派勢力擴張的某些資產階級集團的一方，也來自教權派本身陣營內某些主張從“異教謬論”立場出發，反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個別派系的一方。里夫十三世在位時，這些彼此矛盾着的傾向不止一次地引起了資產階級政府同教會的衝突。1898年時他在同意大利政府的关系問題上發生過尖銳的危機，最後他把“法蘭西問題”留給自己的繼承者庇護十世去解決，這個問題在最後以教權派的失敗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政教分離而告終。歐洲的資產階級準備同梵蒂岡和教會合作，共同反對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這一點是歐洲資產階級所爭取的，然而它要求教會服從於自己。

意大利資產階級打的主意也是這樣。然而里夫十三世期望革命的浪潮早晚會迫使意大利政府向教會求援，因為教會是有群眾基礎和實力的唯一反動力量，依靠它能保存現有的社會秩序。當資產階級向它乞援的時候，梵蒂岡可以提出解決“羅馬問題”^①的條件了。這種情緒在1897年舉行的“行動會議”大會上

有着充分明显的表现，大会的主席薩凱蒂預先关照自由主义者們說，如果他們“希望教会把他們从社会主义中挽救出来，那末首先讓他們向教会投降，讓他們匍伏在教会的旗帜面前”^②。但是意大利政府不想屈服。

如果說里夫十三世的政治策略使天主教会和意大利政府間友好关系的建立迟緩了，那么他的金融投机活动則恰巧相反，它巩固了梵蒂岡和統治階級的关系。里夫十三世不遵照庇护九世的榜样，他是屬於自己的时代的。他对于証券投机、股票和支票簿几乎有着病态的嗜好。他被选为教皇后最初的命令之一，是吩咐在他私人的小礼拜堂內安置防火保險箱，在这只“上帝的全权代理人”的保險箱中貯存着股票和其他有价証券——奥地利的、巴伐利亚的、法兰西的和比利时的。几年以后一只防火保險箱不够用了，于是他命令再添置第二只。^③“里夫十三世对于証券价格的行情总是消息灵通的——一个直接熟悉他的法国記者約瑟夫·茹尔脫回忆道——我敢担保說，教皇是經常就此問題和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先生商議的。巴契里是羅馬的市政顧問和‘羅馬銀行’行政会的主席。”^④

至今犹在的“羅馬銀行”是根据里夫十三世的倡議在1880年創办的。这一机构的首要人物除了上述的巴契里外——他是現教皇庇护十二世的伯父，还有龐康巴尼公爵和罗斯比尔奥西公爵，薩凱蒂侯爵和琪奧杜里侯爵，以及“黑色”貴族的其他著名人物。和他們在一起活动的还有罗摩洛·济托尼——意大利政府中一个部长的兄弟，他接受了大量股票作为礼物。济托尔的参

① 基奧尔奇·凱特罗洛：“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羅馬，1950年，第24頁。

② 茹勃萊列·罗薩：“意大利天主教行动政治史”，第一卷，巴里，1952年，第165頁。

③ 凱薩萊：“教皇里夫十三世和教皇选举會議”（“新文选”，第758期，羅馬，1903年，第358頁）；安特列·諾威斯基：“巴契里的梵蒂岡銀行”，第15頁。

④ 約瑟夫·茹尔脫：“梵蒂岡的金融財政”（“时代”，巴黎，1903年8月8日）。

与“羅馬銀行”的領導工作，标志着梵蒂岡和意大利資產階級金融利益的結合。“羅馬銀行”开始从事証券投机，在中东和近东获得各种利益。同一时期內(80—90年代中)，在梵蒂岡的倡議下，意大利國內如雨后春笋地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貸款处以及各种高利貸和投机組織。

梵蒂岡在保險业中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上世紀末，梵蒂岡的代理人在意大利全境遍設各种保險公司，其中有火灾、冰雹和其他天灾、不幸事故和人寿等保險公司。梵蒂岡的事业家們利用信徒們的迷信和宗教偏見，劝說他們加入天主教办的保險公司，因为可以得到上帝的庇护，并比加入与教会无关的保險公司更为可靠地保證自己免受各种灾难。

里夫十三世对意大利政府的詛咒，并不妨碍他利用羅馬被宣布为意大利首都后飞跃发展的有利局面做生意。除了上面已提过的自来水和煤气公司外，里夫十三世在位期內，还成立了梵蒂岡的电車和面粉公司——“電車与公共汽車公司”和“龐泰涅拉面粉公司”(后者至今尚開設着，是巴契里家族的私产)。“龐泰涅拉面粉公司”在“羅馬銀行”的貸款支援下，大批买进磨坊和面包房。90年代时，“龐泰涅拉面粉公司”已經能在羅馬訂定面包的价格。社会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1897年写道：“哀杜阿尔多·索杰里尼，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大公閣下及其‘羅馬銀行’的朋友們，在紅衣主教冷巴拉的支持和里夫十三世的同意下，以‘圣彼得一枚捐’的巨款将羅馬的所有磨坊收購下来。‘龐泰涅拉面粉公司’被收購以后，接着买进‘戴維列面粉公司’……自以上述的先生們达到垄断磨粉业的目的后，面粉的价格，面包的价格当然也不例外，就提高了。”①

当里夫十三世在位时，梵蒂岡撥出大宗資金在羅馬建筑房屋，积极地进行建筑地区的投机生意。除了“羅馬銀行”以外，还

① “前进报”，羅馬，1897年8月26日。

有其他的梵蒂岡信貸机构进行这项活动，如“羅馬通用銀行”、“信貸銀行”和“手工业者銀行”。下面两家梵蒂岡的企业直接經營房屋的建築，不動产的买进和卖出业务，即“通用公用事业和农业不動产公司”（即著名的“不動产公司”，至今还在）和“貧苦者和劳动群众房屋建築公司”^①。

十九世紀末叶，梵蒂岡的資本控制了羅馬的自來水、照明（煤氣和電力）、交通運輸、面粉和建築工業。這些領域中，梵蒂岡的資本今日仍舊在羅馬占着主要地位。

教權派的金融集团在把首都的公用事业企业攫取到手以后——意大利历史学者亚尔倍托·卡拉基奧洛指出——依靠着“羅馬銀行”和其他梵蒂岡控制的信貸机构的支持，开始同其他資本主义团体取得協議，从而行动更为大胆。教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的結合在里夫十三世时到了如此密切的程度，甚至梵蒂岡的代表出席意大利政府国家銀行的經理會議。^②

里夫十三世如醉如狂的金融投机活动并不是一帆順风的。关于这一点意大利历史学者薩尔汶米尼是这样說的：假如教皇在教义和道德方面是个“絕對无謬誤”的人，那么他在財政方面則不然。^③ 羅馬在80年代起开始的不动产危机吞沒了不少梵蒂岡的資本（約2,000万里拉），差一点使“羅馬銀行”倒閉，从而証明資本主义的經濟法則不論对于世俗的或对于“上帝”的資本，其作用相等，也証明了“宗座”的財政命运和普通資本主义公司的命运，同样地变幻无常。为了恢复元气，里夫十三世采取了久經考驗的手段：他曾两次庆祝“紀念年”——1888年和1893年（自己就位的十周年和十五周年紀念），当时他从各色各样的資本家手中“直接”收受了三、四千万里拉“作慈善事业之用”（每

① 亚尔倍托·卡拉基奧洛：“羅馬首都——从意大利的恢复統一到自由国家的危机”，第123, 132頁。

② 同上，第162頁。

③ 茹塞諾·薩尔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269頁。

次“紀念年”各为两千万里拉)，这笔款子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相当于两千万美元）。①

1893年間，臭名远揚的“羅馬拿銀行”的偽債券事件为梵蒂岡带来許多麻煩。“羅馬拿銀行”的舞弊案多年間激动着意大利的輿論，有許多著名的梵蒂岡和教权派金融集团的人物牽連在这件案子里。然而意大利政府——它的成員也牽連在这樁梵蒂岡銀行的偽造債券案中，作出了一切努力以使案子能暗中結束。結果只有“羅馬拿銀行”的小額存款人受到了損失，而舞弊的領導者則安然如故。

里夫十三世要求所有天主教的群众性組織，定期地为教皇國庫征集捐款。1892年举行的第十届“行动會議”大会的決議規定：在举行天主教組織的會議、家庭的喜庆日和教会的节日时征集“教皇献金”；通过天主教的報紙以及在天主教徒家庭中設置“教皇錢罐”等方法搜罗金錢，此外要求信徒在写遺囑时也不要忘記教皇。②

里夫十三世从美国也得到大宗錢財，教会的僧侶們在教皇的贊同下积极地捍卫資本主义制度，巩固与百万富翁間的关系。教会和教权派組織名目众多的金融和經濟活动，使里夫十三世有可能在身后留下一笔达1,500万法郎之巨的遺產，虽然他曾經因投机活动失敗而受到过数目不小的損失。③

如果說里夫十三世把教会机器轉向同欧洲和美洲的資產階級合作的一方，則其繼承人庇護十世（1903—1914）完成了这一轉变。庇護十世祝福教会和教权派同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同盟，使梵蒂岡金融資本的利益和意大利金融資本的利益进一步地結合在一起。庇護十世繼續坚持自己的世俗权力，可是在实际上他同意大利政府是合作的。在1907至1910年間曾任意大利政

① 茄泰諾·薩尔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269頁。

②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黎里的梵蒂岡銀行”，第11—12頁。

③ 同上，第15頁。

府司法大臣和宗教大臣的奥兰杜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一期间内，教皇庇护十世通过他和意大利查立蒂政府保持着经常的秘密联系。当庇护十世时，奥兰杜写道：“从法律方面来看，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继续是彼此敌视的，然而在事实上是彼此合作的，我难以想象出比它还要密切的合作来。”^①

梵蒂冈在1954年时宣布庇护十世为“圣者”。其勋业被梵蒂冈宣传机关如此热烈地颂扬的这位“圣者”，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如同里夫十三世一样，庇护十世兼有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练达果断人物的素养和口味。庇护十世是“异教谬论”热烈的拥护者，在他的通谕中常常引用它们。根据斯福柴的话，庇护十世极端仇视主张教会应该和现代民主和解的人。^②这种倾向当时在美国、法国和德国僧侣之间特别流行，名为现代主义。庇护十世在1907年为了斥责“现代主义”，特别写了一篇通谕。他毫不忌諱地把现代主义称为“教会的花柳病”。

庇护十世在长时期之内受到西班牙红衣主教维瓦斯·杜托的思想影响。这个红衣主教是个宗教审判厅的官吏和蒙昧主义者，最后死在精神病院里。

庇护十世出身于富农家庭，深深地熏染了尊敬财富和富翁的思想。在早年的宣教活动中他颂扬统治阶级，劝导穷人忍耐地和顺从地担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类似的这种演说，使他的教阶升迁得很快。当他还是一个较年轻的高级教士时，他被任命为富饶的保皇派势力很大的威尼斯教区的总主教。未来的“圣者”在这职位上的杰出工作，是和一些威尼斯资本家合作在1895年创办了“圣马尔加银行”（这家银行现在还开设着）。根据银行的创立文书“圣马尔加银行”最初的股东除了未来的庇护十世以外，还有九个威尼斯教区的教士，其中包

① 奥兰杜：“我向教廷所作的若干报告”，那不勒斯，1930年，第72页。

② 卡罗·斯福柴：“现代的意大利”，第84页。

括“赤足的卡梅里教派”寺院的祭司长。^①庇护十世被选为教皇后，他任命“圣马尔加銀行”的經理、律師西利維奧·富米阿尼为教廷的首席司礼官。正如一个庇护十世官方傳記的作者、本尼狄克会徒西格繆勒所指出，威尼斯的工厂主們（天主教徒和非教徒）慷慨地供給未来的教皇金錢作“社会活动”之用。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他正如西格繆勒所說的那樣，“为了拉住自己的教徒不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而建立了天主教工人联合会”^②。另一个庇护十世傳記的作者波兰高級教士克歇开維奇指出：“沒有一樁罢工是由于他（庇护十世——作者）說要爱一切人而防止了的。”^③

因国内社会主义运动高漲而惊惶不安的庇护十世解散了“行动會議”，因为該組織在階級斗争的压力下产生了以教士莫里为首的左翼。1904年，被意大利第一次总罢工吓慌了的教皇，允許天主教徒“怀着维护社会秩序而贡献自己微末力量的目的”，在議会的竞选中支持最反动的候选人。天主教徒的票数保證了反动势力在政府中得到优势，因之引起了工业家和銀行家們对梵蒂岡的狂热浪潮，这表現在对“羅馬銀行”的态度上，政府补助金和为各种财政投机而发行的公債証券紛紛湧进这个銀行中去。

天主教徒站在政府一方参加議會竞选，不仅意味着梵蒂岡公开走上同資產階級联盟反对无產階級的道路，把“羅馬問題”推至第二位，而且还意味着梵蒂岡本身在成为資本主义力量之一以后，它准备在資產階級政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投入战斗保卫这个政权。

庇护十世积极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使梵蒂岡和俄国沙皇政府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化，在沙皇政府方面則不反对利

①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黎里的梵蒂岡銀行”，第17—18頁。

② 弗列特林·西格繆勒：“庇护十世”，羅馬，1926年，第47、87頁。

③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黎里的梵蒂岡銀行”，第30頁。

用梵蒂岡和革命作斗争。沙皇政府外交大臣拉姆茲陶尔夫在1906年呈給尼古拉二世的短笺中写道：“梵蒂岡能在提供集中于巴黎的欧洲馬松破坏性組織的报导，和上述組織及其分支的确实情报方面，为俄国政府作出价值无可估量的服务。因为梵蒂岡不能不极其警惕地注視着他們的活動。”^① 尼古拉二世在拉姆茲陶尔夫的短笺上批示道：“应刻不容緩地进行談判。完全同意上述意見”。

沙皇政府的期望沒有落空。实际情形是梵蒂岡在过去和現在都支持着資产階級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为了監視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耶穌会徒根据庇护十世的命令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教会組織——“虔信同志会”，即著名的“塞宾涅尔”，由国务卿助理高級教士貝尼尼領導。“貝尼尼的活動是在秘密、密碼和陰謀的气氛中进行的”——意大利历史学者茄勃萊列·罗薩写道。^② “塞宾涅尔”在1921年时正式解散，而在1923年时又重新恢复并利用各种名义和掩护一直活动至今。

庇护十世时天主教会對殖民地的剝削和奴役加强了。耶穌会徒無論在过去或現在，在殖民地活动得特別积极。他們帮助比利时国王利奧普二世奴役刚果，帮助法国殖民者剝削馬达加斯加島和印度支那，帮助英国人剝削罗得西亚。耶穌会徒在叙利亚、黎巴嫩及其他許多非洲和亚洲国家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耶穌会徒和其他的传教士們，为紧跟在帝国主义者后面深入殖民地的梵蒂岡金融机构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有时候梵蒂岡比帝国主义者先深入殖民地。例如，的黎波里脫尼亚首先是被梵蒂岡資本通过“羅馬銀行”而“开拓”了的，随后被意大利帝国主义者所占領。

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對的黎波里脫尼亚的侵略行动是和該区

① “前外交部档案局秘密文件集”，No. 6，彼得堡，1918年，第270頁。

② 茄勃萊列·罗薩：“天主教行动”，第二卷，巴里，1954年，第113頁。

域中“羅馬銀行”的活動，以及接受梵蒂岡指示的天主教傳教士們的活動密切聯繫着的。

梵蒂岡銀行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開始滲入中東地區。

1902年，“羅馬銀行”在巴黎設立分支，同時和“金融信貸銀行”商定在中東地區互相支援。1904年“羅馬銀行”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設分行，1905年參與建立阿比西尼亞銀行，1906年在馬爾他島開設分行和在摩洛哥參與建立國家銀行，1907年在黎波里設分行，1910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1911年在康斯坦丁堡設立支行。“羅馬銀行”與意大利兩個最大的銀行“商業銀行”和“意大利信貸銀行”不同，這兩個銀行雖然參加殖民地剝削，但是大部分資金是集中投資在意大利的工業中，而“羅馬銀行”投資的主要對象是地中海沿岸各國，這是符合意大利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的利益的。^①

“羅馬銀行”在黎波里脫尼亞占有特別重要的地區，有大批田地、採礦站、輪船公司和其他企業在它的控制之下。國際壟斷資本在土耳其帝國境內經營的所有各種行業，“羅馬銀行”都照式照樣地重復地創辦，這一企圖在當時被稱作“巴契里主義”，這名稱取自現教皇伯父的姓氏，巴契里在1903年起任“羅馬銀行”總經理，他曾領導該銀行達20年之久。^②

梵蒂岡通過“羅馬銀行”在黎波里脫尼亞站牢腳跟後，便開始唆使意大利政府以武力侵占這些地區。查立蒂政府懼於意大利人民群眾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情緒，被迫延遲發動軍事行動的日期。“羅馬銀行”於是故意示威性地和德國和奧國的資本家進行談判，提議把自己在黎波里脫尼亞的全部利益出讓給他們。有關談判的消息在報紙上透露以後，梵蒂岡集團本身當然參與其事，意大利的金融家和資本家們極為震動，彷彿在他們中間爆發了一個炸彈，因為他們對於奴役非洲人民的興趣不次於

① 基奧爾奇·凱特羅洛：“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動”，莫斯科，1955年，第373頁。

② 康德洛羅：“意大利的天主教運動”，第374頁。

梵蒂岡。在这些集团和梵蒂岡的压力之下，查立蒂政府在1911年对土耳其宣战，并派遣军队侵略的黎波里脱尼亚。

当时的意大利和世界各国报刊曾详尽地论述梵蒂岡和“羅馬銀行”在发动利比亚战争中——或又称作的黎波里脱尼亚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俄国駐梵蒂岡代办伏康斯基在1911年10月10日发给涅拉托夫的紧急电报中报告道：“公众輿論一致認為教皇厅在今日的危机中有着利害关系，在这一次几乎一致寄与教皇厅相当同情……然而梵蒂岡和‘羅馬銀行’众所周知的关系，难道不就是这次战争中举足輕重的法碼。只要提一个事实就足够了……上述的机构是以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先生为首的，他是羅馬教权派的代表人物，梵蒂岡外交界熠熠巨星高僧叶夫根尼·巴契里的伯父。这家銀行在这次冲突中所演角色的重要性是异常明显的，以致于此間輿論界对它估計过高，他們肯定地說，似乎战争就是‘羅馬銀行’领导者們的行动挑起的……”

最后請允許我发表自己的意見，意大利軍事措施的胜利結束，将使此間的教权派有可能把世俗财物的取得和保持教会的中立态度两者結合起来。”^①

当时的美国駐羅馬大使对本国政府的报告，其內容与上相仿佛。“消息灵通人士認為——他写道——梵蒂岡由于‘羅馬銀行’在这一事件中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它发给报館补助金（要求贊成和土耳其作战——作者）”^②。

“羅馬銀行”的领导机构对它参与意大利帝国主义殖民冒险一事并不掩飾。1913年初，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在銀行的股东面前发表演說，演說中提到：“您們应当感到驕傲，当您們再一次地知道如果意大利的势力在北非获得巩固，則首先應該归功于

①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档案文件，1878—1917年，第二集，1900—1913，第十八卷，第二篇，莫斯科，1938年，第126頁。

② 阿斯寇：“欧洲和意大利对利比亚的掠夺”，1942年，第36—37頁。

您們的銀行資金的活動……您們銀行的勢力不知不覺的深入，為意大利准備了這個龐大的獵物。”^①

意大利帝國主義者在長期血戰，犧牲了數萬士兵之後才占領的黎波里脫尼亞。的黎波里脫尼亞戰爭為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然而這場戰爭為意大利的資本家們，特別是在這場罪惡的冒險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梵蒂岡銀行，帶來了巨額的利潤。在戰爭期間，“羅馬銀行”的流通資金增加到幾乎為1910年的二倍；從1910年的21,753,021,812里拉增為1912年的35,201,502,895里拉。“羅馬銀行”的基金從1907年的4,000萬里拉增為1912年的兩億里拉。^②由於這種變化的結果，依資金而論，梵蒂岡的“羅馬銀行”升為意大利的第二大銀行，下面一張表即證明這一事實。

意大利五家大銀行的資本^③

1907年		1912年	
意大利銀行	24,000萬里拉	意大利銀行	24,000萬里拉
商業銀行	10,500萬里拉	羅馬銀行	20,000萬里拉
意大利信貸銀行	7,500萬里拉	商業銀行	13,000萬里拉
銀行協會	5,000萬里拉	意大利信貸銀行	7,500萬里拉
羅馬銀行	4,000萬里拉	銀行協會	5,000萬里拉

的黎波里脫尼亞戰爭證明，梵蒂岡和意大利資產階級的金融利益是密切地互相結合着的，這一事實也應當反映在他們之間的政治關係上。1912年時查里蒂被迫頒布擴大選舉權的法律，由於他害怕新獲得選舉權的人將會加強社會主義政黨的勢力，因之和教權派締結了一個正式的選舉法案（所謂杰濟隆尼法案）。

查里蒂政府答應教權派不頒行反對宗教組織或可能“破壞國內宗教精神”的法律（如離婚法），答應教權派使教會的經濟組

① “意大利經濟學家”，羅馬，1913年4月19日。

②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黎里的梵蒂岡銀行”，第97頁。

③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黎里的梵蒂岡銀行”，第98頁。

織和社会組織同世俗的同類組織在法律上平等。1913年的竞选中，在64个选区中支持自己候选人的天主教徒，共掙得30万2,000票和选出了29个代表。此外，教权派們还夸口說，由于他們的支持，选出了228个反动代表和击败了100个以上的左翼候选人（社会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急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与他們联合的一些团体选出了96个代表和得到了114万7,000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梵蒂岡期望德奧战胜，因为德奧战胜法俄将会使教权派在法国获得政权，同时为天主教会在这国的活动开辟广闊的道路。梵蒂岡希望意大利在这次战争中保守中立。奥地利駐梵蒂岡大使給本国政府的紧急报告証明，梵蒂岡对奥地利的进攻塞尔維亚极表滿意。梵蒂岡国务卿梅里·華尔以庇护十世名义向奥地利大使声明：“教皇为奥地利未能早日惩戒塞尔維亚人而表示遺憾。”^①

庇护十世死于1914年年底。基查侯爵当选为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五世，1914—1922），他和热那亚的金融寡头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年青时曾为律师。他在二十六岁时决定献身于宗教事业，正确地说，献身于宗教外交事业，而进入了教皇的外交学校（貴族教士学院）。这位热那亚的貴族，百万富翁和律师，在教会舞台上的宦途也未始不亨通。庇护十世統治教廷时他为国务卿助理。貝尼奇克脫十五世繼續执行自己前人的德奧路綫，他劝說德奧作出一定的讓步以使意大利保守中立。^②

为了迎合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們的意旨，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自己一篇最初的通諭中不是攻击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組織，而是攻击社会主义者。罗曼·罗兰关于这一篇演說在自己的日記中写道：

① 卡罗·斯福荣：“近代欧洲的建立者”，巴黎，1931年，第148頁。

② 奧兰杜：“我向教廷所作的若干报告”，第64頁。

“教皇使他的众所瞩目的意見激烈化，最后激烈到譴責社会主义！在教皇新的通諭中說到：对富有者进行斗争的生活不富裕的人們，他們不但违背公道和仁慈，并且还对理性橫施暴虐，何况他們也能够通过誠实的劳动竞赛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基督的全权代理人談論同胞間的友爱当然是應該的。可是“……这种爱不應該导致至消灭階級差别的結果……然而这种爱毕竟應該导致至使富裕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生活与貧困的人相接近，不仅和貧困的人們保持公正的关系，并且对待他們仁慈、和藹有礼和忍耐；这种爱亦应导致至使处于下层的人們为上层階級的繁荣而高兴，并信賴他們支持，如同一家之中年幼的兄弟信賴他們的兄长庇护一样”。

这是怎样一种蔑視性的眷念！怎样一种貴族式的狂妄！——显而易见，写出上述話的人从来不曾嚐过穷苦的滋味。所以他很容易用梅涅尼·阿格里巴^①的箴言来教訓人們，他是自行充当人类首領的：——全部这一思想是基于对无敌力量的崇拜，他可以这样地說：全部权力都来自上帝，所有現有的政权都是上帝奠定的。所有駕凌于人們头上的权力，不論是大公的或者是他臣下的，都受諸于上帝。”^②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对全世界的巨大影响，欧洲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切引起了梵蒂岡的惊惶，梵蒂岡的領導集团动員教会的全部力量以保卫資本主义秩序。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法国和意大利諸国，天主教会在战后成为反革命最可靠的帮凶和反苏战争的急先鋒之一。

前克倫斯基政府駐梵蒂岡大使留薩考夫斯基在1919年10月时，以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政府”派在教廷的代表身份通知在

① 梅涅尼·阿格里巴为公元前503年时的羅馬执政官，根据傳說，他曾經劝說起义的平民返还原來，为他們述說了一篇規劝人們應該順从的箴言。

② “文学报”，1955年3月1日。

巴黎的沙仲諾夫說，教皇同情“与布尔什維克主义作斗争，他最害怕布尔什維克主义”。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和留薩考夫斯基私人談話間，表示他希望“布尔什維克主义很快就灭亡”^①。

战争的結果是对梵蒂岡的金融事业不利的。法国的牧师团体在战前大量購进俄国的有价証券，这些証券由于十月革命的結果变为分文不值。由于这一情况，法国的牧师团体付与梵蒂岡的补助金(圣彼得一枚捐)，曾經一度中断。奥匈帝国天主教会的大部份資金投資在奥地利的有价証券上面，随着奥匈帝国的崩潰，这些証券也化为灰烬了，而奥匈帝国中的天主教会上繳給梵蒂岡国庫的錢，以数額計算占第二位。許多意大利的教会团体以及梵蒂岡本身，由于它們寄望于德奥获胜，所以在战争初期时把巨額資金也投在奥地利的有价証券上面，最后获得一个同样悲慘的結局。

战后的变化首先反映在梵蒂岡金融强国的中心——“羅馬銀行”的景况上面。二十年代之初，“羅馬銀行”必須拥有15亿里拉才能逃避面临的破产危机。然而梵蒂岡在这一次也不例外，它在散布消息时故意夸大自己的亏损，期望与梵蒂岡友好的政府和私人的贈款会增加，和获得无利息的貸款、租讓和減輕稅額等。梵蒂岡的財政状况故意被說得阴沉沉的，这从梵蒂岡集团传出的滑稽突梯的說法中可以看出——傳聞在貝尼奇克脫十五世統治的末期，梵蒂岡的財政情况是如此地悲慘，以至于新教皇庇护十一世接收到为数仅一万里拉的現金。^② 教权派历史学者湯珊企图使讀者相信，如果教皇庇护十一世的女管家浪奇太太不为他綴补袜子和衬衣的話，那么可怜的教皇将无衣可穿！^③ 类似的胡話，其荒誕不經不用駁斥。梵蒂岡的金融业务在战后确是动摇不稳，然而沒有到迫使教皇穿着打补丁的袈裟跑来跑

① 歐曼：“两次世界大战間的梵蒂岡”，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第33頁。

② 宾契：“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与教会”，第307頁。

③ 华特·湯珊：“庇护十一世传”，倫敦，1930年，第160頁。

去的地步。

梵蒂岡特別勤勉地懇求美國百萬富翁發慈悲。1919年在費城，在得到當地大主教的同意之下，刊行了一本名為“梵蒂岡的政治獨立與經濟獨立”的小冊子。小冊子的作者耶穌會徒格·阿·戈特萊斯描繪了“梵蒂岡財政的危急情形”，他號召信徒捐集2,500萬美元，其利息可保證應付教廷日常開支。^①這一基金是否集齊我們不知道，此外有一件事是知道的，即在號召捐集的文告發布以後，梵蒂岡的國務卿助理高僧却利蒂到了紐約，天主教組織“哥倫布騎士團”交給他一張票額一百萬美元的支票。

銀行的帳目和薩爾汶米尼提供的資料證明，庇護十一世在1923、1926和1928年從美國得到大宗借款。但是這些借款和梵蒂岡的日常開支顯然無關，因為在1924年時，僅“聖彼得一枚捐”的收入已達1,800萬里拉，而在1946年時則為2,500萬里拉^②——這筆款項用以應付梵蒂岡的日常開支已是綽綽有餘的了。所以推測教皇庇護十一世用美國借款作各種金融投機，以彌補因戰後局勢變化而造成的損失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

1928年，梵蒂岡官方參考資料“宗座年刊”公布了下列聲明：“庇護十一世陛下從1927年起改組了梵蒂岡的財政部門。從今以後使徒宮（即梵蒂岡——作者）事務的領導由特設的紅衣主教委員會負責。主教携至羅馬的信徒的捐獻今後作特殊用途，並在教皇親自監督下進行分配。任命可信任的人作司庫，其職責包括制作收支表。今後每星期作資產負債表。教廷的支出每年規定為2,000萬里拉。會計制度將根據現代最新的規則制訂並受嚴格的監督。”^③

由此可見，根據官方的聲明梵蒂岡的開支在1928年時規定

① 茹泰諾·薩爾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271—272頁。

② 喬治·賽爾特：“梵蒂岡——過去、現在與未來”，第254頁。

③ 同上。

为每年 2,000 万里拉。然而收入呢！根据官方的材料，1929 年时的收入为 1 亿 8,000 万里拉。但是赛尔特在自己所著的书中当援引这一数字时着重指出，这一数字和梵蒂冈的实际收入远不符合，依他的估计每年为 10 亿里拉。^① 根据这些数字可以得出结论，梵蒂冈在二十年代末的收入超过支出好几倍。

1929 年間，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签订了拉特兰条约，这一条约的缔结大大扩大了梵蒂冈的收入。梵蒂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立刻开始设法与意大利政府取得和解，因为正是应该最终地解决“罗马问题”的时候了。1919 年，意大利正式的教权政党“平民党”的建立，再次证明教会承认资产阶级国家，证明教会公开地保护这个国家的利益。教会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早已一致了，对工人运动的敌视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因此，继续冲突的现实原因已经不存在了。资产阶级和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分子把教会看作自己可靠的同盟者。从梵蒂冈一方面而言，它期望在和意大利政府签订协议时可以得到一笔巨额款项，这就是意大利政府列入预算的应付给教廷的补助金，补助金的数额每年为 322 万 5,000 里拉，而梵蒂冈从 1871 年起就未曾向政府支取过。

1923 年 1 月，墨索里尼和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喀斯巴里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在当时“罗马银行”的总代理商都契伯爵的寓所里举行会谈。墨索里尼和喀斯巴里对为解决“罗马问题”而进行谈判一事取得了协议。同时墨索里尼答应把“罗马银行”从当时面临的破产危机中拯救出来。^② 根据墨索里尼前财政大臣斯蒂芬诺的证言，在墨索里尼和喀斯巴里会见后不久，梵蒂冈从意大利政府那里得到一笔约 15 亿里拉的无利息贷款，接着马上开始了签订条约的谈判。

庇护十一世从而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法西斯，因为教会在

① 乔治·赛尔特：“梵蒂冈——过去、现在与未来”，第 253 页。

② 斯蒂芬诺·维尔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 274 页。

接受金錢以后，事实上負有义务对法西斯制度予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对于梵蒂岡而言，共产主义和民主的敌人墨索里尼是个理想的政治上的同盟者。庇护十一世为了博取自己保护者的欢心，他解散了“平民党”，这个党的許多活动分子变成了法西斯分子，并和墨索里尼合作，直到墨索里尼被推翻为止。

“羅馬銀行”領取到的數百万現金，祇是梵蒂岡从墨索里尼处得到的部分資金而已。根据 1929 年 2 月簽訂的拉特兰条約的附录财政协定的規定，为了“賠償梵蒂岡因取消教皇国及因教皇国归并入意大利而所受的損失”，梵蒂岡从法西斯政府还得到了 18 亿里拉（10 亿里拉以意大利国家有价証券償清，8 亿里拉以現金償清）。因此，梵蒂岡因解决“羅馬問題”从墨索里尼处总共收得 33 亿战前的里拉。

这些資金对于梵蒂岡而言，来得再适时不过了，因为梵蒂岡和所有的資本家一样，在 1929 年底紐約股票交易所跌价停盘时遭到了慘重的損失。梵蒂岡靠了从墨索里尼那里得来的資金，調整了自己的財源，并把它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直至今日梵蒂岡还是依靠着这个基础。部分資金投資于法国的股票、匈牙利的鐵路和其他有价証券上。^① 根据某些資料，这些投資在战前每年为梵蒂岡带来約 9,000 万里拉的收入。

庇护十一世时，梵蒂岡的威望在資本主义陣营內显著地提高了。庇护十一世經常发表敌視苏联、敌視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言論，这使他成为法西斯主义真正的同盟者。庇护十一世許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通諭，他所組織的反对苏联、反对革命的墨西哥和共和政体西班牙的十字軍，支持反动政体的立場以及禁止天主教徒参加人民反法西斯陣綫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使庇护十一世在資本家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值得尊敬和奖励的人物。

① 乔治·費尔特：“梵蒂岡——过去、現在与未来”，第 252 頁。

这就是梵蒂冈在六十年期间内所走过的道路——从 1870 年被剥夺世俗权力，从庇护九世诅咒资产阶级和发表“异教谬论”，一直走到和法西斯结成联盟和缔结拉特兰条约。在这时期内天主教会从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力量转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伙伴，而梵蒂冈则仍旧是宗教中心，它继续捍卫着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并生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一支雄厚的金融力量。天主教就是这样地从封建时代“突变”到帝国主义时代，它不仅在意大利是“值得尊敬”的宗教，并且在信奉新教的各国，例如英国、荷兰、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

第四章

羅馬教皇厅及其金融勢力

現代梵蒂岡的意義首先在於梵蒂岡代表着天主教會的最高領導，天主教會在一系列西歐和美洲國家中是個重要的政治因素。

這個最高領導機關是如何組成的和它代表什麼呢？羅馬教皇厅（教皇屬下機構系統的總稱，教皇依靠着這些機構從梵蒂岡管理天主教會）是世界上最反民主的政府之一。羅馬教皇厅除對自己的首腦羅馬教皇而外，不對誰負責。它不是通過選舉而組成的，而是由教皇任命的。教皇和他的工作人員及羅馬教皇厅的活動是秘密的。

羅馬教皇厅由一網狀的機構組成，它們根據傳統或任務（或者為了偽裝起見）定名為主教會，管理局，辦公厅，委員會，審判厅和各院。1929年成立的一個小小的“國家—城市”梵蒂岡，歸羅馬教皇厅管轄。教皇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機構之一，在它存在的數百年期間曾不斷地改變自己的組織和所演的角色。現在它是一個完全現代化的行政組織。

教皇厅以教皇為首，根據教會的學說，他是“絕對無謬的”，是“上帝的全權代理人”。教皇是個獨裁的僧侶。他親自領導着教皇厅中特別重要的機構，其他機構則通過由他任命的紅衣主教會議或自己的全權代表——高級教士和俗間人士進行管理。

紅衣主教团(总数为70人)在今日已失去从前所具有的独立性。現在紅衣主教团仅在为了听取和形式上贊同梵蒂岡認為特別重要的教皇的声明时才召开。然而紅衣主教团尚保存着作为从自己的成員中选出新教皇的組織的意义。通常教皇們总是力图选出一个在各方面都能繼承自己政策的繼承者。新即位的教皇利用教会中的大公們不会再有多长寿命一特点(照例年令已大的高級教士才能被提升为紅衣主教),能在短短的时期內任命忠实于他的人填补紅衣主教团的空缺。例如,庇护十二世即位的最初16年中死去了53个紅衣主教,即占紅衣主教团成員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样教皇就可能以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僧侶填补空缺。被教皇挑选入紅衣主教团的,都是些得到資產階級政府信任的高級教士。因此,具有进步情緒的教士要被选入紅衣主教团是极困难的,同时要在紅衣主教团中組成一个与教皇对立的有力的反对派也是极困难的。紅衣主教在受銜典礼上要庄严地宣誓忠誠于教皇,如違背誓言时,教皇可剝夺他的紅衣主教称号。在过去时代里,教皇可将不服从他的紅衣主教投入監獄或杀害。在現代条件下,梵蒂岡可迫使它不称心的紅衣主教回到僧院或放弃紅衣主教称号(这种情形非常少見)。例如,法国紅衣主教皮依奧因不同意庇护十世譴責“法兰西行动”的决定(关于这点以后將談到),在梵蒂岡的压力下被迫放弃紅衣主教的称号。

假如說紅衣主教团是一个只具形式意义的,并在教皇在世时沒有势力的机构,但不能認為个别的紅衣主教也是这样的,特别是認為教皇厅中的紅衣主教也是这样的。教皇厅中的紅衣主教是教皇直接的工作人員和顧問,他們領導着教皇厅中的各种工作。其中的某些人对梵蒂岡的政策起着重大的影响。例如,庇护九世时,紅衣主教安东尼里决定着教皇厅的前途;里夫十三世的亲信紅衣主教冷巴拉攬有大权;紅衣主教梅里·华尔事实上由他确定庇护十世的政治路綫。

一些在教皇厅外工作的紅衣主教，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对教皇产生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例如在现在美国紅衣主教斯毕尔曼就有这种地位，他和本国的大资本家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教皇的衰老和接近死期，在某种情况下有戴上教皇皇冠机会的紅衣主教們，他們的势力就更大了。意图被选为教皇的紅衣主教被称为“巴巴皮立”。甚至于老朽不堪的紅衣主教們，要当教皇的念头仍萦绕于心。因为在过去的教皇选举會議上，选票曾不止一次地分散在許多人身上，而选为教皇的是些中間派的，未曾預料到的和平凡的人物。

至今为止，只有意大利人的紅衣主教才有被选为教皇的现实性机会。最近几百年以来只有意大利人被选为教皇，意大利的高級教士們热烈地捍卫着他們对领导教皇厅的垄断地位。可是时代变了：在今日半数以上的紅衣主教不是意大利人了，虽然意大利人目前仍旧控制着教皇厅，至于将来选举新教皇时的形势又将怎样，則难于預測。

庇护十一世曾經把教皇称作为一个不再希望教皇死去的紅衣主教。在意图登上教皇宝座的紅衣主教之間，不断地进行着爭选票和爭势力的尖銳斗争。教皇厅中照例总是有几个相互敌对的各自拥戴着一个教皇候选人的私党。“巴巴皮立”“友爱地敌視着”，从不放过一个足以損害自己竞争者名声的机会。

教皇厅中的紅衣主教只不过是梵蒂岡有势力集团之一而已。梵蒂岡和整个天主教会中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是耶稣会，它早已在教会中占着統治地位。^①假如說教皇厅的各机构是由教皇或紅衣主教們领导的，則这些机构中的重要行政职位是掌握在耶稣会徒手中。

耶稣会徒控制着梵蒂岡的宣传机器。他們领导着天主教教会的最高神学院——格里哥里安大学(罗耀拉創办的)。大学的

^① 1955年年初时，耶稣会拥有32,899名会徒，其中的5,593名，或17%，在殖民地国家活动(参考“国际天主教通报”，第24期，1956年，巴黎)。

校长是耶穌会的將軍。大学的教員是耶穌会徒。几乎近百年来的所有教皇(里夫十三世, 庇护十世, 貝尼奇克脫十五世, 庇护十一世, 庇护十二世)都是格里哥里安大学的毕业生, 即耶穌会徒的学生和走卒。^①

耶穌会在羅馬的格里哥里安大学也为天主教会提供担任紅衣主教, 主教和其他领导职位的人員。近百年来它的 77 名結业生后来成为紅衣主教, 575 名成为主教, 成千名在教会领导机关中占据重要职位。1952—1953 年間, 在該大学中学习的有属于 60 个国家的 2,373 名教士和修道士。除了格里哥里安大学而外, 耶穌会在各資本主义国家中还拥有 115 所大学, 400 所以上的学院和专门学校, 和数以百計的其他俗界的学校。耶穌会徒在羅馬还领导梵蒂岡的这种“战略性”学校, 例如“俄罗斯学院”(即圣戴列賽学院), 乌克兰学院(路登学校), 波兰, 羅馬尼亚, 匈牙利, 立陶宛教会学院, 拉丁美洲学院, 为亚非两洲訓練传教士的“圣法兰契斯哥·薩維里奧”学院, 美国神学院, 圣佩达英国学院。根据意大利資产階級杂志“今天”的报导, 1952 年时在英国学院中学习的有英軍退职將軍斯密斯, 6 个前英空軍飛行員, 一个海軍艦长和一些其他的軍事专家。^②

梵蒂岡的出版社“天主教文明”, 它发行和社名相同的双周政治性杂志, 以及政治內容的書籍和小冊子, 也是耶穌会的产业。“天主教文明”杂志被認為是天主教会主要的“理論”刊物。

① 虽然耶穌会徒根据会章不得接受教会所授的各种称号(主教, 紅衣主教等等), 事实上这一規定未被遵守。例如, 下列的美国耶穌会徒有籍主教和紅衣主教的称号: 西奧圖·爱弥兒——京斯敦主教(英屬牙买加島), 华脫·菲茨什拉尔——費尔朋克斯主教(阿拉斯加), 菲立浦·柯德——前苏州主教(中国), 湯麦斯·罗伯逊——孟买大主教(印度), 費迪席·貝納尔特——加尔各答大主教(印度)。(參閱“美国天主教名人录, 第十卷, 1952—1953”, 密执安)。然而耶穌会徒宁可通过仅作幌子的人, 通过自己的学生, 受业者和秘密的耶穌会徒管理教会。因此甚至在天主教会内部耶穌会也是臭名卓著的。

② “今天”, 米兰, 1952 年 12 月 6 日。

所有該杂志的編輯和工作人員都是耶穌會徒。除了“天主教文明”杂志以外，耶穌會徒在米兰发行政治性的“生命和思維”杂志，在法国发行“学习”月刊，在美国发行名为“阿美利加”的周刊，在阿根廷发行“准則”月刊，以及在其他各国发行各种杂志。耶穌會徒总共发行 1 千种以上的报纸和杂志，用的文字有 44 种。梵蒂岡的无綫电广播事业也由他們領導，其首腦为耶穌會徒菲立浦·索考尔西。

耶穌會徒在过去积极地帮助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掠夺者，現在他們則进行反对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控制着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錫兰的天主教会的活动，中国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前的天主教会也是他們控制着的。耶穌會在貝魯特設有圣約瑟夫大学(黎巴嫩)，在印度設有 9 所学院，在东京設有一所大学，在馬尼拉設有“阿戴尼奧”学院(菲律宾)，墨尔本的“紐曼学院”(澳大利亚)——以及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亚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都設有属于耶穌會的天主教大学。人民政权建立之前，耶穌會徒在中国領導着两所大学和数十所中等学校。耶穌會在上海拥有大量不动产。

耶穌會通过許多輔助性机构，領導教会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思想上的工作。

耶穌會的組織与其他教派根本不同。耶穌會徒不是一般理解中的教士或修道士；他們沒有僧院，也沒有使他們能和一般僧侶区别开来的特別的服裝。他們之間有鉄的紀律相互制約着，耶穌會的各組織不受当地主教管轄，而是直接听命于住在羅馬的耶穌會將軍，將軍則听命于耶穌會事实上的“將軍”——教皇。耶穌會徒所执行的任务与其他教派的不同，純粹是政治性質的，为反对“异端”而斗争，所有的进步运动都是异端，其中包括殖民地各族人民和独立国家的解放运动在內。耶穌會徒力图使資產階級社会的統治集团服从于自己的势力。他們組成为教会內部

的警察，監督和審查僧侶們的政治觀點。加入耶穌會的候選人是被謹慎地挑選出來的，大多數皆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他們要經受為期十年的特別訓練。

實質上耶穌會是梵蒂岡的政治組織，它擬訂和推行天主教會的全部活動計劃。所謂耶穌主義，即“耶穌社”的思想、規則和方法的總稱，正如葛蘭西很正確地指出的那樣，耶穌主義早已成為天主教的同義詞了。^①耶穌會徒是促使梵蒂岡和意大利資產階級和解的急先鋒，也是促使教廷和墨索里尼結成同盟以反對工人階級的急先鋒。他們是群從性天主教組織“天主教行動”的倡議者和組織者。他們在過去和現在都積極參加天主教政黨的活動。耶穌會徒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熱烈的崇拜者。耶穌會徒塔基·汶都里曾作為墨索里尼的“懺悔牧師”達二十年，而耶穌會徒斯坦波弗萊爾則是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的合著者。耶穌會徒曾與南斯拉夫的巴維里契法西斯份子合作，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梯索法西斯份子合作；他們曾暗中操縱西烏克蘭東正教大主教雪波濟茨基；他們在西班牙的弗朗哥和葡萄牙的薩拉查集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耶穌會徒領導着羅馬教皇廳執行的親美路線。他們的組織和報刊繼續鼓吹“冷戰政策”。耶穌會徒的報紙一貫地對蘇聯人民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誹謗。例如，耶穌會徒安德澤羅·勃羅柯萊里，他寫有大量反共的書籍和文章，曾在“天主教文明”雜誌上號召“消滅共產主義”。勃羅柯萊里是擁有巨額資本的教會組織的代表，其成員為了掠奪更多的錢和發更大的財，是任何人也攔不住的，他為了反對蘇聯政府最大程度地滿足勞動者的需要這一政策，提出下列的“論據”：“怎樣的頭腦，無論他是如何的愚蠢，竟會認為人類的幸福取決於物質福利的多寡！”^②蘇聯的和平政策使他暴跳如雷。他感到不舒服

① 葛蘭西：“歷史唯物主義和克羅齊哲學”，都靈，1952年，第10頁。

② “天主教文明”，羅馬，1952年10月31日，第373頁。

的是苏联的政治活动家們正在为“民主、进步、自由、文化、祖国、和平”而斗争。^① 他宣布这些概念是“毒化国际气氛的毒药”。

现代耶稣会徒的“道德”箴言同他們中世紀的前輩們的箴言一样地厚顏无耻和不講节操。例如，我們引耶稣会徒渥泰維奧·麦凱蒂所著的叙述教士“灵魂上的完美”的一書來說明，这本书在1950年由梵蒂岡刊行作为僧侶們正式的“道德”指导書。麦凱蒂在这本书中公开地为变节、表里不一致和腐化这些为耶稣主义所特有的現象辯护。

麦凱蒂写道，所有的教士是上帝挑选出来的，坏的教士也是上帝挑选出来的，所以信徒對他們應該象对好的教士一样地表示听从。麦凱蒂使自己的同事們相信，道德敗坏的教士是根据上帝的意志而存在着的。这个耶稣会徒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于我們僧侶而言，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早已决定了的。麦凱蒂捍卫社会不平等現象，捍卫社会分成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这一事实。他确信，所有这一切是“上帝安排和証明”的。这种“哲学”从資本家的利益观点出发是理想的哲学。对于耶稣会徒麦凱蒂而言，貧穷乃是屬於永世不变的范畴之內的現象。为了証明这一論据，他引耶稣基督作証：“当时有一个慷慨的妇人把她貴重的飾物贈給基督，有些人要求卖掉它，把得到的錢在窮人之間分，基督答道：‘在你們之間窮人將总是有的，而我不是总在你們之間’”。麦凱蒂由此得出結論：教士的責任不是鏟除貧穷，貧穷是无法鏟除的，而應該想尽办法增加教会的財富。^②

耶稣会在今日隶属于教皇，它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反映羅馬教皇的观点。“利用任何能為你們的事业带来利益的現代手段——庇护十二世于1940年写信給耶稣会將軍列道霍夫維基說——但注意使你我所寶貴的我們的組織要保持它过去那种使它的得以巩固的不变的秩序，保持原先滋養它的精神，最后，保

① “天主教文明”，1952年10月8日，第579頁。

② 渥泰維奧·麦凱蒂：“牧师”，羅馬，1950年，第12、17、18頁。

持它的把你們牢固地和断然地同教廷联結在一起的绝对的崇敬和意志的绝对服从。”^①这些话对于耶稣会手段的热烈拥护者和罗耀拉教派的保护人——教皇庇护十二世而言，是相当典型的。

天主教会命运现今的决定者教皇庇护十二世，这个被教会的颂扬者们力图把神圣的灵光加在他头上的，和被称作为“天使般的”牧人的僧侣，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庇护十二世——在俗界他是爱华特澤尼奧·巴契里侯爵——于1876年生在罗马的“黑色”贵族菲立浦·巴契里家族里。菲立浦·巴契里是个教权派的大银行家和教廷中著名的显贵，他担任教廷首席法律顧問之职。巴契里家族尚在十九世纪时即在教皇厅中奠定其今日的地位。巴契里家族的亲属之一红衣主教康梯林尼是庇护七世的顧問，他在1819年时把現教皇的曾祖父安插在使徒署工作，后来成为教皇格里哥里十六世的司庫。爱华特澤尼奧·巴契里的祖父馬尔康东尼奧·巴契里在庇护九世的政府中曾任內政部副部长一职达19年之久（一直到教皇国在1870年被废除为止）。馬尔康东尼奧是红衣主教——警察安东尼里的左右手，后者以对意大利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进行残酷和血腥的迫害而著名，数以百計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們根据他的命令，和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在監獄中折磨或被处死。馬尔康东尼奧除了进行政治活动外，还从事金融投机事业。1864年时他创办了“羅馬观察家”报，其后以高价把报社售与羅馬教皇厅。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羅馬观察家”以梵蒂岡官方机关刊物身份見諸于世。

馬尔康东尼奧的儿子菲立浦·巴契里侯爵为自己的大儿子法兰契斯哥安排了在教会行政上陞迁的前途，为小儿子爱华特澤尼奧安排了在宗教职位上陞迁的前途。法兰契斯哥后来繼承了父亲的梵蒂岡首席法律顧問的职位。法兰契斯哥·巴契里是

^① “天主教文明”，羅馬，1940年12月3日，第167頁。

梵蒂岡在意大利各最大壟斷資本和銀行的董事會中的代理人。其後他代表梵蒂岡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進行談判，締結了拉特蘭條約，由於簽訂了這一條約，墨索里尼付給梵蒂岡數十億里拉，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談過。意大利國王依照墨索里尼的提議，授予法蘭契斯哥世襲的大公稱號（公爵），以獎勵他有功於使談判順利。

我們提醒一點，現今教皇的伯父埃爾涅斯脫·巴契里在二十世紀最初年代中曾領導“羅馬銀行”。

至於談到愛華特澤尼奧·巴契里在宗教職位上的陞遷，其輕易和快速不亞於他的哥哥法蘭契斯哥在法律事務方面，和他的伯父埃爾涅斯脫在金融事業方面所達到的。

愛華特澤尼奧在羅馬的貴族中學“克維林諾·維斯康錫”和“卡普朗尼加”學院結束世俗的教育以後，隨即又畢業於耶穌會的格里哥里安大學。此後他進了梵蒂岡的外交學校——貴族教士學院，這學院在不久以前還只接受貴族出身的神職人員為學生。^①愛華特澤尼奧從來不曾從事過真正的教士的活動。他的全部工作，一直到被選為教皇為止，是在羅馬教皇廳的各種崗位上和梵蒂岡派往國外的外交使節團中活動。1901年時他是梵蒂岡國務院的官吏；1904年時，當時只不過27歲，他已經是高僧和庇護十世“私人的高級教士”。1909年時，庇護十世任命他為高僧會書記。顯然，愛華特澤尼奧為了感謝庇護十世為他在宦途上的飛黃騰達提供了保證，所以一當選為教皇以後就宣布他為“德僧”，其後又把他列入“聖者”之中。在這一期間中未來的教皇為了梵蒂岡的事務，經常訪問巴黎和倫敦。不僅是愛華特澤尼奧的個人才干有助於他的迅速陞遷，他的在教廷中服務的父亲和當時為“羅馬銀行”主席的伯父的地位，也有助於此。

^① 為了便利美國的教士們能參加梵蒂岡的外交工作，庇護十二世已取消了上述的限制。他把學校改名為“古字學，外交學，檔案學高等學校”。現在領導該校的是前意大利軍隊中的上校，耶穌會徒格里譔。

众所周知,1911—1912年間的利比亚战争为“羅馬銀行”和梵蒂岡带来不小的利潤。由于这个緣故,巴契里家族的地位愈为巩固了,而爱华特澤尼奧高僧也步步高陞;貝尼奇克脫十五世任命他为国务卿助理和編纂宗教法典委员会的委員。

貝尼奇克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期望与意大利政府敌对的德奧同盟获得胜利。巴契里家族中的人員是积极反对意大利統一的,出身于这家庭的爱华特澤尼奧也同样期望德奧获胜。亲德永远是未来教皇——庇护十二世政治信念方面的特点。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因巴契里也抱着与他同样的願望,所以在1917年授他大主教之职,并任命他为駐巴伐里亚的圣使,其后任命他为駐德国的圣使,巴契里在德国一直住到1929年。在此期間他公开地干涉德国的政治生活。美国高級教士夏盖关于巴契里在慕尼黑期間活动的性質曾說,当工人們在1919年已經取得政权时,“他在中央寺院的讀經坛上經常宣传反对共产主义”^①。

巴契里在德国期間和下列后来使希特勒执政的德国反动派代表人物,有着私人的交往,如克虜伯、兴登堡、赫斯、伯魯宁、巴本、沙赫脫等等。

高僧爱华特澤尼奧·巴契里不仅干涉德国的內政,使德国的各种反革命力量联結起来,同时他还对年青的苏維埃共和国特別感到兴趣。“有一次——他的官方傳記的作者道尔写道——巴契里在柏林的大主教私邸中来到了一个学者——羅馬聖經学院的教授。他給圣使(即巴契里——作者)带来了梵蒂岡的秘密命令,要求巴契里授与使者以主教之位,随后用某种方式把他运送到俄国去,以巩固极度零落的僧侶队伍和繼續适合神意(?)的工作。授位礼是在圣使的宮庭中秘密进行的,在場的只有受位者,巴契里大主教和他的二个助手。其后弄到了合适的护照(显然是伪造的——作者),于是新主教就奉着特別使命到俄国

^① 唐·夏盖:“梵蒂岡上空的白烟”,密尔窩基,1943年,第28頁。

履任去了。”^①这个新主教不是别人，而是梵蒂冈的反共专家耶稣会徒竇宾尼。

从梵蒂冈的观点看来，巴契里在德国的活动是十分成功的，因此庇护十一世于1929年擢升他为红衣主教并任命他为国务卿助理，在此以前尚委他参加由其兄法兰契斯哥领导的与墨索里尼締結条約最后談判工作。拉特兰条約的締結为红衣主教巴契里带来了新的荣誉，1930年他被任命为梵蒂冈的国务卿。

接着庇护十一世任命他为教皇使节派往葡萄牙，比利时，和阿根廷。1936年时巴契里兼任事务总管（教会金庫的总管），同年啣命赴美，用墨索里尼根据拉特兰条約付給教廷的錢購買新的股票和有价証券。^②巴契里在美国会见了最著名的資本家和銀行家，如摩根，洛克斐勒，杜邦，福特和泰勒。他在紐約时不是住在什么僧院里，而是住在紐約銀行家和石油商人勃兰奇豪华的別墅中。勃兰奇曾于1926年在經濟上支援教权派狂热份子“克利斯节洛斯”反对墨西哥政府的反革命暴动。^③

作为梵蒂冈外交政策决策人的巴契里，亲自参加了与希特勒之間的談判，簽訂了宗教条約（1933年）。1939年庇护十一世死后，巴契里被选为教皇，定名为庇护十二世，好象以此強調他将繼續执行前任教皇的反动路綫的决心。順便提一提，庇护十一世在死前曾建議选举巴契里作为自己的繼承人。^④墨索里尼时代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諾說，巴契里是法西斯和納粹提名的竞选教皇的候选人。齐亚諾于1939年3月在他的秘密日記中写道：“我在泰尔維西奧获悉巴契里被选为教皇。对于我而言这不是意外的消息。我記得和他在2月10日时的談話。談話是异

① 却尔斯·道尔：“庇护十二世的生平”，紐約，1954年，第48—49頁。

② 伴同巴契里訪問美國的，有当时領導梵蒂冈全部商业金融企业的埃里哥·茄列亚齐公爵和貝納尔奇諾·諾茄拉男爵。

③ “拉丁美洲問題”，第11期，墨西哥，1956年2月1日，第83頁。

④ 湯麦士·摩根：“監視哨”，紐約，1944年，第158頁。

常亲切的。似乎他在这次谈话以后异常努力地改善了和德国间的关系，以至于比尼雅蒂（当时意大利驻梵蒂冈的大使——作者）昨天对我说，巴契里是德国提名的候选人……元首（墨索里尼——作者）对巴契里被选为教皇很满意。元首再一次答应为他出一些主意，为了有利于管理教会的事业（有利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者），他应该做些什么。”^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第一天起，庇护十二世就企图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与西方强国和解，使他们转而反对苏联。1939年12月25日，庇护十二世在红衣主教团会议上宣称：“让我们结束这个兄弟互相残杀的战争，让我们联合努力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神论。”^②

战后庇护十二世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说支持“冷战”，号召团结“基督”世界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

庇护十二世和他的前任教皇们一样，是先进科学的敌人，因为科学上每一个新发现都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和揭穿宗教上各种概念是毫无根据的。的确，教皇由于考虑到科学所获得的成功和在人们意识中所具有的力量，他声称教会是欢迎科学和进步的。然而庇护十二世只承认其结论不与教会的教理相抵触的科学。

现今的教皇不是属于狂热型的人物，他不是死守着陈旧的遗训和福音书的每一个字不放。这样的教皇在二十世纪时代未必对天主教会会有益处。庇护十二世极为明白，科学已推翻了圣经上的神话。虽则如此，他仍旧求助于各种诡辩主义以挽救圣经的威望和使它同科学“相调和”。他在1950年名为“*Humani generis*”的通谕中承认，“希腊和拉丁的作者不是用历史方法写成”现存的陈旧的遗训的。据说，是上帝设意要这样做的，因为否则原始的犹太人就无法理解这陈旧的遗训了！于是得出结论

① “团结报”，1953年12月23日。

②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第65页。

說，不應該逐字地去理解聖經，既然如此，那麼聖經據他說來就不與科學相抵觸了！教皇斷言，聖經中重要的不是六天創造出世界，重要的是世界確是創造出來的。

庇護十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方興未艾的時候宣稱，“人類的理智否定上帝”是這次災禍降臨到各族人民頭上的原因。當時庇護十二世說：“在我們的時代里，常常可以看到人類的理智以自己的強有力而驕傲，不予上帝以應有的尊敬，因此人們忘記了自己對上帝的責任，或者甚至輕視他，他們力圖使人間充滿着舒適、財富和各種享受，而忘記了永生的幸福。”^①現代社會的災難原來其根源不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制度中，這些制度產生了法西斯主義和掠奪性戰爭，而卻應該歸咎於人類的理智，歸咎於勞動者要求象人一般地生活這種願望！

歷史證明，過去所有的教皇都是任用私戚的。現今的教皇庇護十二世也患着這一惡疾。他的三個侄兒（法蘭契斯哥·巴契里的兒子）——卡爾洛大公，馬爾康東尼奧和朱里奧，不消說還有他的近親和遠親，都不能抱怨他們的叔叔對他們不關懷。

教皇最大的侄子卡爾洛大公是梵蒂岡國家的“首席顧問”（第一個非僧侶出身的部長）。他同時是格里哥里安大學、“宣傳信仰”主教會、高僧會和一些教派的首席法律顧問，以及擔任宗座財產管理局的主席之職。此外，他還是教皇的朋友茄列亞齊領導的梵蒂岡意大利新教會修建事務局管理處的成員之一。卡爾洛開設着意大利最大的通心粉工廠和肥皂工廠，這位教皇的侄子把通心粉和肥皂推銷給各僧院、神學院和中等神學校。雖然卡爾洛經營着許多各色各樣的事業，但是他和教皇的其他的親屬一樣，不付稅給意大利政府，因為他們算是梵蒂岡的臣下。

教皇第二個侄子馬爾康東尼奧大公是教廷羽林軍中的上校，一家航空公司理事會的主席和“意大利煤氣公司”理事會的

^① “宗座的活動”，梵蒂岡，1944年，第90頁。

理事。此外，他还是其他 30 家股份公司和托辣斯理事会的理事。

教皇的第三个侄子朱里奥特别得到教皇的宠爱，显然因为他是巴契里一族中唯一有后裔的人的缘故。朱里奥大公和著名的意大利军火工厂老板庞勃利尼·柏劳迪的女兒結婚，她是柏劳迪遗产的繼承人。以下是朱里奥所担任的一些职位（远非全部职位）：“羅馬銀行”理事会理事，“羅馬銀行”比利时分行經理，“东南鐵路公司”付經理，梵蒂岡商船管理局主席，“意大利煤气公司”理事会理事，“宣传信仰”主教会法律顧問；此外，他是教廷羽林軍的上校，甚至是哥斯达黎加共和国駐梵蒂岡的外交代表。

教皇侄子們的职位一覽表証明，“基督的全权代理人”对自己亲人們的命运的关注，远已超出偏爱的范围。当然，二十世紀不是亚历山大·巴尔特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譯者）的时代，現在教皇已不能把世袭領地和公国贈給自己的侄子們了，可是派給他們一些厚俸的挂名职位，和安插他們到梵蒂岡控制的銀行和垄断資本的理事会和管理部門去，这事还在他們的权力之内，所以不應該說教皇不可以利用这一权力。^①

埃里哥·彼得罗·茄列亚齐公爵和教皇的侄子們一样地得到庇护十二世特別的眷顧，茄列亚齐公爵占据着梵蒂岡民政总督的高位（他的伯父李卡图·茄列亚齐·里齐是庇护十二世的私人医生）。美国新聞記者湯麦士·摩根把茄列亚齐称作为庇护十二世的亲信顧問。茄列亚齐是美国紅衣主教斯毕尔曼的亲密朋友，他的美国朋友比梵蒂岡中的任何人为多，并以此馳名。有一个时期茄列亚齐在梵蒂岡中代表着美国亲法西斯組織“哥侖布騎士团”的利益。摩根还說，茄列亚齐被認為是美国天主教当局的亲信人士。1936年时他伴随現今的教皇赴美，和他一起

① 关于教皇侄子們的投机活动參閱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第 333 頁；雅罗斯拉夫·加兰：“东方曙光已白”，莫斯科，1954 年，第 282—337 頁。

参加同美国百万巨富間的談判。巴契里被选为教皇以后，根据摩根的說法，茄列亚齐开始“受新教皇的委托执行秘密任务和进行各种金融业务”^①。

茄列亚齐除了是梵蒂岡民政总督外，他在梵蒂岡行政系統中还占着其他許多职位：梵蒂岡总督府經濟管理局的总裁，梵蒂岡新教堂修建事务局的局长。此外，他在許多股份有限公司的理事会中代表梵蒂岡的利益。

除了巴契里家族的后裔和埃里哥·茄列亚齐公爵以外，属于教皇私人“家庭”的，即属于得到教皇信任的（从而能在梵蒂岡上层集团中具有势力）人士集团之中的，还有一批称为“德国帮”的高級教士，其所以称为德国帮是因为其中都是德国籍耶穌会徒的緣故。这就是莱依别尔——庇护十二世的私人秘書，威廉海姆·汉特里赫——教皇的文書，教皇的大部分演說、信函和通諭都是他写的，以及阿美古斯脫·裴雅——教皇的私人信仰声明者。属于这一集团的还有前德国天主教政党中央党首領高僧卡斯。当他的党帮助希特勒攫得政权以后就定居在梵蒂岡，二十年来他是庇护十二世的政治顧問。

美国教士麦克·勃朗也是教皇私人集团中的一个有势力的角色。他的正式职位为教皇宮庭中的卫戍司令，可是勃朗和美国在羅馬大使館之間的密切关系，使人推測他还从事着其他工作。^②

羅馬教皇厅中的机构可以分成三类：政治的，金融——經濟的

① 湯麦士·摩根：“監視哨”，第209頁。

② 除勃朗而外，美国的各教派和各教会机构还派有下列代表經常駐在梵蒂岡：乔治·海茨曼——“梅利諾”教派的代表；杰姆士·凯宁亨——圣保罗教士，传教士协会的代表；爱德华·赫斯顿——圣十字牧师协会的代表；派曲里克·勃兰尼亨——受难兄弟会的代表；多米尼加教派修道士倪摩蒂·斯派克斯；奧古斯汀教派修道院主持約瑟夫·希凱；卡密里脫教派修道士肯涅脫·列琪；耶穌会副將軍汉生·麦考米克及其他等人（“教廷年鉴”，梵蒂岡，1955年）。

和教会行政的。政治机构中包括：国务院，它包括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和俄国事务委员会，此外还包括“圣办公厅”（宗教审判厅）主教会，东方教会主教会和“宣传信仰”主教会。属于金融财政机构的单位有：宗座财产管理局（管理梵蒂冈的不动产），宗座特别行政局（财政部，金库），宗教事务院（梵蒂冈的银行），使徒署（管理空缺的主教区和大主教区，“圣彼德一枚捐”和教皇国库的其它进益，在教皇死后开列梵蒂冈所有财产的清单）。“宣传信仰”主教会，听悔审判厅和教皇厅其他一些机构也从事金融—财政活动。教会行政机构由一些主教会，审判厅和委员会组成。^①

意大利人的红衣主教和主教管理着主要的政治、教会行政机构，和所有的金融部门。虽然在1954年时，为数70人的红衣主教团中的意大利人只有27个，但是正是他们在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占着统治地位，不让外国人占据梵蒂冈的要职。这从一点就可以看明白，即27个意大利红衣主教中有19个在教皇厅，他们直接地参与梵蒂冈事务的管理工作，而其余43个非意大利籍的红衣主教中，在教皇厅工作的只有两人：法国人戴西朗和阿尔美尼亚人阿茄柴让，他们以“东方”和“俄国”两个如此重要的问题的专家驰名。在教皇厅的意大利籍红衣主教中，以卡拿里、庇雅察、披萨尔杜和米加拉最有势力（根据1956年的资料）。

① 属于教会行政机构的有：高僧会（掌管授与僧侣以主教称号和其他僧阶，并领导他们的活动）；圣餐主教会（制定典礼程序）；教会寺院局（管理乡镇小教区教士活动）；僧团主教会大典局（主管宣布“德僧”和“圣者”）；礼仪局（掌管圣彼得大教堂各种祝典的仪式和外交议定书）；中等神学校和大学局（管理天主教会学校）；圣彼得大教堂局（管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行政事务）；审判厅；听悔审判厅，经营贖罪券；使徒署名审判厅（现在为最高的公证所和上诉审判厅）；圣罗马“洛脱”审判厅（主要受理离婚案件）。各办公厅和委员会；使徒办公厅（起草梵蒂冈的通谕和其他官方文件）；使徒日期签署局（金融主管机关之一）；致各国元首信函秘书处（官方从事起草和发送致各国元首信函和国书的机关，实际上是从事密码和运送外交邮包的机关）；拉丁文书信秘书处（翻译梵蒂冈官方文件为拉丁文的机关）；教皇的梵蒂冈国委员会（梵蒂冈最高行政机关）；教皇的保卫信仰、管理意大利境内新教堂修建事务和教会房屋事务的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

虽然他們的年令加起来早已超过三百岁，可是仍极活跃：接待来宾，出席梵蒂岡的各种典礼，发表演說。总而言之，仍旧希望有一天能戴上教皇的三重冠。庇护十二世所以能够保証自己被选为教皇，因为事先取得了这些“巴巴皮立”及其朋友們的选票。教皇为了表示感謝，把教皇厅中的肥缺配給他們，委任他們领导最富有和最有力量的主教会。他們之所以有势有权，其原因就在于此。^①

- ① 下面是关于这几个紅衣主教的簡單資料。卡拿里(生于1874年，1935年起为紅衣主教)是个貴族，侯爵头衔。他是教皇的梵蒂岡國委员会的主席，馬尔他騎士团的最高祭司，以下各主教会的成員：“圣办公厅”主教会，东方教会主教会，圣餐主教会，僧团主教会，“宣传信仰”主教会，大典局，礼仪局，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中等神学院和大学局。他同时是使徒署名审判厅的成員、宗座特別行政局和宗教事务院的成員。庇雅察(生于1884年，1937年起为紅衣主教)是卡梅里教派的首領(約有4500名僧侶)，前威尼斯总主教。他是高僧会的書記和以下各主教会的成員：“圣办公厅”主教会，圣餐主教会，教会寺院局，僧团主教会，“宣传信仰”主教会，大典局，中等神学院和大学局，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以及宗教事务院會議等。庇雅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为騎兵团中的首席随軍牧师，其后为意大利軍隊中的总牧师。庇护十一世时他曾领导过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活动。披薩尔杜(生于1877年，1937年起为紅衣主教)是耶穌会徒，中等神学院和大学局、“圣办公厅”的書記，格里哥里安大学的校长。他同时是下列主教会的成員：高僧会，僧团主教会，“宣传信仰”主教会，礼仪局，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宗座财产管理局和宗教事务院紅衣主教委员会的委員。米加拉(生于1879年，1946年起为紅衣主教)是羅馬和羅馬教区的总助理司祭(教皇的全权代理人)；他是下面各主教会的成員：“圣办公厅”，高僧会，东方教会主教会，圣餐主教会，僧团主教会，“宣传信仰”主教会，大典局，宗教非常事务主教会。他同时是使徒署名审判厅，宗座财产管理局和宗教事务院紅衣主教委员会的委員。米加拉控制着一些有势力教派的活动，其中包括法兰西斯教派(2万5千名会徒)和卡普青教派(1万5千名会徒)。米加拉是一个热烈的保皇党分子，許多年来他以使徒身份在比利时和捷克斯洛伐克做外交工作。二十年代时，因干涉捷克内政被捷克政府坚持令其出境。米加拉虽然年令已极大，他仍然認为自己是“巴巴皮立”。从上述四个紅衣主教的职位一覽表上可以看出，他們在梵蒂岡机构中担任着最有关键性的职务。同时，其中的許多职务并不要求他們花多大力气，可是收益却很好。正因为他們是极端反动的，所以他們领导的机构的活动也是如此。

除了紅衣主教而外，还有一些主教和其他的高級教士也在教皇厅中占着要职。梵蒂岡国务院不久以前的领导人高僧塔基尼及其以前的同事高僧蒙梯尼，就是这种在梵蒂岡被称为“灰色閣下”的人物。

国务院是梵蒂岡教会机器最重要的环节。通常它的首脑所担負的責任等于內閣总理一样。在梵蒂岡他是仅次于教皇的第二位人物。

国务院分成为两个行政单位。第一个称为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它負責领导梵蒂岡的政治活动和意大利境外天主教會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梵蒂岡的外交部。它以国务卿为首，在它的下面有一个由十个紅衣主教組成的諮議机关。第二个是教会日常事务管理局，也是由国务卿领导。它起着內閣总理的秘書处作用，它管理着不直接受教皇领导的各机构的工作，领导意大利的主教会以及群众性的教会組織，例如“天主教行动”。庇护十二世执政后，自1944年起国务卿一职空缺着（虽然庇护十二世自己以前也做过国务卿）。巴契里不願意把教会机关中如此重要的权柄交給一个紅衣主教，他設了两个国务卿助理，或付国务卿的职位，被任該职的是高級教士多美尼哥·塔基尼和柴伐尼·巴蒂斯达·蒙梯尼。塔基尼至今仍领导着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而蒙梯尼則在被任命为米兰大主教以前一直领导着教会日常事务管理局。1956年起蒙梯尼一职由高僧德·阿士阿所接替。

塔基尼是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的老官僚，被認為是梵蒂岡最反动路綫的拥护者。他对于所有新鮮事物都抱敌視态度，他認為进行社会性蠱惑宣传，玩弄自由主义对教会而言是一种危險。他的左右手是大主教安东尼奥·薩莫萊。薩莫萊曾在梵蒂岡派在华盛顿的一个非正式的使节团中工作过許多年，是斯毕尔曼和麦卡錫的好朋友。塔基尼除担任国务卿助理一职外，尚在教皇厅的其他机构中担任职务。

在塔尼基领导之下有一个臭名远扬的“俄国事务委员会”，它筹划梵蒂冈的反苏活动。这个机关的历史是这样的。十月革命以后，教皇贝尼奇克脱十五世在罗马组织了一个东方学院，它的领导人是法国耶稣会徒米契尔·宾尼，以训练在苏联活动的天主教“传教士”。当时亡命国外的白匪的主要力量聚集在法国，梵蒂冈于是在他们之间募集拥护者。这项工作首先是由巴黎大主教的顾问宾尼担任的。东方学院其后改名为“俄罗斯学院”，既为现在著名的圣戴列赛学院，或直呼为“罗斯柯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其中“培养”梵蒂冈募集到的白匪份子，而现在那边在训练从各种国籍的“移民”中特别挑选出来的人。“罗斯柯姆”的学生学些什么样的“学科”呢？这一“神学校”的首脑耶稣会徒威脱在1949年直认不讳地对一家罗马报纸的编辑说，在“罗斯柯姆”中学生学习拳击、跳伞以及其他类似的课程。^①

1926年时，庇护十一世在东方教会主教会中设立了俄国事务部，其责任为：领导“罗斯柯姆”及其分校（当时在比利时的阿曼依·修耳·芒的贝尼奇克脱僧院中，和在波兰的亚尔倍汀的耶稣会神学院中设有分校），收集关于苏联的情报和在白匪亡命者之间进行天主教宣传。俄国事务部的活动，是在特别建立起来的或与之相配合的“传教士协会”的掩护下进行的。在美国的这种协会有纽约的“天主教东方福利会”，在法国有“东方僧团”，在瑞士有“天主教同盟”，在意大利有“基督教东方协会”。在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有这种组织。^②耶稣会徒米契尔·威廉士宣称，他们活动的经费来自“创造奇迹的地方”罗尔特和黎士育（法国）。^③

庇护十一世于1930年宣布发动反对苏联的“十字军”时，他

① 关于俄罗斯学院的活动可参阅汤迪：“耶稣会徒”，莫斯科，1965年，第305—306页。

② 马利奥·斐迪沙利：“宗座的政治（1918—1938）”，佛罗伦萨，1939年，第161—163页。

③ 米海尔·威廉士：“行动中的天主教会”，纽约，1934年，第154页。

是期望帝国主义强国很快就会武装干涉的,当时俄国事务部改组成为独立的委员会,它以耶稣会将军列道霍夫斯基为首。1935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改为彼得·阿茄柴讓主教(生于1895年,1946年时擢升为紅衣主教),他是阿尔明尼亚的反革命份子,尚在內战时期他就和英国干涉者在南高加索搭上关系。同年“俄国事务委员会”成为教会非常事务大主教会的一个部門,直接从属于国务卿。1955年时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塔基尼和阿茄柴讓以外,还有紅衣主教戴西朗,大主教彼得·喀其讓,大主教亚历山大·叶夫林諾夫(白匪,后来改宗天主教的),高僧基利尔·柯洛列夫斯基(白匪),耶稣会徒威脫以及其他等人。^①

教会日常事务管理局的前领导人柴伐尼·蒙梯尼被認為是塔基尼的竟敌。蒙梯尼是典型的貴族出身的高级教士、政客,他是“平民党”的一个有势力議員的儿子。蒙梯尼曾指导过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青年組織多年。蒙梯尼認為梵蒂岡如对工人問題予以相当注意的話,即从事社会性蠱惑宣传,是能在群众間保持它的影响的。他和天主教民主党的上层领导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兄弟路德維格就是該党的議員,“天主教行动”著名的活动家,“羅馬銀行”理事会的理事和一系列受梵蒂岡控制的股份公司的理事会理事。1954年时蒙梯尼被任命为米兰大主教。

“圣办公厅”主教会在教皇厅中按其意义來說是第二个政治性机构。它是天主教会的內政部,旧宗教审判厅,尚在教皇巴維尔三世时就采用現在的名称。“圣办公厅”是梵蒂岡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斗争的主要机关。它迫害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士和信徒。“圣办公厅”的首脑是教皇本人。組成主教會議的八个紅衣主教会是意大利人。

根据“圣办公厅”的正式規章,它领导着与教士的活动、与書

^① “俄国事务委员会”自1955年起以意大利文出版名为“俄国宗教公报”的月刊。“罗斯柯姆”則以法文出版“俄国新聞”通报。參閱“国际天主教通报”,第19期,巴黎,1956年。

籍和出版物的統制(由“圣办公厅”“禁書目录”处管理)、与反信仰和反对教会團結的“罪行”斗争(反异端和反分裂)有关的一切事务。梵蒂岡竭力使社会輿論不知悉自己的警察机关——“圣办公厅”——的活动,梵蒂岡依靠着这个机关使教士和修道士大軍服从它的意志。“圣办公厅”拥有广泛的遍及全世界的秘密情报网,其职责为監視僧侶和信徒的私人生活和政治情緒。

“禁書目录”处的工作是人所尽知的。“禁書目录”的印数不多,分发给教会当局,后者通过各种途径抵制被梵蒂岡“判罪”的書籍,和攻訐不称教会心意的作者。

被列入“禁書目录”的書籍有,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用說了,所有唯物論哲学家的書籍,文艺复兴时代人道主义者的作品,十八世紀启蒙家的著作,世界上最伟大的进步作家的書,以及所有为争取意大利的統一而斗争的意大利爱国作家們的作品。

最近以来,“圣办公厅”开始把为美国反动份子所不称心的欧洲作家的書籍列入“禁書目录”。例如,法国作家讓·保羅·薩特;他的夫人女作家茜蒙·倍戈尔;著名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亚尔倍托·莫拉維亞,美国政府曾拒絕发給他护照;庫西奧·馬拉柏尔德,他有一本小說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美占領軍当局在意大利的作威作福惡行,此外还有一些西欧文化界代表人物的作品也被列入目录之中。

教皇的第三个政治性机构是东方教会主教会,它負責梵蒂岡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近东、中东国家內进行反动活动(其中也包括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这个主教会的首长是教皇本人,而書記是前法軍上校紅衣主教叶夫根尼·戴西朗。戴西朗(生于1884年,1936年起为紅衣主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在法国駐中东的軍隊中服务,并且是該地区第二处(諜报处)的领导人之一。^①戴西朗是紅衣主教會議的首席牧师,礼仪

①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第182頁。

局的首长和教皇厅中一系列主教会和委员会的成员。

东方教会主教会的成员除了戴西朗而外，还有 18 个意大利的和外国的红衣主教，后者之中有阿茄柴讓、斯毕尔曼和塞姆哀·斯脫里契(芝加哥大主教)。这个主教会的顧問名单中可以見到大主教叶夫林諾夫和喀其讓，大主教凱萊，大主教斐立罗·卡代莱里翁(意大利军队中的总牧师)，耶稣会徒揚·霍达契克以及其他等人的名字。

“宣传信仰”主教会的活动也具有政治性質，它的組織遍設于亚非两洲以及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主教会领导着殖民地和附庸国中的传教士。根据 1946 年的資料，有 74 个大主教教区，297 个使徒付主教教区和 126 地方教区隶属于它。它拥有 211 所印刷所和出版 506 种杂志，以及每次印刷数达 141 万 8 千份的报纸。

在 1956 年时，这个主教会的首长是红衣主教彼得罗·富馬索尼·皮昂琪，他被称作为“紅色的”(即尚武的)教皇。^①他的付手是曾在中国工作过 15 年的红衣主教却尔索·康斯坦丁尼。^②康斯坦丁尼也在梵蒂岡駐华盛顿的非正方使节团中工作过。康斯坦丁尼的侄子朱里奥是羅馬著名的股票經紀人，“宣传信仰”主教会的金融投机活动是由他經手的。

“宣传信仰”主教会最高會議由 30 个红衣主教組成(其中的 14 个也是东方教会主教会的成员，包括以斯毕尔曼为首的四个美国红衣主教，以及戴西朗、阿茄柴讓、米加拉和卡拿里。

在談論羅馬教皇厅机构的时候，不能不提及梵蒂岡的間諜

① 在羅馬，人們說，有三个教皇管理着天主教会：“白色的教皇”——即真正的教皇，“黑色的教皇”——耶穌会的將軍，和“紅色的教皇”——“宣传信仰”主教会的首脑。

② 康斯坦丁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是意大利军队突击部队阿尔卑斯軍团“貝薩尔叶里”的总牧师。請注意红衣主教中有許多人是有軍事經驗的。

活动問題。

讓我們来看看，梵蒂岡的朋友們和天主教会的权威人士是如何談及这一問題的。美国总统杜魯門在1952年建議国会任命美国前諜报机关领导人麦克·克拉克將軍为駐梵蒂岡大使，他列举理由說明美国利用梵蒂岡所掌握的“珍貴情报”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岡对杜魯門总统如此不寻常的声明沒有表示任何抗議。这种保持緘默的态度，祇能認為梵蒂岡承認这一事实，即羅馬教皇厅确实掌握着美国政府感觉兴趣的資料。“宗座”的代表对梵蒂岡拥有分枝繁密的諜报机构一点，并不否認。美国天主教主教拉揚于1940年在“紐約时报”发表文章，列举理由証明美国和梵蒂岡建立外交关系对美国有利，他断言“梵蒂岡的諜报机关是世界上最好的”。拉揚主教驕傲地写道：“成千名有很好訓練的教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人員和外交人員，根据梵蒂岡的給予的任务，每个人在自己的地区內无間断地搜集有关社会輿論的資料。”^①英国天主教高級教士爱尔兰特·格兰亨在其所著的，得到教会当局贊同的“天主教和今日的世界”一書中，声称教皇必需有自己的情报机关，因为“梵蒂岡为了領導有方起見，要求經常掌握着从教会的地方机关汇集到中央的情报”^②。

湯麦士·摩根說得还要坦白，他与梵蒂岡的領導集团有联系，曾以美联社記者身份在梵蒂岡工作过18年。摩根在他所著的标题醒目的“監視哨”一書中（这本書曾得到教权派报纸的热烈欢迎），詳細地述叙已搜得的情报通过什么途径从全世界各地汇集到梵蒂岡去。“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他写道——昼夜不停地从全世界各个角落传给羅馬教皇，向他报告在他广袤的領地中，無論地方或中央，所发生的事件。传送来自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僧侶处或其他源泉的消息的綫路好象动脉和靜脈一

① “紐約时报”，1940年5月12日。

② 爱尔兰特·格兰亨：“天主教和今日的世界”，倫敦，1958年，第178頁。

样，它們多得不可胜数，組織得异常灵活，并且日益完善和包罗万象。教会力图干涉人类的全部活动。教会的主要組織，特别是它的輔助性血管，已經深入各处。”^① 摩根列举了一些梵蒂岡賴以传送秘密情报的途径。这首先是和全世界天主教僧侶联系着的修道士团和牧师协会。摩根繼續提到，高僧会和全世界各国中的教会当局保持着联系，每个主教必須定期地向它报告自己教区內的情况。东方教会主教会和“宣传信仰”主教会則搜集特别重要的情报。“在东方教会的指揮下，有着一个由修道士、修道尼、牧师和主教組成的大軍，他們注視着正教教会占优势的国家中的各种情况。”^②

至于說到“宣传信仰”主教会，那末“如果需要获得关于最偏僻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或宗教情况的情报，无论这地区是在热带或寒带，都应当到这个主教会来找”。^③

国务院通过梵蒂岡駐在 64 个国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代表，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宗座的外交人員們——摩根确信——沒有必要去打听軍事秘密，虽則这种情报他們也极易获得……教皇外交人員的任务在于获得对教会重要的情报。他懂得，尽快得到情报决不会有坏处。”^④

上面所援引的得到梵蒂岡信任的人士的供詞，已經足够說明羅馬教皇厅在另一方面的活动。

現在讓我們来認識一下領導梵蒂岡財政經濟活动的各个机构。

1955年美国現代工业管理方法研究院院长馬丁台尔应梵蒂

① 湯麦士·摩根：“監視哨”，第 108 頁。

② 同上，第 109 頁。

③ 同上，第 110 頁。

④ 同上，第 110—111 頁，关于梵蒂岡的諜报活动可參閱：阿·斯伐鮑达，阿·吐契考娃，烏·斯伐鮑达娃：“梵蒂岡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陰謀”，莫斯科，1950 年；烏·米納也夫：“必遭死亡者的秘密武器”，莫斯科，1962 年；烏·別良也夫，木·罗特尼茨基：“冒名頂替”，莫斯科，1954 年。

岡的邀請對教皇廳的各機構進行了考察。在熟悉了教皇廳的金融機關以後，他聲稱梵蒂岡擁有的金融機關“如此多種多樣和支分繁多，簡直象大英銀行一樣”^①。

前已指出，教皇廳中設有三個主要的領導梵蒂岡財政經濟活動的機構。這就是宗座特別行政局，宗教事務院和宗座財產管理局。這些機構的領導人之一為高僧亞爾倍托·德·齊阿里奧，他是梵蒂岡宮廷中最神秘的人物。德·齊阿里奧還領銜着使徒署。

在上述的機構之中，宗座特別行政局占着首要地位，“教廷年鑑”透露道，這機構是庇護十一世於1929年創設的，其任務為監督梵蒂岡根據拉特蘭條約從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處收到的一筆基金的使用情況，和執行“其他行政任務”^②。

梵蒂岡的財政部就在那塊謙虛的招牌之下活動着。

特別行政局的活動受到一個由三個紅衣主教組成的委員會的監督。貝爾納奇諾·諾茄拉侯爵從特別行政局成立時起直到1954年為止，一直是它的“委員”（實際上是財政部長，他在1954年時因過於年邁而退職養老）。他的助手們有前瑞士“瑞士銀行”經理亨利·馬叶爾杜西侯爵，和梵蒂岡“聖靈銀行”經理柴巴濟斯太·薩凱蒂侯爵，薩凱蒂侯爵是意大利最大的大地主之一（在拉齊奧省擁有2萬5千公頃的田產），並且還是教皇的“馬夫長”。他同時還是羅馬教權派聖彼得俱樂部的主席（黑色貴族的俱樂部），和耶穌會俗界組織“耶穌聖心會”的主席。除了上述諸人而外，有一些意大利的和瑞士的銀行家們以工作人員和代理人的身分在特別行政局中工作。

領導梵蒂岡財政多年的諾茄拉侯爵的个人身份是很典型的。諾茄拉和意大利最大的銀行“意大利商業銀行”有着密切關係，他從1925年起就是該行監察會的副主席。這家銀行和法國

① S·B·A, “梵蒂岡的財政”（“新生命”，羅馬，1956年2月12日）。

② “教廷年鑑”，梵蒂岡，1955年，第1016頁。

洛希尔財团有着密切的关系，洛希尔金融集团在最近 50 年来在法国代表着梵蒂岡的金融利益。諾茄拉和梵蒂岡的交往是这样开始的，当二十年代之初他担任“意大利商业銀行”土耳其分行的經理时，曾根据教皇庇护十一世的命令做了一笔买卖土耳其公債的投机交易使梵蒂岡賺了錢。銀行家的一个兄弟巴尔托洛密·諾茄拉很早以前就担任着梵蒂岡各博物館的总館长，而另一个兄弟是主教，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这个有进取精神的銀行家和庇护十一世亲近起来。同时，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也不止一次地利用諾茄拉的效劳。“他曾率領意大利代表团根据道威斯計划参加談判，并且是墨索里尼的私友”^①——德国經濟学家鮑曼关于諾茄拉写道。当庇护十一世于 1929 年設立特別行政局以后，即付托諾茄拉領銜該局。諾茄拉在新职位上最初需要解决的任务之一，就是利用庇护十一世从墨索里尼手中收到的众所周知的几十亿里拉，在美国为梵蒂岡安排財政准备金，或者如有些人所說的黄金貯备。諾茄拉把部份款項和貯藏在梵蒂岡地下室中的黄金，儲存到紐約的摩根的銀行中去。1936 年时，諾茄拉和茄列里齐伯爵一起伴随現今的教皇(当时为国务卿)到大西洋彼岸，他們和美国政府談判后，就梵蒂岡放在美国的基金的貯存条件問題达成了協議。美国政府保証不限制梵蒂岡使用这一基金的自由，同时給予各种特惠条件，其中包括以比卖给其他政府为低的价格把黄金卖给梵蒂岡。根据意大利資產阶级的杂志“今天”和美国“透視”杂志的报导，1952 年时梵蒂岡的货币和黄金貯备为 11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黄金貯备，美国为 250 亿美元。^② 根据同一資料，当时意大利的黄金貯备为 7 亿美元，法国——14 亿美元，而英国則为 50 亿美元。

① 鮑曼：“垄断資本的大西洋公約”，莫斯科，1953 年，第 200 頁。

② “透視”，1953 年 8 月 7 日；同时可參閱維克多·勒杜克：“人民共和党——进行反共和反法兰西陰謀的政党”（“共产党人杂志”，第 12 期，巴黎，1955 年，第 1531 頁）。

換言之，1952年時梵蒂岡的資本已大大超過意大利、法國和英國三國的黃金貯備總值。^①“透視”雜誌指出，梵蒂岡相當大的一部份基金是金塊，它們貯藏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保險庫中。

梵蒂岡的特別行政局和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有着聯繫。在美元地區有摩根的銀行為它服務，在英鎊地區有“漢布羅斯銀行”（倫敦），在歐洲有“瑞士銀行”（蘇黎世），在法國、中東和近東有法國洛希爾財團控制的銀行。

特別行政局投資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業和各種利潤高的企業中的金額，以數十億美元計。甚至於要約略地估計一下也是異常困難的，因為梵蒂岡對自己的金融業務極端保密，它照例是通過化名的人和世俗的組織進行的，後者與教會間的關係是謹密地隱蔽着的。

然而，甚至於根據偶爾在報紙上透露出來的關於梵蒂岡金融業務的少量資料，就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雖然遠非完備的，關於“聖父”的金融帝國巨大規模的概念。

列舉有諾茄拉在其經理部門中代表梵蒂岡特別行政局利益的一些股份公司、托辣斯和銀行的一張清單，就是屬於這類資料的。德國經濟學者鮑曼編了下列一份表，其中列舉這些組織的名稱和諾茄拉所擔任的職務。

諾茄拉在意大利是“費杜却利亞動產與不動產公司”和“通用公用事業和農業不動產公司”（不動產公司）監事會的主席。這兩個公司經營不動產的買賣、抵押貸款、建築貸款、田產投機業務。根據羅吉爾·加羅提提供的資料，“不動產公司”的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最初年代時為1億7百萬里拉，而其準備金為2,140萬里拉。“不動產公司”的主要股東為：

1. 梵蒂岡特別行政局	54,605,000 里拉
-------------	---------------

① 這些資料言過其實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資產階級刊物也承認向勞動者宣傳要安於貧窮的梵蒂岡，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家之一。

2. 宗教事务院	204,500 里拉
3. “宣传信仰”主教会	132,000 里拉
4. “通用保險公司”	6,608,000 里拉
5. “不幸事故保險公司”	3,094,000 里拉
(无記名股票有限公司)	

最后的两个公司也是隶属于梵蒂岡的。“通用保險公司”由特別行政局的代理人契路蒂领导，而諾茄拉則出席該公司的監事會。加羅提指出，“不幸事故保險公司”的經理部好象是梵蒂岡的家庭會議一樣，它的主席是諾茄拉，副主席是工程師古阿里齊，成員有路易澤·蒙梯尼(米蘭大主教蒙梯尼的兄弟)，茄列亞齊伯爵，麥爾康東尼奧·巴契里大公和薩凱蒂侯爵。^①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不動產公司”在埃塞俄比亞和其他的意大利殖民地內設有分公司。戰爭時期內，它的分公司曾設到阿爾巴尼亞的地拉那和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由此可見，梵蒂岡的資本象豺狼般地追隨着法西斯侵略者的足跡前進。

我們再列舉一些諾茄拉在意大利擔任的職務。他是下面兩個不動產抵押放款銀行監事會的監事——羅馬的“意大利農業銀行”和羅馬的“聖靈銀行”；下列一些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的監事：“蒙特卡提尼公司”(化學工業)，米蘭；“意大利南方鐵路公司”，佛羅倫薩；“羅馬不動產公司”，羅馬；“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卡法羅電氣與電化學公司”；“亞得里亞電力公司”，威尼斯。

諾茄拉還是一些法國銀行監事會的監事：“法意銀行”，以南美為投資對象；“私有不動產公司”，巴黎——上述兩家企業部和法國洛希爾財團有聯繫。

在瑞士諾茄拉是下列組織監事會的監事：“瑞意銀行”，羅茄諾；“SAGEP”(不動產經售處)，伯爾尼；和其他五個設在洛桑的不動產公司。諾茄拉還是蒙的卡羅的“蒙的卡羅俱樂部”監事會

① 羅吉爾·加羅提：“教會、共產主義與基督徒”，第347頁。

的監事。^①

关于梵蒂岡在意大利的投資情形更为具体的資料，可参考1948年在羅馬出版的“意大利金融資本組織”这一参考手冊(資本數以意大利战前的里拉計算)。^②

“亚德里亚电力公司”，威尼斯；資本額45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75亿里拉)。梵蒂岡掌握有价值为7千5百万里拉的股票。諾茹拉侯爵为該公司监事会的監事。

“安济加·瑪尔察圣水公司”，(自来水)，羅馬；資本額——1亿6千5百万里拉，梵蒂岡掌握有价值为820万里拉的股票。埃里哥·茹列亚齐伯爵出席該公司的行政會議。經理为勃柳敏斯泰尔伯爵，他是梵蒂岡特別行政局不露真正身份的在外工作人員之一。

“国家电力事业开发公司”，威尼斯；資本——8亿4千万里拉，梵蒂岡掌握有价值为2,600万里拉的股票。

“意大利南方鐵路公司”，佛罗倫薩；資本額——42亿9千万里拉，梵蒂岡掌握的股票未詳，然而可以推測，梵蒂岡已完全控制这家公司。該公司监事会副主席是朱里奧·巴契里，監事有貝尔納奇諾·諾茹拉和其他梵蒂岡的代理人。这家公司还控制着資本總額达63亿5千万里拉的31家股份有限公司。

“羅馬不动产公司”，羅馬；資本額——34,152.5万里拉，梵蒂岡名下3,749.9万里拉。这家公司也完全受特別行政局的控制。貝尔納奇諾·諾茹拉为該公司行政会的成員。

“西西里通用电力公司”，巴勒摩；資本額——12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732万里拉。

① 鮑曼：“壟斷資本的北大西洋公約”，第200—201頁；同时可參閱高尔金：“梵蒂岡有利可图的事业”（“新时代”，1949年，第25期，11—14頁）。

② RADAR，“意大利金融資本組織”，羅馬，1948年，第9、15、28、34、56、61、64、67、68、72、107、114、168、179、182、195、204、223、227、239、274、301、302、356頁。

“中央”，(电话电报企业向它贷款)，里窝那；資本額——15 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46 亿 5 千 3 百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550 万里拉(法兰契斯哥·巴契里在銀行的行政会上代表梵蒂岡的利益)。

“羅馬电力公司”，羅馬；資本額——10 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260 万里拉。行政会主席为克里門蒂·阿里杜勃兰迪尼大公，他和梵蒂岡关系密切；經理部成員有埃里哥·茄列亚齐伯爵。

“謝里特·瓦利达尔諾电力公司”，佛罗倫薩；資本額——10 亿 5 千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1 亿里拉。

“泰蒂电话公司”，佛罗倫薩，資本額 6 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7 百万里拉。亚尔倍托·西奥图里侯爵在其行政会上代表梵蒂岡的利益。

“爱迪生”(世界最大的电气托辣斯之一)，米兰；資本額 100 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225 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份——7 千 2 百万里拉，米兰大主教舒斯脱个人就拥有价值达 1 千万里拉的股票。

“南方海岸电力事业开展公司”，薩窩那；資本額——4 千 5 百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31 万 5 千里拉。

“都灵电话公司”，都灵；資本額——44 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77 亿 8 百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450 万里拉。

“披蒙蒂水力发电公司”，都灵；資本額——100 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140 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3 千 8 百万里拉。

“維契奧拉公司”(电力)，米兰；資本額——19 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46 万里拉。

“金屬加工金融公司”(冶金)，羅馬；資本額——72 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200 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

2,420 万里拉。在行政会上代表梵蒂冈的为法朗哥·拉梯·台齐奥伯爵，他是庇护十一世的侄子和特别行政局的代理人。

“达尔明尼公司”(制管)，米兰；资本额——7 亿 5 千万里拉，梵蒂冈的股份不详。行政会主席为拉梯·台齐奥伯爵。

“达尔明尼—英诺森蒂公司”(冶金)，米兰；资本额——1 百万里拉。行政会成员之一为拉梯·台齐奥伯爵。

“工业企业投资公司”(冶金)，米兰；资本额——3 千万里拉，梵蒂冈的股份不详。拉梯·台齐奥伯爵在该公司行政会代表梵蒂冈。

“铁尔尼公司”(冶金)，罗马；资本额为 52 亿 5 千万里拉，梵蒂冈名下的股票——1,820 万里拉。

“萨宾那航运公司”，洛维列；资本额——1 百万里拉。行政会主席为拉梯·台齐奥伯爵。

“金属贸易公司”(销售金属零件)，罗马；资本额——1 亿里拉，梵蒂冈的股份不详。拉梯·台齐奥伯爵又是这个公司行政会的成员。

“法尔克冶金工厂”，米兰；资本额——5 亿里拉(发售股票的控制数字——22 亿 5 千 6 百万里拉)。它是意大利最大的冶金托辣斯之一，与梵蒂冈有着联系。该厂资本的 73.12% 归法尔克家属所有。该厂主要股东的一个儿子勃鲁诺·法尔克是耶稣会徒，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法尔克”工厂的股东。这个托辣斯的首领埃恩里哥·法尔克是天主教民主党的参议员，法尔克家属经常捐大宗款项给天主教民主党。梵蒂冈投资在“法尔克”托辣斯中的正式数字为 4 百万里拉。

“蒙的尼齐奥工厂”(冶金)，都灵；资本额——5 千 6 百万里拉，梵蒂冈名下的股票——50 万里拉。

“菲亚特汽车工厂”，都灵；资本额——40 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100 亿里拉)，梵蒂冈正式的股份——1 千 5 百万里拉。

“蒙蒂鮑尼公司”(采錫、鋅、水銀和銀),都灵;資本額——6亿,梵蒂岡名下的股票——2250万里拉。

“意大利煤气公司”(煤气的开采和利用),都灵;資本額——29亿4千6百万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37亿2千万里拉),梵蒂岡正式的股份——7亿1百万里拉。然而这个数字尚不能正确地說明梵蒂岡与公司間的关系。“意大利煤汽公司”的股票分散在数百个股东的手中,其中以梵蒂岡为最大,因此梵蒂岡有可能控制整个企业。庇护十二世的哥哥法兰契斯哥·巴契里在許多年間曾担任“意大利煤气公司”的付經理一职。現在有教皇的侄子馬尔康东尼奥·巴契里和朱里奧·巴契里,在公司的领导机关中代表梵蒂岡的利益。三十年代时,“羅馬煤气公司”并入“意大利煤气公司”,前者的全部股票是归梵蒂岡所有的。拉梯·台齐奥伯爵曾在“羅馬煤气公司”中代表梵蒂岡。

“布尔諾造紙工厂”,凡尔佐奥洛;資本額——6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8亿6千5百万里拉)。梵蒂岡的股份不詳。梵蒂岡派諾茄拉侯爵在监事会中代表其利益。

“斯尼亚—維斯科薩公司”(意大利最大的制造人造纖維的托辣斯,和美国的杜邦公司有联系),米兰;資本額——42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56亿2百万里拉),梵蒂岡正式的股份——1千1百万里拉。然而梵蒂岡通过倫敦的汉布罗斯銀行和瑞士洛卡諾的“信貸銀行”,控制着值4亿里拉的增資股票。公司的經理为鄂大索教授,他是“羅馬銀行”理事会的理事,和“天主教行动”机关报“每日日报”行政会的成員。

上面列举的梵蒂岡为正式股东的各股份公司、托辣斯和垄断資本的資本总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等于680亿里拉,而这些公司股票的最高控制发售量达1000亿里拉。已确定的梵蒂岡的股份(祇能部份地反映出梵蒂岡在这些公司中的投資数字),已超过9亿里拉(根据战后的行情为450亿里拉)。梵蒂岡資本占优势的一些公司的資本总額等于77亿4千2百万里

拉,这些公司股票的最高控制发售量达100亿7千万里拉(根据战后的行情则为3,871亿里拉和5035里拉)。

以下援引一些关于意大利其他企业和公司的资料,众所周知,梵蒂岡资本或在这些企业之间已占优势,或者对之表示兴趣。

“意大利电报公司”是一家资本额为7亿里拉的国际电报公司。这家公司的领导者为梵蒂岡的亲信人士——亚尔信托·西奥杜里侯爵,卡尔洛·阿里杜勃兰迪尼大公和其他等人。“东南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付经理为朱里奥·巴契里。“阿尼也涅化学公司”,经理为巴蒂斯戴利。“翁勃拉化学品公司”,经理为鄂大索教授。“意大利橡胶工业金融公司”,经理为薩凱蒂侯爵。“吉列利亚·拜黎兹公司”——出售意大利教会用蜡烛的垄断企业,经理为法兰契斯哥·拜黎兹;他又是羅馬市政厅天主教民主党的委员和羅馬歌剧院的经理,三个儿子都是耶穌会徒。“不记名股票自来水公司”,资本额——3亿里拉;参加该公司理事会的有諾茄拉、薩凱蒂、鮑尔格澤大公和曾在天主教民主党许多内阁中担任工业部长的彼德罗·康貝利。

梵蒂岡所控制的一些保险公司的资本以数十亿里拉计算。除了上面提到过的“通用保险公司”和“不幸事故保险公司”而外,还应该加上“生命保险公司”、“意外事故保险公司”、“泰勒保险公司”、“雪柯里太斯·爱斯泼利亚联合保险公司”、“国家保险公司”(经理为安尼巴列·吉拉尔杜尼),以及“天主教保险公司”(味罗那)。^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梵蒂岡在上述大部份保险公司中的资本大为增加。梵蒂岡还攫到了其他一些企业的股票。特别行政局在法西斯政权崩溃后,以低廉的价格从许多法西斯首魁的

^① 资料摘自——阿尔杜·納托列:“金融资本与梵蒂岡”,“复兴”,第2期,1948年2月,羅馬;阿里奇洛·东迪:“耶穌会徒的秘密权力”,羅馬,1952年,第102—103頁;同时参阅雅罗斯拉夫·加兰:“东方曙光已白”,第282—337頁。

手中买得股票，因为法西斯匪徒們害怕人民的审判，急于将有价証券换取現金逃到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中去。

美国金融集团的眷顧，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于战后梵蒂岡投資額的增漲。华尔街的銀行家們为了事先取得梵蒂岡对其奴役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政策的支持，供給梵蒂岡特別行政局以貶价的外汇，以优惠的价格将他們攫得的各种企业的股票讓与梵蒂岡，引誘它参加各种买卖和投机。結果梵蒂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意大利最发达工业的業主：紡織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①

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梵蒂岡是以小伙計角色参加各种股份有限公司、托辣斯和垄断企业的話，那么在战后时期，在某一工商业領域中高視瀾步睥睨一切的大公司，其資本或全部屬於梵蒂岡所有，或者受它的控制。特別是建筑业(建筑房屋、旅館以及其他等等)，梵蒂岡自教皇里夫十三世时代起就积极投資于建筑业。

梵蒂岡在建筑业中拥有象“吉泼尔杜披里公司”这样資本雄厚的企业。“吉泼尔杜披里公司”的資本額达12亿里拉，它控制着10个女兒企业。它的行政会有下列梵蒂岡的金融家們参加：諾茄拉，茄列亚齐，馬尔康东尼奥·巴契里；薩凱蒂和古阿里奇工程师。古阿里奇同时又領導着“不动产公司”，該公司是一个控制着意大利許多城市中数十个企业和商号的大托辣斯，其資本額达330亿里拉。^②

①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第333頁。

② 下列为“不动产公司”控制的一些公司：“蒙梯·瑪丽奧西部地区公司”，“新佛拉斯卡第公司”，“西弗摩尔公司”，“康雪里阿齐昂尼公司”，“米兰人民金融公司”，“大旅館建筑公司”(热那亚)，“庇桑不动产公司”，“羅馬人民建筑金融公司”，“維拉·維利建筑公司”(米兰)，“羅馬地区建筑公司”，“宾柯宫廷建筑公司”(热那亚)，“羅馬卡尔台里尼不动产公司”，“羅馬宾士黎基奧建筑公司”，“复兴投資公司”，“民用农业不动产公司”(米兰)，“大旅館管理公司”(意大利大旅館托辣斯)。

根据意大利报刊的资料，梵蒂冈在意大利的投资额，于1956年时为9,000亿里拉。^①

特别行政局通过以高僧阿尔宾诺·加立蒂为首的天主教中心供给电影业以资金，摄制宗教题材的电影。梵蒂冈也供给“奥尔皮斯电影公司”和“圣保罗电影公司”以资金，庇护十二世的侄子们和意大利前内阁总理加斯贝利的女婿是这两家电影公司的主要股东。

梵蒂冈拥有广泛的自己的影院网以上映自己的新片。1938年时，梵蒂冈在意大利拥有450所电影院，1948年——2,500所，1951年时，意大利全国11,500所电影院中有4千所是属于梵蒂冈的；1952年时，某些省份中新登记的属于教会的影院，比属于俗间的为多，^②而在1955年时，根据“意大利通讯社”的报导，梵蒂冈已拥有1万5千所影院，其座位总数达6百万；几乎所有农村地区内通常采用的窄银幕放映设备都是梵蒂冈所有的。

由于梵蒂冈与统治意大利的教权派政党有着联系，并得到它们的支持，梵蒂冈广泛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的金融和企业的利益服务。梵蒂冈的亲信人士和意大利垄断资本的代表们，并排地坐在意大利所有最重要的经济机关里。例如，管理分配政府定单给各工业企业的内阁复兴委员会中，就有下列托辣斯的代表：“爱迪生”、“菲亚特”和“法尔克”——梵蒂冈是它们的股东；以及“天主教行动”的首领之一和特别行政局工作人员的费拉利·阿卡迪。在政府的工业拨款委员会（它分配所谓“美援”基金）中，有着下列企业的代表：“维尼亚—维斯柯萨公司”，“法尔克”，“菲亚特”，“庞勃里尼—巴洛蒂”以及特别行政局的工作人员台齐奥伯爵和格伐尔尼里。政府的中央工业委员会的情景也是如此。意大利经济学者马利奥·列纳在引证这些事实时指出，在战后的意大利大商人同时代表着梵蒂冈、教权派政党和大业主的利

① S·B·A·，*梵蒂冈的财政*（“新生命”，1956年2月12日）。

② “世界报”，米兰，1953年11月10日。

益是极为典型的。^①这一事实是饶有兴趣的，就是在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会的领导机关中(解决股份有限公司与政府之间税收方面争端的机构)，又有这位梵蒂冈金融业真正的费加罗^②——诺茄拉侯爵和意大利垄断资本的代表并肩地坐在一起。^③

梵蒂冈除了在意大利投资而外，它还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许多附庸国和殖民地国家中投资。上面已经提到过，诺茄拉是法国、瑞士和卢森堡的一些银行和企业经理部的成员。梵蒂冈特别行政局的保险柜中尚藏有下列外国企业的股票和有价证券：亚尔马顿水银公司(西班牙)，“电业银行”(瑞士)，“多伦多国际电力公司”(加拿大)，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车、自来水、煤气和电力企业，“联合水果公司”(美国)，“大西洋轮船公司”(西班牙)，“阿拉伯—美国油公司”(“美孚”油公司中东的分公司)；梵蒂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美国大使梅隆·泰勒从美国政府手中得到这公司的股票的，其交换品是拿破仑三世的妻子赠给庇护九世的苏彝士运河的股票)，“辛克萊石油公司”(美国)，“安那康达铜矿公司”(智利)，“法国石油公司”，“华比银行总行”(西欧最大银行之一)，“老山锌矿开采和冶炼公司”(比利时)。比利时工商界巨子艾德蒙·卡尔登·维亚尔侯爵在最后两个企业中代表梵蒂冈的利益。^④梵蒂冈在西德的金融利益，也 与大银行和大工业康采恩的利益混在一起难解难分。梵蒂冈与这些集团间的中间人是红衣主教弗林格斯的堂兄、阿登纳女儿的公公——银行家威廉·维尔汉。^⑤法国最大纺织业托辣斯

① 馬利奧·列納：“天主教民主党政府为大资本服务”(“复兴”，第三期，1953年3月，罗马)。同时可参阅阿尼西莫夫：“现代意大利的主人”(“真理报”，1955年3月8日)。

② 费加罗为露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主角，意为忙人。——译者

③ 馬利奧·列納：“意大利经济侵略中的教会僧侣”(“复兴”，第五期，1953年5月，罗马)。

④ 鮑曼：“垄断资本的大西洋公约”，第163, 177—178页。

⑤ 鮑曼：“一小撮西德垄断资本家”，莫斯科，1954年，第39—43, 169页。

“裘·諾尔紡織公司”的百分之七十股票屬於特別行政局所有。梵蒂岡在多米尼亞共和國、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和哥斯達黎加共和國中擁有植物園(怪不得朱里奧·巴黎里是這個國家駐梵蒂岡的大使)。梵蒂岡擁有法國鐵路的股票，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危地馬拉、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和土耳其發行的國家有價證券。它在加拿大有巨額投資。梵蒂岡的商船隊在1955年年底時已有遠洋航輪20艘，由加拿大的銀行在與梵蒂岡特別行政局平等基礎上提供資金。

梵蒂岡另一個進行廣泛金融活動的機構是宗教事務院，它起着天主教會中央銀行的作用。“宗座年鑑”謙虛地指出，宗教事務院的任務為“保管和指導用於宗教事業的資金”。宗教事務院是另一個梵蒂岡機構的繼承者——宗教事務管理局，後者是教皇里夫十三世於1887年創立的，在特別行政局未誕生以前起着梵蒂岡國庫的作用。特別行政局成立以後，國庫的職司移交給它，而宗教事務管理局轉而担起銀行的職務。宗教事務管理局在三十年代時其作用大為提高，因為當時意大利最大的銀行，包括梵蒂岡所控制的銀行在內，均處於破產的邊緣，危危欲墮(這些銀行的大部分股票被法西斯政府以比市價為高的價格購進)。梵蒂岡的兩家大銀行“聖靈銀行”和“羅馬銀行”亦被政府的財政機構“工業復興局”所控制。“羅馬銀行”和“聖靈銀行”轉入政府手中一事，並不意味着梵蒂岡失去了對這兩家銀行的影響，梵蒂岡的亲信人士至今仍在其中占據着領導職位。然而這兩家銀行的功能則在很大程度上轉與宗教事務管理局，管理局當時得到了一筆因法西斯政府購買上述兩銀行股票而積起的資本。1942年時，即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方興未艾的時候，根據教皇庇護十二世的指示宗教事務管理局的編制大為擴大，並改名為宗教事務院。

宗教事務院的工作受一個由5個紅衣主教組成的委員會的監督。宗教事務院首席領導人為紅衣主教克萊莫里斯(數年前

已死去),他是法西斯羅馬總督菲立浦·克萊莫里斯的兄弟。希特勒的銀行家沙赫特自1952年起是宗教事務院的顧問,他經常訪問梵蒂岡。

宗教事務院的總辦事處設在梵蒂岡,它不受意大利財政機關的管理。許多意大利的資本家、外匯投機家和其他商人利用這一點,向意大利財政機關隱瞞自己的收入,把資本變成活期存款放在宗教事務院中,並通過它進行交易。因為放在宗教事務院的活期存款可以不受意大利現行外匯條例的限制。任何一個資本家都可以在宗教事務院開立帳戶,祇要他保證在死後把一定比例的自己資本贈與宗教事務院,或者立即捐出一定數目的錢,數目的大小根據存款人的經濟情況而定。存款人應該立書面聲明,聲明他對宗教事務院所承擔的義務不得在遺囑中予以改變,或者被其後自己的任何決定所改變。存款人的遺產繼承人與宗教事務院的官司,無論在意大利或者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結局總是有利於後者的,即有利於梵蒂岡的。

宗教事務院的主要任務為確定和經理資本受梵蒂岡控制的意大利信貸銀行的業務。意大利的大多數這些機構聯合成為“中央信託公司”一個集團,其中有“維尼多省天主教銀行”(威尼斯),其資本額為2億1千萬里拉,準備金為2億7千7百50萬里拉,“聖杰米揚諾與聖普洛斯彼羅銀行”(摩登納),“威尼斯銀行家信託銀行”(威尼斯),“不動產金融公司”(維欽察),“羅馬奧洛信託公司”(波倫亞),其資本和準備金為5億2千8百萬里拉,行政資本為310億里拉。^①

同時這些銀行也控制著一系列其他企業和供給它們資金。

米蘭的“安勃洛齊亞諾銀行”也是宗教事務院的分支機構,其資本額為10億里拉,由台齊奧伯爵領導。這家銀行的部份股

^① 羅吉爾·加羅提:“教會,共產主義與基督徒”,第349頁;同時可參閱“學習”,第1期,1955年1月,羅馬,第81頁。

票在耶穌會徒手中。下列一些銀行均在某種程度上從屬於宗教事務局：“斯加里蒂銀行”，“烏格·那托利銀行”，“公用事業企業信貸銀行”，“社會事業聯合信貸銀行”（最後兩家銀行由梵蒂岡親信人士安尼巴列·吉拉爾杜尼負責），“那伐拉人民銀行”，以及1956年耶穌會創辦的以銀行家卡爾洛·巴爾迪尼為首的“社會倡議金融公司”（米蘭）。^①

在宗教事務局的監督之下有130家以上的儲蓄銀行，聯合在“聖保羅銀行”的周圍，它的資本額在1955年時為339002.6萬里拉，而存款為1110億里拉。^②

宗教事務局通過自己的信貸機構控制着下列的不動產抵押銀行（主要是省銀行）：“援助”公司（都靈），“阿戴新納不動產公司”（味羅那），“那瓦列齊不動產公司”（諾瓦拉），“亞得里亞納不動產公司”（米蘭），“不動產聯合公司”（那不勒斯），“愛米利亞不動產公司”（熱那亞），“里德桑那不動產公司”以及其他。

宗教事務局與許多梵蒂岡在某種程度上對其資本表示興趣的外國銀行和信貸公司有着密切關係。例如，下面的一些企業就是其中的一部份：在法國有“巴黎荷蘭銀行”（不久以前該銀行的領導人還是披埃爾·戴高樂，戴高樂將軍的兄弟），這家銀行在所有的法屬殖民地以及比利時和荷蘭都設有分行；“國家票據貼現所”（巴黎），它被“聖心”宗教協會所操縱；“通用工商信貸銀行”（巴黎）；“美西銀行”和“烏爾吉霍銀行”（西班牙），它們在拉丁美洲設有分行；“烏里脫拉馬利諾銀行”（里斯本），它在葡萄牙殖民地擁有礦山租借權和種植園，包括在莫三鼻給和安哥拉；柴尼尼銀行，即“美意銀行”（美國舊金山，它在拉丁美洲和歐洲設有分行），以及其他。宗教事務局和沙赫特在杜塞爾多夫的銀行也有着密切的關係。

梵蒂岡的資本主義活動是受到天主教會最高的法律——教

① “天主教文明”，羅馬，1956年6月2日。

② “觀念”，第12期，羅馬，1955年12月。

会法典所奉为神圣的。

教会法典第 1495 条宣称：“天主教会和教皇有权自行酌定和不受世俗当局的拘束，取得、保存和使用世间的财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在这一条，或者在其他的条文之中，“世间的财富”一词无明确规定，也不受任何限制。第 1496 条规定：“天主教会（意指整个教会，也指教会的个别环节和代表人物——作者）有权不受世俗当局的拘束，要求信徒捐钱以供教会开支和供养僧侣，以及用之于教会固有的其他目的上”。“其他目的”一词在法典上既无解释，也无限制。第 1499 条的规定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声称教会有权“以任何自然法和民法所规定的公正的手段取得世间的财富，如同其他人根据这些法则取得世间的财富一样”。^① 甚至于未得真传的人一读第 1499 条内容以后就会立刻懂得，教会为自己预先保留的不是以“公正的手段”取得财富的权利，而是为自己保留以“其他人”，即所有的资本家，利用的手段以取得财富的权利。因此，梵蒂冈将自己能拥有资本，能参加资本主义制度中以剥削劳动者为利润来源的金融投机事业，以及参加殖民地掠夺的这种“权利”奉为宗教了。

教会法典不但不禁止寺院，甚至不禁止“托钵僧”从事金融事业，并且还特别准许他们对信徒们在遗嘱中规定捐献给寺院的钱的用途可自行酌定——即肥私囊，而不必按照立遗嘱人的意图（用作宗教礼拜，慈善事业等等）。祇要得到上级教会的裁可就行（第 151—533 条）。^②

不但如此，根据一张教皇厅命令所有寺院（修道院和尼院）毫无例外地都得按期填写的表格（第 378—181 号，1948 年），我们 know 梵蒂冈还责成修道院院长要使原来的资本生利，和采用“别人在利用的手段”以攫取各种财物。这从表格的下列数部份的内容上可以极明显地看出：

① “宗教法典大全与补充教规”，马德里，1951 年，第 562—563 页。

② “宗教法典大全与补充教规”，第 213—214 页。

經濟制度部份

第 38 节：甲) 寺院在报表年度內得到了那些不动产和財物，价格多少；乙) 取得的方式：贈送的还是通过其他() 方式得来的，无偿的还是直接买来的；为最后情形时，則注明是用現款購进的还是除帳得来的。

第 39 节：从民法观点来看，所得的财产和財物是如何登記的，以及用誰的名字() 登記的。所立文据是否可靠() (这一节的注介說明，在訂立文据以前应该征詢法律专家的意見和上級天主教的意見——作者)。

第 40 节：这些特別費用是如何支付的，从寺院的一般收入項下支付的，还是从非一般項下支付的(前者指捐獻、饋贈和为各种宗教礼拜而募集的錢，而后者則指不动产和各种投資所得的錢，投資是以假戶名出面的——作者)。

金融投資部份(1)

第 53 节：在报表年度內是否曾以寺院有权处理的基金，作过合法的()、可靠的和有利的投資。

表格的第 56 节命令寺院报告因遗产或捐獻所得，总值多少。^①

这些章节的內容不喻自明，不需要作注释。

現在讓我們看看宗座财产管理局做些什么事。对天主教会在意大利的不动产和屬于梵蒂岡的在国外的不动产的管理，在其职权范围之内。

宗座财产管理局的活动受一个由三个紅衣主教組成的委员会的監督。数年以前，管理局最后一任的领导高僧朱里奧·格維台蒂因經常盜用公款而被撤职后，他的职务暂时由教皇的侄

^① 上述表格摘自梵蒂岡官方刊物“寺院僧侶的新教規”，羅馬，1950年，第245—246頁。

子卡尔洛·巴契里代理，卡尔洛是该机关的首席法律顧問。

除了宮庭、古城堡、寺院、教会建筑物和各种屬於教会的房屋而外，宗座財產局經營着教会在意大利的农业田地。必須指出，梵蒂岡一方面拥有巨額資本和經營資本主义企业，它同时是意大利最大的地主。根据意大利国家农业經濟局 1946 年的資料，全国有 464,800 公頃土地，或全部可耕地的 8.2% 屬於梵蒂岡所有。教会的田地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最富饒的地区。例如，假如在加拉勃利亚（意大利南部）每郡之中平均有 60 公頃的田地為梵蒂岡所有，則在翁勃利亚（意大利中部）為 370.3 公頃，在托斯克為 201.1 公頃。按照 1948 年的市价，梵蒂岡田产总值超过 3,500 亿里拉。^① 以上所援引的資料还不足以全部說明教会在意大利究竟有多少田地，因为有数十万公頃屬於梵蒂岡的田地不會計算在內，这些田地化在受梵蒂岡控制的假戶名和各色“慈善”机关的戶名之下。与比同时，数十万农民則失去了耕地。

信徒們、各种商人和政客的遺產和捐獻，使梵蒂岡不动产的总数不断地增加。例如，前美国駐梵蒂岡大使泰勒曾把自己在佛罗倫薩的一所价值 50 万美元的別墅送給了教皇。

梵蒂岡除了上述各項收入来源而外，尚有其他的收入。

各种捐獻、为传教活动而募集的捐款以及“圣彼得一枚捐”等，每年巨額地进入梵蒂岡的國庫。这些收入的极大部份在很早以前就是来自美国的。例如，“宣传信仰”主教会在 1924 年从美国收到的錢为 680,483 美元，在 1927 年时为 1,126,807 美元，而法国在同一时期交給梵蒂岡的錢仅为上述款項的五分之一。^②

梵蒂岡的出版事业也为它带来了不少好处。根据教会法典，信徒們祇准使用教皇厅設在羅馬的官方出版社印刷的祈祷書和礼拜文。于是梵蒂岡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印刷教会書籍，在这

① 魏西奧·泰勃列脫：“意大利僧侶的田产”（“复兴”，第 5 期，羅馬，1953 年 5 月）。

② 卢干：“美国的天主教”，巴黎，1950 年，第 65 頁。

个领域内不受到任何竞争。

梵蒂冈效法列支敦士登、安道耳和圣马力诺这些袖珍国的榜样发行邮票出售给集邮家，从而博得巨大的利润。梵蒂冈每年发行数百套邮票，上面印着“圣者”、“创造奇迹者”、教皇以及类似题材的图画。仅售邮票一项的收入就能够抵销教皇国全部行政开支，而且还有余。

如同在中世纪时代一样，梵蒂冈现在继续利用信徒的宗教感情，从中剥削他们，出售赎罪，和圣者的遗物，为信徒举行免罪仪式和制造奇迹，宣布“圣年”和尊崇“圣者”，以发给离婚准许状作买卖等等。

制造“圣者”仍旧是梵蒂冈有利可图的一宗事业。天主教会创立至今宣布了约 2 万人为“圣者”。十六世纪起，当为“圣者”们立了正式的清册后，至 1954 年时总计有 4394 人被奉为“圣者”。此外教会宣布了约 20 万人为“德僧”。教皇们在近数十年来特别热心地制造“圣者”和“德僧”。庇护十一世在执政的 17 年期间宣布了 34 人为“圣者”和 496 人为“德僧”，而庇护十二世每年平均宣布 5 个“圣者”和 40 个“德僧”。教会法典要求每一个作为“德僧”的候选人至少自己要有二件“被证实”的奇迹；对于作为“圣者”的候选人则要求有四件奇迹。^①除了奇迹而外，还要求证明候选人的基督德行已达到“壮烈的程度”。大典局负责审查这些“证据”，它审查每一个候选人的宗卷。然而首先被审查的不是候选人的奇迹，而是他的政治面目。

制造“圣者”的手续被称为尊崇式，而制造“德僧”的手续则称为加福式。参加礼式的除了有以“圣者”与“德僧”厅主任为首的大典局官员外，这位主任通常被人称为“魔鬼的检察官”，似乎因他对候选人的证据审查严格与苛刻而得此绰号，还有代表推举“圣者”和“德僧”候选人的宗教组织的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们

^① “德僧”只有地方意义；他们在本教区或本寺院中被人尊崇。“圣者”则到处受到天主教会的尊崇。

被称作为“圣者的律师”。他們的职责是使“魔鬼的律师”相信，“圣者”的候选人确实具有教会法典所规定的标准。提名“圣者”候选人的宗教组织在物质上和政治上对这件事均极为关心。因为宣布新的“圣者”可以提高信徒们的宗教情绪，而信徒们纷纷到新的“圣地”去祈祷又是和教会收入的增加相联系的。

这就是最成功的“圣者的律师”为什么能从自己的委托人手中得到神话般的律师公费的原因，因为候选人的被列为“圣者”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圣者的律师”的才干和长袖善舞。因此期待奇迹是用不着的。因此希望自己的候选人得被奉为“圣者”的寺院和教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不吝吝律师公费。

前述的尊崇圣者的手续，是十八世纪时教皇克雷奇克脱十四世（1740—1758）在启蒙学派和百科全书派的反对者们的影响下制订的。这一套手续据说在宣布“圣者”和“德僧”时，能保证避免“错误”和滥竽充数现象。不久以前庇护十二世宣布一个十五世纪的瑞士人尼古拉斯·佛罗为圣者，因为他在二十年期间内“只是”以神秘的灵感为营养⁽¹⁾，甚至于连滴水也未曾进口过。奉为“圣者”的还有庇护十世，因为向他祈祷可以治愈痼疾！这些事实证明，现代的梵蒂冈仍旧如同中世纪时代一样，是蒙昧主义的温床。

梵蒂冈是如何从宣布“圣者”和“德僧”一事中取得商业利润的呢？第一，提出候选人争取这些“称号”的有关教会组织，为举行尊崇或加福仪式事应该付给大典局巨额款项，并在各种文件、证件和其他项目的名义下也得付钱，此外还须作各种捐献和馈赠。尊崇仪式的价格常常超过2万5千元美金。例如，英国的天主教徒们在1935年为了汤麦士·摩尔的尊崇式就付出了这笔数目的钱。^①第二，梵蒂冈从出售遗骸、遗物、新的“圣者”和“德僧”的画像上也得到不少进益。在举行例行的“圣者”尊崇式时，

^① 霍威尔·斯密斯：“你是彼得”，伦敦，1950年，第464页。

教会机器在全世界各国展开对他的“奇迹”的宣传，和出售表示尊崇他的各种物品，号召信徒捐献款项为这个新的“创造奇迹者”修建教堂、小礼拜所、祭坛、养老院和学校。这种建筑工程同时也为与教会当局分享利润的建筑师和包工头带来好处，使梵蒂冈企业生产的教会用家具和类似的产品有销售的地方。

基督教内对“圣者”和遗物崇拜，是接受古代非基督教的各种宗教和拜物的传统的。梵蒂冈在很久以前就把崇敬遗物列为教规之一。教会法典要求，在每一所教堂的祭坛上必须保存着某一“圣者”或“德僧”的遗物。梵蒂冈垄断着遗物的买卖。因此，当为每一所新教堂或祭坛举行祓除礼时，信徒们不得不掏钱向教皇办公厅购买对于教堂来说如此重要的物品。

美国是现代销售梵蒂冈制造的遗物和遗骸的最大市场。最近15年来(1939—1954)，美国新建了11511所教堂。^①每所教堂平均有4个祭坛，因此在这一期间内为近5万个新祭坛举行了祓除礼，这意味着需要购买同等数量的遗物，而信徒们则为每一件遗物得付出相当数目的美元。

梵蒂冈经常组织的“圣年”和“纪念年”，至今为梵蒂冈国库带来不少好处。在最近的一次“纪念年”时(1950年)，有二百万巡礼者、旅行者和猎奇者访问了罗马。他们之间的许多人捐钱给圣彼得大教堂；或者投一个金币到教堂内专门为此而设的小箱中，或者从梵蒂冈制造的种类繁多的商品中为自己挑一件作纪念：念珠、圣象、赎罪券、带着小镜框的钥匙圈(镜框中嵌着旅行者的保护神圣赫里斯托弗尔的画像)、圣彼得大教堂的导游手册或者梵蒂冈博物院的导游手册等。

“圣听悔僧”——教皇的忏悔部门——现在仍旧存在着，并如同以往一样地贩卖着赎罪券。^②现在修道士和教士们不再在市场上出售赎罪券和在读经台上大做广告了，象十六世纪戴采

^① “新闻周刊”，纽约，1954年5月24日。

里时代那样，然而在羅馬任何一个梵蒂岡設立的出售崇拜紀念品的商店里，信徒或旅行者可以用适当的价格为自己买一张有紅衣主教尼古拉·卡那利(大听悔僧)签名的贖罪券，其上書明，当贖罪券持有人突然死去或不及在臨終的病床上行塗膏礼时，“圣父”将赦免他所有的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这种贖罪券特別暢銷。現在它主要的需求者是美国的游客。贖罪券的价格从5元美金起，根据图案，印在每张贖罪券上面作为裝飾用的教皇肖像和紙質的优劣而定。贖罪券也有值价数百美元的，它出自无名的艺术家之手，燙金的字和摩洛哥山羊皮的封面。总而言之，只要你有兴趣买，有供富翁买的贖罪券，也有供穷人买的贖罪券。

受理离婚請求的“洛脫”审判厅繼續为梵蒂岡國庫带来可观的利潤，如同在中世紀时期一样。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法律只承認在教会中登記的婚姻，而教会法典只准許羅馬的“洛脫”审判厅解除婚約。因此，一个天主教徒，無論住在澳大利亚或是拉丁美洲，如果要离婚的話只得到梵蒂岡的“洛脫”审判厅去。虽然教会法典只在极少数的情形下允許离婚，可是在“洛脫”审判厅中活跃的律师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施展妙計以达到目的，所有一切都取决于当事人的慷慨与否，因为审判厅在判决的时候，对于事先曾为梵蒂岡國庫“慷慨輸將”的請求者，不是一点也无动于衷的。关于梵蒂岡每年从“洛脫”审判厅得到多少錢是很难說的。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会在許多国家中为反对国家頒布离婚法而頑强地斗争着。

梵蒂岡的僧侶在榨取信徒的錢財方面的創造性是无限的。下列事实即为明証。在梵蒂岡的电报局內設有一个专门的服务

② 教会至今仍利用着中世紀教会的“过瘾神恩說”这一“理論”。教会法典中有25条条款是关于贖罪券的，其911条宣称，教会当局有权发售贖罪券，因为“教会在上帝的面前諸有协助”。教士在受教阶时所作的誓詞中，以及在我們上面提及的教会法典上，一开卷就有下列几行話：“我确信，耶穌基督賦与教会当局发售贖罪券之权，并且使用此贖罪券将为基督徒带来极大的益处”。參閱‘宗教法典大全与补充教規’，第43, 338—346頁。

处，只須付給一定數目的錢，它就可以為你以教皇名義發給新婚夫婦一封祝福電報，或發給病人和彌留者一封免罪和授予臨終聖殮的電報：

信徒在遺囑中規定將遺產贈給教皇的事現在仍然象以前一樣地多，這為梵蒂岡帶來數百萬的收入。意大利“歐羅巴”雜誌在1954年報導說，意大利著名的商人列維在遺囑中規定把自己值40億里拉的全部財產贈給教皇。^①

梵蒂岡每年從如此眾多和不同的來源得到的巨額收入，是為誰服務的和用作什麼的？教會的頌揚者們斷言，梵蒂岡的錢主要是用在救濟窮人和維持教皇廳兩宗事上。然而這不符合事實。梵蒂岡的慈善事業由所謂“教皇援助委員會”統籌其事的，它有着自己的收入來源。委員會從工廠主那里募得捐款和實物（衣服，罐頭食品等等），意大利政府並且撥給它補助金，此外還移交給它一些前法西斯青年同盟“里都利奧”^②的休養所、運動場和其他產業。教皇援助委員會從梵蒂岡得到了什麼呢？而教皇援助委員會是不公布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和年度總結的，這顯然是有意的。因為梵蒂岡如果有什麼可以吹噓的話，它早已向全世界宣傳了。所以應該這樣推測，委員會根本沒有分得梵蒂岡收入中的一杯羹，或者為數極可憐，因此梵蒂岡不得不隱瞞其事。梵蒂岡預算中的另一個大項目，是與它的外交活動有關的各項開支。但是聖使的供養費用是由他駐節的主教會提供的。

因此，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梵蒂岡的收入決不是耗費在慈善事業上，甚至也不是用之于維持梵蒂岡的外交機構的，而是花在其他目的上的。梵蒂岡收入的極大部份被教皇、他的親屬、紅衣主教和其他教會顯貴們所據為己有。教皇廳中的紅衣主教

① “歐羅巴”，米蘭，1954年10月10日。

② 卡爾洛·法爾康尼，“教廷在意大利的救濟事業”（“新論”，第11期，1954年，羅馬）。

們“賺得”最多。他們的薪俸每年達10萬美元，此外每逢節慶日教皇還為他們送來所謂“紅衣主教的一盤菜肴”，有時候這盤菜價值2萬5千美元（例如，逢到“聖年”）。教皇廳其他高級教士的薪俸較為普通些，然而也很可觀，他們是：僅有頭銜的主教、大主教和高僧。然而這只不過花去了教皇廳收入的一部份。數目更大的錢用於進行反對進步陣營的思想意識上的戰爭，用於反對共產主義和先進科學；用於維持教權派組織、教權派的報刊和各種宣傳機關；用於進行反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內其他國家的破壞工作。教皇廳的不少收入用於繼續擴大梵蒂岡的資本，購進新股票和有價證券，以及作其他的投資。可是梵蒂岡連一文錢也不發給以依靠信徒施舍為生的，或者根據國內法可向本國政府領錢的普通僧侶。

耶穌會徒渥泰維奧·麥凱蒂，他所屬的教派擁有不可勝數的財富，在自己的一篇關於“道德”的論文中說服教會中的普通執事們說，“財富是萬惡淵源，它給德行敗壞者以食物；而貧困則是無數美德之所由”^①。根據麥凱蒂的理論，只有當資本家、教會的大公們和各教派的將軍們掌握了財富以後，它才會帶來好處，至於在人民手中，以及在普通教士手中，財富是“萬惡淵源”。意大利的普通教士是不受這種“萬惡淵源”之害的；1953年時，普通教士每月只有10,510里拉的薪俸，即不足18塊美元。鄉村教士們的處境特別貧困，他們常常和他們的信徒們一樣地窮。然而梵蒂岡在這方面也企圖為自己博取資本，但這一次是博取政治資本。窮極奢侈的梵蒂岡高級教士們在談到這些教士時，以他們特有的偽善口吻說道：你們看，上帝的侍奉者們生活得如何地貧困和正義，教會是如何地窮呀！今日人士們以嘲弄的口吻談論着教會的貧困這一神話。普通教士不相信這一神話。意大利報紙曾報導過，貧窮的鄉村小教區的修道院院長們要求梵蒂岡把

^① 渥泰維奧·麥凱蒂：“耶穌會——教士良知的考驗”，羅馬，1948年，第21頁。

所有教区的收入汇集成一堆，然后按比例地分配，取消“肥教士”和“瘦教士”的区别。^① 事态甚至发展到这般地步，当发生罢工时，乡村教士们请求工会把教士要求增加薪俸一项也列入工会提出的要求之内。甚至于教皇的宪兵也在1952年宣布罢工，要求增加薪俸和增加粮食配给。

这就是梵蒂冈帐目的秘密，它被一复核时就露出资本主义的原形来了，而决不是神圣的。

现代的僧侣不单是宗教活动家，他们同时是大资本家，股票持有者，银行、工厂和公司的老板。他们和自己的亲属们同资本主义世界关系密切。

作为大资本的伙伴的梵蒂冈，同时也是他的思想上的同盟者。这在受梵蒂冈鼓舞的现代教权派政治运动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① “世界报”，米兰，1953年5月9日。

第五章

梵蒂岡的政治蜘蛛网

梵蒂岡鼓舞着西欧和美洲为数众多的教权派政党（天主教民主党，天主教社会党，“人民党”）。“天主教行动”这个群众性組織是受梵蒂岡领导的，其活动对于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局势有着重大影响。教廷今日的世俗权力，表现在梵蒂岡通过教会組織在许多国家控制着分枝繁多的群众性組織，及在思想上武装教权派政党。

教权派政党和教权派群众性組織是在为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理想所鼓舞着的革命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条件下，在上世紀下半叶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和奥地利，即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时期聚集于教权派陣营周围的主要是封建貴族集团，地主，农民中的富裕阶层和不参加社会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当时尊崇教权运动的特征为：仇視社会主义，企图巩固教会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以削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散布沙文主义，支持开拓殖民地和捍卫资本主义秩序。随着时代的演变，尊崇教权亦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旗帜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各个国家中的尊崇教权运动是完全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要求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結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由于出現革命危机和許多有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在某些国家内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层都聚

集到教权派的旗帜下面来了。教权派正是依靠了他們在这些国家中掌握了政权，例如在德国，奥地利和比利时。同一时期内在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拉脱维亚，西班牙和葡萄牙各国中出现了教权派政党。所有这些政党的主要任务为同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作斗争。随着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和资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愈来愈信任和支持，教权派政党或者法西斯化了，如在奥地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或者执行对法西斯让步而敌视反法西斯同盟的政策，为法西斯执政开辟道路。所有这一切都得到梵蒂冈的同意和赞许。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许多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由于和法西斯侵略者合作而完全声名堕地时，反动派再一次乞援于教权派，因为反动派把教权派视作自己天然的后备军。教权派在这一次是以“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假面具出场的，蛊惑性地答应进行社会改革，保卫和平和给予其他种种好处。实际上当他們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执政以后，教权派破坏了在抵抗运动期间建立起来的人民阵线，开始反对民主权利，反对共产党人，变成美国侵略集团政策在欧洲最忠实的执行者。“天主教政党已充当起业已一团混乱和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最后挑起担子的人这一事实本身——陶里亚蒂指出——就足够明白地说明这些政党，说明它们的思想体系，它们的主要社会基础及其领导者执行的路线；说明这些政党不仅是保守的经济和社会势力，而且还是反动势力，它们为了挽救全人类今日号召去消灭的穷困和被压迫的世界，什么都准备干”^①。

教权派政党对于统治阶级说来，其宝贵之处在于这些政党依靠了“天主教行动”和类似的与教会有关系的群众性组织，依靠了教会当局，他们能够动员信赖教会的群众；在于教权派政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他们通常在工人阶级之中拥有自己

^① 陶里亚蒂：“争取劳动、自由与和平的政策”，“真理报”，1950年4月18日。

的代理机构,即“基督教”职工会,最后則在于他們是进行政治上两面手法,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蠱惑宣传的老手。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天主教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大資本家的政权在意大利重新恢复,并以花样百出的两面手法遮盖自己的反动政策。正如陶里亚蒂指出的:“一方面它(天主教民主党——作者)宣称自己是忠于‘北大西洋公約’的原則,即忠于保卫資本主义制度原則,它詛咒左翼人民力量,特別詛咒我們(共产党人——作者),它追随美国麦卡錫主义的后尘,唆使工业家迫害工人积极份子,利用全部国家机器以图阻挡我們前进。它在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在群众間的影响不致丧失殆尽,被迫宣称自己是資本主义的反对者,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它既发誓又賭咒,說它是願意尊重民主的。然而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在党内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决定該党的实际政策的終究是他們。”①

教权派在“第三种力量”的旗帜下出場,企图欺騙劳动群众,他們断言他們毫不偏袒地既反对資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他們的政治目标为建立一个以基督的社会学說为基础的“公平的社会”。然而在事实上教权派政党的政策表现为支持“冷战”,保卫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保証独占資本家获得利潤,以及迫害工人运动。

教权派的政治手腕以善于随机应变見称,根据情势可以同任何一个資产阶级集团結成联盟。例如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教权派支持法西斯,在意大利他們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共掌政权,在奥地利則于长时期內对部份工党領袖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英国則与莫斯萊法西斯分子共同行动等等。

天主教教权派在一系列西欧国家中擎着資产阶级民族主义大旗出現。教权派民族主义运动在过去就往往带有法西斯主义

① 陶里亚蒂:“三十五年的生活与战斗”,“真理报”,1956年1月21日。

色彩(例如在斯洛伐克的刘道夫主义者,克罗地亚的烏斯泰主义者,比利时的弗萊門民族主义者)。由于历史条件形成的势力,天主教会还对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运动起着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一段时期內,西欧各国教权派民族主义集团除了少数例外而外,背叛了他們本民族的民族利益。梵蒂岡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些运动,好象利用兌換用的零錢一样,来向更大的掠夺者为自己換取各种特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与日益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相抗衡,在梵蒂岡和天主教会的积极参加下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中成立了教权派政党。梵蒂岡热切地力图扩大自己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影响,从而抬高自己在美国統治集团中的身价。

現代的教权派政党乃是天主教会与資产階級联盟的政治表現,乃是梵蒂岡与金融資本利益相同的表現。教权派政党在思想意識方面則以梵蒂岡的“社会綱領”馬首是瞻,这个綱領的主要內容为捍卫資本主义和敌視革命运动、敌視社会主义。

每个天主教政党受梵蒂岡影响的程度,和依附梵蒂岡的程度各相迥异。必須注意的是,每个国家中的天主教政党首先是代表自己資产階級的利益的。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对梵蒂岡的依附程度比其他天主教政党为甚,它的主要支柱“天主教行动”是直接受羅馬教皇指揮的。“天主教行动”掌握着分枝繁多的,积极活动着的,和紀律严密的群众性組織,教权派沒有这些支持是不可能在大选中获得成百万选票的。

“‘天主教行动’究竟是怎样的組織呢?‘天主教行动’是一些群众性組織的联合会——如职工会,各阶层的协会,文化团体,科学团体和体育团体等等;它根据宗教的特征而建立起来,并受教会的領導。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章程(它是其他国家中同类組織章程的蓝本)中,对这个組織的宗旨有下列簡要陈述:‘天主教行动’是世俗的天主教徒的民族性組織,它的宗旨为同教会进行密切的和直接的合作。‘天主教行动’本身組織或者通过其

他屬於它的或受它監督的天主教組織，關懷自己成員靈魂上的和宗教上的教養，指導他們在個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傳布和保衛基督信念。‘天主教行動’把傳布信仰和服從基督的全權代理人（即羅馬教皇）認為自己首要的職責”。

“在‘天主教行動’的幫助下——意大利進步歷史學者基奧爾奇·凱特羅洛寫道——教會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首先保衛和鞏固作為政治組織的自身，同時保衛和鞏固同教會發生關係的統治階級。‘保衛和傳布基督信念’——這祇是主要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已。最近數十年來，雖然‘天主教行動’這組織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急劇地提高了，然而群眾的宗教觀念毫不活躍，也並未更為加深，這就是最好的證明”^①。

“天主教行動”這一術語首先見諸于庇護十世在1905年發表的一個通諭中，庇護十世號召意大利教權派份子建立一個名為“人民聯盟”的政治組織，其任務根據當時“天主教文明”的報導，為“在社会生活領域中保衛基督秩序和同社會主義的學說及其破壞傾向作鬥爭”^②。1908年時，一些天主教政治組織組成了名為“意大利天主教行動”的聯合領導機構，這機構直接聽命於教皇與教會。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天主教行動”急劇地擴展了，它企圖把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置於自己影響之下。意大利在法西斯統治時期，“天主教行動”仍舊是天主教會的主要政治基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天主教行動”和法西斯合作，雖然有時候在教權派和墨索里尼政府之間發生過形式上的很尖銳的爭執。由於“天主教行動”這組織及其幹部的存在，意大利的教權派份子有可能在法西斯崩潰以後迅速地組成天主教民主黨。

庇護十一世，他被稱為“天主教行動”的教皇，曾把這個類型的組織在其他國家加以推廣。

① 基奧爾奇·凱特羅洛：“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動”，第5頁。

② “天主教文明”，第一卷，羅馬，1905年，第129頁。

梵蒂岡力图将各种“天主教行动”的組織联合起来，使具有国际規模。为这目的服务的有下列联合会，例如“国际男子联合会”，成立于1948年，在27个国家中有其組織；“羅馬世界”，它联合着47个大学生和学生青年的民族性組織；“天主教女子組織世界同盟”；“国际天主教少女协会”；“国际基督教职工会联盟”，成立于1920年，由12个民族性組織組成，盟員有3百万；“欧洲基督教劳动者运动”，1949年成立；在紐約設有所謂“中欧基督教职工会联盟”的領導机构，而在巴黎則設有“国际基督教劳动者——流亡者与难民联盟”的領導机构，这些流亡者和难民不过是一小撮从社会主义陣营逃亡出来的反动份子。上述两个組織均成立于1951年，由美国当局撥給經費。教权派政党联合成为一个“黑色国际”——“国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同盟”，它成立于1947年。所有上述的以及其他的教权派組織，同时又加入“国际天主教組織會議”，該組織成立于1927年，会址設在瑞士的弗里堡，以及“国际天主教組織情报中心”，該組織成立于1950年，会址設在日內瓦。①这就是教权派政治上的蜘蛛网，它在同等程度上既为天主教的利益服务，又为帝国主义資產阶级的利益服务。

教权派陣营在意大利有着很大的势力。教权派在意大利直接受到梵蒂岡的监督和依靠天主教会。“意大利政治性的天主教——天主教民主党的領袖迪諾·鮑写道——乃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基督教政党。”②同一作者承認“如果在意大利有着一个統一的天主教徒的政党，如果教徒們总是积极地参加竞选运动，那么首先应归功于天主教会，僧侶和主教們积极干涉。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已經习惯于接受自己修道士、教士、紅衣主教，以至教皇的引导，他們指导教徒們在政治活动中應該运用那些方

① “国际組織年鉴”，布魯塞爾，1954年。

② 迪諾·鮑：“意大利天主教的危机”，羅馬，1954年，第86頁（迪諾·鮑在1955年時曾任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長）。

法和手段”。

因此，更詳盡地研討梵蒂岡的現代政治方針是恰合時宜的，尤其因為梵蒂岡的方針不僅影響到意大利教權派的政策，並且還影響到其他各國教權派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梵蒂岡是作為“冷戰”的鼓舞者出現的。教皇庇護十二世在1947年8月間曾與美國總統杜魯門交換信札，在信札中他們彼此保證在與共產主義作鬥爭中互相支援。同年9月7日庇護十二世在羅馬彼得廣場向“天主教行動”的積極份子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聲稱：“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沉思熟慮和籌劃策略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你們準備好沒有？兩個敵對的陣營在宗教和道德方面表現得愈來愈明顯。正是考驗的時候了。”^①“紐約時報”多年駐梵蒂岡的記者卡密爾·欽法拉興奮地寫道，緊接着發表演說以後“庇護十二世開始肩并肩地和基督教國家一起和共產主義危險作鬥爭，他運用教會道德聲望作為鬥爭的武器，同時也運用教會的物質（財）力量。根據他的行動可以確信，在天主教教會和莫斯科之間取得和解是不可能的。他已經不是中立的了（好像他曾經守過中立似的！——作者）……他開始為建立強大的反共聯盟而鬥爭”^②。

的確，不能說庇護十二世是公開而笨拙地奉行這一路線的。教皇是個外交家，是熟知西歐各國人民政治情緒的，他知道軍事聯盟，軍備競賽和戰爭歇斯里的，是被世界公眾輿論和全世界各國人民群眾所斥責的。這就是為什麼庇護十二世在發表反對社會主義陣營演說同時，還保證他是贊成和平斥責戰爭的。然而這種保證有什麼價值呢，只要看他直接監督下刊行的“天主教文明”雜誌的內容就明白了。耶穌會徒勃羅柯萊里在教皇廳這份刊物上毫不忌諱地聲稱：“不幸的(?)是所有人都談論和平，所有

① 卡密爾·欽法拉：“梵蒂岡和克里姆林”，紐約，1950年第47頁。

② 同上。

的人都要求和平，然而那些叫嚷得最凶的，只不过是為了想遮蓋自己的犯罪意圖。（這個耶穌會徒不是指真正的戰爭販子——帝國主義者而言的，而是指國際和平運動的擁護者而言的——作者）。召開各種大會，建議舉行各種國際會議，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建議愈來愈多，到處人們號召走向和平，但是難道不應該和先知耶利米同聲高呼——和平，世界沒有和平嗎？”^①勃羅柯萊里在1952年時，還在“天主教文明”上寫道：“對於古老歐洲的命運而言，另一件事的政治意義更為重要，即建立歐洲軍……我們(?)能夠很快地使它實現嗎？”^②

另一個耶穌會徒安東尼奧·密西尼奧亦寫有相同的文章，他是“天主教文明”雜誌外交政策欄的編輯。

1955年時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圖誹謗蘇聯的和平政策。他在一篇文章中“證明”西歐軍事同盟的目的，只不过是“自衛和在經濟、社會及文化領域中進行合作”^③。密西尼奧厚顏無恥地聲稱：“如果在巴黎草擬並在倫敦獲得協議的協定引起俄國的不滿的話，那麼這就是協定對歐洲及和歐洲聯合的各國有利的最好標志。”^④

“天主教文明”雜誌（即羅馬教皇，梵蒂岡）攻擊於1955年舉行的日內瓦會議。“共存是烏托邦，它會麻醉西方——教皇雜誌在緊接着日內瓦會議閉幕之後寫道——把已出鞘的寶劍重新入鞘是危險的空想……西方正面臨着危險的和平攻勢……當還沒有在教皇指示的基礎上解決所有主要問題之前，應該提防和東方取得和解。”^⑤難道斷言共存是烏托邦，而寶劍重新入鞘是危險的空想，不是證明梵蒂岡繼續奉行“冷戰”政策嗎？

① “天主教文明”，羅馬，1953年11月21日，第386頁。

② 同上，1952年3月21日，第601頁。

③ 同上，1955年1月15日，第162頁。

④ 同上，1955年2月19日，第365頁。

⑤ “消息報”，莫斯科，1955年8月11日。

許多年來羅馬教廷進行反對人民民主國家的活動，進行反對這些國家中贊成建立國家與教會間正常關係的天主教會團體活動。在庇護十二世直接領導下的“聖办公厅”將贊成國際和平的匈牙利天主教會雜誌列入“禁書目錄”之中。（如“匈牙利天主教會公報”，“十字架”）。

捷克政府和波蘭政府使天主教會各種願望得到滿足，因此這些國家的天主教會報刊歡迎教會與國家間關係的正常化。梵蒂岡“聖办公厅”的回答是，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會報紙“天主教會消息”和波蘭天主教會雜誌“今日與明日”列入“禁書目錄”，梵蒂岡是故意在舉行日內瓦會議的時候作出這一決定的。誰迫害人民民主國家內的天主教會報刊呢？難道是這些國家的政府？不是的，是梵蒂岡“聖办公厅”在迫害它們。

庇護十二世禁止天主教會僧侶參加和平運動。意大利教士茄什洛因敢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因此被革除教籍和褫奪教階。“羅馬觀察家”曾譴責在和平呼聲書上簽名的天主教會徒。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不能阻礙世界和平運動蓬勃開展，不能阻止“日內瓦精神”的產生，日內瓦精神把對美好未來的希望扎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心中，也扎在數百萬天主教會信徒的心中。庇護十二世應該在其1955年聖誕文告中承認這個事實，在這一文告中他表示贊成停止試驗核武器，和在“對軍備確立監督的條件下”禁止採用核武器。庇護十二世聲言：“朕毫不懷疑地斷言，總體地實行這三個措施是各族人民及其領導者良知上的責任”。

庇護十二世的這篇演說受到了所有和平真正的朋友們的歡迎。它在基本上是和不僅受到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支持，也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千百萬勞動人民——天主教會徒和非教會徒——支持的蘇聯的建議相符合。

然而庇護十二世文告的其餘部分與上述引文不相吻合，他在文告的其餘部分發表了一系列梵蒂岡代表人物共同的攻擊共產主義的言論，他反對抱有“共處實際可能性的幻想”，反對“不

論代價如何與所有的國家共處”，雖然就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和羅馬教皇在象禁止熱核武器這樣重要的國際政策問題上觀點相同而言，這事實本身就令人信服地證明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和平共處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不能不同意大利“團結報”在評論庇護十二世談論禁止熱核武器的演說時所發表的意見，“團結報”寫道：“這就是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所提出的建議，蘇聯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過這一建議，並且還要繼續提出……禁止試驗原子武器和熱核武器的問題是個有局限性的問題，然而問題的提出是由於明顯的正義性的要求，由於對全人類是必要的。‘共產主義’站在為它的實現而鬥爭的隊伍的前列。各族人民期望的是正義的勝利，也就是期望庇護十二世所繼續在詛咒的共產主義的影響能夠傳播和增強。”^①

庇護十二世在聖誕文告中非難在具有進步情緒的天主教徒間的得到廣泛流傳的一種意見，“根據這種意見（教皇在文告中說道）基督徒應該把共產主義視作為歷史發展中的一種現象或一個階段，幾乎視為歷史進展中必不可缺的一個‘時期’，差一點就要說成為上帝所預見到的”。社會主義制度今天已經普及於人類三分之一，而羅馬教皇却仍舊不願意承認共產主義是歷史發展中的“現象或階段”，把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和平共處視為社會主義世界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投降。在這一方面，庇護十二世的聖誕文告和帝國主義集團代表人物類似的說法不謀而合。誰不明白呢，在這種“條件”之下不可能使國際緊張局勢得到絲毫緩和，提出類似這種的“條件”只能妨礙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間正常關係的建立。

庇護十二世在同一文告中號召西方列強把社會主義陣營內國家從“共產主義”中“解放”出來，他懇求殖民地各族人民“承認歐洲在進步事業中的功績和拒絕譴責殖民主義”。

^① “團結報”，1955年12月28日，羅馬。

不言而喻，这类声明是对殖民者有利的，而不是对正为自己独立而斗争着的各族人民有利的。

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梵蒂冈在战后建设问题方面的政策，是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政策相吻合的。

资本主义世界内所有国家中教权派政党和组织，在国际政策问题上追随梵蒂冈的反动路线的。

在意大利教权派组织特别众多，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和意大利资产阶级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天主教民主党。

领导着法西斯崩溃后建立起来的天主教民主党的人物，原系天主教“平民党”的首领，墨索里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愿和他们合作。同时和他们进入该党领导集团的还有“天主教行动”的首领们，他们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以同情法西斯著称，例如杰达即是。加入新党的有“天主教行动”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范范尼，拉·庇拉，佐席比·陶采蒂，他们以“左倾”见称，虽然其中有些人过去公开支持过法西斯，例如范范尼即是。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机构中尚有意大利最大的垄断资本和托辣斯代表，他们由于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发了横财，例如毕拉、康披里、万诺尼等。

“天主教行动”的首领们在教权派政党内演主要角色。“由于在法西斯时期保存了党的干部——教权派历史学者马里奥·叶诺迪写道——‘天主教行动’才能够在天主教民主党内占有很大的势力。结果‘天主教行动’的首领之一路易泽·达今日认为自己是全权代表，时常声明自己有监督党（天主教民主党）的权利。对直接受教会监督的世俗组织‘天主教行动’的依附，是现代基督教民主政治沉重的负担。”^①

天主教民主党客观上代表着意大利资产阶级和天主教会上层分子的利益。

^① 马里奥·叶诺迪与沃胡梭·鄂甘尔：“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基督教民主”，诺特尔丹姆，印第安纳，1952年，第26页。

教权派一面利用社会民主党，一面依靠了教会机构的支持（而在战后还依靠英美占领军当局的帮助），他们才能够将相当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富农和政治上落后的工人与雇农吸引到自己的一方。这使教权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这基础本身之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1946年时，根据庇护十二世的指示，对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改革，以使适合战后的条件。“天主教行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为教皇任命的指导团，由六个主教和大主教组成，指导团由一个红衣主教领导。指导团之下有执行机构——主席团。主席团的成员包括：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男女各一人），书记和司库——所有这些人都是由教皇任命，参加“天主教行动”的各个组织的主席亦然。此外还有一个专门机构在指导团领导下进行活动——中央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主席团成员；“天主教行动”各组织的主席，一些由这些组织常委会选出的代表，以及由主席任命的人士。“天主教行动”各教区和乡村小教区常委会的主席由当地主教任命。这种领导形式允许梵蒂冈，准确地說——教皇，完全控制这一政治性群众组织。梵蒂冈领导着该组织中央机构，并通过作为政治顾问常驻于所有“天主教行动”组织内的权限范围很大的僧侣代表，它可以按照教会的愿望指导“天主教行动”的活动，轻而易举地击败该组织中任何反对派。

参加“天主教行动”的有七个群众性组织，其会员总数根据1956年的资料为三百万人。上述组织中有四个单位与“天主教行动”并行地进行活动，即拥有自己的教区和乡村小教区常委会。首先为“男子联合会”（成立于1922年），会员为已婚男子和年龄已达三十岁的男子；在它的领导下有“儿童天主教行动”，会员为四岁至十岁的儿童。

其次为“青年联合会”（男青年），在1868年为庇护九世所创立。1948年时，这组织拥有24,000个基层小组，15万名会员和

25万名候补会员。

在“青年联合会”领导下有一系列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组织：“意大利基督教青年工人”（男青年和女青年），成立于1941年，会员分为两类：积极会员（同时参加“天主教行动”），赞同会员（非“天主教行动”的成员）；“农村青年”（男青年和女青年），成立于1946年；“青年大学生”（男青年和女青年），成立于1944年；“意大利天主教少女”，联合着资产阶级和保守派的子弟。

“天主教行动”的第三个大组织为“青年女子”（为从四岁到三十岁的少女和女子），成立于1918年。它有五个分部：幼儿部（四岁到六岁），“女孩部”（六岁到十岁），候补会员部（11岁到13岁），青少年部（14岁到18岁），正式会员（19岁到30岁）。1948年时，“青年女子”在意大利所有教区和18,500个乡村小教区中设有分支；参加的少女和儿童达874,404人。^①这是“天主教行动”最大的群众性组织。

此外参加“天主教行动”的有“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合会”，成立于1896年，隶属于该会的有“毕业生运动”（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小学教师运动”。

“天主教行动”系统内尚包括一系列运动组织和文娱组织，例如“意大利天主教童子军协会”（男孩）、“意大利辅导员协会”（女孩）、“意大利运动中心”和“联谊会”（在妇女间活动）。

从属于“天主教行动”的职业性组织如下：“意大利天主教教员协会”，“意大利天主教中学教员联盟”，“天主教大学教员委员会”以及“意大利天主教技术人员同盟”，“意大利天主教法律工作者同盟”，“意大利药剂师同盟”，“意大利天主教徒出版者同盟”，“大众图书中心”（主持教权派宣传鼓动图书的分配工作和组织“人民”图书馆），其神学顾问为“天主教文明”杂志编辑之一耶稣会徒，柴可摩·马蒂可尼。

^① 奥古斯汀诺·契卡隆尼：“教会百科全书”附录，米兰，1953年，第185、136、286页。

“天主教行动”主席团下有领导宣传鼓动的中央局，负责道德宣传、教育和电影的秘书处，以及“戏剧中心”、“无线电中心”和“社会活动所”。

近年来“天主教行动”领导的“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在教权派组织系统内的影响开始愈来愈大。

“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是罗马从德国占领者解放出来的次日，根据梵蒂冈的指示而建立的。“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律师路德维格·蒙蒂尼，他是现今米兰大主教的兄弟。天主教职工会的首领们同意在当时加入统一的职工联盟时，预先为自己保留组织“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的权利，这似乎只是为了关怀工人“灵魂上的安宁”，关怀他们的文化活动和组织互助。左翼工会活动家为了希望使职工会的团结能成功，同意了条件，虽然明知“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成立后教权派和资产阶级一有机会便会依靠这组织来分裂工人运动。陶里亚蒂在1944年评论统一的职工会中央成立时说：“我们不当，也不愿意和天主教群众不和，我们必须和他们在今日和明日为协同行动找到共同的活动范围……我们知道在天主教政党队伍中有着工人、农民、知识份子、青年和劳动群众，他们最终有着和我们相同的愿望，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地希望在今日建立一个民主和进步的意大利，在这个国家中工人的要求将会得到实现。我们要求和这些天主教群众行动统一。我们知道在过去存在着妨碍这种行动统一的心理上和组织上的因素。我们至今为止，为了扫除这些障碍做了一切必须做的事……今日我们在这个新的共同的劳动联盟中走了实现这种统一的第一步。我们为职工会的团结而庆贺，因为它是意大利民主化和政治进步道路上的一个大进步。”①

表现在统一的职工会运动中的劳动人民行动的统一及其成

① 維多利亞·高利賽：“世俗的權利”，馬杜拉，1951年，第31—32頁。

就，在資本家和梵蒂岡之間引起了極大的不安。耶穌會徒勃羅柯萊里在一篇登在1946年的“天主教文明”雜誌上的文章中相當公開地暴露這種不安的原因：“這對於誰都不是秘密，在我們的（即天主教的——作者）工人與農民間，只要一提起共產主義就會引起的敵意或者甚至恐怖感，已經減弱了，因為現在他們談論着：既然天主教徒和共產黨人已經聯合在一個組織之中，那末說共產黨人是與宗教不相容的敵人是謊話：兩者之間的差別應該是不大的。”^①

在群眾的壓力下被迫同意統一職工會的教權派們，同時開始準備分裂，他們把共產黨人抱無神論觀點提出來作為反對與共產黨人合作的主要論據。

共產黨人作出了一切努力不使因宗教誘因而導致職工會運動的分裂。他們甚至於準備投票贊成把拉特蘭條約也寫在新的意大利憲法中。陶里亞蒂在議會中評論共產黨時對這一問題的观点時說：“工人階級不希望因宗教問題而使國家分裂。工人階級不希望，我們也不希望，在工人間發生衝突——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為一方，而信奉天主教的工人為另一方。不僅如此，我們的責任為作出一切可能使衝突不發生。”^②然而正如眾所周知，教權派們竭力設法把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排擠出政府，將政權攬到自己手中。分裂派們下一步行動將為分裂“意大利總工會”是極明顯的。

為了保證勞動者的團結和擊敗教權派的分裂活動，共產黨人作出了新的讓步。共產黨人同意當在“意大利總工會”的領導機構中發生意見分歧時，少數派有權利公開表示自己不同意多數派的立場，有權利不執行領導機構通過的決議。這一提議保證了“意大利總工會”中天主教派系的充份行動自由。但是教權派們害怕勞動人民的團結。

① 維多利奧·高利賽：“世俗的權力”，第3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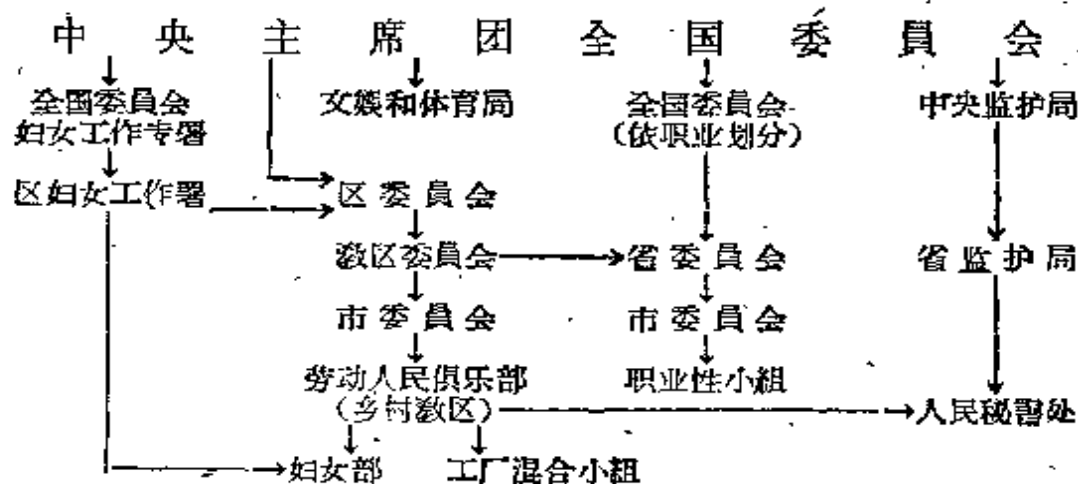
② 同上，第46頁。

1948年时，“意大利总工会”因陶里亚蒂受到敌人的謀害而宣布总罢工，教权派首領們便以之为借口退出总工会（追随着他們的有社会民主党人），他們憑借了“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組成了自己的分裂派职工会組織，大多数天主教徒沒有跟从他們，仍旧留在总工会內。

“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以中央主席团为首，下面有各委员会——区委员会（包括几个省），教区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市委委员会。市委委员会领导乡村教区俱乐部，而俱乐部則领导該会会员根据工作地点而組織的小組（工厂，机关等等）。乡村教区俱乐部中亦有根据职业划分的小組，妇女部和經管互助工作的“人民秘書处”。

同时各职业性小组亦組成以全国，省和市委会为首的独立性系統。“人民秘書处”也組成独立性系統，以中央和省监护局为首。妇女部則直接隶属于“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全国委员会”之下的妇女工作专署。

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的組織系統



“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受僧侶的監督和操縱。中央領導机构受耶穌会徒的監督，中級和下級組織則受主教和乡村教区教士們的監督。

1949年时該协会拥有92个省委员会和7,012个乡村小教

区俱乐部。1953年时会员的数字不到15万，同一时期意大利总工会的会员超过300万人。

“天主教行动”另一个重要环节如在1948年建立的“公民委员会”，当时梵蒂冈为了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它通过在“天主教行动”组织内的耶稣会徒隆巴尔琪提出建立这种委员会的主意，使天主教会影响下的所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彼此协调，包括各个教派和天主教民主党在内（在意大利有850种教会组织或直接从属于教会的组织）。

1948年3月前，距大选前二个月时，意大利被“公民委员会”的蛛网所满布，它们依靠着教会和亲教会的组织以及警察的支持，对进步阵营进行肆无忌惮的谩骂和诽谤，规模之大为意大利前所未见。

从此以后“公民委员会”积极参加所有的竞选运动，它对天主教民主党的影响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这个党在群众间的威望和影响却开始下降了。现在大家都承认，天主教民主党人没有“公民委员会”的支持，它无法在大选时保牢自己的地位。

“公民委员会”究竟是怎样的组织呢？这是一个以“全国公民委员会”为首的中央集权组织，所有的“公民委员会”受它管辖。“公民委员会”的领导由上级指定。1954年时“全国公民委员会”中的领导人有红衣主教庇雅察，耶稣会徒隆巴尔琪和“天主教行动”的代表杰达，他们代表着最反动的同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教权派集团和梵蒂冈。“全国公民委员会”设有刊物局，“心理局”（计划进行宣传鼓动）和区监督局。

“公民委员会”的低级机构为区监督局，它通过“区公民委员会”进行领导地方公民委员会（乡村小教区的）。地方公民委员会的义务为执行全国公民委员会的训令，指示和命令。地方公民委员会由所有在该乡村小教区内活动的教会组织和世俗的教权派组织的代表组成。地方公民委员会的成员有：“天主教行动”乡村小教区常委会及其各组织的领导人，“意大利基督教劳

动者协会”乡村小教区俱乐部的主席，天主教童子軍組織的專員，“直接生产者”（地主富农的組織）地方分支的主席，各教派、宗教团体和兄弟会的代表，当地天主教民主党組織的代表等。

“公民委员会”担负着調查該地区工人的政治信念和他們对那一职工会表示同情，監視他們在工作地点的政治行动的責任，實質上就是担负进行監視工人及其組織的間諜的責任。

“全国公民委员会”在1951年时发出一件名为“地方公民委员会的組織和活动計劃”的指令，責成所有的地方公民委员会搜集有关“各政党公开的或隱蔽的活动的情况，以及引起公众关心的地方和全国性問題方面的社会輿論”。指令責成地方公民委员会經常注意社会上流传的消息，監視报刊，并从因地位关系而掌握必要的情报和文件的人士处設法获得它們。^①

1949年时，杰达和耶穌会徒通过公民委员会开始“为伟大的召喚进军”，目的为将意大利共产党人“呼回”教会的怀抱中去；实际上是一次反对意大利共产党的进军。

美国在羅馬和梵蒂岡的大使館为这次宣传运动撥付了大宗款項，杰达依靠了这笔錢組成了一个專門机构，它以“为伟大的召喚进军”中央局为首，发行为宣传运动服务的报纸和杂志，并雇用了一支宣传鼓动者大軍。教权派虽然动員了“公民委员会”这一机构和大宗款項，但是結果他們完全白費心机。这次进军为期二年半，可是杰达甚至无法夸耀說他已經“呼回”了一个人。結局是梵蒂岡在政治上极为难堪：成千万美元付与东流。“进军”在1952年偷偷摸摸地結束了。

1952年的市政选举，1953年的議會选举和1956年的市政选举时，“公民委员会”和“天主教行动”这两个組織都动員起来支持教权派，与进步力量作斗争。从1956年市政选举前进行的竞选宣传活动中可以看出动員的程度，当时教权派召开了八万

^① 湯迪：“耶穌会徒”，第280—281頁。

次大会和各种会议，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然而意大利教权派的势力终究是在削弱着，正如选举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任何对共产党人的诽谤与诬蔑，不能使劳动人民看不见这一事实，即教权派政府奉行的是为金融资本和地主利益服务的政策，政府的政策使人民的民主成果受到威胁。“这种危险并不是什么遥远的事——陶里亚蒂指出——它已经开始以现实的、严重的、惊人的面貌出现。这就是：由于教权派当局以及强大的宗教团体或半宗教团体的干涉，现在已经产生出一种要改变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基础的危险。”

此外，在组织国家的各种活动的政治方面，在工会活动方面，在社会保险、教育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我们看到那些披着宗教的外衣被人利用来达到某些社会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团体和权力，正在进行变本加厉的、日益普遍的、顽强和压迫性的干涉。

我们必须明确地公开地揭露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公开说明，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意大利国家就会逐渐改变它的性质。事实上，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再是一个各派政治势力可以活动的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只会是一个新式的教权派国家”^①。

我们详细地分析了意大利教权派的组织，是为了指出梵蒂冈是用怎样的政治蜘蛛网缠住了这个国家。教权派组织的这张蜘蛛网是反动力量进行统治的支柱。

现在简要地叙述一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教权派运动的状况。

法国在十九世纪末期产生了德·梅伯爵领导的“社会”天主教运动，其目的为与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社会主义影响斗争。

法国的教权派们一致地敌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他们使资产阶级确信，只有教会能够把他们从社会革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修道院院长康伦琪西尔在1892年时公开地制定教权派

^① 陶里亚蒂：“共产党为复兴意大利社会而斗争”（“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6年2月3日）。

的綱領：“誰能遏止革命戰爭呢？……這甚至連憲兵也辦不到，因為有人說得好，憲兵本身也需要受監視……不要迫害僧侶，不要使無神論變為國家的最高法律，還是給教會以權利吧，讓教會來塑造孩子們的心靈，徹夜不眠地坐在病院中將死病人的床邊，接近工人，以宣傳上帝恩寵的機會來安定他們的不滿情緒，於是就沒有必要開槍了。在上帝面前的恐懼——摻合着愛的恐懼——這就是精深奧義的始末……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抵抗住社會主義的強大攻勢，沒有，除開天主教而外。”^①

德·梅和他的同道者們建立了天主教“法國青年協會”，“基督教勞動聯盟”以及其他組織。然而他們既在教權派中間並不得到特別成功，因為大多數教權派夢想君主政體和不願同資產階級共和國和解，在勞動人民中間也得不到成功。德·梅不希望工人們從資本主義桎梏下解放出來，他希望聯合工人在教會的監督下與社會主義作鬥爭。“在我們所寫的一切文字中——其後德·梅承認道——你們首先找到的是同革命作鬥爭的號召。”^②

以馬爾克·桑尼為首的“基督教民主”的代表人物是從另一個立場對待工人階級的，桑尼是“左翼”天主教組織“播種者”的奠基人。桑尼要求讓工人參加管理企業。“播種者”的領導人物反對反動份子和保守份子，他們試圖和工人組織建立友好的關係。馬爾克·桑尼曾向俄國1905年的革命致敬。^③然而“播種者”領導人物的進步方針不合梵蒂岡的脾胃。庇護十世在1910年時正式譴責“基督教民主”運動。桑尼解散了“播種者”。1911年時他和他的朋友們組織了“青年共和”社，繼續捍衛“播種者”的綱領，可是沒有得到特別的成功。教會阻撓他的活動，然而馬爾克·桑尼的組織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1936

① 康倫琪西爾：“天主教的法國”，巴黎，1892年，第51—52頁。

② 庫洛汶：“作為現代世界政治因素之一的天主教”，莫斯科—列寧格勒，1931年，第21頁。

③ 馬利奧·叶諾迪與法朗梭·郭甘爾：“意大利和法蘭西的基督教民主”，第26頁。

年时“青年共和”社参加了人民陣綫，而在法国被占領期間其擁護者們参加了抵抗运动。战后許多成員参加了天主教政党人民共和党，其余的人則团結在自由主义情緒的天主教杂志“趋向”，“双周”，“基督圣書周刊”和“灵魂月刊”的周围。（头两种杂志不久前被梵蒂岡禁止，已停止发行）。

梵蒂岡譴責“播种者”是为了博取法国資產階級的欢心，梵蒂岡在政教分离以后（1904年）力图 and 法国資產階級建立友好关系，虽然并不成功。梵蒂岡另一这样的行动为譴責“法兰西行动”，法国教权派最反动的势力是麇集在这組織周围的。^①“法兰西行动”与共和国进行斗争，梵蒂岡对该組織抱否定态度应足以証明教廷垂青于資產階級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教会和資產階級更为接近，在战争期間法国主教会一致支持資產階級的帝国主义政策。战后法国政府和梵蒂岡之間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法国主教会开始热心地推广“天主教行动”型的組織，特别是天主教职工会，青年运动以及其他等等。当时成立了教权派的人民民主党，該党是代表法国資產階級最右翼的立場的。党的喉舌为“震旦报”，人民共和党未来的首領皮杜尔即在該党工作。虽然作了一切努力，可是教权派陣营一直到希特勒击潰法国之前，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毫无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1939年时梵蒂岡取消了对“法兰西行动”的譴責，示意它贊同怀亲法西斯情緒的教权派們的路綫。叛国賊貝当成为他們的英雄，貝当使耶稣会合法化并鼓励教会和教权派各組織的活动，“羅馬观察家”說他“把十字架归还給了法国”。

法国主教会支持貝当，然而大多数普通教士和青年共和派的成員及人民民主党的某些首領們积极地参加抵抗运动。大多数参加对希特勒占領軍进行斗争的教权派們，他們不是力图革新法国的政治，而是力图阻撓进步力量取得政权。

① 梵蒂岡是在1914年时譴責“法兰西行动”的，然而这一决定保守秘密。

希特勒垮台以后，法国资产阶级，它的某些政党已破产了，支持在解放最初年代中玩弄社会改革辞句的教权派们（只说一点就足够了，即被选为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为曾经因“左倾”而被梵蒂冈谴责的马尔克·桑尼）。这就是人民共和国在战后最初年代中成功的原因，然而这种成功是短暂的，因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在执政期间显示出自己是“冷战”和重新武装西德的信徒，对印度支那和法属非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使法国小学教育教权化。所有这一切使人民共和国成为阴谋反对法国人民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党。这导致人民共和国势力的削弱，导致教权派阵营发生深刻危机，以及促使教权派在1956年选举中惨败。人民共和国这次选举中仅在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和反动势力的老巢布勒塔尼和华戴保住自己的席位。

人民共和国是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支柱之一。垄断资本所信托的人士参加了它的领导机构：莫里斯·舒曼（人民共和国1949至1953年间的主席），他代表法国和美国大银行的利益；罗伯尔·舒曼——他不止一次地当过外交部长和两次出任总理，为工业家温台尔家族亲信人士；安德烈·戴布雷——巴黎—荷兰银行经理之一；让·列多诺——摩洛哥的煤矿主，与纽约“中央汉诺威银行”有联系；皮埃尔·歇汶埃——“米拉鲍”银行的亲信人士，以及其他人士。

法国天主教会积极支持人民共和国，同时该党的领导机构与梵蒂冈，西德，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教权派政党有联系。许多在梵蒂冈势力下的法国银行都在经济上支持人民共和国，首先是“通用工商信贷银行”^①。

人民共和国的反动政策在教权派运动内部引起愈来愈大的不满。由于对人民共和国支持西德军国主义化表示愤慨，1954年时有一大批由被开除出人民共和国的议员安德烈·德尼领导

^① “共产党人杂志”，№ 3，巴黎，1954年，第295页。

的青年共和派成員脫離人民共和黨。一位法國天主教靈修方面的領導者法朗索·莫里阿克，他脫離了人民共和黨和支持梵蒂岡的反動報紙“費加羅”的編輯部。有聲望的天主教雜誌如“靈魂月刊”和“基督聖書周刊”也刊文批評人民共和黨和梵蒂岡的政策。

梵蒂岡不僅支持人民共和黨的反動領導集團，最近以來，它對布熱德份子的法西斯運動也開始予以眷顧。庇護十二世在1956年7月隆重地接見了這些法西斯份子的首魁——皮埃爾·布熱德，這除了是政治性示威而外，不能作別的解释。

“天主教行動”在法國的廣泛性不及在意大利。法國“天主教行動”組織的主要目標為在工人和農民青年中擴展其勢力。“法蘭西天主教青年會”為法國“天主教行動”的主要基地，該會成立於1886年，成員有五個群眾性組織（工人的，農民的，資產階級青年的，大學生的和青年水手的）。“法蘭西天主教青年會”的領導權在不久以前是屬於“天主教青年工人”和“天主教青年農民”的。1956年時，由於“天主教青年工人”的領導機構拒絕屈從於“法蘭西天主教青年會”的反動首領們，因而使該會發生分裂。1950年時成立了“工人天主教行動”一組織，參加該組織的有在群眾性工人組織中工作的教權派積極份子。在“天主教行動”的下層組織中，要求和共產黨人共同為和平與社會進步而鬥爭的傾向是非常強烈的。

“天主教行動”在法國的另一個支柱為天主教的職工會——“法國天主教勞工聯盟”，會員人數在1956年時在30萬人左右。“法國天主教勞工聯盟”中有左翼，雖然不是始終一貫地，但他們贊成所有的勞動群眾行動統一。

法國教權派運動的歷史證明，雖然天主教會為了使自己在受到法國革命的打擊後能恢復元氣而作了一切試圖，然而教會在這方面沒有獲得任何真正的成功。為了爭取廣大群眾的擁護而提出進步性綱領的教權派們，例如，桑尼，他們的這種試圖受

到法国主教会和梵蒂冈无情的压迫，这只能促使法国天主教阵营内部的矛盾更为尖锐化。

在比利时天主教运动起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它起着王国政权的支柱和防止社会主义的堤坝作用。这个国家的主教会比较早地开始建立天主教职工会（在1867年），然而教权派的主要力量在于它对农民群众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者对农民问题没有充分的估计，所以农民让教权派操纵了。1890年时，教权派组织了“农民同盟”，它不仅包括地主和富农，连大部份中农和小农也参加了这组织。“农民同盟”的各种团体，如互助金金库，合作社，银行，保险公司，体育和歌咏团体等，网罗了农民生活从生迄死的各个方面。

教权派在工人中间就不能获得这样显赫的地位。1920年时，社会主义职工会的会员为71万8千人，而天主教职工会只不过拥有会员6万5千人。美国教权派历史学者马迪在谈到二十世纪初期比利时天主教职工会时写道，天主教职工会缺乏赢得劳动群众信任所必需的典型的工人精神。“天主教徒害怕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敢组织由工人们自己领导的纯粹的工人组织。”^①资本家们领导着教权派的职工会。“天主教的社会组织缺乏具有积极性的，进步性和建设性的纲领——教权派份子马迪证明道。——他们仅不过起着反对社会主义的防护工具的作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可是这不能算作是纲领……他们的首领热烈地捍卫宗教主义，对根本性的和迅速的經濟改革畏缩不前。天主教政党中占优势地位的保守派们对社会党天主教徒看不顺眼，甚至怀着敌意。他们准备和社会主义作斗争，但不愿意对于他们有利的社会条件作某种改变。”^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害怕革命运动发展，教权派们改换

① 马迪：“比利时的天主教社会运动”（“教会与社会”，第304页）。

② 同上。

了策略。他們把工人出身受过專門訓練的积极份子安置在教权派职工会的领导位置上,这些人开始提出各种蠱惑民心的要求。結果教权派得以大大地增加天主教职工会會員的数目。

除了“农民同盟”和教权派职工会以外,在比利时“天主教行动”的领导下,工人和农民青年的組織也积极地活动着(“天主教青年工人”,“天主教青年农民”)。

比利时教权派的天主教社会党早已变成成为比利时资产阶级的一个反动的大政党。正如比利时自由党主席迪斯津耐所指出,“天主教社会党的队伍內有着所有各阶层的代表——从资本家以至工人和农民。然而这个党的特征在于参加該党最适合的是拥有巨額财产和爵位的人”。^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比利时的教权派政府支持对侵略者的綏靖政策,和指望希特勒胜利。教权派政党非正式的領袖比王利奥普三世曾得到德国占領者的庇护。战后比利时的教权派們曾一度使利奥普三世复位,但并不成功。他們支持“冷战”政策,北大西洋同盟和其他侵略性軍事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即比利时法西斯运动(基督国王主义)是教权派組織“基督国王”的成員所发起的。佛来米民族主义者(前綫党,1940年时改名为佛来米民族同盟)的亲法西斯运动也是在天主教会影响之下的。

比利时的天主教会是梵蒂岡在西欧的一个重要堡垒之一。比利时的天主教会为进行传教工作提供了大批的教士。在受梵蒂岡监督的比利时天主教最大的路汶大学中,設有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而訓練传教士的专门学校,甚至还設有为苏联訓練传教士的专门学校。

荷兰的天主教徒占少数,在上世紀末时在荷兰成立了羅馬天主教国家党,該党至今还存在,已改名为天主教人民党。这是一个公开的反动政党,它支持荷兰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特

^① “新时代”,1956年7月19日。

別表現在对印度尼西亚方面。它和教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依靠着荷兰大部分天主教徒参加的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各种教权派的联合会和协会。在荷兰天主教徒之中有不少真誠的和平拥护者，和关心改善劳动人民境况的人士。但是教权派政党的领导是由好战的反动份子組成的。

德国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产生了教权派的政党——中央党。这个党代表着天主教領域內这些资产阶级和地主們的利益，他們以尊崇教权作为对抗社会主义的武器，作为遏止普魯士企图在全德意志事务中占执牛耳地位的这种野心的手段。俾斯麦期望在政治上击败教权派，期望在反对扩张教权的声浪下使工人們离开同资本主义和君主政体的斗争。

俾斯麦的期望沒有实现。他的“文化斗争”运动仅仅燃起了教权派的狂热和促进他們的团结，工人們也沒有上反对扩张教权运动的圈套，他們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俾斯麦为了巩固反动势力对抗社会民主党，最后和教权派取得和解。

1890年时，德国的教权派們建立了“人民协会”^①群众性組織，它拥有自己的互助金金庫，銀行，养老院，啤酒酒店，运动团体等，受到魯尔大工业家的撥款支持和受警察与德皇的庇护。“人民协会”的主要任务为与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作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十五年期間中——梵蒂岡历史学者阿芙乐·曼汉頓指出——如果把和別洛夫宰相发生冲突的短短时期不算在內，在德意志帝国議會中有着最强大的議會党团的天主教政党，是从高根洛哀起直到別特曼—霍尔威格止所有帝国总理的最有势力的同盟者，也是支持德意志帝国主义主要力量之一。”^②

中央党欢迎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支持布列斯特和

① 全名为“德国天主教人民协会”。

② 阿芙乐·曼汉頓：“梵蒂岡”，莫斯科，1948年，第151頁。

約。当德皇威廉的德国垮台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得到胜利，因之将自己的前途付托于中央党。资产阶级的打算没有落空。中央党的“左翼”首領們（例如爱尔茨貝尔格以及其它人）签订了凡尔赛和約，然后偕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領們作出一切可能，以妨碍工人阶级得到胜利。当他们达到这目的后，中央党“左翼”的首領們即讓位給右翼份子——高級教士路德維格·卡斯，勃柳宁和馮·巴本，后者最后为希特勒执政开辟了道路。1933年时，中央党的議員——其中許多人为现今西德总理阿登的同伙，例如雅柯泼·凱撒，亨利·福凱尔，亨利·克虜伯，叶琳娜·維佩尔等——投票贊成希特勒掌有非常的权力。卡斯当时在議會中是这样地为教权派支持希特勒的决定辯白的：“德国中央党总是力求民族团结。当在这一个历史紧要时刻，当应该忘記所有次要政治糾紛的时刻，中央党意識到自己在人民前的責任，不管所有党及政治上的任何其它的信念，它拥护团结（同希特勒团结——作者）。总理先生（即希特勒——作者）对国家生活中重要問題以及对法律和文化方面重要問題所作的切实保証，允許我們——关于这一点我公开地和极为欣慰地声明——能对因在这里討論这个法律而产生的情感予以公正的評价。由于注意到总理的保証将作为政府将来立法活动的基础，德国中央党同意投贊成通过非常权力的法律。”^①

当时任科倫付市长一职的阿登納也站在同样的立場上。阿登納領導的科倫市政厅的中央党党团，在1933年3月30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說：

“我們在任何情势下不应妨碍总理先生引导走上执政地位

① 阿历山大·洛菲尔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天主教”，华沙，1952年，第42—43頁。

甚至于当卡斯脫离德国政治舞台，定居于梵蒂岡以后，他还繼續在叢雜“元首”。“希特勒懂得如何駕馭國家”——卡斯在1933年年底在羅馬对記者說（同上，341—342頁）。

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在胜利的国民革命过程中组成的。这种反抗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和无法预测的后果。由于考虑到已经形成的局势，应该为这个政府建立起它能够依靠的尽可能广泛的基础。

我们欢迎消灭共产主义和镇压马克思主义，现在这一行动规模之大是战后所有期间内无法办到的。从1918年起，社会主义思想渗入德国人民意识中这一事实，妨碍我们至今不能着手建立一个符合我们观点的国家，因为天主教少数派的能力只能防止社会主义最有危险性的影响。”^①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仇恨，以及对德国劳动人民的敌视，这种情绪在中央党的领导集团中高于其他一切的考虑。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份子对于中央党的右翼领导者而言，是他们理想的同盟者的原因。

1933年7月5日，中央党的领导机构为了不妨碍希特勒份子起见，解散了自己的党。中央党的领导机构在解散该党的宣言中声称：“前中央党的成员，不管是谁，满怀着为建设新国家和建立起新的国民共同体而贡献出一份力量的真诚愿望”。就是这样，正如德国历史学者奥托·温采尔所指出：“在自动解散的时候，这个党公开地表示和希特勒团结。现在中央党已改称为基督教民主党，它是波恩政府联盟中的主要政党。当时天主教中央的右翼份子和重工业大资本家们联合在一起，聚集在巴本、克洛克纳、费尔德门格斯等人的周围，和希特勒共同奋斗。于是为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的军备竞赛就开始了。”^②

德国天主教会当局也和重工业大资本家们，银行以及垄断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敌视进步的工人运动，为了巩固希特勒的血腥独裁制度干出了一切可能干的事。德国的主教会在1933

① 奥托·温采尔：“十二年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而斗争”，莫斯科，1956年，第35—36页。

② 同上，第47页。

年为降灵节而写给信徒的文告中说：“我们天主教徒是易于对在德意志国家中坚定地出现的新政权予以正确评价的，我们准备服从这个政权。这种准备不仅是人的天生美德，但也是上帝的训谕。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人间的权力中，都能看出上帝天国的反映和看出它是依附于上帝永恒的权力的……我们天主教徒对新的国家政权为了保护我国人民的自由而追求的目的，也表示拥护。”^①

梵蒂冈对希特勒表示友好，如同对墨索里尼一样。1933年时，庇护十一世和希特勒缔结了宗教条约，这个条约被世界舆论解释成为梵蒂冈和纳粹的同盟条约。前梵蒂冈国务院工作人员，因反对梵蒂冈和法西斯合作而辞职的教士埃涅斯脱·鲍纳犹蒂指出，在签订宗教条约之后“教皇厅正式承认这个按其实质是一种偶像崇拜的制度，并为它祝福。无怪乎‘人民观察者’要急于把宗教条约的签订，解释成教皇无疑地已承认纳粹制度，而教皇厅派外交使节驻柏林是赞同德国政治的发展”。^②正如奥托·温采尔正确地强调的那样：“纳粹党人在签订宗教条约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消除德国天主教广大劳动群众的不信任，和摧毁他们的反抗。”^③

宗教条约第三十一条对希特勒最为有利，这条规定准许所有教权派的组织和纳粹的组织合并（统一）。

教权派的领袖们以馮·巴本为代表和其它等人帮助希特勒重整军备，积极参加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活动，而教会当局在同一时期则作出一切可能，帮助纳粹党人扼杀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我们只要引“现代宗教问题手册”为例就足够了，该手册初版在1937年，1940年毫无修改地再版，两次都是得到天主教主教会的赞同和许可的。“手册”毫不掩饰地为纳粹兽

① 奥托·温采尔：“十二年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而斗争”，第48页。

② 埃涅斯脱·鲍纳犹蒂：“庇护十二世”，罗马，1946年，第126—127页。

③ 奥托·温采尔：“十二年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而斗争”，第48页。

性的思想体系辯护。“在对于我国人民决定性的时刻——‘手冊’的作者弗里堡大主教康拉脫·格累貝尔写道——教会的領導者們特別忠誠地肩并肩地和国家活动家站在一起(即和希特勒及其党羽——作者),准备对共同的敌人予以反击。他們在为基督教,为我国人民对上帝真正的信仰而斗争的时候,以自己的力量巩固了元首在我們祖国筑成的反对布尔什維克主义有效的障碍物”。^①“手冊”中全部文章是以这种对納粹主义表示忠心耿耿的笔調写的。

战争时期中,僧侶和教权派們在希特勒还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时,一直支持他。当他們明白納粹德国一定要战敗,他們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一样,企图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他們参加將軍們的密謀,希望建立一个为西方强国所接受的反动的“反布尔什維克”独裁政体,他們和西方强国的談判是通过梵蒂岡,通过战争时期內住在瑞士的美国諜报机构在欧洲的領導人亚倫·杜勒斯进行的。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巴伐利亚州为基督社会联盟),是战后西德資產階級主要的政党。阿登納領導着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周围,聚集着中央党和一系列德国其他資產階級政党的残兵敗将,这个政党最初試圖取得厌倦战争和对法西斯失望的群众的支持,所以曾提出民主性的綱領。例如阿登納在1947年1月1日对德国人民发表演說,他肯定地說:“我們同意我們的国家完全解除武裝,同意消灭我国的軍事工业,并且同意在条約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規定對我們进行广泛的監督。我将說得更多一些,我确信德国人民的大多数将会同意我国在符合国际公法的原则下仿照瑞士的榜样恪守中立。”^②

这种保証應該使社会輿論有利于教权派。然而阿登納和他

^① “今日的宗教問題手冊”,大主教康拉脫·格累貝尔博士編。德國主教会推荐讀物,夫賴堡,1940年,第36頁。

^② “灵魂月刊”,巴黎,1955年5月,第807頁。

的朋友們的復仇主義政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參加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推行普遍義務兵役制——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戰後最初年代中阿登納的演說是如何地虛偽。阿登納不僅禁止德國共產黨，還迫害那些由於過去悲痛教訓，因而反對軍國主義化和擁護東西方取得和解的天主教徒。民主主義天主教徒的機關“終結和開始”，建立於1946年，被西德當局所查封。只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進步的信徒團結在基督教民主聯盟之中，他們和所有的民主力量手攜手地為在民主基礎上統一德國而鬥爭。

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是大資本家的政黨。該黨在聯邦議院中的黨團之中的三分之二為壟斷資本家，工業家和容克貴族^①。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領導人物之一為西德著名銀行家費爾德門格斯。他在經濟上資助基督教民主聯盟。1953年大選時，他為基督教民主聯盟張羅了1億5千萬馬克以上的選舉經費。費爾德門格斯是聯邦議院的議員和阿登納的親信顧問，阿登納有一天說過：“我們的黨把費爾德門格斯的事業作為自己的事業。”^②費爾德門格斯為現代“基督教民主”的典型代表，他擁有西德最大的科倫銀行，是22個康采恩和公司監事會的監事，其中包括“通用電氣公司”，“聯合鋼鐵公司”，蒂森，克洛克納和其他曾經資助過希特勒的康采恩。

西德沒有如同“天主教行動”型的群眾性組織。天主教會在西德服從教權派政黨的統治集團，不打算在政治舞台上充當獨立的角色。

必須指出，基督教民主聯盟不僅受到天主教會的支持，也受到新教的支持。根據1956年的資料，基督教民主聯盟中央委員會40個委員中有16個是新教的積極活動者，其中包括聯邦議院議長格斯登美爾，基督教民主聯盟議院黨團付主席希林，希林

① 庫爾脫·普里茲庫拉：“教會的權貴們”，慕尼黑，1955年，第298頁。

② 彼得·席克巴哈：“波恩民主幕後”，柏林，1954年，第58頁。

为西德和其他一些国家新教中央机构的顧問。同年份联邦政党 11 个教权派部长之中有 4 个是新教徒。^①

从这些事实可以明白,为什么西德天主教会的发展“天主教行动”型的組織不关心,因为它恐怕对天主教会的政治野心抱不信任态度的新教份子退出基督教民主联盟。

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沒有成立独立的基督教职工会。教权派的职工会积极份子参加了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統一的工会联合会。教权派在該組織中为右翼。他們以分裂作为威胁,在对他們有利的方面对工会联合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施展压力。这种情况一直維持到 1955 年,当阿登納的軍国主义政策遭到了工会联合会方面反击的时候。教权派当时示威性地退出了該組織,組成了分裂派的基督教职工会中心,其第一届大会是在 1956 年 7 月在埃森举行的。

教权派运动在奥地利的发展途径与在德国稍有不同。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尚在十八世紀末期时已是君主政体順从的工具。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了同它們作斗争,在 1887 年产生了教权派政党,該党的社会基础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奥地利的教权派們以反犹太主义見著,他們在这方面比希特勒先行了数十年。他們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曾进行了无耻的宣传运动,在各方面支持奥匈帝国主义。

1918 年共和国建立以后,教权派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主要支柱。1934 年时,教权派首領陶尔斐斯,舒什尼格,許塔林貝尔格和高级教士柴毕尔建立了教权派法西斯专政,以血腥的恐怖手段镇压工人反抗。正如前舒什尼格政府社会保障部长約瑟夫·道勃立斯別尔格所承認的那样“政治上的天主教有意識地破坏了奥地利的民主”^②。不过,奥地利教权派的首領也不否認

① “改造”,巴黎,1956 年 8 月 23 日。

② 約瑟夫·道勃立斯別尔格:“歧路上的天主教社会政策”,格拉茲,1947 年,第 480 頁。

这一点。例如，舒什尼格和他的同伙采諾都（前教权派法西斯組織“爱国陣綫”的执行秘書和舒什尼格內閣中的部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驕傲地記述他們是如何扼杀奧地利的民主的。

“应该平靜地一頁又一頁地讀完这些書，以便了解它們的作者是如何厚顏无耻地公开地夸耀自己的极权政体的，这种政体似乎‘站在民主政体和法西斯政体的中間’，以便了解他們如何詭辯地企图援引基督传统和教皇的通諭为自己的計劃辯解。”^①天主教徒亚历山大說的真是一針見血。毫無疑問，教权派战前的政策为希特勒侵占奧地利开辟了道路，同时促使奧地利参加了貽禍至今的战争，这种政策在現在受到許多天主教徒的譴責。

1955年时，由天主教政党活动家领导的奧地利政府宣布奧地利遵守中立，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証明部份奧地利天主教徒的路綫有着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梵蒂岡在拉丁美洲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今日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共和国中，都有“天主教行动”的組織，这些組織联合成为“天主教社会行动泛美协会”，会址設在華盛頓。在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秘魯、巴西、委內瑞拉和墨西哥，都有教权派的“基督教社会党”在活动着。在哥倫比亚，厄瓜多尔和智利諸国，保守党受到教会的支持，这些党反过来也予教会以最大的支持。哥倫比亚，委內瑞拉，多米尼加和中美的反动独裁者夸耀自己和梵蒂岡的关系，并依靠教权派份子和天主教会的群众性組織。

美国政府和美国天主教主教会与拉丁美洲的教权派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1955年时，美国付总統尼克松在危地馬拉对当地的大主教馬利安·洛赛尔說“天主教会是全世界各处共产主义最强大的障碍之一”，——梵蒂岡的杂志“天主教文明”是乐意

^① 爱尔加·亚历山大：《德国的教会和社会》（“教会与社会”，紐約，1953年，第485頁）。

登載这番話的。^①馬利安·洛賽爾曾反对阿本斯民主政府和协助阿馬斯上校攫取政权。

数以千計的美国传教士們在拉丁美洲經常工作。在巴拿馬、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海地，梵蒂岡的圣使是由美国天主教教会的代表担任的。斯毕尔曼經常在拉丁美洲各国作視察旅行。随着美国主教会对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影响的增长，后者愈来愈甚地服从于美国統治階級的利益。

对西欧和美洲某些国家的教权派政治运动的簡要分析指出，这一运动在战后年代中，首先为与美国金融資本有密切关系的資產階級集团的利益服务。依靠着梵蒂岡领导的“天主教行动”和其他群众性組織，依靠着教会和教会僧侶阶层，以及在美国独占資本的支持下，教权派在許多国家领导着和进步力量作斗争的最反动的集团。

梵蒂岡的政治路綫，教权派政党和教权派群众組織的活动，揭露了天主教会的真面目，它是資本主义秩序的支持者之一，是众所周知的企图攫取世界霸权的美国統治集团的同盟者。因此就要来研究一下天主教陣营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及其現状。

^① “天主教文明”，羅馬，1956年2月18日，第3頁。

第六章

美国的天主教

在去認識美国天主教会的活动的时候，应注意到教会当局对美国有势力集团侵略性外交路綫的支持。尚在1946年时，美国教会活动家乔治·海特莱在“教会和有組織的运动”文集中写道：“今日美国和欧洲的天主教宣传机关願意接受那些坚持說和俄国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受那些因此希望立即发动战争的人的吩咐。”^①六年以后，美国教会評論家布兰却，他显然不是对苏联抱好感的，指出“虽然教皇呼吁和平的辞句是很动听的，然而天主教在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战争問題上流传极广的观点，比起任何一个社会团体的观点还要富有侵略性。在美国这种观点已近于歇斯底里。它毫不掩飾地鼓吹发动神圣战争，充滿着宗教十字軍所特有的夸张情緒”^②。乔治·舒斯脫在“美国的天主教”（紐約，1954年）一書的序言中写道，許多美国天主教徒只要听得共产党人說一个“贊成”，便条件反射地說“反对”。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天主教活动家們所以要反对职工会、种族平等和消灭人口臃肿城市中的貧民窟，只是因为共产党人贊成的

① 乔治·海特莱：“反鴉片同盟”（載“教会和有組織的运动”，第二卷，紐約，1946年，第74—75頁）。

② 保罗·布兰却：“共产主义、民主和天主教的权力”，倫敦，1952年，第298—299頁。

緣故^①。

庇護十二世的朋友，紐約大主教，紅衣主教斯畢爾曼是美國天主教會中最有勢力的人物，他是“實力政策”的擁護者。只須提起他在1954年在巴黎的演說就可以了，他號召法國人“結束猶豫不決的態度”，加強在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法國“戰鬥報”當時是這樣評論美國紅衣主教的演說的，“斯畢爾曼為奠邊府提供了思想上的掩蔽所……法國人將永遠不會忘記，當他們的历史處於最危急的時刻，有一個披着紅衣主教袈裟的外國人來向他們發表演說，而這些話是他們不習慣從一個奉侍神的人那里聽到的。”^② 1956年初，斯畢爾曼訪問了西德，在那里他發表演說，號召德國人和“共產主義”作鬥爭。

民主陣營內批判梵蒂岡的人士指出，天主教會以自己最權威的人物為首，和壟斷資本集團共同執行侵略政策。這些批評者們這樣地說，是以眾所周知的事實為根據的。共產黨人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和平共處，他們贊成全世界和平，擁護“日內瓦精神”，反對“冷戰”。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再一次向全世界肯定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以共產黨人以及一切真誠希望和平的人們不能對這種現象置之不理，即對國際反動集團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宗教，以及對天主教會——特別是美國的主教會——的某些代表人物和上述集團的合作現象置之不理。

美國的教會雖然在形式上和國家分離，然而教會所有的做法都和國家合作，以保衛資本主義秩序。天主教歷史學者弗蘭西斯·唐寧承認，從國家方面來說，它對待宗教和僧侶如同對待政權的輔助機構一樣^③。

① “時代”周刊，紐約，1954年5月17日。

② “新時代”，第22期，1954年5月29日，第17頁。

③ 法蘭西斯·唐寧：“天主教對美國工人運動的貢獻”（“教會和社會”，馬迪主編，紐約，1953年，第849頁）。

美国的教会为統治阶级焚香祝祷，統治阶级的代表們則公开地起誓，表示忠誠于宗教。

美国的資本主义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內，在上世紀期間，推向西部，与之伴随着的是几乎把土著消灭光、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以及对美国劳动者残酷的剝削。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美国历史学者們則臆惧地称这个时期为“命运中不可避免的”，为“全能的上帝的意旨”。根据这一“理論”，洛克菲勒，梅隆，福特和其他金融資本的代表人物也根据上帝的命令而来到了这个世界。美国的百万巨富們不但在剝削劳动人民事业上大有成績，并且在“虔信”的領域中，他們的事业也不坏，他們修建了各种教派的教堂，宣諭道德訓誡，規劝人民要順从和信仰全能的上帝，他們希冀使人民相信，資本家們所以有他們今日的地位和財富應該感謝上帝。美国的某些国家活动家的言行正与之相同。麦金萊总统（美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他的命令而侵占菲律宾的）曾經說过，在采取侵菲这一步驟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地“跪下祷告，祈求全能的上帝”为他指引道路。于是如同麦金萊所說的那樣，真的产生了“奇迹”；根据“上帝的启示”他突然明白了，“对于我們來說（即对于美国资产阶级——作者），正應該占有所有菲律宾島屿，教导和提高它，并使它文明化，給他們灌輸基督理想，因为他們也是我們的人类弟兄，耶穌基督也為他們而死的”。根据“上帝的启示”西奥多·罗斯福“占有了”巴拿馬，威尔逊企图“占有”墨西哥和西伯利亚，而柯里士和胡佛向拉丁美洲派遣了武装干涉部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宗教領域中亦甚为活跃。

杜勒斯是一个长老会派牧师的兒子，大垄断資本和托辣斯的律師，他在共和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着重要的位置。金融—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的結合是杜勒斯的特色。杜勒斯是新教世界运动的倡議者之一，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將所有的基督教会联合成为一个全世界性的教会。杜勒斯是屬於新教活动家中对天主

教明显示弱的蜕变份子之群的。1955年时，他的兒子之一爱弗莱·杜勒斯改信天主教和加入了耶稣会。在爱弗莱·杜勒斯被接受入天主教的典礼上，老杜勒斯曾发表演说，他声称“我因幸福而十分激动，因为我的兒子信奉了天主教。”^①

每逢星期日杜勒斯在华盛顿保守的长老会派教堂作布道演说，这些演说其后由美国国务院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官方文件印发。

在杜勒斯发表的这种布道演说之一，1953年10月1日以“我們祖先的信仰”为题的演说中，他发展着一个论据，即资本主义文明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来巩固它，将不能生存。布道者杜勒斯使他的由銀行家，工厂主和大公司的律师組成的听道者們确信：“我們是理想主义者，我們有着道德原則，而我們的反对者共产党人是唯物論者，他們否定道德規則”。“美国政府——杜勒斯随后宣称——所信仰的首先不是物質财富，而是精神财富……我們的反对者們最大的弱点在于他們是坚信不渝的唯物論者。”^②大家知道，杜勒斯及其听道者們的反对者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是正在建設着社会主义或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着的各族人民。很明显，杜勒斯因为人民希望自由地生活和如人地生活，而称他們为“坚信不渝的唯物論者”，而称自己和自己的拥有巨額資金的朋友們为理想主义者，献身于道德者。难道这不是顛倒黑白嗎？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届內閣中有十个百万富翁和一个水道工人——职工会首領托平。內閣閣員們(其中包括“理想主义者”杜勒斯)和86家大公司有着正式联系，这些公司的资产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大公司在1954年时的純利为178亿美元。有代表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各大公司和垄断資本，其利潤特別巨

① “改造”，巴黎，1956年7月14日。

②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我們祖先的信仰”，美国国务院，华盛顿，1954年，第5、9頁。

大。通用汽車公司的純利在 1955 年時打破紀錄數字，達 10 億美元，該公司的前任經理威爾遜曾任國防部長^①。在美國百分之一的人擁有全部國家財富的 59%，而 87% 的人却只分得全部國家財富的 8%^②。

這就是美國的實況，在美國，政權掌握在信仰“精神財富”的百萬巨富——“理想主義者”的手中。在勞動者——“唯物論者”領導着國家的社會主義各國中，所有的國家財富歸屬於勞動人民。這些國家中沒有資本家，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是的，共產黨人是否定資本主義“道德”規則的。他們的理想符合人類絕對多數的利益，可是資本主義制度捍衛者的理想，不論他們如何向上帝禱告，只符合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

這一情況是值得注意的，即在反對各族人民利益的侵略政策問題方面，資本主義集團中的代表人物，不論是信奉新教的，其代表人物之一為杜勒斯，或是信奉天主教的，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

1955 年 4 月間，杜勒斯在華盛頓舉行的耶穌會各高等學院的校友大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他演說的主旨在為戰爭不可避免這一論調辯護。他聲稱，和平有利於共產黨人，所以他排除各族人民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在某種條件下時”“精神財富”的捍衛者杜勒斯斷言，“和平可能導致人類的衰退和使人們的精神墮落到這般程度，即消滅了作道德上和理智上判斷的能力”。這位布道者對這一點認為還是避而不談的好，即持久和平的確立，會使靠軍備競賽發財的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巨大利潤減少。

1956 年 2 月公布的英美兩國政府首腦的共同宣言是同樣地偽善，這一宣言的本文象教皇的通諭，而不象出諸於現代國家

① 索林：“近年來美國施行的經濟措施為美國壟斷資本帶來了什麼？”（“經濟問題”，1956 年第 1 期，第 85 頁）。

② 契波拉柯夫：“現代資本主義的某些問題”（“共產黨人”，1956 年第 1 期，第 106 頁）。

活动家之手的文件。这一宣言甚至连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也称之为“外交上伪善的典范”，宣言是以下列夸大其辞的声明为开端的：“我们意识到，在过去的1956年间，在认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和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安排的人们，与认为人只是生来为国家机器服务的人们之间的由来已久的斗争，仍旧汹涌未平”。类似这种的论据是用来为“冷战”政策辩护的，和“提高”北大西洋同盟主要伙伴们的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难道为自由而斗争着的塞浦路斯岛上的爱国者们是没有信仰的？难道起而反对巴格达条约的约旦人民，和捍卫自己独立的埃及人民都是没有信仰的？同时，被剥夺了自由的危地马拉的人民，谴责“冷战”的印度人民以及为和平而斗争着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劳动人民，难道他们都认为“人应该作为国家机器的工具吗？”为了了解英美两国国家活动家将全世界分成为有信仰者和无信仰者的企图仅不过是一张幕，用以遮盖住主要帝国主义强国所奉行的政策的利己主义性质，只要提出上述问题就足够了。这种理论的毫无根据仅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清楚，即根据美国官方统计，48%的美国人民不属于任何教会^①，或至少是对宗教表示冷淡的。在美国虽然宣称信仰自由，不信任何宗教的人在权利方面却受到限制。例如在阿肯色、马里兰、密西西比、得克萨斯各州，法律禁止选举不信有上帝存在的人担任公职。在某些其他州中，这类人不准作证人和陪审员。然而48%的美国人宁愿不领受因隶属于某一教会而得享受的好处。按照杜勒斯的说法，难道他们希望做“国家机器的奴隶”吗？

上面提到的共同宣言企图使人相信，即按照共产党人的意见，人似乎生来为国家机器服务的，虽然大家知道，共产党人恰巧抱着与之相反的观点。共产党人认为，国家机器（政府，法庭，警察，军队）应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保护他们。难道苏联

^① 赫伯脱·舒纳特：“二十世纪美国的宗教”，剑桥，1952年，第92页。

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的国家机器保护着资本家的利益嗎？难道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刷新他们的精神面貌，没有作可能作的一切嗎？又难道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机器没有把“小人物”——工人和佃农——压个粉碎？

在资产阶级国家之中，国家机器是作为与劳动人民对立的敌对力量的，而且常常借口说这是天意来作辩护。难道美国的安全法律，国会和其他迫害异端份子的法庭不是在追求着这一目的嗎？这些法庭的导演们要使人相信，他们“猎逐巫女的行动”是得到上苍支持的。法国多米尼加会徒布吕克伯尔格尔在1950年访问美国后谈到，有一个著名的美国法官说，他每次判决共产党人服苦役后，上帝都来访问他，对他表示感谢。甚至于连老于世故的布吕克伯尔格尔也无法掩盖他对这种假仁假义透顶的行为嫌恶的心情①。

在美国资本和教会的联系是如此地多样化和牢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如此肆无忌惮地利用宗教，这在任何其他国家中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一情况同时也说明了现代美国和梵蒂冈间关系的性质。

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首先援引象里斯东·朴伯的“工厂主与布道者”这样一本无偏见的研究著作中的资料，这本书于1942年在美国出版。朴伯当时在耶鲁大学神学院担任社会伦理学讲师。根据他的某些论点来判断，他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者，换句话说——是个“毫无可疑之点”的人。

朴伯专事研究美国的资本和宗教间的关系，他以哈斯康尼的历史为例，该地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工业中心，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初已出现最初的纺织工厂。几乎全部工厂主和工厂的创办人，自1870年起至1900年为止这一时期内，93个工厂主中有91个是各种宗教团体的积极会员。最初的纺织厂老板们使

① 布吕克伯尔格尔：“金字塔式的美日”，巴黎，1952年，第189页。

人相信，工厂事业对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个人致富的途径，毋宁说是提高自己受苦的“弟兄们”福利的源泉。工厂主们将工厂事业视为“上帝的事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迫使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或者更多一些。所有这一切使某些研究者有口实硬说，哈斯康尼工业的产生具有宗教上共立勳业的性质。

然而事实驳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业家们，和他们现代的頌揚者们的伪善的高谈闊論。“虽然有着对他们工业家们而发的许多頌贊詞，把他们描繪成基督的慈善家——朴伯指出——然而在分析他们的工业活动以后，关于他们无私的評價被迫作根本性的改变。工业家们在自己的企业中广泛采用童工，他们在社会輿論严厉地譴責这种作法以后，还繼續使用童工。他们常常付出极低的工資，如每日工資仅为1毛錢，他们为这种低工資和自己收入之間的高低悬殊而辯护道，工人们这一工資和他们原先在农业中工作时所得的工資相比，已經高了”^①。朴伯得出結論說：“显然可以这样說，获得利潤的願望在工业家的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至于論到宗教，則不过是一张假面具，自始就为工厂主的經濟利益服务的，不管他们是有意識地为此目的而利用宗教，还是无意識的”^②。

宗教在客觀上帮助工厂主致富。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呢？朴伯解释道：僧侶們不发表談話反对或譴責工厂主采取的剝削工人的方法，——僧侶們頌揚工厂主的活动，教士們和工厂主不但在精神上共通，并且在物質利益上也休戚相关，因为僧侶們拥有紡織公司的股票，常常拋掉袈裟而直接到工厂主那里去工作。

僧侶們使自己信徒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頒行“禁酒法規”上面——要求禁止出售含有酒精的飲料。朴伯認為，僧侶們要求頒行“禁酒法規”的宣传有利于工业主，因为教士把工人们一切的不幸——貧困，职业病等——都归結为工人们嗜酒，而不是由

① 里斯东·朴伯：“工厂主和布道者”，紐約—倫敦，1942年，第18頁。

② 同上，第20頁。

于資本主义的剝削所致。“要求頒行‘禁酒法規’的斗争使工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使這問題成为社会的中心問題，因为人們对‘禁酒法規’发生兴趣，因之几乎所有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都在暗中被抽掉了。”^①这种宣传在今日仍然是南方各州僧侶們的中心工作，用以把劳动者誘离反对剝削者的斗争。

“教会对工厂主无疑的忠心”朴伯繼續写到，“对于教会的內部生活和寺院的修建有着重大影响。紡織工业的先驅者(工厂主)，其大多数在自己的居住区中出錢出力，帮助宗教組織发展成长，他們常常是設立主日学校和牧师协会的倡議者，聘請布道师和建筑教会。”^②

工厂主予教会团体和教士个人以金錢。教士們恐怕自己收入的来源被揭露，特別在人們指責他們是“工厂主出錢雇用的代理人”以后^③。工厂主通过邮局将支票汇給教士，或者在工厂的办公室中亲手交給他們。作者引用了各种証据和数字証据，以此为根据作出了下列結論，即工厂主付給教士們的錢等于他們平均津薪的20%^④。

在許多情形下，教会的房屋和土地是属于工厂主的。工厂主們領導着乡鎮小教区的牧师会，或者在其中占着重要的职位(通常为司庫)。朴伯援引一位名为斯考福尔特的教士的声明，这位教士是1929年罢工风潮席卷茄斯东尼亚时少数站在工人方面的教士之一，他在声明中說道“毫無疑問，教会是工厂主的財產和受他們控制的”，而僧侶們則演着“为工业显貴服务的道德警察”的角色^⑤。

1929年茄斯东尼亚市的紡織工人总罢工期間，教会的階級

① 里斯东·朴伯：“工厂主和布道者”，1942年，第36—37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40、151—152頁。

④ 同上，第149頁。

⑤ 同上，第283頁。

性質表現得特別明顯，在當時政府按照工廠主的要求槍殺工人，把最積極的罷工工人投入監獄。朴伯指出，幾乎全部當地的僧侶（一百個以上的教士），除去兩三個教士是例外，都站在工廠主和當局的一邊。作者寫道，僧侶們的意見由一個教士代為表達了，這個教士要求“把罷工的組織者推倒瀝青中，四周倒上鵝毛，然後投入最近的湖泊中去”^①。罷工被鎮壓下去以後，工廠主們確定每月和僧侶們開一次會，會上討論與工人運動作共同鬥爭的方法。教士每參加一次這種會議可得5塊美金。

罷工被鎮壓後，業主們開始只僱用持有教士介紹信的工人來工作。這種介紹信與政治上可靠的證明文件毫無二致，教士們在出具上述介紹信的同時，從而起了有利於工廠主的警察功能。

作者在結尾作出了下列結論：“教士不僅允許利用教規的力量與反對現存經濟制度的人作鬥爭，並且在上述路線方面本身也參加利用這一力量。僧侶在改變經濟生活方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教士們到處絕對地和堅決地贊揚現存的經濟制度，這根據他們的言行就可以判斷出來。”^②

朴伯在關於茄斯東尼亞工業區豐富的事實資料的基礎上提出的問題，是與整個美國有關連的。在茄斯東尼亞和紐約，在加利福尼亞和佛羅里達，在芝加哥和華盛頓，資本家和神父們大致是這樣議論着：“宗教是牛油。我們在潤滑生活機器的時候愈是用得多，那麼零件的摩擦愈少，機匠的活兒愈輕鬆”。高爾基作品中美國的“國王——共和主義者”就是這般地議論的。柯里士總統當時也曾這般地議論過，他說“如果在人民中間沒有服從法律的堅定準備——這種準備是宗教的虔敬所教導的，那麼警察欲將秩序導入生活中的全部藝術都是徒然無效的”；杜勒斯今日也是這樣地議論着，他在所著的“戰爭或和平”一書中斷言：“當人民變成物質財富的奴隸時，不幸的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① 里斯東·朴伯：“工廠主和布道者”，第283頁。

^② 同上，第330頁。

“宗教是牛油”——这一观点被美国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教会理论家用各种不同的调子重复地唱着。美国科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院1922年出版的“工业关系与教会”论文集中，资本家卡兰亨(路易斯威尔油漆公司的经理)指出，教会对资本家与工人间关系的干涉，“能够阻止钟摆摆动到最边缘处去，以及不让如同俄国今日那样的情况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从前的特权阶级将被推翻和消灭”。卡兰亨随后教导说，只有教会能够扑灭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抗议。“无论街头防暴，无论枪弹——他写道——都不能抵抗汹涌的群众……”。按照他的话，只有教会才能做到①。

美国科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在1948年出版的同样题目的另一文集中，即在出版我们上面援引过的论文集的26年后，我们已熟悉的观点用新的调子重复地弹着：宗教是牛油，资本主义社会这部机器上这种牛油愈是用得多，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将愈为牢靠。这一次是资本家赫茨发表他的权威性意见了。他写道：“宗教在社会发生动荡、惨祸和危机时期特别重要。当发生自然灾害——水灾、旱灾、瘟疫和地震——的时候，或者当人们由于他们自己造成的灾祸、战争、革命和经济萧条而受苦难的时候，宗教个别地和集体地给与他们伟大的慰藉”②。

美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并不停留在议论宗教对“社会”的益处上面。这有事实说明，即在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领导机构中设有与教会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起着教会与大商人之间的中间人作用。委员会的主席在不久以前是约斯柏尔·克莱恩，他是杜邦康采恩的副经理。

美国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他们对工人阶级和进步阵营的仇恨，以及他们将宗教和教会视作为资本主义辅助力量的这种观

① 卡兰亨：“从雇主观点来看教会在工业中的作用”（载“工业关系与教会”，费城，1922年，第107页）。

② 赫茨：“教会组织”（载“美国的有组织宗教”），费城，1948年，第8—9页。

点，就是促使这些阶级和梵蒂冈以及天主教会亲密的原因。

美国天主教史学者吕根在1930年指出：“当新教，犹太教和其他教派破灭的时候，天主教被人们赏识（在美国），它被视作为社会保守势力的强大组织和巩固的堡垒，它特别受到那些比起其他人愈发感到必需有社会秩序的人们赏识，这种社会秩序在今日使他們有可能无忧无虑地运用领导者、财主和金融家所具有的权利。常常可以找到有一些矿场主和工厂主——新教徒或非教徒，他們出钱修建天主教堂或者小礼拜堂，而爱尔兰的、波兰的和意大利的工人們在其中学习‘依法’尊敬和順从他們的老爷們。对于他們而言，天主教首先是宪兵。”^①

現代的天主教会，它鼓舞着和支持着西欧各国亲美的政党，它在美国是一个最强大的教会组织，正愈来愈得到美国统治阶级的垂青。美国进步杂志“政治月刊”在1950年指出，当美国的资本尚处于襁褓阶段时，它需要持宿命論的新教的支持，这一学說在自由竞争时期曾很好地为它服务过。現在当它成为腐朽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垄断资本的时候，它依賴全世界反动經驗的支持，依賴普遍主义哲学或世界主义哲学和天主教会实践經驗的支持，依賴教会对各族人民的解放独立不可調和的仇視传统^②。

梵蒂冈和美国的亲密，还决定于梵蒂冈总是竭力和每个历史时期中最强大最反动的国家友好，和它結成联盟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証。中世紀早期，教廷勾引的这种力量是弗兰克国王，其后为德意志的皇帝，十六和十七世紀时为西班牙，随后为奥地利，十九世紀上半叶为法国，十九世紀末期为德国和沙皇俄国；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是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起为资本主义陣营的主导国家——美国。甚至于象美国政論家約翰·麦克奈这样一个显然对梵蒂冈怀好感的作

① 吕根：“美国的天主教”，巴黎，1930年，第144頁。

② 謝依曼：“美国的教会与国家”（載“宗教与无神論历史問題”；第2期，莫斯科，1954年，第82頁）。

家，也写道：“羅馬的敌人和友人一致发表这种意見，梵蒂岡期望在美国的保护中找到强有力的世俗界的支持，这种支持天主教会总是在找寻着的，从康士坦丁大帝起一直到墨索里尼”^①。与这个世界上的强者結合在一起——这就是梵蒂岡数百年来外交路綫的主要原則；不同不幸的、弱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在一起——把“天国”送給它們；而同最强大和最反动的在一起，無論是法西斯也好，或者是信新教的帝国主义者也好。

天主教会成为美帝国主义者理想同盟者的过程不是頃刻之間完成的。

殖民地时期天主教在英国北美領地上的作用微不足道。当时只在馬里兰有天主教会。总的來說殖民者是蓄意反对天主教会的，他們怀疑教会。殖民地每年庆祝“教皇日”，在这一日要把羅馬教皇的画象在一定的礼式中付諸火中^②。耶穌会徒特別使人不信任。約翰·亚当斯于1816年因恢复耶穌会問題写信給其侄美国总统杰弗逊說：“耶穌会徒的复活我不喜欢。难道他們在我們这里不是成群地轉来轉去，甚至于任何一个吉普賽流浪者的头目都要羡慕他們嗎？他們假裝成印刷工人，出版者，作家和小学校的視学。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会社在人世間或者在和地獄中要受到永世的非难的話，那么毫無疑問这个会社就是耶穌会。”^③ 哲斐逊在回信中完全同意亚当斯的意見。他們連想都不可能想到，有一天美国的总统竟会是耶穌会徒的朋友和庇护者。

美国的天主教会在十九世紀中叶还是奴隶制的积极捍卫者^④。梵蒂岡現在使人相信，似乎天主教会一直要求解放奴隶，要求种族平等。可是事实揭穿了这一神話。梵蒂岡在十九世紀时在各种借口之下不但拒絕譴責奴隶制，还拒絕譴責販賣奴隶。

① 約翰·麦克奈：“教廷——新的估价”，紐約—多倫多，1952年，第322頁。

② 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莫斯科，1955年，第215頁。

③ 阿芙乐·曼汉頓：“梵蒂岡”，第348頁。

④ 密勒：“耶穌会的权力与秘密”，第430頁。

庇护七世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尤薩尔維于1815年在維也納會議上報告教皇說，對於喀斯戴爾里爵士要求反對販賣奴隸的請求，他支吾其詞地“不損及我們”（即梵蒂岡）地搪塞過去了。“我考慮到，”尤薩爾維解釋道，“一旦譴責販賣奴隸，我們會得罪堅持保存這一為它們帶來巨額金錢利益的信奉天主教的國家”^①。“宗座”關於販賣奴隸和奴隸制度問題的政策，就是由這種“對宗教虔信”的考慮決定的。

內戰前時期的天主教報刊一致支持奴隸主們。波士頓教區的機關刊物“前導”，它反映着美國天主教會的觀點，在1857年寫道：“奴隸主擁有奴隸的權利和他們擁有任何其他財產的權利，是同等地重要”。1862年時“前導”斷言：“解放黑奴在理論上很好，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則是另一回事；不容置疑，馬里蘭的黑人當奴隸的生活比獲得自由時來得好”。

天主教歷史學者約翰·墨菲在他的以美國天主教徒對待外來移民和黑人關係為題的論文中被迫承認：“總的說來，天主教的報刊一致認為奴隸制是一個在當前條件下應該讓它存在的制度。奴隸制的廢除論者和他們的綱領，不消說是受到了反抗，其口實為他們的要求太趨於極端，和支持這些要求會使國家的統一受到威脅。一些為保存奴隸制而辯護的經濟學上的論據也出現了，有一點被斷定了，似乎被解放的黑人的境況完全證明自由沒有為他們帶來好處。有一些人甚至談到要宣布奴隸制是黑人生存所需的自然條件，對於黑人而言處於奴隸狀態比較有利。”^②墨菲在其他一處寫道：“天主教會的領導者們否認黑人受到嘲弄，他們說，總的來說奴隸主是公正地對待奴隸的。他們斷言，奴隸制度的敵人在誹謗奴隸主。”^③

① 卡羅·斯福柴：“現代意大利”，第67頁。

② 約翰·墨菲：“美國天主教徒對移民與黑人態度的分析”，1825—1925年，第77頁。

③ 同上，第187頁。

天主教僧侶們在內戰時積極地站在南方奴隸主的一邊。當戰爭最激烈的時期，南方各州的僧侶們派出以查理斯天主教林欽和耶穌會徒約翰·范农为首的使節團前往歐洲，說服信奉天主教的國家的政府予南方奴隸主更積極的援助^①。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為林肯的被暗殺，凶手鮑斯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耶穌會徒的學生。

美國的天主教會在此以後仍繼續對黑人抱敵對態度。有色人種牧師協會的首領，天主教教士約翰·斯拉戴恩在1903年的一次演說中抱怨道，教會當局阻礙黑人獲得神職^②。甚至於“自由主義的”紅衣主教吉朋——他的傳記作者亞倫·辛克萊是這樣稱他的，也“因為成百萬黑人有着選舉權，然而其教養却不足以了解他的意思而深為不安”^③。為了反駁那些聲言美國天主教會以友好態度對待黑人的人，墨菲寫道：“說天主教學說有利於人們承認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這種說法，在有着許多事實證明這種平等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實行的條件下，收效很小。在這一方面，著名的黑人領袖杜波依斯的聲明是值得注意的，他說‘美國的天主教會比起任何其他一個教會來，更為擁護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我們同意不同意他的話呢？……”^④

北方戰勝南方以後，這正是教皇的世俗權力開始被剝奪的時期，美國的天主教會漸漸地轉變它的政治路線。天主教會愈來愈堅決地支持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它力圖成為一個根據時代精神的“真正的美國教會”。現在它的主要攻擊對象已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第一個美國紅衣主教麥克羅斯凱即由於他詛咒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而知名於世。

① 西奧圖·梅納：“美國天主教史”，第372頁。

② 約翰·墨菲：“美國天主教徒對移民與黑人態度的分析”，1825—1925年，第120頁。

③ 亞倫·辛克萊：“紅衣主教吉朋傳略”，紐約，第一卷，第383—384頁。

④ 約翰·墨菲：“美國天主教徒對移民與黑人態度的分析”，1825—1925年，第144頁。

紅衣主教吉朋使进行社会性蠱惑宣传在美国的天主教圈子中得以流行，他曾得到許多美国总统和百万富翁的讚美，他頑固地奉行使美国的天主教成为現存制度的堡垒的路綫。吉朋在1882年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群众性的天主教組織——“哥倫布騎士团”，以与工人組織“劳动騎士团”相抗衡。他是頑固地劝說里夫十三世提出自己的“社会”綱領，以与“共产党宣言”相抗衡的一小撮人之一。有一些历史学者甚至認為吉朋是“新事物”的共同起草者。^①十九世紀末期，不論在美国还是在梵蒂岡，天主教会的势力如此地扩张，以致于法国的研究者馬克思·勒克勒克在1891年时这样說：“現在盎格魯撒克逊人刚毅和庄严的声音可以在天主教会的领导集团中听见了。美国的教会从前是羅馬教会的一个普通的外部附加物，远离羅馬教会，并且同它关系不密切，現在已成为它主要行动力量之一了。”^②

美国天主教势力和财富的增加，在当时沒有引起梵蒂岡特別的热忱，因为梵蒂岡担心美国的教士們和它决裂，成立独立的美国教会。这种忧虑促使里夫十三世在1899年时写信給吉朋，教皇在信中非难美国天主教会的“美国主义”。里夫十三世的所謂“美国主义”，是指美国天主教会适应资产阶级的风尚、习惯和传统。“所有这一切令人疑心，”里夫十三世写道，“在你們之間有人在筹划和希望在美国創立特別的教会，使它和現存的世界其他各国的教会不同。”^③

在以美国主教会名义的复信中，紅衣主教吉朋同意上述的倾向应受譴責，然而他否認这些倾向是美国所特有的，即否認受到“美国主义”的感染。梵蒂岡与美国主教会間的“冲突”就此結束。

① 呂根：“美国的天主教”，第18頁。

② 馬克思·勒克勒克：“美国紀事（1890年美国經濟危机及宗教危机）”，巴黎，1891年，第289—290頁。

③ 乔治·賽尔特：“梵蒂岡——过去、現在与未来”，1934年，第304頁。

从那时起到今日为止，教皇再也不曾对美国的教士表示过不满。“梵蒂冈对美国教会如此抱好感的原因”，教权派历史学者泰林预测道，“显然是因为美国提供给梵蒂冈的金钱和传教士愈来愈多的缘故。”^①

十九世纪末期起，美国天主教会的主要力量用以同社会主义运动作斗争。“在这个国家之中每个红衣主教，每个大主教，主教和教士在同社会主义作斗争”^②——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领卡尔松在1912年时指出。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丹尼尔·里翁系统地揭露了天主教僧侣们的反工人阴谋。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讚揚天主教教会的反工人宣传。塔夫脱总统曾说过：“我认为，天主教会是这个国家中反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堡垒之一，所以我欢迎它在美国存在。”^③

天主教僧侣们对职工会运动特别重视。红衣主教吉朋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改良主义者首领塞繆尔·龔柏斯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吉朋和主教会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曾不止一次地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宣传工人和资本家的合作。自1910年起，耶稣会组织“基督教救世军”开始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活动着。

二十世纪初时，在美国各大工业中心遇见天主教士一盤惑家已是件极普通的事，他们效法哈本的手法，一方面批判现存的资产阶级秩序和呼吁改善工人的境遇，同时却捍卫资本主义和攻击社会主义。教士约克就是二十世纪初期轟传一时的这种“改革家”之一，他的活动地点为旧金山。实际上这位“工人之友”追逐着什么目的呢？这只要一讀他的传记的作者克劳宁的下列証言就清楚了：“如果约克神父有时对工业家和民政当局严厉得

① 威廉·泰林：“参与政治的教皇”，第150页。

② 丹尼尔·德·里翁：“新苦修主义（在行动中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机器）”，纽约，1928年，第43页。

③ 西奥图·梅纳：“美国天主教史”，第539页。

有些不当，那末这完全不是因为他对他们抱敌对情绪。他的行为可以从他的信念得到解释，他认为统治阶级缺少社会宇宙观和忽视他们的社会责任意味着威胁和平与秩序，并使急进主义者有借口向群众提出他们自己的纲领。”^① 从而可知，约克神父及与他沆瀣一气的“工人”活动家们的社会活动，目的在于妨碍社会主义思想在劳动者中得到传布。

天主教僧侣们一方面从事社会性蛊惑宣传，同时向资本家们证明，他们依靠天主教会比依靠其他教会有利得多。红衣主教吉朋最亲信的顾问约翰·爱尔兰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讲得再明白不过了，这篇演说的标题为“天主教与美国主义”。爱尔兰断言，天主教不抵触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传布天主教，”爱尔兰劝说道，“不会给美国的民法和政治制度（即指美国的统治阶级——作者）带来害处。不但如此，天主教为这些制度带来了对于它们的生命和发展而言极端重要的、积极的和有权威性的宗教因素……教会教导人们说，不服从法律是反对上帝之罪行……最后教会以来世幸福生活这一动人的教义来代替人间的斗争……天主教会是现存社会的救星，它是以上帝的名义和权力如此做的，同时它是宣扬上帝的权力和捍卫上帝的威望的最强大的代理人。”^② 在爱尔兰的演说中，天主教应作为拯救资本主义，使它免遭复亡的一种力量。爱尔兰的演说词已经被收入教会的官方刊物“天主教政治原理”一书中，该书由耶稣会徒赖恩和蒲伦于1948年在纽约出版。这证实天主教僧侣们在今日仍继续认为爱尔兰的演说词是他们的纲领性文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助于美国天主教会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为了动员社会舆论支持美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威尔逊政府广

① 伯纳·克劳宁：“约克神父与旧金山的劳工运动，1900—1910”，华盛顿，1943年，第228页。

② 约翰·爱尔兰：“天主教与美国主义”，（见约翰·赖恩与法兰西斯·蒲伦：“政治原理”，纽约，1948年，第358—359页）。

泛地利用所有教派的宗教組織，其中包括天主教在內，以作為自己綱領的傳布者。

以紅衣主教吉朋為首的天主教僧侶們支持美國政府的軍事計劃，從而更進一步地鞏固了與最大的金融寡頭間的關係，為共同反對社會主義而鬥爭。在戰爭時期，梵蒂岡在美國的代表頑固地號召同社會主義作鬥爭。例如，傳教士約翰·勞沙諾於1917年在美国對資本家發表演說，他說：“一個最危險的禍根，由於歐洲戰爭的結果正在蓬勃地成長——這就是社會主義學說的傳播，而天主教會應該反對這些學說。我們應該準備阻擋社會主義的傳布和起來反對它。”^①

自從美國參戰以後，天主教會對威爾遜的帝國主義政策積極支持。1917年時“全國天主教歐戰後援會”成立，參加的有主教會和最大的天主教世俗組織的代表。這一組織存在到1919年為止，它和國防部和國務院之間交往密切，動員天主教徒參戰。天主教會人士由於他們比其競爭者新教徒組織得好，他們的軍事活動也因而遠為積極。

隨着戰爭接近結束，梵蒂岡一片驚惶不安。梵蒂岡恐懼革命運動在歐洲勝利，它急於鞏固與美國財閥間的關係。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1918年以接待國王的榮譽接待了威爾遜，在他面前逢迎諂媚。他請求威爾遜允許梵蒂岡參加國聯。貝尼奇克脫十五世靠了美國人的幫助，在凡爾賽會議上和意大利的代表奧蘭杜取得聯繫，並試圖商談解決“羅馬問題”。美國的高級教士愈來愈多地佔據教皇廳中的高位。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岡任命美國主教華爾許為派往布伐洛什賑災的天主教使團的首長，而不是任命別人。眾所周知，這個使團的反蘇活動卻比它原來職責所規定的活動要干得多。二十年代時，教皇的國務卿任命許多美國高級教士擔任外交工作，其中有斯畢爾曼，哈萊等人。庇護

^① 辛克萊：“宗教的利潤”，1918年，第121頁。

十一世將美國紅衣主教的人數自二名增加到四名。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梵蒂岡國庫主要靠美國捐獻。傳教士基金、“聖彼得一枚捐”基金，以及教廷各廳各處各種名目的其他進益，大部份是美國天主教徒的獻金。

庇護十二世在締結拉特蘭條約之前不久，曾以騎士稱銜和梵蒂岡的獎章授與一大批美國資本家，因為他們的財政援助使梵蒂岡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將自己的財政正常化。這批人之中有：考爾涅里烏斯·凱利——安那康達銅公司經理；弗里特里克·約翰·斐希爾——通用汽車公司付經理；約翰·貝爾納——愛里鐵路公司；約翰·里希——密蘇里州聖路易“商業銀行”經理；約翰·繆林——科羅拉多礦業公司經理；弗蘭克·考梅爾福特——新英格蘭動力公司經理；約瑟夫·格蘭斯——格蘭斯公司經理；阿密吉奧·基安尼尼——美洲銀行經理；杰姆士·法立爾——美國鋼鐵公司經理^①。美國資本家中新教廷貴族的名單證明，在當時梵蒂岡和天主教會的利益同美國最雄厚的金融資本的利益如何支干交錯，不能分離。

紅衣主教巴契里在1936年的美國之行，使梵蒂岡和美國金融寡頭間的關係更加鞏固了。巴契里當選為教皇后於1939年第一次致美國天主教徒的信件，美國統治集團對之很為滿意。新教皇在這封信中好象在作第二次宣誓似的。他確信，以剝削勞動人民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對於他以及他的前任教皇們而言，是完美的制度。教皇在他的信函中聲稱：“全部歷史教導我們說，世間總是有富人和窮人的——這就是我們能從人的本性不變的特點中得出的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梵蒂岡和華盛頓間直接外交關係的奠定，和戰後時期羅馬教皇廳和美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的一致——這就是美國—梵蒂岡友好關係發展的階梯。

^① 約翰·希萊：“教皇或墨索里尼”，紐約，1929年，第156—157頁。

美国的天主教会既和民主党在政治上合作，又和共和党在政治上合作。

当罗斯福执政期间，天主教会的某些人物为了适应时代精神，练习向劳动者倾吐爱慕之情。

红衣主教蒙德莱在1938年公开地为美国天主教会“过去”的罪过而忏悔。“我们的不幸在于我们过去太频繁地和不正义的一方缔结同盟，或者被迫缔结同盟”，这位红衣主教承认道，“利己主义的业主们向教会献媚，称它为伟大的保守势力，接着要求教会象警察般进行活动，同时他们付与为他们工作的人可怜的几文钱。我希望，所有这一切将永不回复地过去了。我们的位置是与工人在一起。”^①这些话发表的时候，美国的天主教会在进行疯狂的宣传反对西班牙共和国，受福特和其他财阀津贴的天主教士考夫林在号召支持希特勒，而耶稣会徒则在渗入产业工会联合会，以图从内部破坏它。

红衣主教法兰西斯·斯毕尔曼代表着今日美国天主教最反动的集团，他是美国主教会的首脑。

斯毕尔曼是一个爱尔兰籍小铺老板的儿子，他是他的出生城市惠特曼(马萨诸塞州)的拳斗冠军，毕业于非宗教的学院以后他进了耶稣会的福特汉大学。神学院结业后，这个年青的教士到了罗马，在罗马他读完了耶稣会的格里哥里安大学和梵蒂冈的外交学校。学校毕业以后，梵蒂冈派斯毕尔曼到美国一家有势力的天主教“前导”报馆担任编辑。1925年时庇护十一世召斯毕尔曼到罗马，任命他为国务卿助理高僧布尔贡契克-杜克(其后为红衣主教)的助手。斯毕尔曼是第一个能在教皇厅获得如此高位的美国高级教士。

斯毕尔曼在梵蒂冈正合他的脾胃。他在罗马也继续从事体育活动。“哥伦布骑士团”根据他的主意拨款百万美元在梵蒂冈

^① 西奥图·梅纳：“美国天主教史”，第433页。

修建了一个上流社会的运动俱乐部，以供梵蒂岡的高级教士作体育锻炼用。教皇庇护十一世眷爱这个年青的美国外交家，这位外交家正如摩根所说的那样“善于把美国生活的各方面——至少看来是令人奇怪的，假使不算狂暴的话——的好的一面，介绍给教皇厅中许多稳重的高级教士们看。”^① 1929年时，斯毕尔曼和已被任命为国务卿助理的巴契里共事。在这些年代中，斯毕尔曼参加了梵蒂岡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间的拉特兰条约的准备工作，参加了庇护十一世于1930年发起的反苏“十字军”的组织工作，参加了1931年为“工人问题”而写的“四旬斋告示”的起草工作，参加了1933年梵蒂岡与希特勒之间的宗教条约的签订工作以及梵蒂岡的其他措施。

1933年时，斯毕尔曼被任命为波士顿主教。1936年时，他伴随巴契里作旅美视察。1939年时，当庇护十二世当选为教皇后六星期，他擢升斯毕尔曼为纽约大主教，而在1946年则为红衣主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毕尔曼的头衔又多了一个，他被委为少将官衔的美军随军总牧师。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为止，他仍旧是美军随军牧师的首脑。

随着职位的高迁，这位有进取精神的高级教士的个人事业也飞黄腾达。斯毕尔曼在被任命为主教后不久，即收到洛克菲勒的一笔为数达6,542,421美元的“慈善基金”，这项款子每年的股息就有50万美元^②。这一基金由斯毕尔曼经管，不受任何人过问。斯毕尔曼从他的著作所得到的进益即超过50万美元。他是美国最大的垄断资本的股东：美孚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等。

斯毕尔曼积极参加“冷战”政策。为此目的，他经常出国鼓动社会舆论和对社会舆论施加压力。天主教新闻记者弗列德里

① 湯麦士·摩根：“监视哨”，第438页。

② 兰特别尔格：“美国的六十家族”，莫斯科1948年，第387—388页。

克·霍夫尔指出：“斯毕尔曼在許多国家中拥有真正的自己私有的外交网。”^①

美国的黄色报刊已預定斯毕尔曼为将来的教皇。尚在 1937 年时，泰林問道：“美国人滿意地接受意大利人教皇的命令和付給他錢将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在教会的法規中沒有任何根据只能选意大利人为教皇，和到羅馬去朝拜他”^②。今天，美国的高級教士們比过去任何时期还要經常地提出这一問題，尤其是当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由于这个庇护十二世的眷顧，才能高据梵蒂岡的一些要职。在战后年代，教皇駐爱尔兰、西德、日本、南朝鮮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圣使位置，落到美国高級教士的手中了，而这些高級教士則同时又是下列有势力教派的領導人物，如弗兰西斯教派（有两个分支），卡尔曼里教派，多米尼加教派和馬里安尼教派^③。耶穌会將軍約翰遜的副手——汶生·麦克米克，現在在耶穌会中据着首要地位，麦克米克是耶穌会“美国省”的首領。

美国的天主教会由所謂“全国天主教福利会”領導的，这一教会組織是在“全国天主教欧战后援会”基础上于 1920 年成立的。形式上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活动由每年举行的主教会議决定，然而主教会議的首脑事实上是斯毕尔曼。“全国天主教福利会”通过隶属于它的世俗組織和教会組織，計劃和推动美国天主教会的群众性政治工作；它通过“走廊議員”（即短期派在国会的为了“改造”众議員和參議員的非正式代表），对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使通过有利于教会的决定，并通过报纸、杂志、无綫电广播、电影和戏剧影响社会輿論。这种压力是以美国政治风尚的傳統方式施行的：威胁，賄賂，敲詐和恫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年代中，当希特勒已攫得政权

① 弗列德里克·霍夫尔：“新教帝国主义”，巴黎，1948年，第235頁。

② 威廉·泰林：“参与政治的教皇”，第157頁。

③ 約翰·麦克奈：“教廷——新的估价”，第333—334頁。

和資本主义国家資產階級集团的法西斯傾向日益浓厚的時候，“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开始提出最反动的口号。“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积极参加攻訐墨西哥进步政府，反对重建美苏之間的外交关系，支持福林神父的法西斯組織“基督陣綫”。西班牙內战之初，它开展有利于佛朗哥將軍的宣传活動。

1937年時，“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开始在全国展开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動，它公布了关于美国共产党人“破坏”工作的挑釁性总结报告。接随着这一事件，在每个教区内建立了教士委员会，監視共产主义的发展情形和将自己的結論报告“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所有的教徒有责任将有关共产党人的活動的所有情报报告委员会，而供給他們反共的書籍小冊子和电影。至于最干練的教士則被选派到設立于華盛頓的天主教大學，学习社会科学的專門課程。在天主教的报刊上充斥着反共的宣言和文章，而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和大学生們則經常被預先警告不得和“赤色分子”合作^①。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鼓吹和贊揚慕尼黑協定，反对美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联合陣綫。战争时期中，“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反对援助苏联和开辟第二戰場。战后它支持軍事同盟政策和美国侵略性对外政策的其他表现。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和臭名远揚的国会各調查委员会合作。主要的“巫女的狩猎者”之一麦卡錫，就是过去耶穌会的學生和“天主教行动”的积极分子。95%的美国天主教報紙支持麦卡錫，其总印数达1,600万份^②。

在1954年的紐約警察大会上，警察牧师約瑟夫·麦克弗萊将麦卡錫捧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美国人”。麦克弗萊的演說受到4千个警察听众的喝采。鼓掌者之中有出席这次集会的紅衣主教斯毕尔曼。斯毕尔曼在同年10月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声

^① 阿美乐·曼汉頓：“梵蒂岡”，第355頁。

^② 保羅·白兰却：“爱尔兰人与天主教的权力”，波士頓，1953年，第293頁。

称：“国会所进行的各种調查活动有着重要的原因。感謝上帝，当采取措施还不算迟的时候，这些調查活动已經开始了”。根据“新聞周刊”的报道，其他的高級教士和教区机构也发表同样观点的宣言支持麦卡錫^①。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尚领导着“职工会會員天主教徒协会”，(成立于1937年)以及“工人学校”网，这些学校专事訓練在职工会中进行分裂活动的骨干分子。

进步的职工会活动家弗里曼指出，“职工会會員天主教徒协会”和天主教的工人学校的出現，正当“美国的劳动者开始在工业基础上广泛地和有效地組織起来的时候”^②，就是說当美国的职工会运动升向更高阶段的时候。“职工会會員天主教徒协会”力图推翻进步分子领导着的职工会。“职工会會員天主教徒协会”攻击进步組織，从事挑撥离間和工賊活动^③。

“职工会會員天主教徒协会”和天主教的工人学校憑借天主教僧侶和資本家的支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活动。例如，在1948年时天主教的工人学校已达100所，其中的24所由耶穌会徒所领导。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立意加强天主教在美国的势力，它使社会輿論相信，它拥有多数，在某些选区中拥有决定性多数的选票。由此可見，許多議員只有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才能期望选举得胜，議員們有了天主教会的支持即能穩操左券，但必需听从“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訓令。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中央领导机构設于華盛頓。它由8个部(管理局)組成，其中有：(1)执行部，其下設有外国移民服务处、教义处、情报处和出版处；(2)教育、报刊和社会活动部，其下有工业关系处、家庭生活处、农业生活处、世界和战后問題处、信

① “新聞周刊”，1954年5月24日。

② 杰姆士·弗里曼：“劳工之敌”，紐約，1948年，第3頁。

③ “政治月刊”，1949年4月号。

貸卫生和法律处(管理“走廊議員”及与立法机构联系);(3)“天主教行动”局;(4)青年組織部。“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系統中尚有下列机构(括弧中是成立年份):后备兵和难民服务处(1936年);国民虔信联盟(1934年);天主教紐約国际种族委员会(1934年);美国国籍取得协进会(1930年);全国天主教公益服务会(1940年)以及其他等等^①。

教会評論家赫伯脫·舒納特在評論“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活动时指出:“不单是‘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法律部,它的其他部也是为了政治活动的目的而設立的,这些部門使主教們可以經常对立法者施加压力,因为‘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是在主教們的直接監督下行动的……”^②。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綱領及其工作方法,也諸于耶穌会徒約翰·克劳宁所著的書籍中,克劳宁是該会“天主教行动部”的付部长和“天主教社会研究学院”的領導人。

克劳宁在其所著的,得到美国主教会官方准許的“天主教社会行动”一書中,闡述了美国天主教会社会活动的原則。他开始时声言:“在欧洲資本主义似乎已經死亡”和“沒有人能够相信,我們(即美国)将会避免严重的动乱和不怀疑自己的未来”。克劳

① 天主教会几乎企图渗入美国生活的所有环节,这可以根据下列名单就可以知道,名单中列有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依赖于“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各种組織,然而名单中远非包括全部这类組織:全国天主教教育协会,美国天主教社会学协会,美国天主教哲学协会,天主教圖書館协会,美国天主教历史学学会,天主教人类学协会,天主教徒大学生全国联盟,学校天主教协会,戏剧团体天主教运动,争取文学具有道德价值全国局,天主教新人俱乐部,天主教兒童書籍俱乐部,天主教演員协会,天主教作家协会,天主教报刊协会,天主教无綫电广播协会,天主教电影与无綫电协会,天主教記者协会,天主教童子軍,全天主教与全美足球队,天主教美国青年女兒,天主教音乐教师全国协会,天主教邮政職員同盟,天主教法院職員协会,天主教律師同业公会,美国軍事学院天主教學員合唱队,美国天主教飛行員,天主教經濟协会,天主教工业問題研究会,青年天主教工人,天主教医院协会,天主教医师联合会,女护士全国委员会,社会医院服务协会以及其他等等。

② 赫伯脫·舒納特:“二十世紀美国的宗教”,第56頁。

宁确信，只有利用教会的社会哲学才能捍卫美国的资本主义，因为只有教会能对群众起“鎮靜”的作用^①。教会的“社会哲学”的实质是什么呢？是在于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取得和解。耶稣会徒克劳宁建议，应该说服工人和资本家作出共同的让步，于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将解决。

克劳宁继续说道，为了对社会事件的发展过程起影响，教会应该掌握力量和威望，这一点教会是能够作到的，只要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与各社会集团有着联系的组织网，依靠着它们影响社会舆论。“教会在今日可以与军队相比拟，为首的有：总指挥——教皇，将军——主教们，下级军官——教士。然而，”克劳宁警告道，“熟习军事科学的人都懂得，为了组织军队除了士兵以外尚需要一种人。后备军官——这是为了使任何一个军事行动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教会中俗界的积极份子便起着这一作用。他们不以自己的名义宣传政治路线，也不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可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已足够进行独立活动。他们遵循着总的路线和各种指示，领导和组织起受他们影响的教徒”^②。

耶稣会徒克劳宁号召建立起天主教的工人组织，训练积极份子，为天主教工人和天主教商人创办专门学校，克劳宁建议教士们巩固与工业家之间的联系，而在职工会之中则同共产主义影响作斗争。

克劳宁忠告天主教会人士同新教和犹太教建立关系，以进行对抗共产主义的共同斗争。“天主教徒认为，”克劳宁声称，“信奉各种宗教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保卫基本准则”^③，即保卫资本主义秩序。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活动即以执行这一纲领为目的，特别是它的“天主教行动”部。克劳宁报道，在“天主教行动”这组

① 约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行动”，密尔窝基，1948年，第13—14页。

② 同上，第38页。

③ 同上，第158页。

織中“对民族的和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行深刻的研究。对这方面的研究，常常为主教和僧侶們提供极宝贵的情报，而一些情报却远在值得正式公布以前就为他們所获知了”^①。由此可见，“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并不鄙夷充作暗探。

在另一本著作“天主教社会原理”中(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教会当局的许可和被推荐为天主教积极份子的课本)，克劳宁闡述天主教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的任何一种責难在美国将会被曲解”——他警告道。这个耶稣会徒不余遺力地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天主教徒只能討論改革资本主义，因为教皇断然譴責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克劳宁宣称^②。

美国天主教会最积极的核心与其他各国相同，是耶稣会徒，現在三分之一的耶稣会徒(約1万名会徒)在美国，或者在美帝国主义者侵占的土地上。美国天主教会的全部“教育”工作(学校，大学，出版事业，无綫电和电视宣传)，受耶稣会徒的統制。他們领导着这样一些巨大的学术机关，如下列城市中的天主教大学：西雅图、斯波康、密尔窝基、新西納蒂、克利夫兰、底得律、华盛顿、俄馬哈、圣路易、新奥尔良、紐約。許多耶稣会办的大学为美帝国主义者提供与美国和国外的进步运动作斗争的干部。在福特汉天主教大学中設有所謂“現代俄罗斯問題研究院”，在这个大学的教員名冊中，著名的为联邦調查局服务的奸細路易斯·布金斯和菲尔勃里克赫然在焉。他們是所有反共审讯的当然証人。这一“学术机关”的首腦是安德烈·烏魯索夫，从前的白俄公爵，現在是天主教僧侶。上述“研究院”中訓練些什么“学者”是不难揣度的。在华盛顿的耶稣会办的乔奇頓大学中，設有国务院正式的“外交”学校。

耶稣会徒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別信任。例如：杜魯門曾委任

① 約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行动”，第175頁。

② 約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原理”，第267頁。

耶穌會徒派脫里西奧·楊西雅為“國家科學研究院”的領導人之一，該機構從事研究與製造原子和氫武器有關的問題。杜魯門並任命耶穌會親信的人士湯姆斯·梅萊（前“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經理，他的兩個兒子在耶穌會中居要職）為政府原子能委員會的委員。

阿拉斯加、菲律賓、夏威夷群島、波多黎各以及下列美帝國主義的世襲領地：如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國、中美各共和國，都受到耶穌會的“庇護”。在這些區域和國家內，教會的最高職位由耶穌會徒擔任。最後，美國的耶穌會徒尚活躍於台灣和南朝鮮，積極地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國活動。

梵蒂岡的傳教活動全然落在美國僧侶的控制之中。根據1949年的官方資料，有著49個美國修道士僧團和73個美國修道女僧團在國外進行傳教活動。

美國的傳教士同年尚有下列各地活動：非洲、阿拉斯加、澳大利亞、新西蘭、緬甸、加拿大、中南美、西印度、錫蘭、中國、印度尼西亞、夏威夷群島、印度、巴基斯坦、泰國、日本、朝鮮、近東和中東、菲律賓群島、琉球群島、以及塞浦路斯和馬爾他島、英國、瑞士、荷蘭和芬蘭^①。

美國的天主教會是梵蒂岡最富有的一个分支。沒有人知道，教皇從美國人手里拿到多少美元，然而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進入教皇國庫的大部份錢是成百萬的美元。“新聞周刊”曾經不無自夸地這樣說過^②。

美國的天主教僧侶們被貪財慾所魅，他們對此並不諱言。

美國主教會這一組織的活動，猶如資本雄厚的壟斷資本或托辣斯一樣。“新聞周刊”在1954年時寫道，紅衣主教斯畢爾曼“從其位於第50大街和麥迪遜路轉角上（在紐約）的灰色摩天樓里的住所兼指揮所里，教士們不無根據地把這裡稱作為‘權力

① “全國天主教年鑑”，彼得遜—新澤西，第356—357頁。

② “新聞周刊”，1954年5月24日。

的堡垒’，象指导做大生意似地领导着自己的大主教区。”^①

在美国教会的主要基层組織，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村鎮小教区。美国研究者却尔斯·菲斯克指出：“城市教区——这是一个巨大的金融企业。供养它的人们将其与工业和金融混为一谈……”^②

为数众多的与大銀行有連系的专业化金融組織，根据主教会布置下的任务，为教会金庫征集款項而进行的宣传活动作出計劃。在美国，“羅馬观察家”写道，为教会“需求”而征集款項不是一件热忱者办的事，而是一宗“科学”事业，其技术問題是要由专业化的大商号負責設計的。这些組織的专家们从事研究和确定进行宣传活动的特別方式，广泛采用无綫电广播、电视广播、报刊和其他宣传手段，以达到說服信徒慷慨輸将的目的^③。

根据这些公司刊登在美国天主教会官方参考手冊上的广告性声明，可以看出，他們曾为教会征集到巨額款項。披尔斯·赫特立克·契尔胡金融公司把一封新奥尔良大主教的信函公布出来作为例子，大主教在信中感謝該公司募得了3百万美元。劳逊公司宣称，它募得了628万1,000美元，华特·威尔斯·德萊許曼公司——1,000万美元，費尼公司在加拿大募得1,500万美元，在美国則募得400万美元等等^④。

根据商务部的官方資料，天主教会在1936年时为各种开支和慈善事业共花費了1亿8,000万美元。如果它在慈善事上(維持学校、医院和其他非教会內的开支)用了1块美元，那末为教会本身需要則花了6块美元^⑤。如果估計到上述的統計是以教

① “新聞周刊”，1954年5月24日。

② 杰薩·台維斯：“資本主义及其文化”，莫斯科，1949年，第410頁。

③ “羅馬观察家”，1956年6月23—24日。

④ “天主教規大全”，紐約，1950年，第2、4、35、59、87頁。

⑤ “美国商务部，宗教团体財產調查局，1936年”，第1卷，华盛顿，1941年，第29頁。

会僧侶們自己提供的資料为基础的，僧侶們为了有利于博得社会輿論的良好反响，完全有可能把資料加以修飾，然而就是这样，上引数字也将梵蒂岡的关于教会“为了穷人”而撥出巨額金錢的神話全盘揭穿。1块美元給穷人(也不是全部，大部分用作为教会的宣传費)，6块美元塞在自己的口袋中——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慷慨”的天主教会給予穷人的“援助”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甚至还是根据官方資料得出的結論呢！

每年归入美国天主教金庫的錢究竟有多少呢？关于这一点只能猜測，因为美国的天主教会同其他国家的一样，是不公布自己的預算的。美国的研究工作者杜依德·斯密斯所援引的数据可以用作为大概的指标，根据他的数据，美国的每一个小教区要从每一个在教堂登記过的信徒手中，每年平均征收27元1角2分美金^①。假使将这一数据作为計算时的基础，又假使教会官方統計所称美国在1954年时的天主教徒达31,648,000人一事确实不誤，那么應該把教会的平均年入推測为8亿美元。根据教会所提供的資料，其中只有3,000万美元用作于慈善事业，而其余部分則漏到美国天主教僧侶們的无底口袋和梵蒂岡國庫中去了。

根据公布在“羅馬觀察家”和美国的“新聞周刊”杂志上的資料而制訂的一张表，使我們对战后年代的美国天主教会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但是，我們所援引的一张表不能反映出主要之点，即在實質上能表示美国天主教影响的标准。我們是指美国的僧侶和百万巨富、大商人、銀行家和垄断資本，以及与政府集团間的关系而言。

美国的天主教会在政治和經濟上得到下列这些大垄断資本代表人物的支持，如福特(他現在通过“福特基金”慷慨地撥款支

^① “教会与有組織的运动”，紐約，1946年，第75頁。

持一些天主教机构)①, 凱尼迺(貝脫萊造船公司), 法尔萊(可口可樂), 杰姆斯(第一国民銀行), 約翰·沙里汶(沙里汶—里特銀行), 爱里沙·华克(庫恩—罗比銀行), 彼得·泰蒂尔巴哈(国际油漆公司), 威廉·康諾利(辛克萊石油公司), 杰姆斯·契利(霞飞石油精炼公司), 华倫·凱利(美国国民石油公司), 基安尼尼(美洲銀行), 赫斯特和露斯(报刊杂志托辣斯), 約翰·拉斯考伯(通用汽車公司, 銀行業信托公司等), 以及其他諸人。上述大資本家中的大多数有着馬尔他騎士团, 梵蒂岡圣格罗勃或圣格里哥里僧团騎士的头銜。从前教皇是将这些头銜賜給大封建主, 国王或俄罗斯皇帝的。梵蒂岡現在用来奖賞美国百万富翁。

美国的天主教会(1934—1954)②

	1939	1942	1952	1954
紅衣主教·····	3	—	—	5
大主教·····	19	—	—	33
主教·····	111	—	—	164
教会·····	18,757	—	—	30,268
村鎮小教区·····	—	13,315	15,653	—
教士·····	33,540	—	—	45,451
修道士·····	—	140,566 (1947年)	156,696	—
教会中学校学生·····	16,747	—	—	33,448
軍中牧师·····	50	—	—	1,206
天主教大学和学院·····	—	207	233	—
学生数·····	—	116,500	204,937	—
天主教中学·····	—	2,071	2,440	—
学生数·····	—	384,588	558,491	—
天主教小学·····	—	7,701	8,898	—
学生数·····	—	2,065,198	2,776,856	—
教会管轄的医院·····	—	95	117	—
床位数·····	—	7,852	10,141	—
全国天主教徒数·····	—	21,406,507	31,648,424	—

天主教会与美帝国主义間关系的巩固，使一些梵蒂岡亲信的天主教徒政治家得以占据政府中的高位。他們特別被欢迎担任执行“冷战”政策，反对进步陣营各国的职务。至于福萊斯特^①，林貝尔格和麦卡錫已經臭名远揚，不待贅言。屬於这一类活动家的还有斯密脫將軍，他是前中央調查局的首腦和杜勒斯的助手；克萊尔·布·卢斯夫人，前美国駐意大使，出版界巨子亨利·卢斯的妻子；前駐苏大使海軍上将柯克和乔治·凱南，駐埃及大使哲弗逊·凱弗里；前“哥倫布騎士团”首腦法兰西斯·梅蒂犹斯，在杜魯門政府中曾任負責海軍事务的国务秘書，他是美国活动家中最先要求先发制人对苏作战的一人（在1950年）；托平，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劳工部长，他劝告工人們研究教皇的通諭，不要去讀“革命的書籍”；霍华特·麦克格里斯，杜魯門时的总檢察长；台尔金，天主教工会联合会的副主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劳工部长；前北大西洋公約欧洲盟国联軍总司令格倫瑟將軍，以及其他等人。

美国的高級天主教僧侶参与战争歇斯底里的宣传与筹划。軍隊中的教士（随軍牧师）在軍隊中煽起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仇恨。天主教士在随軍牧师中占领导地位。

1949年8月，根据国防部长約翰遜的命令，成立了随軍牧

① 1955年时，“福特基金”捐輸給美国天主教机构的錢达3,700万美元。（見“国际天主教通报”第15期，巴黎，1956年）。現在福特公司的首腦亨利·福特第二已改宗天主教，而他的兄弟爱特賽則仍为新教徒。这种在宗教上的“分工”是美国垄断資本家族的特色。

② “羅馬观察家”，1953年6月13日；“新聞周刊”，1954年5月24日。

③ 美国耶穌会杂志“阿美利加”把福萊斯特发疯的原因，推测为他讀了同事們所写的題为“辯証唯物論如何影响苏联的外交政策”的报告。福萊斯特这一件致羅馬教皇、丘吉尔和西方其他政府人士的报告，如“阿美利加”杂志所称，其内容使他极度震惊，以致于弄到发狂的地步。耶穌会杂志訓导美国的未經世面的老百姓說，你看，辯証唯物主义的学說对于一个“不曾体驗过它的滋味的人”，会产生这样“可怕的效果”。（“阿美利加”，紐約，1951年12月1日）。

师事务委员会，以领导三军中的随军牧师。该委员会拟订的特别训令规定军中牧师的任任务为“在智、德、体三方面训练兵士，使他们在战时能战胜任何敌人”。

在总统特设的“美国武装部队中宗教与福利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说(1950年)，宗教在美国军队中的思想训练工作中起着极重大的作用。这一报告指出，军队中的宗教课程和礼拜仪式应该有助于军队总的道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军事训练质量的提高，有助于美国的安全和国防的巩固。为了挑拨兵士们反对进步阵营，报告要求僧侣们在兵士的思想中造成关于这一阵营虚假的印象，提示他们说，“对方”不愿“道德规范”，而美国在保卫着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①。

天主教的僧侣们特别热衷于执行这一纲领。他们教导兵士说，他们的长官恰好就是“上帝的代表”。随军牧师团出版的一本名为“我们为了上帝和祖国而团结在一起”的小册子教导兵士说，军官们是在上帝给予的权力基础上，要求兵士服从他们的。“假使你意识到，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上帝，那么你就更易于服从军事命令了，”上述的小册子中这样说道，“你不要把军官认作为力图能迫使你做多少就多少的一个人。你要把他认作为上帝的代表。因为这在事实上是如此，甚至于当军官自己不知道，或甚至于不相信这一点时也是如此。”^②

随军牧师与司令部的军官，以及与谍报部门和反谍部门合作。他们亲自监视兵士们的政治倾向，或者通过经过特别审查的兵士中的情报员和下级军官进行监视。随军牧师为每一个新兵设一张履历卡，其上记载着有关这一兵士的政治倾向和行为的资料。因为兵士们在同随军牧师谈话时，远较同反谍人员谈话时坦白，因此随军牧师在这方面也为指挥官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

① “随军牧师”，报告书，华盛顿，1950年，第1—33页。

② 卡尔浦维奇：“美国军队是美帝国主义的武器”，莫斯科，1952年，第127页。

天主教僧侶們甚至於不想遮掩自己在美國武裝部隊中的代表們的卑鄙活動。天主教高級教士，少將銜隨軍牧師路易·派克在一篇刊登在耶穌會雜誌“阿美利加”上，標題為“美國軍隊中的宗教課程”的文章中公開地寫道：“隨軍牧師是司令部的一個成員，他是討論一切有關兵士的宗教、道德狀況和行為問題時的參贊和顧問。在許多方面他是指揮官的‘眼睛’和‘耳朵’，隨軍牧師通知他有關部隊的情況和提出有益的建議。”^①

在美國的天主教陣營中，是否存在著反對教會僧侶們反動路線的力量呢？這種力量是存在著的，然而他們現在還薄弱，他們的呼聲被“全國天主教福利會”和耶穌會組織反動的宣傳聲所淹沒了。自由主義的天主教徒團結在“國民”雜誌的周圍（該雜誌每次的發行數為25,000份）。“國民”雜誌非常謹慎地反對弗朗哥和麥卡錫，反對戰爭的歇斯底里。教會方面容忍它是有打算的，因為這一個相對地抱自由主義的，總的來說是忠誠於梵蒂岡的組織，其存在有助於抑阻那些不滿教會的反動政策的教徒們的憤怒情緒。

但是，教會當局對教會中那些敢於直率地，甚至於只不過是畏畏縮縮地贊成進步的人物，則採取嚴厲的處置。芝加哥市主教貝爾納·謝爾的遭遇即為一例。謝爾被稱為羅斯福總統的朋友，稱為一個同情工人運動的人。他反對基督教和反動派混為一體，反對教會與銀行家、工業家和政客結成同盟。謝爾斥責法西斯神父考夫林。1954年時，謝爾在作完一次反對黑暗蒙昧主義者麥卡錫的演說後，收到了2萬多封信徒表示擁護的信。謝爾在1946年的一次演說中說：“如果印度尼西亞人處於荷蘭人‘好意的’管理之下，那麼自由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對於處在法國人庇護之下的越南人或對於被英國人警惕地監護著的印度人，自由又意味著什麼呢？……當你換了主人以後，奴隸制度仍

^① “阿美利加”，紐約，1951年3月1日；“神職與特務”，華盛頓，1951年。

然还是奴隶制度”。

謝尔的这种演說既不合斯毕尔曼的胃口，又不合美国統治集团的胃口。經過长期同教会当局冲突以后，謝尔在 1955 年被迫离职退休，而他所领导的組織，因为过于“左傾”而被解散。接着卖淫式的資產階級报刊开始誹謗謝尔^①。

美国的教会当局就是这样惩戒那些祭坛的侍奉者，虽然他們还是畏畏縮縮地，然而終究是企图对教会隶从于資本的利益表示反对。

英国作者阿芙乐·曼汉頓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著的“梵蒂岡”一書中写道：“实質上天主教会力图将美国变成为純然的天主教大陆，这一大陆将抵偿它在欧洲大陆上所失去的一半势力。”^②我們所引述的事实指出，虽然梵蒂岡暂时还没有征服美国，然而它和美国的天主教会目前已經是影响美国統治階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① 瑪丽·卡罗尔：“謝尔主教——失却榮譽的先知”（“哈泼杂志”，1955 年 11 月号）。

② 阿芙乐·曼汉頓：“梵蒂岡”，第 346 頁。

第七章

天主教陣营內的危机

天主教会和天主教陣营在今日整个来說，在經歷着深刻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危机。

构成这一危机的因素是极多的各种各样的。教会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新事物”公布后的四十年，庇护十一世被迫在1931年发布的“四旬斋告示”通諭中承認，教会“失去了”工人阶级。这一事实，庇护十一世宣称，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醜事”。

不但是工人们抛弃了教会。最近几十年来广大的农民阶层也开始离开教会，对于象意大利和法国这种国家这事特別典型，在那里不久以前农村还是僧侶們的堡垒。“农村离开了教会。这是残酷的真理”——教士柴伐尼·鲍拉在修道院院长布拉尔所著的“法国农村中传教問題”一書的意大利版序言中这样承認，在这本書中有着大量事实材料說明教会影响在法国农民中下降^①。

根据法国修道士范·列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布的材料，在西德有50%以上的天主教徒不奉行宗教仪式，而在意大利，根据耶穌会徒考尔蒂的資料，80%的居民不做礼拜。羅馬的

^① 布拉尔：“农村教区”，1948年，第10頁。

情况还要糟，只有1%的居民上教堂^①，而羅馬还是梵蒂岡的所在地，虽然有着梵蒂岡、教士及修道士大軍駐在那里，还是不管事。

法国乡村小教区的走向衰落，是群众对宗教日益冷淡的结果。我們看看修道院院长斯密特—厄格兰是怎样評論的，他著有一本专门研究分析现代法国乡村小教区活动的書，書中說道：“乡村小教区中的教士們在断定自己的活动毫无成效时，向自己提出問題道，是不是自己的职业是錯誤的。假如他們不到‘超自然’的領域中去求慰借，那么他們将会明白，他們的教士头衔对于社会是沒有益处的。他們甚至于会接受說他們过着寄生虫生活的这种責备，或者至少願意接受裝飾品这一称号……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好象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地下暗流，不断地和不可避免地將我們的乡村小教区带入非基督主义的漩涡中去……我們企图修建，而房屋却繼續在毀坏，我們竭力想支撐它，但是不得不后退。我們奋力在划游，但是水流却將我們帶走；我們采取破釜沉舟的措施，但是病情在恶化。”^②

教权派陣营現時危机的原因何在呢？其原因之一在于教会將自己同資本主义連在一起，已成为它热烈的捍卫者，从而注定了使自己同資本主义一起腐朽敗亡。美国社会学家保罗·赫金森在过去曾正确地指出教会危机和資本主义危机之間的关系，赫金森在其正当世界經濟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出版的“世界革命与宗教”一書中，关于这个問題写道：

“有組織的宗教(即教会——作者)在世界許多国家中是和統治階級的利益融成一片的。当全世界发生变化和統治階級有被推翻危險的时候，許多这些特权階級垮台的可能性，对于与他

① 卡罗·法尔康尼：“意大利乡村小教区的危机”（“新論”，羅馬，1953年，第13期）。

② 保罗·斯密特—厄格兰：“非基督教的机械論”，巴黎，1952年，第10—11頁。

們共命運的宗教而言，決不是什麼好預兆……

有組織的宗教在竭力開展活動，以保衛行將死亡的社会或已經不存在的社会，或保衛已失去自己思想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同时，在为自己掘墓。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期望教会采取其他的政策，因为每一种宗教按其本質來說是保守的，它不可能有另外的做法。

基督教虽然在传教方面有成就，总的來說它是白种人的信仰，由白种人在其他种族中传播开来的。白种人世界霸权的行将败亡，相应地引起了白种人宗教权势和影响的衰敗。一个宗教如果不能解决因世界观发生变化而提出的精神上的問題，那么它注定要随着人們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衰敗。除此而外，一个宗教如果不能解决新文明的倫理問題（在此处为机械世紀的倫理問題），它不能期望將那些全然和新文明連在一起的人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①

赫金森指出的这些因素，当几乎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已經組成社会主义陣营，殖民地各国正在掙脫帝国主义桎梏和全世界各族人民要求执行和平和社会进步政策的今天，特別显得明显。

历史上最早的对天主教会的沉重打击是反封建运动和宗教改革，其后为启蒙运动。法国 1789 年的革命使政教分离，并且强烈地动摇了法国天主教的地位。由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天主教在其他各国的地位也不穩了。拿破侖一世第一个取消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天主教会只有靠反革命的胜利，及在王政复辟和“神圣同盟”时期时才能稍稍恢复因受这些打击而喪失的元氣。意大利的統一使世俗的教皇国終於寿終正寢。梵蒂岡仅在帶了自己的全部中世紀思想武器，投入了自己不久前的敌人的陣营——資產階級陣营以后，才能恢复起教会的某些势力。資

^① 保羅·赫金森：“世界革命与宗教”，紐約，1931年，第186—187頁。

产阶级需要天主教会的帮助，以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作斗争。二十世紀初期，在法国和意大利兴起的旨在对抗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民主”运动，是教会声东击西誘人到迷途去的策略，然而这一运动在欧洲天主教圈子内引起了深刻的思想上的纷扰，这显然是不利于反动派的。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这一思想上的纷扰特别加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包括对天主教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成立的天主教政党“平民党”党内，发生了尖锐的内部斗争，而根据梵蒂冈和资产阶级的计划，这个政党原应遏止因十月革命胜利而激起的革命浪潮的。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左翼天主教徒，他们是属于工会领袖米尔奥里一派的，他们同“善意的”教权派政客们一起要求有自己生存的权利。于是梵蒂冈指望法西斯份子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和保护者。然而梵蒂冈却不能说服天主教群众相信法西斯份子是上帝所赐与的。1936年时，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许多天主教徒，不愿梵蒂冈的训令，支持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因而引起新的危机，新的分裂，新的反“共产主义”的教皇通谕（193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深刻地震撼了梵蒂冈廊柱下的基础。虽然教会在近百年来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尽力诅咒，虽然教会曾经和法西斯份子结过同盟，然而梵蒂冈在盟军解放罗马以后，由于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意志，不得不同意让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在国民阵线的政府中共同合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教廷仍旧是忠实于自己的反动观念和反动目的，同反动力量团结在一起反对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因这些行为使教廷的真面目为人民所看清了。梵蒂冈在同美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之后，即将共产党人逐出教会。这一措施在中世纪时对于封建主和农奴主而言，无异被目为邪教徒，后果十分可怕，但是在二十世紀采取它却引起正好相反的效果。“教会宣布逐出共产党人一

事——前美国駐意大利大使克莱尔·卢斯夫人，一个得到庇护十二世好感的女教权派份子証实道——是一场恶梦，教会直到現在还不能够摆脱它。成百万人离开了教会并且从此再也不会接近它了……总之教会应为自己所干的事而痛哭。”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权派政党在一些西欧国家中的长期执政，促使許多信徒改变了他們对教会和社会的看法。天主教政党的活动証明，所謂“天主教社会綱領”實質上是保卫剝削階級的利益的。教权派政府的政績只在一个方面是“卓越的”——即在积极支持“冷战”政策一方面尚在日内瓦四大国會議之前很久。这一政策的宣告破产，不能不在天主教組織和政党的所有环节內引起混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建設的成就，以及苏联与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坚决执行的和平政策，对于天主教群众产生的影响日益强大，而梵蒂岡許多年来正是在这些人中間进行着反苏和反共宣传的。

許多天主教徒在对梵蒂岡路綫的正确性不再相信和失望以后，便轉向馬克思主义，轉向这一直到今天为止由于受教会宣传影响，因而見了就躲避的世界观。今天，当教会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发布了不知多少通諭，作出了不知多少革除教籍和逐出教会的决定后，教权派的理論家們被迫承認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許多天主教信徒有着“不可思議的誘惑力”②。

現在在天主教的杂志上不但可以常常讀到对馬克思主义的詛咒，还可以常常讀到这种論調，例如：“这一事实对于我們基督徒來說似乎是惊人的，而对于僧侶們來說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即馬克思主义在其唯物論体系中具有神圣的革命精神。无神論的馬克思主义是上帝新发现的辯証因素……无神論的馬克思主义是反对資產階級和具有革命性的。这是否定的否定，是引向基督主义的“急进葯剂”③。

① “欧罗巴”，米兰，1954年3月25日。

② 迪·鮑：“意大利天主教的危机”，第53頁。

列宁指出，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它的敌人改装为马克思主义者^③。教权派份子之中有着这种人，然而通常天主教徒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找到了那些磨折他们的问题的答案，而教会的思想体系无法为他们作出这种答案。法国主教会的活动家之一，修道院院长披埃尔就说出了这一观点，他是无论如何没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的：“共产主义能满足群众，因为它给与群众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因为它试图解释所有的问题，不论是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学的甚至哲学的……从另一方面而言，虽然神学家们在作着种种美梦，但是应该承认，基督教无力提出一个能被现代人接受作为自己的对世界统一的想法。”^④

当天主教徒开始客观地将教会的思想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相比较的时候——是生活本身促使许多天主教徒去比较的——他就会对共产主义得出下列的结论，前耶稣会徒阿里格罗·汤迪就是一个例子。

“归根到底——汤迪说——在我看来共产主义是唯一能答复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科学，这一科学奇妙地解释各种现象，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不怕新的、正在成长和发展着的东西。共产主义是生活的解释，同时又是生活本身。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文明伟大的成果，同时又是正在实现着的文明”。

正如教皇庇护十一世在题为“四旬斋告示”的通谕中所承认的那样，即假如僧侣中的某些人尚且得出这种结论，那末天主教徒的工人定将成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纵容富人，忘记了工人们的利益，不关怀他们”。

教会当局看到，天主教的群众也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优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因之用尽一切它能采取的手段，企

③ “世界报”，1954年3月9日。

④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546页（俄文版）。

⑤ “灵魂月刊”，第89期，1946年，第267页，巴黎。

圖不讓在天主教运动的积极份子和共产党人之間建立起友好关系。“因为經常把自己活动与共产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法国紅衣主教修尔承認——天主教徒敢于，常常甚至于并不意識到这一点，主张实行被教会所譴責的学說。”①

工人們全体不相信教会，不怕它的詛咒，愈来愈广的劳动阶层确信教会的活动不利于人民，而有利于剝削者。

庇护十二世在1955年5月1日对工人发表的演說中，把人們称教会是資本主义的同盟者这种肯定的說法認為是“可怕的誣蔑”。

“可怕的誣蔑”？那末为什么一些老老实实在地想說明教会对群众的影响所以在低落的原因的教会人士和教权派的活动家，也承認这一“可怕的誣蔑”是真情？为什么信徒們愈来愈多地相信这一“誣蔑”呢？

法国天主教杂志“灵魂月刊”承認道，因为“资产階級世界与天主教世界的关系是这样的，这两个世界对于許多人而言已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結果是—一个人要抛弃第一个世界，他必然与第二个也脫离”②。

“人民害怕僧侶的势力——根据法国修道院院长米兴諾的話說——因为人民認為这势力有利于特定的人和特定的階級，这些人是剝削他們的……甚至对于信教的工人而言，教会是教士和富人們的政党。”③

“教士嗜錢，他只想如何致富——布拉尔神甫援引在法国天主教徒間广泛流传的意見說——神甫从来不会‘因飢餓倒斃街頭’。人們成为教士，正如他們成为律師、医生等等，只因为这为他們带来收入。”④

① 爱弥勒·傅尔蓋：“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的責任”，巴黎，1951年，第199頁。

② “灵魂月刊”，第12期，1954年，第716頁，巴黎。

③ “灵魂月刊”，第8、9期，1946年，第231—234頁，巴黎。

④ 布拉尔：“法国教权的上升或沒落”，巴黎，1950年，第267頁。

“法国人民中广泛流传着这一确信不移的意见，教会是富人人们的工具，即教会是业主们、有权势者和政府的工具——修道院院长繆夫确认道——人民中认为僧侣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和死亡一方面的人……普通人相信教士只对金钱感兴趣。”^①工人们异常明白——另一个法国主教会的代表人物霍兰说，1848年时法国的僧侣除了少数例外，支持所谓秩序党，这秩序就其结果来评判，和基督秩序相似之点非常之少^②。教会当局在巴黎公社时期的行径，或者它对贝当及其政权的态度，或者就法国红衣主教们支持“冷战”这一事实而言——难道所有这一切不促使工人们离开教会吗？

农村中教会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比在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农民不象工人那样快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当地主或富农在雇用雇农时要求后者必须去做弥撒——在法国的许多省份中是如此的——那么这个雇农甚至是瞎子也会明白，教会是为谁服务的，修道院院长布拉尔烦恼地这样提到^③。这就是为什么甚至连他也被迫承认，教士在农民心目中是地主的朋友，而教士的职位是个“肥缺”^④。

“自从贵族地主的家成为许多乡村小教区的中心，和教士们不止一次地证明他是为地主家族服务的，而不是为全体信徒服务的那时起——布拉尔继续写道——农民中间这种信念就愈加巩固了。所以‘宗教祇是对于富人说来是好的’这一著名的成语渐渐地赢得了农民的心”^⑤。

我们在比利时也遇见这种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比利时教会当局对天主教组织的积极份子进行了一次提問

① 繆夫：“无产阶级的使命”，1947年，第88—89页。

② “无产阶级的基督教化”，夏里洛叶会议的报告，1950年，第175页。

③ 布拉尔：“法国教权的上升或没落”，第63页。

④ 同上，第82页。

⑤ 同上，第84页。

測驗，題目為“工人階級對僧侶和教會的真正關係是怎樣的？”。下面是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答案：

“人們繼續相信上帝，然而群眾和教會之間彼此脫離。人們把教士當作資本家同盟者的代表”。

“人們認為教會同政治和金融集團連結在一起”。

“我生活在群眾中間，和他們共患難。工人在宗教方面是冷淡的。工人反對僧侶，因為他相信僧侶支持富人”。

“工人們看不到天主教會的代表人物具有基督的苦行精神”。

“工人們從教士的行為、他所代表的文化、論調和居住條件看來，認為他是和資產階級相聯系的”。

“工人們確信，基督教是保護富人和業主的”^①。

“僧侶和資產階級因其利害共同，其利己主義和資產階級精神正亦全然相同”——多米尼加會徒哈因承認道^②。比利時大主教卡爾登·維亞爾公開地說：“難道我們（指僧侶——作者）不以自己的行動，為那些把教會變成他們的防衛武器和保險櫃的人們辯護嗎。”^③

甚至於西班牙“天主教行動”的機關報“愛克列齊亞”在1954年也被迫承認，大多數工人對教會懷敵意；因為他們認為教會是剝削階級的同盟者。

事實就是如此。當然，如果生活本身不是時刻向勞動人民證明，教會是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的，那麼任何“可怕的謠言”，任何無神論和反對教會的宣傳，不能使他們離開教會。

另外一個在現代條件下加速宗教衰敗的極重要因素是科學的進展。教會的理論對人們周圍事物的解釋是歪曲的和反科學的，在無線電和原子能時代，它在愈來愈多人的思想中站不住腳

① “無產階級的基督教化”，第11—13頁。

② 同上，第140頁。

③ 同上，第188頁。

了。不管教会如何努力地通过僧侶們领导的学校和其他学院来統制青年一代的思想，它的努力終归是徒劳无益。在这一方面，法国高級教士讓·列克莱尔的自白是可作为例証的，列克莱尔写有专门研究現代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的著作。

在天主教学校中受教育的青年，列克莱尔說，一进入大学后就开始对上帝的存在抱怀疑态度。那些曾在僧侶那里受过教育的学生把宗教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一加比較后，觉得前者簡直是孩童的幻想。列克莱尔把在科学界占統治地位的气氛描摹成这样：“許多科学家确信，传统理解中的宗教問題再也不会使現代人感到兴趣。有利于宗教的論据和反对宗教的論据都是属于无法証明的范畴的，因此不能予以注意。学者們認為，所有的宗教是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令人感觉兴趣的現象……他們認為进步的道路，人类发展的道路，是通向与宗教相反的方面去的，祇有科学精神能答复文明人的願望……天主教圈子中出身的青年人一进入大学，就处于这种科学气氛的影响之下。實驗室中被实验所証实的科学方法，对他們而言象天启般正确。自从这一时刻起，在他們于太学念書的整个时期中，他們經常被提示，不應該同意未經檢驗过的結論，科学教育首先在于作出良好的檢驗方法。于是他們就想到，他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接受的宗教訓导缺乏坚实的基础，他們接受的是未經証实过的公式，他們相信的是无根据的議論……他們在青年时代所認識的基督教，由于不曾和其他宗教比較过，因之是非凡的、独一无二的宗教。現在在他們面前展列着其他二十种与基督教有着許多相似点的宗教，这使他們感到惊异了。这些宗教也有着自已的拥护者，宣称他們的宗教优于基督教，于是青年人得出了下列結論——归根結底說来不是他們自己选定基督教的，他們有这一信仰是环境所致，因为沒有可能把基督教与其他世界观相比較，他們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仅是由于生长在基督教的环境中，如果他們生在其他一个国家中，也会成为很好的伊斯

兰教徒或印度教徒的。于是他們問自己道，說他們的信仰是眞实的，究竟其保証何在。难道一个宗教不与另一个是平等的嗎？”^①。列克萊尔不由得不承認，僧侶們无法对这些問題提出令人信服的答复，虽則如此，教会当局繼續捍卫着傳統的教会理論，它不經過战斗是不会交出自己的地盘的。天主教內为耶穌会徒所鼓舞的所謂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在这方面特別热心。复古主义者是科学与进步、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的死敌。在意大利复古派由“天主教文明”所代表。在法国复古派麇集在“法兰西天主教徒”杂志的周围，这本杂志在德国占領法国时期称为“明日”杂志，它受到貝当的支持。現在“法兰西天主教徒”主张繼續“冷战”，并且要求法国也制造原子弹^②。复古派反对进行社会改革。根据复古派理論家之一、高級教士勃魯諾·塞拉茲——他是土魯斯市天主教高等学校的校长——的說法，“基督教的解脫不在于消灭貧困，而在于消灭罪恶。”^③

法国天主教杂志“灵魂月刊”認为复古主义是天主教会中的主流。这一杂志宣称：“复古主义者在西班牙和加拿大教会中占着优势，他們在羅馬，在美国和德国教会的代表人物中間有着特別的势力。复古派的势力在‘圣办公厅’中占統治地位……教皇私人办公厅主任德国高級教士萊依别尔亦以复古主义者的拥护者見称。”^④

僧侶中意識到在現代条件下教会坚持“异教謬論”原則是决无好处的代表人士，是不滿意复古主义的。寻覓和坚持其他解决方法的僧侶們，組成了一个虽然非占优势的但相当有影响的現代主义派，这一派的成員可以分为溫和派現代主义者和“急进

① 列克萊尔：“二十世紀智識份子間的信仰問題”，第二版，巴黎，1950年，第9—12頁。

② “灵魂月刊”，巴黎，1955年5月号，第805—806頁，1955年7月号，第1183—1184頁。

③ “世界宗教近况”，巴黎，1955年1月1日。

④ “灵魂月刊”，巴黎，1954年3月13日。

派現代主義者”，但這並不意味着兩者之間有着嚴格的區別。溫和派和急進派贊成改變教會的路綫，首先出于為了戰勝共產主義影響這一考慮。

溫和派現代主義者要求教會“干預生活”，積極參加社會生活，最大程度地發展如“天主教行動”一類的群眾性組織。他們贊成在政治上玩弄戲法和隨機應變，他們宣傳要依照美國教會的方式和模樣使教會的活動現代化。“如果教會空虛無內容，它還有什麼價值？——屬於這一類型的現代主義者之一、意大利高級教士鮑拉驚嘆道——我們至少應該做到讓教會兼足球場，教會兼彈子房，或教會兼電影院。如果教會中沒有這些娛樂，年青人不會到我們這裡來，或者來了以後，隨即到其它會戕害我們在青年心中所播下的種子的處所去。”^① 現代主義者的溫和派是教權派陣營中和資產階級臭味最相投的一部分人。

現代主義者中的“急進派”認為，教會應該提出急進的綱領和為其實現而鬥爭，從而拯救自己和“防止共產主義勝利”。教士帕里莫·馬佐拉里常常在意大利教權派報刊上發表政治論文，他宣稱：“共產黨人在幾年後將在選舉中得到多數票而執政。因之或者是由我們來實現共產主義綱領的大部分，或者是由共產黨人來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至今為止，政府和統治階級及大資產階級在保護着富人的自由。現在該是保護窮人的時候了”^②。正如意大利教權派份子迪·鮑所指出，這一派的信徒們為了打算戰勝共產主義，“因此把經濟財富的意義問題作為重點，他們斷言，國家生活中的主導作用是屬於這類財富的。他們為了打算戰勝共產主義，因而利用共產主義所固有的武器，共產主義所固有的各種論據，辯證唯物主義，雖然這裡邊有着心理上的困難和違背教理”^③。

① 布拉爾：“鄉村教區”，第18頁。

② “歐羅巴”，米蘭，1954年1月3日。

③ 迪·鮑：“意大利天主教的危機”，第62頁。

倡导这种“急进的”和蛊惑人心的策略以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理論家不是別人，而是布尔什維克主义的“专家”和东正教“哲学家”白匪份子別尔茄也夫，近年来他以天主教会的“拯救者”之一的身份活跃着。

別尔茄也夫理論在法国的追随者之一高僧哈因，承認共产主义学說已获得“世界性成功”。哈因同意这一說法，即“馬克思主义生在工人阶级的心中”。他在研究一个问题：用什么办法能把馬克思主义从工人阶级的心中赶出去。“这将来可以办到——他断言——如果教会的领导人能引导基督教的教义比共产主义更走向极端的冒险和极端的牺牲”。哈因确信，进行社会性蛊惑宣传是摆脱目前窘境的路。

“超过馬克思主义——这就是基督教的任务”——別尔茄也夫的另一个拥护者、法国教士台尔明这样声称，接着他又补充道：“为了离間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应该作出一切努力”^①。然而对共产主义进行一般性誹謗以图达到离間的目的，对于反动派来说，其可能性愈来愈小了，这一点台尔明也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繼續教导道——应该擷取共产主义中有益的核心：經濟結構对人的道德行为的影响，对物質的正确估价，历史辯証法，贊美劳动，把无产者从一切使他隶属于其他人的制度中解放出来，工人团结精神，必須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僧侶制度，使財富和遺產再也不会成为它的主要因素，发展工人文化和树立工人的人道主义。”^② 台尔明說，应该采取共产主义的“实践部份”，抛弃它的革命性理論和哲学。台尔明“革命性”綱領的目的，不在于把工人阶级从資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是在于“消灭共产主义”。

梵蒂岡根据形势和各个国家中教会所处的地位，有时利用复古主义者，有时則利用急进派或溫和派的現代主义者。

① “无产阶级的基督教化”，第64頁。

② 同上，第54—55頁。

法国教会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是极其弱的。梵蒂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考虑到每一种流派都会把属于一定阶层的人引向教会，所以它同时既支持复古主义者，又支持现代主义者。梵蒂冈特别期望“急进派”现代主义者能打破工人阶级对教会的不信任，从而使教权派在劳动者中间争得地位，这亦将巩固人民共和党的地位。所谓工人教士运动就是追求这一目的的，这一运动的简短历史已经异常明显地反映出正在腐蚀着现代天主教阵营的一些矛盾^①。

工人教士运动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一运动的首倡者为多米尼加教派僧侣穆夫、戈登和丹尼尔。穆夫以前是个律师，戈登和丹尼尔是“基督教工人青年”的牧师。法国沦陷时期，他们根据主教会的指示落户在马赛和巴黎的工人居住区，以监视工人阶级的情绪。穆夫有一时期曾经在马赛港做装卸工人，因此他有可能亲自尝试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妙处。他们这种躬自亲行“走向工人阶级”的结果是出版了二本书，书中他们对自己的观察所得作出了结论和建议，这些结论和建议其后成为他们追随者的纲领^②。

穆夫、戈登和丹尼尔在工人中间住过一时期后发现了些什么问题，又得出了什么结论？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是生活在怎样黑暗恶劣的条件下^③，如何地遭受残酷的剥削；他们深信，工人们是把教会看作剥削者的奴仆的，而把僧侣则看作是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认为僧侣所进行的反共宣传对工人没有起应有的影响。他们警告道，如果首先没有获得工人群众的信任，那么企图影响他们是徒劳无功的。

① “宗教与无神论历史问题”，第3期，1956年，第145—151页。

② 戈登与丹尼尔：“法国——教会之国？”巴黎，1950年（初版在1943年，巴黎）；穆夫：“无产阶级的使命”。

③ 穆夫把本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一百年前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相比较。

“首先應該博取群众的信任——繆夫劝导僧侶們說。現在在人民与教会之間橫着不可逾越的鴻沟。人民确信教会的利益是同富人、业主們的利益相一致的。”^①为了博得对教会怀敌意的工人們的信任，繆夫建議利用法国教会在过去曾用以籠絡杜亚列人的老方法^②。杜亚列人对天主教传教士特別不信任。长时期以来，所有欲使他們信仰基督教的嘗試都遭失敗。于是在本世紀之初有一个名为富考尔的修道士决定試行一下以下的方法：他落戶在杜亚列人之中，數年間和他們一起劳动，同他們一样地忍受各种苦难，然而并不試图劝说他們信奉天主教。因之他博得了杜亚列人的信任，随后使他們信了教。多米尼加教派的这些教士建議对法国工人階級也采取这种战略。他們認為在工人階級之中有一群教士落戶其間是合理的，这群教士与其說是以言辞影响工人，还不如說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他們。这些教士們的衣食住行應該同所有的工人們一样，和他共同劳动，至于对待资本家問題上亦应与工人抱同一态度。

“这是事实——繆夫写道——在我們的工人教区中教会(教士，主教，梵蒂岡)有着坏名声，教会被指責不和劳动者的生活相关連，教会利用人民的信任靠信徒来生活……但是，假使教士在工厂中工作，則所有这些責难都化为烏有了。証明能以自己的劳动为自己換取面包的教士，是不可能被責为寄食者的”^③。

法国主教会在事先得到梵蒂岡的准許后，同意了繆夫及其同伴們的建議。工人教士的活动計劃拟訂好了，同时預計到，工人教士的活动要收到效果至少在50年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代里，成立了工人教士組織。同多米尼加教派平等地参加这組織的有弗兰西斯克教派、耶穌会和卡普青教派以及其他教派的僧侶。1951—1955年間正当該

① “无产階級的基督教化”，第155頁。

② 杜亚列人为居住在撒哈拉和法屬苏丹的巴巴尔族人。

③ “无产階級的基督教化”，第214頁。

运动处于发展高潮时，参加该运动的教士和修道士约有300人，他们在巴黎最大的工厂中工作，其中包括“雷诺”和“雪铁龙”工厂，和在位于巴黎近郊所谓“红色”区域内的企业中工作，如伊夫里、蒙忒、克里姆林—皮赛尔、蒙脱罗兹诸区；以及在位于列黎、里昂、马赛、土鲁斯、波尔多和其他工业中心的工厂中工作。

工人教士居住在工人区中，最好是在工人家庭中租一个角落或一个房间。他们在大工厂中工作，参加统一的工会，服从工会的纪律，参加工会的斗争。

单独活动的工人教士被称为侨民。每区的侨民组成一个“法兰西传教士团”，它同教区和当地的群众性天主教组织保持联系，首先是同“天主教行动”保持联系。所有的传教士团由“巴黎传教士团”领导，它向法国枢密红衣主教修尔负责。准备作工人教士的僧侣在设在里士育、里蒙兹和庞蒂尼等地的神学校中受专门训练。

工人教士规避反共宣传。教会当局忠告他们要象天使般的谦虚，不作自我宣传，以避免造成工人教士的行为是在追求着某种“秘密的”——即政治性的——目的的印象。

这些被资产阶级报纸戏称为“穿着工人工作服的上帝的侍奉们”，其行为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把自己在工厂中赚得的工资分与周围的人，以及免费为人举行圣礼，后一事在教会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如果我们真正希望成为诚心诚意为好的教士，希望别人也认为我们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在金钱问题上应该有明确的立场——缪夫关于这个问题写道——我们（即缪夫领导的传教士团——作者）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教会的大门上悬挂下列通告：

“上帝面前不分穷人和富人。

在这个作为所有人的避难所的教堂里，举行圣礼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和免费的。

我们没有秘密的预算。

任何一个願意担負教区支出的人，可以不具名地尽你一份力量。

每月底我們的預算貼在教堂的入口处”^①。

1947年，教会当局在比利时煤矿中心沙勒尔瓦召开了工人教士运动大会。在大会上除了有人发表演說，提醒說工人教士的首要責任为教会服务和忠誠于教会领导外，还听到这种呼声：号召同工人階級忠誠合作反对資产階級。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教士保罗·布尔齐的演說，他号召天主教徒“或者与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伟大的工人解放运动合作，或者起来保卫以現金存款为基础的侵略性經濟制度，在这二者之間，作出最后的选择”^②。根据布尔齐的意見，教会假使与业已日暮途穷的資产階級連結在一起，那是个錯誤，它應該指望无产階級，因为未来是屬於他們的。布尔齐說：

“資产階級不是起源于上帝的，現在的革命将要审查統治階級的干部。假如为了保証工人群众的解放和为了工人群众的安全，必須改組統治階級的結構时（即以工人代替資本家——作者），我們不知道根据哪一条基督的原理有权利禁止这样做”^③。

教会当局起先对工人教士运动显然是表示眷顧的。縱令从这一事实也可得到証明，即沙勒尔瓦大会的會議速記稿在1948年以法文出版，其后譯成意大利文，并由勃列沙市的教会印刷局在1950年出版。

显而易见，梵蒂岡在将共产党人逐出教会以后，期望工人教士的这些“左傾”言論能証明教会对劳动者的专爱，能离間工人脱离共产主义。但教会的上层份子既然認為这些言論不过是权术，而以后的事件也証明，許多普通教士根本不想昧自己的良心，他們真誠地希望同工人階級合作，参加他們的解放斗争。

① “无产階級的基督教化”，第211頁。

② 同上，第331頁。

③ 同上，第234頁。

1948年法国国民陣綫政府被拆散，这政府包括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接着上台的是资产阶级—教权派政府。工人阶级经过无数牺牲而取得的国际工会团结，重新被破坏。同盟国在反法西斯和反纳粹斗争中的合作关系，被美国侵略集团及其欧洲附庸国的反苏反人民民主国家的集团组织、被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计划所代替了。

所有这些变化使工人教士面临着一个问题：在新的形势下采取什么路线？追随梵蒂冈的榜样和公开敌对共产党人呢？还是继续留在统一的工会中，以证明不是所有的僧侣都反对工人阶级，也还有不理教会当局的路线而支持工人运动的教士存在着？

教会当局命令工人教士仍旧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因此，就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情况：梵蒂冈号召同共产党人作斗争，而在同一时期内工人教士就是同那些作为斗争对象的共产党人，友谊地团结在统一的工会中工作，同时又得到梵蒂冈的支持。另一方面，工人教士继续参加统一的工会所领导的罢工，赞成禁止原子弹，反对在越南进行“肮脏战争”和反对人民共和党的首领及工会的分裂派份子。工人教士的这种活动愈来愈引起法国统治集团的恼怒。这反映在反动报刊上，原来对工人教士的赞扬，说他们是“上帝的首先赞成者”，现在被对他们的斥责所代替。法国垄断资本的报纸“震旦报”特别暴跳如雷，它对工人教士和支持他们的活动的多米尼加教派进行了有计划的攻击宣传。这家报纸甚至宣布巴黎的多米尼加寺院是“马克思主义的窠穴和共产主义的温床”，而工人教士则是“共产党情报局的代理人”。美国的反动报刊也参与对工人教士的讨伐宣传。

1952年5月28日，巴黎人民走上街头反对臭名远扬的美国将军李奇微来到法国首都，李奇微在朝鲜战争时期的行径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愤怒。教权派份子皮杜尔手下的警察以武器对付愤怒的巴黎市民。警察暴行的受难者之中有两位工人教

士布凡和卡恩，根据警察的声明，他们是“同一群抗议示威的共产党人”一起被捕的。两位教士虽然曾向警察说明他们是僧侣，然而仍被警察残忍地痛打了一顿。

受难的教士们在谈到他们在警察署的遭遇时，叙述说：“我们一到那里，他们既不问又不看我们的证件，就开始打我们。将近有二十个警察冲向我们，用拳头、橡皮棍和脚乱打乱踢，主要是打头部。我们被推倒在地板上，又被强迫重新站起来，不管我们已经血流满面，继续殴打，直到我们浑身是血，面部青肿得不可辨认，差不多失去知觉和根本无力反抗时为止。以后我们被沿着楼梯拖到地窖中。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他的脸被打得连眼睛和嘴巴都张不开……”

我们渐渐地恢复了知觉。有一个警察专员走来问：“觉得好些没有？我觉得抱歉，连你们也挨了揍”。“什么，如果可以打别人的话”，贝尔纳说（教士中的一人——作者），“那么我们即使祇有一次能够同那些总是被拷问和被磨折的人们在一起受难，也是满意的……”。

此后我们被领到一楼和其他十三个同志监禁在一起。其中有些人脸上青肿不堪，淤血斑斑，有一个人衬衫上全是血（因在警察署或警署中被打）。警察不给饮食给我们，并且不准将自己的情况通知任何人。并不是所有被捕者都是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可是大家全被警察打了。

有两个共和国保安军的宪兵走到监禁室的铁槛旁嘲笑我们：“难道教士可以这样吗……暴徒……脏货……堕落者……”等等……

我们由于疼痛而变得迟钝了，坐在长凳上过夜，一方面听着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警察们快活地谈笑……

早晨九时，贝尔纳被唤到一个警官面前：

——这也算是个神甫！我以前是教会中学校学生，是个基督徒。你是暴力的拥护者，不是友爱的拥护者。

他立刻取了鉄板^①，用它打貝尔納的背。

貝尔納：——我从来不曾宣传过用暴力。可是我了解他們，當他們被煽动的时候。

警官：——你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訓，下賤貨，紅色神甫，你的聖父在莫斯科，現在我給你看。

他从架子上拿一根橡皮棍，狂暴地用来打貝尔納，一面說：‘我尊敬教士，但不尊敬人’。

——应该尊敬人。

这时候在場的一个穿民警制服的說：

——您听着，我們都是弟兄，您也是我們的弟兄。

——我同意。我和昨晚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們每天都在証明我們应友爱，因為我們生活在一起。可是当我在这里被你們打了以后，我能相信你們的友爱嗎？我觉得最伤心不过的是你們称自己为基督徒，大概你們是上教堂行弥撒礼和受聖餐的，然而却毆打我，毆打一个教士（在这天早晨其他的同志們沒有挨打。挨打的只有我們，教士們）。

我将这事通知高僧菲尔頓（巴黎大主教、紅衣主教菲尔頓，他是紅衣主教修尔的侄子——作者），——警官說。

——好吧！他会听你們的，然而也会听我們的。

——共产党人！

——昨天在示威游行中我看見了許多基督徒——他們根本不是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工人教士。

——我贊揚过工人教士，然而現在，不管我在哪里，我将尽力地伤害你們。

貝尔納再也不回答警察的話，因為恐怕繼續挨打。

另一个教士被带了进来……

——你昨天在哪里？

① 这是指示威游行中擲下来的商店挂在外边的招牌，用来挡警棍的。

——昨天我和我的同志們在一起，我是在幫助受傷的人的時候被捕的。

——废物！你宣傳暴力，而不是友愛。

警察給教士看一小塊鐵板，繼續問道：

——你贊成這個嗎？

——不，我不贊成，然而我了解。

——你不贊成嗎？

警察用鐵板打教士的腹部。

——滾出去，滾出去……

教士轉着身子躲讓，警察用盡全力用腳踢他的腰部。這是所有毆打方法中最厲害的一種”^①。

教士布凡和卡恩的真實而簡短的故事證明，當教士站在工人一方時，他在“基督秩序”的守護者眼中便變成了政治犯，警察可以為所欲為地用橡皮棍打他，象毆打保衛自己權利的工人一樣。

巴黎大主教、紅衣主教菲爾頓被迫對警察罪行提出抗議。除此而外，出來保護布凡和卡恩的還有法國主教會書記夏羅哀，“巴黎傳教士團”的領導人修道院院長霍蘭，巴黎教區的教士和其他教會活動家。

1953年8月，法國碼頭工人舉行罷工，要求立即結束印度支那戰爭。天主教各工會的領導者反對舉行罷工。當時有一批工人教士發表了一個聲明，痛斥天主教工會的主席泰西叶是叛徒和工賊。泰西叶的答复是到法院去告狀，控告聲明的作者們誹謗他。環繞着這一事件所進行的論戰，迫使泰西叶辭職。

這些事件使梵蒂岡當局感到憂慮，梵蒂岡早就不安地注視着工人教士們的活動，和企圖緩和他們的“熱忱”。1953年9月，紅衣主教披薩爾杜根據教皇的訓令發給法國主教會一份通

^① “工人教士”，巴黎，1954年，第193—197頁。

知，命令立即解散“法兰西传教士团”和召归所有在工厂和其他处所工作的工人教士，其理由为工人教士这一制度未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它没有为天主教会带来益处，相反地却带来了害处。

梵蒂冈的迫害是出于政治原因。“工人教士们被指责不够反共——雅克·杜克洛关于这一决定写道——梵蒂冈提出这种责难显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党首先是保卫劳动者和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梵蒂冈的非难并不是出于宗教的前提，而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①

1953年10月5日，工人教士通过了一份致红衣主教菲尔顿的宣言。我们从这一个在今日仍不失其现实性的文件，适当地摘录以下一些文句以供参考：

“我们处身在工人之间学得了许多东西。我们的僧侣们因只从一方面观察问题，所以这一点他们很难了解。

我们已经懂得，工人阶级为了要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即使一点点的自由，他们的活动必须是有组织和有意识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有利于进行剥削的条件统治着一切，个人自由不过是一种欺骗。我们现在懂得，无产者没有阶级觉悟、没有自己的组织是任何时候也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敌人从四面八方围攻他，如果敌人不是在质和量两方面比他强百倍的话，那么至少在拥有进行奴役和压迫的工具方面比无产者强：从进行公开和残酷的斗争一直到进行伪善的友爱宣传和散布宗教麻醉剂。我们想到，我们的责任是同意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观点，和参加他们的有组织活动……

我们已经懂得，教会所鼓吹的社会学说是常常是引向出卖工人阶级，引向出卖工人阶级的合法利益的……

我们已经懂得，正与某些断言相反，工人阶级的斗争既是由

^① “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巴黎，1954年，第189页。

于純粹的物質要求所引起，同时又由于对于人的尊严的焦虑所促使，因为工人階級同时又为新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为改变生活条件和建立新的人类社会而斗争……

我們因积极地参加工人斗争而被譴責，这只是因为教会及其大部份制度和僧侶所保卫的制度，正是我們和工人階級所全力反对的，認為这制度已經腐朽和不合理。

應該勇敢地面向事实：教会是支持这一制度的……

教会只不过在理論上譴責資本主义。在实际活动中教会不仅承認这个制度，并且还同它合作。工人們是不会对这事实抱任何怀疑态度的。我們更不必談到教会的学說、政策和教会当局的措施是支持資本主义的。难道一个其全部教养被資產階級文化所浸透的教士，是天然不对資本主义表示好感的嗎？

有人对我們說，應該承認資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罪恶，因为教会是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着和活动着的，正如教会过去曾在封建社会中活动过一样。然而那些抱这种論調的人极为清楚地知道——虽然也感到深深的不安，世界上有一半人口实际上已抛弃了这一制度……要知道甚至資本主义各国内部的广大无产者群众，在他們的心中也不承認这个制度，他們是这个制度的牺牲者。

教会感覺到人們将把这制度连同教会一起抛弃掉，它开始惧怕工人階級，惧怕无产階級的胜利，惧怕无产階級的胜利在社会制度、生活、人們的意識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教会对鼓舞着无产階級胜利的步伐、激励着无产階級的革命力量和为无产階級指出美好前景的共产主义特別恐惧。”^①

大多数工人教士所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关于这些教士，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員罗伯特·貝尔納斯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地談到：他們是被謹慎地挑选出来和受过严格訓練的，教会当

① “工人教士”，第 230—234 頁。

局曾認為他們是“可靠的反共分子”^①。當他們自身經歷了資本主義剝削的一切殘酷以後，他們的反共思想就化為烏有了。

法國主教會在收到如此慷慨淋漓的宣言以後，通知梵蒂岡說，突然解散工人教士運動將受到他們的反對，和引起法國天主教廣大階層的憤慨。

事實上果真如此，披薩爾杜的通知在報紙上傳播以後，引起了天主教階層對教皇決定廣泛的抗議。著名的天主教作家和活動家法朗索·莫里阿、丹尼爾·勞波斯、愛汀·鮑恩、喬治·戈登和其他人在報刊上著文為工人教士辯護。

甚至某些資產階級報紙，如“費加羅報”和“世界報”也站在工人教士一邊。

自由主義天主教徒辦的一份有相當影響的雜誌“靈魂月刊”積極支持工人教士。這份雜誌的編輯部在評論教皇取締工人教士運動的命令時，據說工人教士被共產主義精神所感染了，嘲諷地要求教皇也制裁資本家一教士，即制裁那些為資本家集團服務的牧師，因為他們早已感染上資本主義精神了，不但如此，其中許多人已經自己成為資本家。“廣大公眾——‘靈魂月刊’寫道——可能只知道一些由資本家一教士領導的企业，資本家一教士和選擇剝削者地位的那些人一樣，為了更好地了解工人階級，為了更好地對他們進行估價，他們決定擠身於資本主義集團之列。資本家一教士有着優越的條件，以証實教皇在通諭中所宣布的教會社會學說是有根據和實際可行的，不過這些通諭早被人們忘記得乾乾淨淨了。然而，可惜得很，同樣的原因會引起同樣的後果，同時最善良的意圖會引人入地獄。一些工人教士落入了共產主義的圈套，而許多資本家一教士則忽然發覺自己處身在一般資本主義的捕鼠機中……似乎資本家一教士中的某些人早已身為資本家了。他們不但付給被他們看作自己僕人的聯

^① 羅伯特·貝爾納斯：“法國工人教士”（“國際新聞”，紐約，1955年1月號，第33頁）。

工們以極低的薪金，同時還利用自己的神職身份更好地剝削他們。工人監工為了尊敬這些資本家一教士的袈裟，極願意把心懷不滿的工人的姓名報告他們。工會運動，甚至基督教的工人運動，在他們的企业中是被禁止的，但資本家一教士自己却不拒絕參加製造商同業公會……”^①

如此親近教會的人士們的這種言論，迫使梵蒂岡聲明，關於工人教士的最終決定目前還沒有作出，尚待仔細研究後再作最終決定。梵蒂岡隨即撤換了法國多米尼加教派的領導人^②（包括修道院院長興拿、波阿賽洛、康茄爾、菲列）。1954年1月召開的法國主教會會議上，主教會根據梵蒂岡的訓令宣布“教士的職業是和工人的職業相抵觸的”。主教會會議命令工人教士立即辭去被工人們選上的“世俗職務”（即指工會中的工作），而在工廠中的工作則保留到1954年3月1日為止。主教會責令教士們在今後如要進行“體力勞動”時，則每次應得到教會當局特別許可，特別許可規定的勞動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會議的決議還指示道，研究工人問題的教士今後受鄉鎮小教區教士的管轄，並且不得和工人住在一起，而住在鄉鎮小教區的教士只有在得到教會首長的同意後才能離開教區。

雖然有着最後兩段“妥協性”的規定，事情很明白，主教會的決定意味着取消工人教士運動，而他們在政治上同情工人階級是引起這個決定的原因。正因為這一點已經是眾所周知，所以主教們否認他們的決定有着政治背景。他們勸說工人教士們“不要聽信說我們的決定是由于政治問題的原因的那些人的話。你們不要懷疑你們的主教們的忠誠。他們是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將審判他們，他們斷言決無政治原因在內，而全然出于宗教原因……”。七十三位工人教士——其後差不多所有的工人教士都

① “靈魂月刊”，第12期，1954年，第788—789頁。

② 1954年多米尼加教派的將軍如謎地死去以後（他是因汽車失事身死的），接替這一位置的是美國人麥克台爾莫。

参加了(除了七个耶稣会徒和一批在列黎工作的工人教士)——公布了他們对主教們的答复信，这封信如同他們以前发表的宣言一样，証明在僧侶的某些阶层中在思潮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教士們在答复信中写道：

“当法国和国外千百万工人为自己队伍的团結一致而斗争，以保卫自己的面包、自由与和平的时刻；当工厂主和政府加强剝削和迫害，企图不惜代价保証不失去自己的特权和堵塞工人阶级进步的道路的时候——教会当局想强迫工人教士脱离劳动，使他們脱离和所有自己的同志們团結一致地进行着的斗争。

主教們断言这不是政治措施，而是宗教措施。然而我們认为，我們的工人生活从来不曾妨碍我們的信心，妨碍我們的教職。我們不能理解，为了福音的緣故如何可以禁止教士同千百万被奴役的人們共甘苦，如何可以禁止他們在斗争中表示和工人是团結一致的。

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那些确认它是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們，而是需要那些能和它共同斗争，抱同一目的的人們。”^①

1954年2月7日，250位天主教徒—工人运动活动家也发表了宣言書，反对解散工人教士^②。

其他許多牧师也支持工人教士，他們不怕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为志願同工人連結在一起的同行們辯护。下面所援引的一篇文章，可以很好地說明今日在法国外省僧侶中占統治地位的一种情緒。

上加隆省的一个乡村小教区的司祭裘波阿，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写道：

“工人教士現在被譴責了，可是对那些官員—教士，記者—教士和政治家—教士又該如何对待呢？为什么允許教士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讓步，而教士与工人之間的互讓却認為是不可能

① “团結报”，羅馬，1954年2月4日。

② 吉尔柏·馬利：“工人教士的任务”（“国际新聞”，巴黎，1954年5月号）。

的呢？

全是廢話，——階級鬥爭——這才是事實，雖則是值得遺憾的事實，但是究竟是事實……”^①

從擁有億美元的梵蒂岡來說，它對教士的責任的理解，和依靠自己教區內信徒的贈金為生的上加隆省普通鄉村教士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

梵蒂岡對天主教報刊中凡同情和平運動與工人教士運動者，也都橫加迫害。法國天主教“雙周”雜誌在1955年1月29日被梵蒂岡列入“禁書目錄”之中^②。

“雙周”雜誌創刊於1950年，它很快地博得了工人教徒和知識分子教徒的同情。這本雜誌與梵蒂岡和法國天主教會的官方路線相對抗，它反對在越南進行的“骯髒戰爭”，反對重新武裝德國，贊成信仰天主教的工人與共產黨的工人所領導的工會團結一致，贊成天主教徒參加國際和平運動。然而“雙周”在其他許多問題方面，仍然抱着教會傳統的觀點。

“雙周”雜誌的工作人員是屬於戰後一代的天主教活動家之列的，其中的某些人曾積極地參加過抵抗運動。他們全都是宗教界人士，決不是否定教會的信條和羅馬教皇威權的人。這只要從他們服從梵蒂岡的決定，和停刊了自己的雜誌一點就可以看出。但是他們以此為出發點的，即他們對天主教教理的信仰和忠誠，與同共產黨人站在統一戰線上為爭取和平和社會進步而鬥爭這回事是完全可相容的；他們認為教會能夠保持它對群眾的影響，如果天主教徒在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勞動者中（大部份這種勞動者是在法國）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他們共同為和平與社會公平而鬥爭的話。

① “團結報”，羅馬，1954年2月9日。

② “雙周”為法國天主教第二大雜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梵蒂岡所查禁。1948年被列入“禁書目錄”的尚有進步的天主教雜誌，“教會的青春”運動的機關刊物“趨向”。

“双周”既沒有得到法国主教会的支持，又沒有得到梵蒂岡的支持。尚在1952年11月时，法国的紅衣主教和大主教會議曾执行梵蒂岡的訓令，警告“天主教行动”的成員不得追隨該杂志的路綫。

1954年3月11日，主教會議又一次譴責“双周”杂志。1954年4月9日，“羅馬觀察家”著文攻击这本法国杂志，責备它在討論“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这样一个复杂的問題时”，沒有考虑梵蒂岡关于把共产党人逐出教会的指示。

“双周”不管梵蒂岡对它抱着明显的敌对态度，繼續勇敢地拥护和平，贊成工人教徒，同共产党人在为劳动者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行动一致。梵蒂岡的答复是把这本杂志列入“禁書目录”。

“双周”的編輯部服从了梵蒂岡的决定，并停止刊行这本杂志。然而在最后一期中杂志的編輯部指出，它認為杂志所抱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編輯部在“致讀者信”中声言：“我們忠实于教会，我們同样程度地忠实于我們对自己的在劳动和工作中的同志們所負的一切責任，不管他們是誰。对于我們來說，放弃我們已經发表过的观点，或者放弃我們認為工人应团結一致的主张，是不可能的。在工人階級或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問題上，在爭取和平或爭取教育的民主化問題上——在这些旨在提高人类福祉，促使社会公平和广泛传播文化的巨大的努力面前，二十世紀的基督徒沒有权利做一个袖手旁觀的观众。”^①

該杂志的編輯安利·爱尔芒登載在同一期杂志上的文章是值得大为注意的：“統一各种人民力量的行动是劳动者唯一的希望”。文章作者說道：“我們曾极明确地断言过，反共显然不是走向民族独立的最好途径，相反地却是失去民族独立的最好方

^① “双周”，第98—99期，巴黎，1955年3月。

法。我們同样断言过，脱离群众的和缺乏明确主义的知識份子运动，是注定要遭到失败的。至于論及民族独立問題，則只有在所有的各种人民力量，在所有的党派及其代表——包括共产党在內——的通力合作之下方能贏得。

我們在最初就是以这种立場为依据进行我們所有的政治性宣传的。現在象我們这样地在議論着的人，要比开始时多得多。当然路途上滿布障碍物，使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接近我們不是那么容易，所有的不信任和宿嫌不可能立刻消除掉……。

因此，應該作出結論說，不管所有各种人民力量在联合过程中将会碰到困难，然而所有各种人民力量的联合在将来仍旧是劳动者的唯一希望。我們將沿着这条道路繼續我們的政治活动。”^①

“双周”杂志和工人教士运动的被梵蒂岡所譴責，并不使人惊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即在天主教陣营中产生了一些如此进步的团体，它們坚持着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友好以及共同进行斗争这种理想。

工人教士和“双周”杂志的历史，再一次地証实了在法国教权派陣营內有着一股进步的潮流，属于这流派的人士正在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的忠实走狗、法国主教会反动的多数派和人民共和党的首領們而斗争着。

法国天主教徒中的进步派不顧种种迫害繼續在发展着。法国天主教杂志“灵魂月刊”、“快报”和“基督圣書周刊”上刊登的拥护禁止原子武装、反对殖民主义、贊成国际合作的文章就証实了这一点。

意大利天主教陣营也經歷着如同发生在法国的那种危机。在意大利天主教徒对教会当局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右翼首領們的反动政策，愈来愈强烈地表示不滿和憤怒。

① “双周”，第98—99期，巴黎，1955年3月1日。

为了正确地理解今日天主教民主党党内的矛盾，必须知道该党内部各种力量间的关系。这些力量可以划为四派：保守力量，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相信天主教民主党领导机关的人民力量；不相信天主教民主党领导机关的人民力量，然而这一派认为他们能在党内改变党的现行战线；最后一派的人民力量认为必须建立新的同盟来改变党的现行方针^①。最后几派的影响正在不断地扩大着。

意大利的报纸宣布，梵蒂冈的上层人物分成两派，一派是传统政策的拥护者，其首脑是国务卿助理塔基尼；一派是“新的”更具有弹性的政策的拥护者，其首脑是塔基尼以前的同事、现为米兰大主教的蒙梯尼，教皇据说是倾向于他一方面的。至于在天主教民主党中，则第一种倾向的领导者是加斯贝利，而第二种倾向是以现总书记范范尼为代表。

“新方针”的拥护者们将自己打扮成工人的朋友，然而完全不想牺牲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蒙梯尼警告教会中的“社会”活动家们说：“揭发劳动或生活方面某些不合理条件的人，应该随时谨防可能因他的言行而使原来的事实被夸张。爱护自己的劳动弟兄或为他们而工作，甚至于有时甘为他们而牺牲自己职位的人，同样应该抛弃对阶级精神有致命性危险的坚信不渝的态度。”^②

梵蒂冈懂得，在一个经常有二百万失业者大军和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以及强大的工会运动蓬勃开展着的国家里，进行基督教的以社会问题为内容的蛊惑性宣传是利弊相兼的。然而以社会问题为内容的蛊惑性宣传是教会手中的武器，教会依靠了它方能希望保持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因此，梵蒂冈被迫运用它，可是其效果却每况愈下。

① 隆哥：“意大利共产党人为自由、和平与向左转而斗争”（“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6年8月5日）。

② “罗马观察家”，1954年6月2日。

我們援引几个典型性的例子來說明。

差不多抱着与法国僧侶組織工人教士运动同样的目的，在大多数居民投左翼政党票的爱米里省里，在1950年时根据当地大主教、現紅衣主教列卡洛的倡議，成立了一个由經過特别挑选的修道士組成的組織，以与共产主义对工人階級的影响作斗争。这一組織称“兄弟会”，它以主教会为据点，拥有汽車、无綫电广播設備、活动电影放映設備和其他宣传工具。“兄弟会”乘着車輛在各省間穿梭地巡行，它主要在发生罢工和业主停閉企业的地方活动，罢工和业主停閉企业是今日意大利的平常事。人民因为这些修道士的机动性高，就給他們起了个“飞行教士”的綽号。他們的手头常用書不是福音書，而是一本就其書名而言即类似某种綱領却不象書的“基督教革命教义問答”。的确，这本书根本没有談到革命，然而它和其他以社会問題为內容的现代教会書籍比較时，就从它要求工人和业主間的关系应以“绝对公平”为原则，而不以“基督的美德”为原则这一点而言，就远为特出的了。“基督教革命教义問答”認為，信徒應該支持“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

資產階級教权派的記者們与他們的法国同行最初对待工人教士的态度一样，起初讚揚“飞行教士”的活动，誉之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之箭”、“教会的突击队”、“紅衣主教列卡洛的别动队”和其他意义重大的別名。資產階級报刊对“兄弟会”的热情不久就下降了。过了一个时期以后，关于“兄弟会”流传着一些“不体面”的謠言；与其說“兄弟会”在与共产主义影响作斗争，还不如說它在协助共产主义得到流广。紅衣主教列卡洛本人也惹得梵蒂岡不滿起来，因为他发表了一个号召禁止使用原子、化学和細菌武器的宣言。（羅馬教皇直到1955年年底方才发表同样的宣言）。“飞行教士”的首領貝納索牧师对“前进报”記者所作的新年談話（1953年年底），引起了梵蒂岡上层人物更大的不滿，貝納索說，“在通向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左翼人士——作者）

合作，以解决在革新我们的社会体制时所遇到的最根本和最恼人的问题的道路上”^①，他认为没有什么障碍。

意大利的教会当局同其他各国的一样，惧怕从事社会工作的教士们卷入劳动者为达到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惧怕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53年，梵蒂冈当时的国务卿助理蒙梯尼向教会中所有从事社会工作的神职人员发出一封信，写道：

“让所有对社会问题深感兴趣的教士们不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诱惑面前让步，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学说和实践两方面看来都是唯一正确的。”^②

如果意大利尚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诱惑前”让步的教士，那么在人民民主国家之中千百位普通教士欢迎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资产阶级宣传机关成年累月地攻击共产党人，似乎他们用武力强迫社会主义各国中的僧侣们赞成人民政权，这种诽谤和谰言难道不是只消引用蒙梯尼的这一封信就可以揭穿的吗？

在工人教士问题上及类似的从事社会工作教士问题上极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不仅在劳动者之中使梵蒂冈的真面目被迫自行揭穿和使梵蒂冈的威信低落，即在僧侣间情况也是如此，在慈善事业活动领域内也感觉到存在着这些矛盾，大家知道，梵蒂冈在经营慈善事业方面累积着数百年的丰富经验。

过去年代里，教会的慈善事业在不小的程度上有助于僧侣在社会各阶层中维系他们的威望，有助于隐瞒教会权贵们所固有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恶习，例如崇尚奢华，挥霍无度，贪婪无厌，自私自利等等。教会对僧侣中个别人物的善行大为宣传，以为僧侣们普遍的淫荡生活辩护。

然而慈善事业早已衰颓不振了。在现代条件之下，群众要

① “前进报”，罗马，1953年12月31日。

② “纽约时报”，1953年9月13日。

求的是社会公平，而不是施舍救济。那些仍然决定用布施这种办法医治资产阶级社会各种毛病的教士們，他們迟早会不得不向自己提問：能不能既保护了被剝削者的利益，又不責备他們的剝削者呢？意大利的一位叫做齐諾·薩尔蒂尼牧师(在意大利人們通常称他为頓·齐諾)的历史，証明了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問題^①。

1953年在都灵出版了一本不大的書，書名为“我們不同意”^②。書的黄色封面上印着几张照片。中央印的是我們前面提到过的頓·齐諾，一側印的是几个宪兵，另一側印的是典型的集中营的小木板房和几个形容憔悴的兒童。这些人象征性地以梵蒂岡旗帜的顏色作为衬底(梵蒂岡国以黄色为其标志)，是与書的内容有着直接的联系的。这本书引起了意大利天主教界相当热烈的討論。

齐諾·薩尔蒂尼牧师是在已相当成熟的年令时开始其宗教活动的——在1931年，当时他是一个律师并有着相当多的主顧，他决定做一个牧师，献身于教养孤兒和所謂“非婚生嬰兒”的事业，后者在意大利通常是被弃放在寺院門口或教堂的入口处的，这样做的不但有未婚的母亲，也有許多在穷困的逼迫下感到絕望的父母們。

頓·齐諾是在战后始获声名的。战后他收容了近千个无家可归的兒童和几百个无資財工具可以为生的难民，和他們一起定居在爱米里省的一个叫福斯考尔小地方的前德国人筑造的集中营中。

頓·齐諾把自己的“家庭”——他是这样称自己組織起来的公社的——分成几个工作队，每个工作队中有着成年人——“使徒”和兒童——“小使徒”。这个公社中禁止利用姓氏，私人财产是被废除的；这样一些字也是被废除的，如“您”、“你的”、“我

① “頓”这个头衔在意大利一般是僧侶和貴族所有的。

② 頓齐諾·薩尔蒂尼：“我們不同意”都灵，1953年。

的”、“金錢”。公社開設了一些手工艺工場，和在頓·齊諾用自己募捐得來的錢買來的土地上種植蔬菜，然後賣出換錢。所有的收入歸公社的公共金庫所有，並在其成員們中平均分配。這個“家庭”的領導是以頓·齊諾為首的由所有“使徒”選出來的委員會。公社定名為璦瑪台爾斐亞（取自希臘文，意為“友愛城”）。

公社的活動起初是在天主教神秘主義和宗教“靈感”的標志下進行的。頓·齊諾認為，在璦瑪台爾斐亞之中，他有可能使以四海之內皆兄弟和社會平等為基礎的早期基督教公社重見于世。

梵蒂岡的宣傳機構也廣為傳播關於璦瑪台爾斐亞的這種思想，並對薩爾蒂尼的奇思十分欣賞。教皇和教會中的權貴們曾不止一次地在梵蒂岡接見他。每次接見伴隨著廣告性的喧囂，其熱烈程度應足以表示出教會和教皇對璦瑪台爾斐亞的眷顧。天主教民主黨的領袖們，其中的某些人頓·齊諾尚在他執行律師業務的時候已有友誼關係，也不惜紙墨對他大事頌揚。甚至於當時的米蘭大主教、紅衣主教舒斯脫，一個著名的反動份子和倫巴蒂亞百萬富翁的朋友，也對薩爾蒂尼表示善意。以披列聖公爵夫人為首的上流社會的夫人們和工廠主及銀行家的太太們組織了一個支援璦瑪台爾斐亞的委員會。同頓·齊諾交往和訪問璦瑪台爾斐亞一時成為名流社會中的風尚。

薩爾蒂尼在梵蒂岡和米蘭資本家集團中能取得成功，其中有着隱秘的內情。我們前面已經提及過，璦瑪台爾斐亞設在愛米里省，它因系意大利最“紅色”的省份之一而見稱。“飛行教士”就是在這一省中活躍着的。依據教會當局的意圖，頓·齊諾的活動應成為一個明顯的例子，它能證明天主教會和天主教民主黨政府不但眷顧窮人，並且還實行“真正的”共產主義，何況是通過“和善的”途徑進行的，不“委屈”資本家，甚至於幾乎不用資本家幫一點點忙。

可是不多久以後，那些贊美過薩爾蒂尼的報紙開始暗中詭

謗，說他對自己的任務自我陶醉和當真以“使徒”自負，說他憑借梵蒂岡和有產階級的財政支援，揮金如土和開空头支票。有一個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宣稱，頓·齊諾對為他所討厭的債權人慣用的答复是：“請您感謝上天，因為我沒有付還您錢。窮人們欠您的債愈多，您愈是容易進入天國”。

這就是頓·齊諾的庇護人對他的熱情開始低落的原因。

意大利各地區的孤兒和無家可歸的人因為受教權派報刊天花亂墮的宣傳所迷惑，群相湧至“友愛城”。頓·齊諾異常熱烈地歡迎他們的來到，齊諾使他們相信，“聖靈”將會养活所有人。然而“聖靈”表現了不可饒諒的吝嗇。事情在於無論梵蒂岡，無論天主教民主黨政府，無論米蘭的百萬巨富們，都不準備為實現頓·齊諾的意向而花大錢。他們原先準備捐助一些錢，其數額僅足以維持一個不大的、“很體面的”示范性的濟貧院，而連贍養一千個意大利的棄兒和無家可歸的人都不願意。

終於有一日頓·齊諾在經濟上入不敷出，無法保證供給“使徒們”以每日的面包了。雖然瑠瑪台爾斐亞的奠基人竭盡全力為公社的成員們建立正常的生活條件，可是飢餓開始經常地訪問他們。

頓·齊諾對自己的公社忠心耿耿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報紙上曾報導過，有一天公社中的一個成員在祈禱時因飢餓而昏厥過去，頓·齊諾脫下了自己的袈裟連同教會的家俱一起送進當舖，以換得的錢為自己公社中的成員買面包。然而這些英雄行為不能解決瑠瑪台爾斐亞的窮困問題。公社因為沒有貸款，很快就要破產了。薩爾蒂尼請求自己的施主增加捐款，他用地獄威脅他們，又用共產主義會來到進行恐嚇，他要求的不是數量微小的施舍，而是上百萬的錢（瑠瑪台爾斐亞在1953年初的赤字為4億3千6百萬里拉，約合75萬美元），然而人們對他揮手，象趕走討厭的蒼蠅一樣。

最後頓·齊諾忍耐不住了，他率領了全公社的人到最近的

城市摩登納去，在那里冲进了省长的官邸，要求立即付予一千万里拉，并以“革命”来威胁。省长召集了宪兵和军队以防万一，并打电话给当时的内政部长谢尔巴。谢尔巴答应付给一千万里拉，然而决不原谅萨尔蒂尼的这一举动。

这个璫瑪台尔斐亚的倡办人早就不合谢尔巴的脾胃。警察曾不止一次地报告他说，萨尔蒂尼不积极地反对共产党人，说他纵容“革命活动”，说在璫瑪台尔斐亚“共产党的代理人”在领导一切。谢尔巴有一次曾亲自访问璫瑪台尔斐亚。这次访问使他失望了，因为饥饿的“使徒们”毫不热情地接待这位教权派部长。谢尔巴为了对他们再进行一次测验，所以在璫瑪台尔斐亚设了一个选举区。选举后计算选票时，竟没有一个“使徒”⁽¹⁾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这次选举的结果最终地决定了“友爱城”及其创立者萨尔蒂尼神甫的命运。

庇护十二世先前曾声称“教皇支持顿·齐诺”，可是他任命一个以红衣主教勃尔贡契尼·杜卡为首的委员会对璫瑪台尔斐亚进行调查。顿·齐诺被召到“圣办公厅”（宗教审判厅）秘书红衣主教披萨尔杜面前受审问。意大利报纸报导说，披萨尔杜企图说服萨尔蒂尼不要因他们钱似乎不够而坚持要梵蒂冈和政府给予援助，即使有钱，也应用之于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活动。甚至当确有多余的钱的话，花来帮助需要者也是毫无意义的。披萨尔杜这样断言，因为企图根除贫穷现象和上帝为了惩罚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而降之于人间的其他罪恶，是徒劳无益的。

这位红衣主教和宗教审判官教导顿·齐诺说，企图在人间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的”邪说，因为在人间果真能使各种事情公平合理，那末就没有必要赎罪，从而教会本身的存在也是多余的了。教会的教理教导说，应该对罪恶忍耐和相信来世的公平。你在人间所受的苦难和地狱般的折磨在天国中将百倍地以幸福重报。对于这一点顿·齐诺半信半疑地问道：如果这是事实，那末为什么教皇和红衣主教们，特别是红衣主教披萨

尔杜本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人世间的苦难宁愿享受人间的幸福——难道他们不相信天国和不愿意进入天国吗？

这番谈话的结果是对顿·齐诺不利的。资产阶级的报纸继续刊登反对他的恶意宣传。有人散布谣言说顿·齐诺“被恶魔迷住了”，简单地說，他是个疯子。债权人到法院控告他蓄意不还债，而早先百般捧他的红衣主教舒斯脱发表了一个声明，谴责公社社员“不良的”思想和禁止天主教徒支持他们的“反教会的计谋”。1953年3月，红衣主教勃尔贡契尼·杜卡召璠玛台尔斐亚的创办人到罗马，当面宣读了“圣办公厅”（宗教审判厅）的决定，命令他立刻把璠玛台尔斐亚交给沙立齐安教派的代表，而自己则到遥远的僧院中去忏悔。当顿·齐诺在听判决书的同时，一队全付武装的警察根据谢尔巴的命令冲进璠玛台尔斐亚，动手捣平“友爱城”。宪兵们把成年人驱上载货汽车，押解着运到“红色的”爱米里省境外。如有反抗的，不分男女老小一概痛打。未成年的强迫分送到各寺院的孤儿院去。“使徒们”蜷缩了达九年的前集中营可怜的茅屋被谢尔巴的“基督教”警察统统拆光。

璠玛台尔斐亚及其居民们的历史到此结束。至于说到顿·齐诺，他还给梵蒂冈添了不少麻烦。

薩尔蒂尼牧师在听宣读“圣办公厅”剥夺他对璠玛台尔斐亚的领导权的决定时，他顺从教廷的意旨和答应照办，可是后来知道宪兵们摧毁了他的公社后，他从僧院中逃了出来避在朋友们的家中，写成了前面提到过的辩护书——“我们不同意”。这是一本真正的起诉书，它揭露了梵蒂冈和教权派政府在所谓社会问题上的伪善。

梵蒂冈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人统治意大利已有八年了，顿·齐诺写道，他们统治的结果是什么呢？教权派政府“不承认所有公民的生存权，鼓励剥削人民和以人民的劳动果实度奢华的日子；对公民的民主权利横加摧残，甚至于允许：滥用法律保

护私有财产，同意在雇用工人时可以根据思想意识和所属党派决定取舍；欺騙人民，允諾給所有人以住屋，事实上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人領到房屋；兴建大多数公民住不起的华丽大厦；在意大利經濟落后地区核准奴役工人，工厂主以飢餓折磨工人；迫使他們为 300 里拉或 400 里拉的工資每日工作 10 小时；付与自己的部长們和高级官員們以高薪，伪托基督的名字来哄騙穷困的天主教徒，用共产主义的危險进行恐吓，警告他們投他們的票，以及迫害不利于政府的政党。”^① 教权派政府的面目已彰彰明甚，不用多說的了。

齐諾·薩尔蒂尼确信，僧侶們和梵蒂岡对天主教民主党人的反人民政策同負完全的责任。

薩尔蒂尼把梵蒂岡和天主教民主党政府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走狗这个真面貌揭穿了。他在致蒙梯尼高僧——当时梵蒂岡的国务卿助理和对庇护十二世有相当影响的一位顧問——的信中写道：“六百万意大利人处于穷困和半飢餓状态并不是因为国家財源不足，而是因为这些資源为統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了，特别是因为它花在供养以强迫飢餓者不得反抗为职责的警察和宪兵身上。閣下，請您不要忘記，肚子是有着根本意义的。如果教皇陛下周围的貴显們也象璠瑪台尔斐亚的成員們一样地半飢不飽地过日子，他們不知道成什么个樣子，这倒是很有趣去瞧瞧的。”^②

“你們将回答道——頓·齐諾繼續写道——如果我们不得到很好的薪俸，我們又如何能在我們的宮殿中过活和工作呢？可是，当我们生活得象奴隶似的，那末你們的宮殿又关我們什么事？如果你們不是在言論上，而是在实际生活中是我們的神甫，那末拋却你們的宮殿来同我們一起生活，一起受飢餓吧。古代的神甫們都能在地洞中过活，你們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① 頓·齐諾·薩尔蒂尼：“我們不同意”，第 13—14 頁。

② 同上，第 23—24 頁。

頓·齊諾的話不但击中了蒙梯尼的要害，同时也击中了羅馬教皇的要害。璦瑪台尔斐亚的創立人其后繼續責問蒙梯尼道：“为什么梵蒂岡不把謝尔巴和天主教民主党政府革除教籍？請不要对我說：‘可怜的’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啊，难道它能够比現在还做得更多些嗎？而謝尔巴却有力量派遣載重汽車連同宪兵来反对孤寡无靠的兒童，把无罪不幸者們流放各处？一个政府推行着充滿弑子、弑母和弑父事件的社会制度，难道能把領導这个政府的人称作天主教徒嗎？”①

可是，如果教权派政府和資本家們拒絕帮助飢餓者們，梵蒂岡又为什么不帮助他們呢？

“請告訴教皇——薩尔蒂尼繼續痛斥道——讓他派自己的會計們到‘圣办公厅’的大主教会去；他們在那边将会找到必需的基金的。穷人說：飽汉不知飢汉餓。把这句来自人民的箴言印在所有教义問答和教会書籍以及寺院的帳簿的封面上，雕刻在所有基督受难象下的跪台上，将不是件坏事。”②

頓·齊諾呼吁教皇脫下他的金質王冠贈与受苦的人們。他无所惧怕。

“至多公正的敌人把您和我們一起吊起来而已——頓·齊諾安慰庇护十二世道。这种結局对于教皇、紅衣主教、主教、牧师和基督所有的战士們而言，难道不就是他們最願得到的王冠嗎？或者还是挑方便的做，宣揚一番圣殉难者們的業績和受他們余蔭的庇护，不去学习他們的榜样？”③

頓·齊諾憤懣地抨击教皇宮廷中奢侈浪费和揮霍无度的現象，永远是心怀奸計和道德腐敗的梵蒂岡权貴們和教廷中的任用亲戚的慣例，这些丑事变本加厉地随着年代的发展而发展，正与人民駭人听聞的穷困成反比例。如果这就是基督教义所生的

① 頓·齊諾·薩尔蒂尼：“我們不同意”，第30頁。

② 同上，第32頁。

③ 同上。

果实，則就不需要基督教了——齐諾·薩尔蒂尼对梵蒂岡和教权派政府的起訴書中最后的邏輯結論就是这样。

梵蒂岡要求薩尔蒂尼背弃自己的言論。对他施遍了各种威吓，答应他在被控蓄意不付債款的法庭上获得无罪的判決。

最后頓·齐諾終於屈服了。他发表声明承認自己所写的書是“錯誤的，不好的和有害的”，于是法庭宣告他无罪^①。然而这种“供詞”有什么价值呢？尚在加利略的时代起，梵蒂岡宗教审判厅早就以逼供的能手为众所周知。这种“供詞”絲毫沒有降低頓·齐諾揭发性言論的意义，相反地却証实了它的真实性和正义性。

薩尔蒂尼事件的典型性在于事件不局限于他一人，而在于其他的牧师和意大利天主教会的許多活动家都支持薩尔蒂尼，在其他国家中也有人贊同他的观点。

璫瑪台尔斐亚不仅吸引了許多需要面包果腹和房屋蔽寒的孤兒和无家可归者。許多渴望作有益于人的事业的年青牧师和修道士都傾心于璫瑪台尔斐亚，因为頓·齐諾創办的公社是有益于人的事业的象征。当时修道士和牧师自行脱离修道院和教区来到璫瑪台尔斐亚和頓·齐諾合作，这种事情曾发生过数十件。志願軍們一直捍卫薩尔蒂尼的事业到底，而梵蒂岡則如同处罚璫瑪台尔斐亚的創办人同样严厉地惩戒了他們。

甚至于某些教会当局的代表人物也贊同薩尔蒂尼的观点。例如，米兰大教堂布道师和意大利北部有势力的高级教士之一台維德·都洛尔杜牧师，也因同情頓·齐諾而被撤职和远謫至意大利境外。維尔齐尼奥·苏阿納主教也支持頓·齐諾，璫瑪台尔斐亚即在他的轄境內。虽然这位主教年已耄耋，在頓·齐諾的案件结束后仍被庇护十二世命令撤职，并禁閉在卡普青教派的一个寺院中，据說，他在“圣办公厅”的检察官长期审讯和数

^① 齐諾·薩尔蒂尼于 1955 年抛弃了神职。

度絕食(强迫斋戒)的折磨下死去。

齐諾·薩尔蒂尼及其朋友們的命运不是独一无二的。台尼洛·杜利契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建筑系学生,热忱的天主教徒,他离开了大学决定献身減輕失业者苦难的事业。他曾一度在瑞瑪台尔斐亚和頓·齐諾合作,其后在离巴勒摩(西西里的首府)不远的一个叫派尔梯尼可的小地方建立了一个移民屯居地“神的城市”;派尔梯尼可处于盜賊横行和以貧穷出名的地区內。“天主教行动”的青年报纸在最初贊揚他的事业。許多教权派报纸和杂志上也登載关于他的报导。杜利契似乎已得到政府和教会当局的支持。突然在1954年2月間的报纸上出現了一个新聞,它报导說宪兵們已解散了“神的城市”,杜利契則被拘留在米兰,并且逼迫他在不再回到西西里去的文件上签字。原因在于他的事业不合西西里地主們和黑手党的胃口,后者是意大利南部地主阶级的秘密恐怖組織,是教权派和教会在西西里的社会支柱。原来杜利契帮助雇农和貧农,“煽动”他們,他的行为有利于“赤色份子”;西西里的地主們要求自己的同乡謝尔巴終止这场“捣乱”,后者欣然地同意了(謝尔巴是西西里人,他早就和黑手党有着关系)①。

然而要制服杜利契不是那么容易。杜利契写了一本书,書名为“派尔梯尼可的土匪們”,这本书呼吁人們把西西里的农民从貧穷、飢餓、地主和政府官吏的暴行中拯救出来。謝尔巴政府倒台以后,杜利契重返派尔梯尼可,他在那里繼續从事启发农民的工作。1956年1月間,派尔梯尼可地区的失业者写了令人感动的呼吁書要求政府和意大利人民援助他們。許多組織、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演員响应了他們的呼吁。派尔梯尼可的失业者从他們那里收得了汇款、衣服、日用品邮包和書籍。天主教民主党政府也响应了他們的呼吁,派了300个輕騎兵和警察到派

① “团结报”,羅馬,1954年2月20日。

尔梯尼可。1956年2月，台尼洛·杜利契和其他六个失业貧农的领导人被捕了，并被投入监牢。由于意大利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和抗議，杜利契和他的朋友們才免于受法庭严厉的懲罰。

梵蒂岡領導对开始醒悟起来的和站在工人階級一边爭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教士和天主教活动家的对策是，孤立和誣蔑他們，以至剝夺他們的圣职。可是生活本身愈来愈經常地要求僧侶們对燃眉的問題作明确的答复。在他們間許多人之中这些問題引起了“良知上的危机”，促使他們对使广大群众必然不免于忍受貧困和匱乏的煎熬的資本主义制度表示抗議和憤慨，促使他們对为資本主义辯护和享受着人間种种福祿，另一方面却要求普通人民节慾和順从的梵蒂岡当局，表示抗議和憤慨。

下級僧侶因其社会成分关系，所以同农民和小資產階級有着密切联系，农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資本主义垄断資本的牺牲品，他們是长期地經受着精神危机和思想长期处于分化状态中。这两个階級政治上的願望和情緒也不能不反映在下級僧侶的情緒上。这方面群众性的天主教組織表現更为显著，天主教民主党也不例外，随着資本主义世界政治和經濟总危机的加深，在这些組織中愈来愈明显地出現了一股潮流，它拥护和平，要求拒絕教权派政党的亲美路綫，要求执行积极性的社会政策，以及同共产党重建友好关系。

天主教民主党党內的这股潮流是由佛罗倫薩市长乔治·披拉領導的。披拉在1953年年底因轟动意大利的佛罗倫薩“皮昂涅”工厂停閉事件而声名大噪。“皮昂涅”工厂屬于与美国大垄断資本“杜邦公司”有联系的意大利大托拉斯“斯維亞·維斯科薩公司”。梵蒂岡是“斯維亞·維斯科薩公司”股票的持有者之一。“皮昂涅”工厂制造机器設備和軍事裝备。1953年年底，美国人借口“皮昂涅”工厂的大多数工人是共产党人而命令閉厂。“斯維亞·維斯科薩公司”順从地执行了命令，于是2,500人以上的职工——包括家屬将近一万人——流落在街头。共产党人、左翼

社会党人、意大利总工会和佛罗倫薩的人民起来保护“皮昂涅”工厂的工人。佛罗倫薩市长披拉也起来保护工人，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議員和領袖之一。他向意大利所有的主教和所有政党的領袖——包括左翼政党——发出呼吁書，請求他們支持“皮昂涅”工厂的工人和不准停閉工厂。披拉的倡議得到了紅衣主教列卡洛和其他一些主教以及群众性天主教組織的积极分子的支持，不消說，当然也得到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的支持。这在事实上建成了从天主教徒到共产党人的广泛的国民陣綫，为“皮昂涅”工厂工人的权利而斗争的陣綫，最終它保證了工人获得胜利和迫使“斯維亞·維斯科薩公司”重新开工。

上述的事实証明，在天主教陣营中有着两股主要的潮流：一股执行反动政策，另一股要求改变这一路綫，准备同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一起，尽管他們已被逐出教会，来共同保卫人民的权利。許多征象足以証明第二股潮流的势力正在增长。

意大利青年天主教运动組織中对教权派政党和梵蒂岡官方路綫的不滿情緒也在发展着。1954年“天主教行动”青年組織的主席露西主张联合各种力量爭取和平，爭取禁止热核武器，为当局所不容，因而辞职。1956年天主教民主党总書記范范尼因該党青年組織的領導机关“同情共产党”，故予以解散^①。在“天主教行动”的青年中，新的思想正愈来愈寬广地为自己开拓道路，当这些青年一旦从“灵魂上的輔導者們”的监护下解放出来时，将会看清意大利的社会实际。

陶里亚蒂于1954年4月在分析天主教运动中的这些新趋势时写道，如果稍微站得离教权派上层分子远一些，那么“你会遇見一些人，他們看到和意識到現今人类面临的严重問題，然而应循什么途径去解决它，他們沒有信心，所以他們表示悲觀和不信任。如果你去注意中层分子和广大的天主教群众，那么你

^① “前鋒”，羅馬，1956年7月8日。

会发现，他們的情况則完全不同。他們之間的大部分人已經同我們在一起，追隨我們和投我們的票。然而就是那些不和我們站在一起，仍舊敵視我們的天主教徒，他們也感覺到有那种必要，如同我們所領導的群众所考慮的。可以这样說，在有組織的天主教世界所依靠的群众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所領導的群众之間，現今有着比他們的領導者之間較多的相同的观点。因此，相互諒解、相互接近和取得協議有着很大的可能，我們應該循着这一途径前进。我們的活動就應該根据这一方針，我們意大利共产党人是居住在天主教世界的中心，我們担負着历史和历史演变这一异常重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一个新的問題。因此應該有新的指示和决定。”^①

陶里亚蒂在另一篇演說中声称“我們不要求天主教陣营支持我們的一切要求……”

我們建議天主教力量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所有的进步力量达成具体的協議，以解决国际政策方面和內政方面的主要問題。例如，可以就反对原子武器的斗争，就消除国内政治紧张局势的社会性措施方面达成協議”^②。

1955年，天主教群众对“冷战政策”的反对声加强了。天主教陣营內的危机無論在上层或下层，都加深了。不仅是謝尔巴政府的下台証明了这点，为范范尼—謝尔巴集团所反对的格隆基当选为意大利总统也証明了这点。

1955年年初，意大利議會中有两个天主教民主党議員巴尔戴柴基和梅隆尼起而譴責批准巴黎协定，他們立即被开除出党，然而他們繼續为和平而斗争。

天主教組織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在覓求和共产党人联系

① 陶里亚蒂：“爭取意大利所有民族力量的大團結”（“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4年6月23日）。

② “真理报”，1954年6月3日。

的方式，和奉行或开始奉行显然不是天主教民主党领导所希望的路綫。

奥地利国家条约——它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和在中立的基础上和平地发展——的签订，不能不对意大利天主教集团的情绪发生影响。天主教民主党米兰组织的书记卡米罗·里派蒙蒂为此曾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米兰教权派的“展望”周刊上（这个周刊支持格隆基总统的路綫），作者在文章中批评“愚蠢的、讨厌的反共路綫”，要求把前战犯密席元帅从天主教民主党议会党团中清除出去和赞成奥地利中立。里派蒙蒂希望“天主教阵营和亚非两洲的中立国家并列，同样成为新的国际力量中的一个领导者和决定性因素，这股力量的特点应该是争取真正的局势缓和以及同各族人民和平共处”。反映参加前抵抗运动的天主教徒意见的天主教杂志“自由和幸福”，和国会议员巴尔戴柴基和梅隆尼出版的“政治评论”杂志也发表同样的文章^①。

佛罗伦萨市长披拉坚决要求在国内施行进步性社会改革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1955年6月，披拉向“真理报”驻意大利记者发表谈话，赞成改善意大利和苏联间的关系^②。

披拉对“真理报”记者谈话中所表示的思想和愿望，以及他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代表谈话这一事实，引起了梵蒂冈统治集团的不满。“罗马观察家”在6月末刊文谴责披拉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梵蒂冈官方刊物的攻击引起意大利和法国一些著名的天主教活动家的抗议，他们声明和披拉是团结一致的。其中法国天主教活动家法朗索·莫里阿克声称：“随你们怎样说吧，可是我是支持披拉的，因为首先我服从自己的良知，我认为良知高于其他一切权威。”^③

梵蒂冈对根据披拉倡议而召开的“争取和平和争取基督文

① “新生命”，罗马，第24期，1955年6月12日。

② “真理报”，1955年6月21日。

③ “新论”，第14期，罗马，1955年，第96页。

明”會議抱否定態度，特別是对1955年7月在佛罗倫薩召開的最后一次會議。这次會議上第一次响起了号召結束“冷战”，号召东西方之間走向合作，号召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間互相諒解的呼声。耶穌会徒达尼耶隆和莫里阿克的演說最引人注意。

达尼耶隆号召天主教徒勇敢地站在工人一边，工人們的目的是从“奴役和剝削中解放出来与爭取在經濟和政治上成熟”，和支持“亚非两洲年青的刚刚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各族人民”。“社会主义者——他說——應該欢迎天主教徒参加斗争，以實現社会主义者已为之奋斗百余年的理想，基督教在許多情况下对这种理想是抱敌对态度的。如果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最終証明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他們祈祷得比基督徒好（指行动而言，达尼耶隆解釋道——作者），意味着上帝欢喜社会主义者較欢喜基督徒为深。然而主要不在确定誰是第一，而在于使被压迫者获得解放，在于把潜在的人变为真正的人。”^①

耶穌会徒达尼耶隆的演說是一个新的証据，它証明甚至在耶穌会內部，也絕非全部会徒都支持“冷战政策”。它同样証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对天主教教会奉行的对于資产階級和帝国主义有利的“社会”政策的批評，是完全有根据的。莫里阿克在这方面的演說也是同样地激昂慷慨和坚决。

他承認資产階級把宗教視作馬勒，靠了宗教它能够使人民順从。“宗教是必需的，但只是对于人民而言”，这句话是欧洲資产階級所有創作当中最坏的一件——莫里阿克說。莫里阿克承認，宗教已被有产階級利用来欺騙穷人，来散布“我們自己也不相信的关于来世的神話，使穷人甘願在人間做个被剝削的人”。有产階級是根据这原則活动的，即“宗教之所以好不是因为它是正义的，而是因为它能减弱奴隶們对解放的渴望，所以是有益的”。“太多的基督徒——莫里阿克繼續談到——認為自己容忍

^① “新論”，第14期，羅馬，1955年，第104頁。

現存的生活条件是正当的。他們以相信来世的公正为借口，很容易和不正义的事情和易相处”。莫里阿克号召天主教徒改变現存的社会秩序和反对“在我們民主国家中占統治地位的所有諸神之中最残忍的一个——英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法国的金錢之神，它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无休止地洒穷人的血”^①。

誠然，莫里阿克远非彻底的人，也不理解共产主义思想意識的本質，然而这并不貶低他对高級僧侶批評的意义。

左翼天主教徒的言論引起了梵蒂岡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反动領導的迫害。1955年7月，范范尼对该党青年組織領導机构的人員翁貝尔托·扎波里、法朗哥·勃雅尔奇和朱席披·克雅拉蒙梯予以紀律处分，因为他們以观察者身份出席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扎波里因此“罪”被罰不准参加党的任何政治活动12个月。在同一时期，“展望”杂志的編輯蒙別罗·麦凱蒂、天主教民主党华列席省党組織的领导人之一，被开除出党。天主教民主党領導机关的決議中說，因为他所領導的杂志执行的路綫“与党的路綫相抵触并損害党的威望”。我們前已提及，“展望”杂志批評“实力政策”。

如果范范尼在1955年年初能够相当輕易地将巴尔戴柴基和梅隆尼逐出党外，因为他們反对无条件接受巴黎协定，那末这一次同样的决定則遭到了許多教权派組織强烈的抗議。“展望”杂志对中央領導机关决定的答复是召开了一个專門會議，出席的有天主教民主党各省委员会和都灵、斯比塞、波倫亚、威尼斯、华列席、諾瓦拉、那不勒斯和其他各城市委员会的許多委員。會議的決議書中說，开除麦凱蒂出党“使外省的党組織惊异，如果不說憤怒的話，因为我們認為“展望”杂志始終一貫和忠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米兰的天主教民主党省委员会，天主教徒游击隊員协会和一系列其他教权派組織也作出了同样的決議。

^① “新論”，第14期，羅馬，1955年，第105—106頁。

意大利報紙在評論這些事件時表示疑問道，天主教民主黨領導機關難道能以殘暴的方法擊敗天主教群眾對黨執行的政治路線的日益增強的反抗嗎？報紙的推測是正確的。

1956年3月，意大利總統格隆基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他號召西方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平競賽。他說：“無論誰，無論個別的人，無論國家，無論國家集團，都不能不異常憂慮地探討着世界的前途，世界的和平發展只依靠着軍事力量……”。格隆基說，軍備競賽“對於意大利是個悲劇性的奢侈行為”。必須以發展國家經濟和進行社會改革來代替軍備競賽。格隆基示意道，美國侵略力量要求對共產黨人進行警察迫害，是毫無效果的。格隆基的演說證明，即在天主教民主黨內部，對教權派領導機關數年來執行的反動路線的反抗也在增強着。

共產黨人對教權派陣營內的危機又抱什麼態度呢？天主教民主黨人隊伍中任何一點進步現象都使我們高興，隆哥說道，可是我們應該指出言與行之間的每一個矛盾處，指出前提與結論之間的每一個矛盾處，因為光揭露是不夠的，應該行動，光有很好的綱領是不夠的，應該擁有能實現這綱領的社會力量，光知道什麼叫做力量是不夠的，而應該把各種力量聯合起來，動員和投入行動^①。

今日的共產黨人和昨日的一樣，仍舊毫無例外地向所有的信徒伸出手去，建議共同為和平、進步和自由，為各族人民間的友誼，為人類的幸福而鬥爭。共產黨人認為，哲學和宗教上的分歧不應該妨害人們共同為實現這些目的而鬥爭。

陶里亞蒂在關於蘇共二十次黨代表大會總結的演說中聲明：

“象往常一樣，我們特別向天主教人士發出呼喚。在過去，每當一群瘋子要把人類投入恐怖的、毀滅性的原子戰爭這種危

^① 隆哥：“意大利共產黨人為自由、和平與向左轉而鬥爭”（“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5年8月6日）。

险^①特殊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发出呼吁，这种呼吁必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没有收到所需要那样大的效果。现在的情况可不同了，我们最近听到，天主教会的领袖在圣诞节那天提出了一些旨在改善国际局势的建议。他的建议涉及到禁止试验原子弹，开始进行即使是局部的裁减军备，建立对军备的监督。在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还认为这都是应当立即实行的一切措施。我们当时说过，这些建议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的合理的基础。

这很好，在我国政府中，天主教政治运动的代表占大多数，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政府。那末，政府中的多数派为什么自己不提出天主教会领袖所作的建议呢？他们为什么不根据这些建议来使意大利政府采取主动，促使国际紧张局势继续缓和，帮助改善国际关系并解决人类当前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呢？天主教人士怎样看待亚洲几个最大的国家所制定的并为苏联所接受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国家主权，互不侵犯，进行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呢？难道说佛教徒、回教徒以及信仰其他亚洲宗教的人民能够做到的事情，天主教人士在这方面却不能做吗？天主教人士难道应该堕落到只是来保卫美国生活方式吗？在这方面说来，美国生活方式也就是意味着‘实力地位’政策，即把全世界引向战争边缘，从而使帝国主义者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攫取更大利润的政策。这些就是我们要提出的实际问题，我们要求确切的答复。”^①

天主教运动队伍中准备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为保卫和平和社会进步而共同斗争的这种力量的加强，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们的欢迎。

^① 陶里亚蒂：“争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新条件”（“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6年3月29日）。



2 021 5407 9

譯者后記

八十二岁的羅馬教皇庇护十二世已于1958年10月9日因患腦充血逝世。10月28日，由五十一位紅衣主教在梵蒂岡教皇选举密議室投票选出了精通梵蒂岡外交的意大利人、七十六岁的安杰洛·米塞佩·朗卡利紅衣主教为新教皇。新教皇原来是威尼斯的大主教，他当选后立即选择了約翰二十三世这个称号，这是羅馬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第二百六十二位最高統治者。